

红船扬帆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抒情散文选

刘白羽 涂怀章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序

涂怀章

让我们追溯到八十年前。

浙江嘉兴南湖。7月的一天，乌云低垂，雨雾蒙蒙，游船如织。其中，一艘画舫绕湖心小岛悠然行进，直至深夜，它就是后来被载入中国和世界革命史册的“红船”。当时，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上海转移到船上进行，12名出席者，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70名党员，讨论了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步骤与前途。红船扬帆，党从这里起步。人民拥护，党壮大为浩浩荡荡的队伍。党率领她的队伍浴血征战，上井冈，反“围剿”，爬雪山，过草地，饮马延河，逐鹿中原，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终于使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翻身站立起来。从此，百姓胸中永久萦回着对红船的思念，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阳光照亮大地，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独立、自由和幸福，创建了万古不朽的功勋。20世纪中叶，党走过弯路，但她自己矫正了前进的方向，率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胜利跨入21世纪。而今，12亿同胞沐浴在现代化生活的曙光里，一首《春天的故事》，表达了我们的感激。

八十年过去了，人民对红船的思念更加炽热、深沉。

为了向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盛大节日献礼，长江文艺出版社邀约刘白羽先生和我共同选编一本散文集，正合我们的心愿。刘白羽是一位革命经历丰富、创作成就卓越的散文名家，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从阅读他和很少几位名家的作品开始学习散文的，能够和这位可敬的师长合作完成神圣的使命，深感愉悦。

根据周百义社长的构想，经与周季胜副总编具体研讨，我们对八十年来发表的中国散文分三个时期进行挑选。第一辑，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40 年代末，有革命先驱李大钊呼唤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的号角，有党的领袖瞿秋白对苏俄十月革命经验的传播，有民族文化主将鲁迅为拆毁旧中国“铁屋”发出的呐喊，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文学大师对党领导人民浴血战斗史迹的记叙，有其他名家对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方志敏同志的《清贫》，作者系我党高级干部，时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被俘时身上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外，没有一个铜板，连敌人的士兵也不信。家中同样清贫，只有几套旧汗褂裤和几双缝底线袜是惟一的财产。读着这样的文章，联想作者为革命的英勇就义，谁能不肝肠寸断、潸然泪下。今天，那些官居高位却贪占巨额钱财、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的腐败分子，在这样伟大高尚的共产党员及其文章面前，绝对无地自容。笔者以为，《清贫》一类的文章，乃是我党思想建设的光辉经典，应该世代代传授下去。

第二辑，新中国建立至 70 年代中期，所选散文主要为

两部分。一是欢呼革命胜利、讴歌解放初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字，二是回忆党的光荣历史、记叙个人在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的篇章。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誉为“散文三大家”的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文章。刘白羽的散文，大气磅礴，格调高昂，语言如烈火狂飙，想象若彩虹闪电，结构自然灵活，充满激情与哲思，文采飞扬。你会读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对艺术上的“大散大美”，却无法模仿。杨朔的笔下，端庄清丽，秀美俊逸，一般有人物情节，讲求结构巧妙，营造诗情画意，语言清新洗练，风格爽朗明快。其章法比较好学，但应提防雕琢之痕。秦牧的字里行间，涉世深邃，视野开阔，经验丰富，情感厚重，知识渊博，常以审美的眼光看自然，用艺术的语言说科技，具体篇什不宜临摹，总体技能值得师承。还有曹靖华、吴伯箫、峻青、袁鹰的散文，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他们均写出过脍炙人口的名篇。因容量有限，所有名家均只能入选一篇。

第三辑，“新时期”始，至新世纪初，入选内容有三：一是欢呼“新时期”的到来，歌颂党领导人民平息“十年动乱”的胜利，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二是拜谒革命胜迹，回忆、赞扬党的领袖及相关时代的生活历程；三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带给祖国繁荣幸福的新景象，直至歌赞香港与澳门的回归。其中，作家魏钢焰60年代发表过许多影响深远的歌颂党的散文，如《船夫曲》、《艳阳漫步》、《没出唇的歌》、《行军》等。本书选他的《党又跨上了战马》，是为了标志一个新时期的起点。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十年的散文，与“文革”前的写法很不相同，它们很少像过去那样

引吭高歌，直抒胸臆，而是随意描述山川草原、厂矿企业、街市巷陌的新人新景，自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四个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

实践证明，八十年来，党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本书所选散文，多数描绘了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记录了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光辉足迹。但我们不应忘记，党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有过许多深刻沉痛的教训，当下和今后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中国诞生以前，解放区以外，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直接歌颂和反映党的生活的作品，数量有限，编选起来颇费气力。应该说，敞开胸怀尽情歌颂党的文章，上个世纪50—60年代发表得最多，质量也高。因为党纪严明，党风纯正，人民的感激之情自然奔放于大量散文之中。尽管有过浮夸冒进年代，可是，党及时作了纠正，领导我们战胜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很快赢得了亿万百姓的赞颂。我在大学阶段，曾经大量阅读当时的散文，留下了美好深刻的记忆，后来注重研究散文，也与那时的印象有关。令人惊奇的是，编选本书时，当我走进许多图书资料库，发现此类作品很难找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文革”之中遭劫掠毁坏；旧报刊被处理掉；老作家编新文集时较少辑录。70年代后期以来，更出现了奇特现象。我翻遍各地出版的《新时期抒情散文选》、《八十年代散文选》、《九十年代散文选》、多种散文《年鉴》、个人散文集，所获甚少。我想，可能是因为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写法“深沉”了；再者，外面的思潮进来了，新生代脑海里“多元”了，“个人的歌”就高产了。毋庸讳言，转型期惊人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是许多作家提不起精神的原因。那

么，如何看待成绩和困难？怎样响应党的召唤继续完成改革大业，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不要颂歌的创作？当今作家必须思考这些问题。

跨入 2001 年，党率领我们走上了新世纪的光辉里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迅速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度发展和进步，是我们渴望实现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自然由两个文明建设的具体内容组成。作为中国作家，尤其党员作家，我们应该看到新时期有目共见的伟大成就，看到灿烂的明天，以献身的精神和实在的创作投入党领导的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业，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对于腐败和落后，对于问题和弊端，我们肯定要抨击。对于成绩和光明，对于高尚和伟大，我们更要热烈拥抱，大声赞颂。任何历史时期都需要颂歌的创作，因为歌颂好的，就是批判坏的，就是树立正气，支持社会进步，鼓舞人民走向胜利与幸福。当然，我说的颂歌不是口号式的无根据的盲目的谀词，而是实事求是的精彩的有深度的抒情。

我们应当在两个问题上求得共识：一是正确处理坚持“二为”方向与充分发挥作家“个人创造性”的关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作家的“个人创造性”（或说“个性”），可以体现在题材和样式的自由选择上，体现在主题的开掘、形象的塑造、艺术技巧的自由运用上，体现在个人创作习惯与风格的自由表达上，但对“二为”的方向、动机和追求的效果不能动摇，更不能相反。个性应该服从方向，个人创造性必须发挥在通向“二为”方向的路上。二是正确认识坚

持“双百”方针与弘扬反映时代精神的主旋律的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一项基本方针，要求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鼓励探索与创新。在如何提高艺术水平、判断优劣、裁决是非上，提倡平等争鸣，支持自由发展与竞赛，不搞行政命令。这与党提出的努力描绘、讴歌、表现我们伟大的民族和国家，塑造新人物，谱写新的时代乐章，弘扬反映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把激励人们热情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为自己的责任，是不矛盾的。我们既不能把贯彻“双百”方针理解为可以不顾动机和效果随心所欲地宣泄，也不能把弘扬主旋律理解为“政策图解”，为几个具体口号服务，公式化地宣传限定的工作内容，传达某集团某长官的个人意志，更不能理解为宣扬“文革”前的极左观点。我认为，党的宣传和文艺管理部门，有号召、提倡和组织某题材创作的自由，作家有接受指定题材和任务、配合宣传的自由。同样，作家也有表达个人意志、倾向、观点的自由，但没有对别的作家接受创作任务配合宣传进行指责的权利。弘扬主旋律的范围是宽阔的，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赞美党和政府，是弘扬主旋律。关注人民疾苦，指陈时弊，揭露腐败，鞭挞丑恶，也属这一范围。作家有发表个人见解、运用不同形式、从属不同流派、显示不同风格的自由，但不应有“诲淫诲盗”、损害公益、阻碍社会进步的自由。文艺评论有同志式的批评的自由，也有以平等态度反批评的自由。就散文创作而言，既然可以写花、鸟、虫、鱼、玩偶、宠物、“小女人”、“小男人”，那么我觉得，更应该提倡写世纪风云、民间疾苦、都市改革、乡村迁变、军营号

角、学府钟声、社区风尚。总之，应该用散文大写新世纪的壮丽与辉煌！

让我们沿着南湖红船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

2001年7月

目 录

序	涂怀章 (1)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李大钊 (1)
《呐喊》自序.....	鲁 迅 (3)
赤色十月	瞿秋白 (9)
清贫.....	方志敏 (11)
雷雨前.....	茅 盾 (14)
梅园新村之行.....	郭沫若 (17)
向光明走去.....	郑振铎 (20)
血梯.....	王统照 (23)
《西行漫画》题记	阿 英 (26)
陕北之行.....	范长江 (28)
一面光荣的旗帜.....	白 朗 (46)
挥手之间.....	方 纪 (52)
三五年是多久.....	曹靖华 (61)
信念.....	袁 鹰 (67)
北京.....	老 舍 (71)
中国的春天.....	丁 玲 (75)
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巴 金 (85)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臧克家 (89)

新疆在欢呼	碧 野 (93)
黄浦江的早晨	靳 以 (100)
大青山的颂歌	玛拉沁夫 (104)
登上地球之巅	郭超人 (110)
因为我们是幸福的	曾 克 (120)
雪窗驰想	冰 心 (124)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127)
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 (132)
遵义的早晨	张树钦 (140)
红玛瑙	刘白羽 (148)
秋色赋	峻 青 (157)
雪浪花	杨 朔 (164)
土地	秦 牧 (169)
路标	魏 巍 (177)
朵朵葵花向太阳	季羨林 (183)
大河与浪花	杨 沫 (188)
党又跨上了战马	魏钢焰 (192)
洪波启示录	涂怀章 (196)
启明星	杜 宣 (204)
梦绕南湖	童嘉通 (209)
临江楼记	何 为 (211)
谒雨花台	紫 风 (215)
延河灯火	罗夫生 (220)
广场一片情	吕锦华 (222)
梦秋白	张 惟 (225)
毛泽东与《人民文学》	周 明 (234)

便是寻常百姓家	毛新宇 (238)
周总理与第一次文代会	吴泰昌 (243)
一束鲜花	李玲修 (246)
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	刘成章 (249)
我怀想最初的年轮	贾宝泉 (257)
太行这条龙	郝宝铭 (264)
荒原的图腾之城	赵建英 (268)
浪花拥抱的热土	孙友田 (271)
红日下，那片黄土地	冀 人 (274)
火焰山下	李 禾 (280)
鹰与井架	吴 强 (283)
今日兰考	张守仁 (287)
雾岛	徐荣木 (293)
西藏二题	王宗仁 (297)
古城彩道	刘建权 (300)
鸟枪换炮的时候	萧重声 (304)
小街风情	陈残云 (309)
市声	吴 文 (313)
昆明夜市	高洪波 (320)
生意人	吴庆安 胡德阳 (324)
这里没有冬天	骞国政 (328)
我背“长城砖”	黄宗英 (333)
山鸟飞去又飞回	宗 鹰 (339)
从拱北到关闸	傅宁军 (343)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李大钊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迭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

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的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到一种冒险的美趣。

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

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

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选自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民国》第一卷第二号）

《呐喊》自序

鲁 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

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板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

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

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

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选自《散文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赤 色 十 月

瞿秋白

第三电力劳工工厂——旧时的奇纳摩工场。

十月革命的纪念。工厂中人集合无数，……晚会。劳动神圣的工人，他们所见所受已不少了：凶恶的哥萨克驱逐工人，风暴似的罢工运动，势不相敌的对垒争斗，今天却有多少人庆祝他们来，——十月革命，——职员，工人，家属，一群一群往工厂里去。

工厂管理人现在是乌哈诺夫，宣布开会，用简短的演说辞，略述十月时的经过，吊革命中之战死者，——大家都站立致敬，奏哀歌之后，一个一个陆续发表热烈的祝辞。

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了：

“‘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

列宁末后几句话，埋在热烈的掌声中。

鼓掌声，万岁声，国际歌乐声，工厂的墙壁，都显得狭隘似的，——伟大的能力正生长。……

会完了。一大半到饭厅晚宴。有一群工人到工厂管理处去说：“唔，谢谢你，乌哈诺夫同志，我们又见着了伟人了。”

赤色十月工厂中的庆祝晚会，确有限盛意。

——十一月七日为彼得城无产阶级暴动的纪念日，适俄旧历十月二十五日，故称“十月革命”。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八日

（选自《赤都心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四年六月版）

清 贫

方志敏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而且猜到我是谁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儿，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钉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地失望啊！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夏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民党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夏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惟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

（选自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五月版）

雷 雨 前

茅 盾

清早起来，就走到那座小石桥上。摸一摸桥石，竟像还带点热。昨天整天里没有一丝儿风。晚快边响了一阵子干雷，也没有风，这一夜就闷得比白天还厉害。天快亮的时候，这桥上还有两三个人躺着，也许就是他们把这些石头又困得热烘烘。

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看不见太阳。然而太阳的势力好像透过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头顶。

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乌龟壳似的。田里呢，早就像开了无数的小沟，——有两尺多阔的，你能说不像沟么？那些苍白色的泥土，干硬得就跟水门汀差不多。好像它们过了一夜工夫还不曾把白天吸下去的热气吐完，这时它们那些扁长的嘴巴里似乎有白烟一样的东西往上冒。

站在桥上的人就同浑身的毛孔全都闭住，心口泛淘淘，像要呕出什么来。

这一天上午，天空老张着那灰色的幔，没有一点点漏

洞，也没有动一动。也许幔外边有的是风，但我们罩在这幔里的，把鸡毛从桥头抛下去，也没见它飘飘扬扬踱方步。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气的大筒里似的，人张开两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进来只是热辣辣的一股闷。

汗呢，只管钻出来，钻出来，可是胶水一样，胶得你浑身不爽快，像结了一层壳。

午后三点钟光景，人像快要干死的鱼，张开了一张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条缝！不折不扣一条缝！像明晃晃的刀口在这幔上划过。然而划过了，幔又合拢跟没有划过的时候一样，透不进一丝儿风。一会儿，长空一闪，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缝。然而中什么用？

像有一只巨人的手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边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这巨人已在咆哮发怒；越来越紧了，一闪一闪满天空瞥过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幔外边来了巨人的愤怒的吼声。

猛可地闪光和吼声都没有了，还是一张密不通风的灰色的幔！

空气比以前加倍闷！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会猜想这时那幔外边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气；你断得定他还要进攻。你焦躁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闪电光，那隆隆隆的怒吼声。

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来了苍蝇。它们从齷齪的地方飞出来，嗡嗡的，绕住你，钉你的涂一层胶似的皮肤。戴红顶子像个大员模样的金苍蝇刚从粪坑里吃饱了来，专拣你的鼻子尖上蹲。

也等来了蚊子。哼哼地，像老和尚念经，或者老秀才读古文。苍蝇给你传染病，蚊子却老实要喝你的血呢！

你跳起来拿着蒲扇乱扑，可是赶走了这一边的，那一边又是一大群乘隙进攻。你大声叫喊，它们只回答你个哼哼，嗡嗡！

外边树梢头的蝉儿却在那里唱高调：“要死哟！要死哟！”

你汗也流尽了，嘴里干得像烧，你手脚也软了，你会觉得世界末日也不会比这再坏！

然而猛可地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胡——胡——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像剥落了一层壳那么一爽。霍！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罢！

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选自茅盾《速写与随笔》，开明书店一九三五年版）

梅园新村之行

郭沫若

梅园新村也在国府路上，我现在要到那儿去访问。

从美术陈列馆走出，折往东走，走不好远便要从国民政府门前经过。国府也是坐北向南的，从门口望进去，相当深远，但比起别的机关来，倒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宫殿式的外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形体太小，并不威武，虽然有点近代化的写实味，也并不敢恭维为艺术品，能够没有，应该不会是一种缺陷。

从国府门前经过再往东走，要踱过一段铁路，铁路就在国府的墙下，起初觉得似乎有损宁静，但从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够这样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横过铁路和一条横街之后，走不好远，同在左侧的街道上一条侧巷，那便是梅园新村的所在处了。

梅园新村的名称很过听，大有诗的意味，然而实地的情形却和名称完全两样。不仅没有梅花的园子，也不自成村落。这是和“百家庄”一样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岖不平，听说特种任务的机关林立，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号的周公馆，应该是这儿的一座绿洲了。

小巧玲珑的一座公馆。庭园有些日本风味，听说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地方。园里在动土木，在右手一边堆积了些砖木器材，几位木匠师傅在加紧动工。看这情形，恩来先生显然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这样的存心——在这个小天地里面，对于周围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设的轨范。

的确，我进南京城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南京城还是一篇粗杂的草稿。别的什么扬子江水闸，钱塘江水闸，那些庞大的惊人的计划暂且不忙说，单为重观瞻起见，似乎这首都的建设是刻不容缓了。然而专爱讲体统的先生们却把所有的兴趣集中在内战的赌博上，而让这篇粗杂的草稿老是不成体统。

客厅也很小巧，没有什么装饰。除掉好些沙发椅之外，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台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西侧的壁炉两旁，北面与食厅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书架式的壁橱，在前应该是有书籍或小摆设陈列着，现在是空着。有绛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厅。

仅仅两个月不见，恩来先生比起重庆时瘦了。大约因为过于忙碌，没有理发的闲暇吧，稍嫌过长的头发愈见显得他的脸色苍白。他的境遇是最难处的，责任那么重大，事务那么繁剧，环境又那么拂逆。许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但却丝毫也不敢放松，不能放松，不肯放松。他的工作差不多经常要搞个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时间供他睡眠，有时竟至有终日不睡的时候。他曾经叹息过，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无益的谈判”里继续不断地消耗了。谈判也不一定

真是“无益”，他所参预着的谈判每每是关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比较起来，成就究竟是显得那么微末。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的悲哀，这是一位才干出类的人，才没有更积极性的建设工作给他做。

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祷祝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肠胃有点失调，恩来先生也不大舒服，中饭时被留着同他吃了一餐面食。食后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有什么会合去了。

借了办事处的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去拜访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党的代表们，两处都不在家，我们便回到了中央饭店。

（选自郭沫若《南京印象》，群益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向光明走去

郑振铎

谁都喜爱光明的。虽然也许有些人 and 动物常要躲在黑暗之中，以便实行他们的阴险计划的，但那是贼，是恶人，是鸱，是蝙蝠，是狐。凡是人，是正直的人或物，总是喜爱光明，总是要向光明走去的。

黑漆漆的夜，独自走在路上，一点的星光，月光，灯光都没有，我们心里真有些怕。夏天的暴雨之前，天都乌黑了，无论孩子大人，心里也总多少有些凛凛然的，好像天空要有什么异样的变动。山寺的幽斋中，接连的落了几天的雨，天空是那样的灰暗，谁都要感到些凄楚之意。

但是太阳终于来了。接着夜而来的是白昼，接着暴雨而来的是晴光，接着灰暗之天空的是蔚蓝色的天空。那时，不知不觉的会有一阵慰安快乐的感觉，渗入每个人的心里，会有一种勇往活泼的精神，笼罩在每个人的脸上。

在黑暗中走着的人，在夏雨中的人，在灰暗的天空之下的人，总要相信光明的必定到来。因为继于夜之后的一定是白昼。夜来了，白昼必定不远的。继于阴雨之后的，一定是阳光之天。雨来了，太阳必定是已躲在雨云之后的。

那些只相信有阴雨之天，只相信有夜的人，且让他们去。我们是相信着白昼，相信着阳光之必定到来的。

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我猜一定不会错，每个人一听到这句问话，都必定要皱着眉头，在心里叹着气答道：“黑暗时代！”

是的，是的，现在是黑暗时代。

政治上，社会上，国际上，家庭上，有多少浓厚的阴影罩着！且不必多说，这许多，许多黑暗的事实，一时也诉说不尽。

但是“光明”已躲在这些“黑暗”之后了！我们要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还要迎着光明走去！譬如黑夜独行，坐在路旁等天亮，那是很可羞；如果惧怕黑夜而躲进小岩洞或小屋之内，那更是可耻。

我们相信光明必定会到来，我们迎上去，我们向着他走去！

在黑夜里，踽踽的走着，到了天亮时，我们走到目的地了，那是多未快慰的事呀！

那些见黑暗而惧怕，而失望的，让他们永躲在黑暗中吧；那些只相信有黑暗而不相信有光明的，也让他们的生活于黑暗之洞里吧。我们如果是相信“光明”的，我们便要鼓足了勇气，不怖不懈，向着光明走去。

我们不彷徨，我们不回顾。人类是永续不断的一条线，人间社会是永续不断的努力的结果。我们虽住在黑暗之中，我们应努力在黑暗中进行，但也许我们自身，是见不到光明的。人类全体永续不断的向着光明走去，光明是终于会到来的。

走去，走去，向着光明走去。

光明终于是要到来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选自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二二七期）

血 梯

王统照

中夜的雨声，真如秋蟹爬沙，急一阵又缓一阵。风时时由窗棂透入，令人骤添寒栗。坐在惨白光的灯下，更无一点睡意，但有凄清的，幽咽的意念在胸头冲撞。回忆日间所见，尤觉怆然！这强力凌弱的世界，这风潇雨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争斗的人生，……真如古人所说的“忧患与生俱来”。

* * *

昨天下午，由城外归来，经过宣武门前的桥头。我正坐在车上低首沉思，忽而填然一声，引起我的回顾：却看几簇白旗的影中，闪出一群白衣短装的青年，他们脱帽当扇，额汗如珠，在这广衢的左右，从渴望而激热的哑喉中对着路人讲演。那是中国的青年！是热血沸腾的男儿！在这样细雨阴云的天气中，在这凄□无欢的傍晚，来作努力与抗争的宣传，当我从他们的队旁经过时，我便觉得泪痕晕在睫下！是由于外物的激动，还是内心的启发？我不能判别，又何须判别。但桥下水流活活，仿佛替冤死者的灵魂咽泣；河边临风摇舞的柳条，仿佛惜别这惨淡的黄昏。直到我到了宣武门

内，我在车子上的哀梦还似为泪网封住，尚未曾醒。

我们不必再讲正义了，人道了，恰如平伯君之言，正义原是有弯影的，（记不十分清了，姑举此意）何况这奇怪的世界原就是兽道横行，凭空造出甚么“人道”来，正如“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我们真个理会得世界，只有尖利的铁，与灿烂的血呢！平和之门谁知道建造在那一层的天上？但究竟是在天上，你能无梯而登么？我们如果要希望着到那门下歇一歇足儿，我们只有先造此高高无上的梯子。用什么材料作成？谁能知道，大概总有血液吧。如果此梯上而无血液，你攀上去时一定会觉得冰冷欲死，不能奋勇上登的。我们第一步既是要来造梯，谁还能够可惜这区区的血液！

人类根性不是恶的，谁也不敢相信！小孩子就好杀害昆虫，看它那欲死不死的状态便可一开他们那天真的笑颜。往往是猴子皮气发作的人类，（岂止登山，何时何地不是如此！）“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话，并非奇论。随便杀死你，随便制服你，这正是人类的恶本能；不过它要向对方看看，然后如何对付。所以同时人类也正是乖巧不过，——这也或者是其为万物之灵的地方。假定打你的人是个柔弱的妇女，是个矮小的少年，你便为怒目横眉向他伸手指，若是个雄纠纠的军士，你或者只可以瞪他一眼。在网罗中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即连瞪眼的怒气敢形诸颜色者有几次？只有向暗里饮泣，只有低头赔个小心，或者还要回嗔作喜，媚眼承欢。耻辱！……耻辱的声音，近几年来早已迸发了，然而横加的耻辱，却日多一日！我们不要只是瞪眼便算完事，再进一步吧，至少也须另有点激怒的表现！

总是无价值的，……但我们须要挣扎！
总是达不到和平之门的，……但我们要造此血梯！
人终是要慷厉，要奋发，要造此奇怪的梯的！
但风雨声中，十字街头，终是只有几个白衣的青年在喊
呼，在哭，在挥动白旗吗？

* * *

这强力凌弱的世界，这风雨如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
的争斗的人生，……然而“生的人”，就只有抗进，激发，
勇往的精神，可以指导一切了！……无论如何，血梯是要造
的！成功与否，只有那常在微笑的上帝知道！

雨声还是一点一滴的未曾停止，不知那里传过来的柝
声，偏在这中夜里警响。我扶头听去，那柝声时低时昂，却
有自然的节奏，好似在奏着催促“黎明来”的音乐！

一九二五年六月五号夜十二点

（选自王统照《片云集》，生活书店一九三七年版）

《西行漫画》^① 题记

阿 英

当我从一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同志的手里，接到这一束生活漫画，而逐一看过的时候，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

虽只是二十四幅的漫画，却充分的表白了中华民族性的伟大，坚实，以及作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在开始生长。

我以为，在中国漫画界之有这一束作品出现，是如俄国诗坛之生长了普希金。俄国是有了普希金才有自己民族的文学，而中国，是有了这神话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记录画片，才有了自己的漫画。

在中国的漫画中，请问有谁表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刻苦，耐劳，为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地一种惊天地动鬼神的意志。非常现实的在绘画中把这种意志表现出来，如苏联文学之有《铁流》、《溃灭》，是从这一束

^① 《西行漫画》，即今人民美术出版社刊印的黄镇同志的《长征画集》。作者误署肖华同志。

漫画始。

其次，中国既有漫画，虽不乏优秀之作，但真能表现民族的优越性，生长性，不渗杂任何病态的渣滓，内容形式，甚至于每一笔触，都百分之百表现其为“中国的”，如这一束漫画，在过往是还不曾见过。

因此，这经过了悠久的旅程，而又从辽远的陕北带到南方来的一束漫画，它将不仅要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的行程永恒存在，它的印行，也将使中国的漫画界，受到一个巨大的新的激刺，走向新的开展。它要成为漫画界划时代的纪念碑，分水岭。

发挥着民族伟大意志的反侵略战争，现在是在继续的开展。广大民众为着民族的生存是毫无顾惜的在忍受着一切的苦难。这正表现了这一束漫画所反映的民族精神的更进一步的发挥。把它印行出来，正是要在当前的战斗事实而外，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提供一项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实证。

我仅以无限的敬意，呈献给这一束漫画的作者——肖华同志！

（选自鹰隼 [阿英笔名]《剑腥集》，风雨书屋一九三九年三月版）

陕北之行

范长江

（一）西安里面

此文系就以本年二月中旬时之情况记述，现在局面已较前大有进展，如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声明服从三民主义，红军之具体改编等。而且此种阴郁政治局势之揭开，只是时间问题，并料本书出版之时，隔大局之清朗化已不远，故一并列入，以供留心时局者之参考。

谁都知道“双十二”以后有重要共产党人入西安，甚至于认为“双十二”事件完全是共产党操纵的局面。所以事变后许多人恐怕蒋委员长被挟往陕北，则情形将更棘手。总之，稍为有几分政治素养的人，对于陕甘大局，比较看重共产党在其中的关联。

记者于事变后奉社命从绥远到兰州，因已确知周恩来在西安，而且知道西安附近，曾到过彭德怀、贺龙等的部队，我很想借此机会，会会这般神秘的人物，一探政治的究竟。

二月二日到西安，被突发的事变关在城门外，三日进城，一般人风声鹤唳都在怀疑共产党，我也有几分相信。但

是西安的朋友，真正见过周恩来的，还是不多。

四日午后经朋友的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握手后，他和蔼的开始谈话。

因为旁的事情，我们当天不能作详尽的谈话，我们约到第二日作竟日之长谈。谈话的题材，当然首先是关于西安事变。

陕北红军问题之由军事的走向政治的，还是中央开的端，二十四年冬中委××，奉命由西安飞肤施转入红军区域接洽，即为观察红军之动向者。那时肤施前线为东北军王以哲部，此事遂壮东北军与红军自由接洽之胆。王以哲首先与红军干部发生关系。二十五年夏季，张学良乃与周恩来在肤施正式见面，讨论张所提出之两大问题：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于前一点，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但是那时共产党的“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蒋”，即不推翻蒋之统治，无法抗日。张、周见面之后，张之见解，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

拥蒋，无法抗日。而对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颇使周发生相当影响。

共产党在陕北之中央委员，已不足法定之全体会议人数，临时最高之决定机关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来之报告，引起极大之论辩，结果，参考张学良所提供之新材料，与将国内外大势重加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转而“拥蒋”进至“拥蒋”之必要。

这样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

基于此种根本政治立场，共产党乃力谋对国民党之政治妥协，化除彼此间绝对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外的“双十二”事变。

张、杨对于“双十二”事变，认为是“兵谏”，一部青年群众称之为“革命”，谓为抗日的第一步。共产党当双十二事变发生时，中央机关还在陕北保安，他们得到事变的消息，许多人最初一秒钟的决定，是感情的报复主义，主张派人入西安，速蒋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盖双十二事变，既非如帝俄时代群众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类似滑铁卢战争之俘虏拿破仑，此仅以一种不光明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第一，与中国当前团结御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构成今日蒋委员长之政治理论，政治组织和一百余万之中央军，仍然健在。则此事之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对于国内和平统一，将致背道而驰，愈跑愈远。但是既然木

已成舟，理论上的问题已经无用，当速谋补救的办法。周恩来系于十二月十六日由肤施乘张之波音机到西安，即向张陈释蒋之必要，同时更亲自与霸陕中央要员见面，作各种政治协商。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突在张陪送之下，飞出西安。许多青年群众，突闻此事，大为震动。比较消息灵通一点的少壮军人，非常不满意周恩来这种作法。

张同蒋到京之后，即未西返，东北军少壮派之感情，极度不安，又闻张学良被审消息，群情更哗。而和平初步办法，已商有成议。周恩来为主张接受和平条件最力之人，“双十二”事变，打死王以哲之后，周自己似亦因此不得不移住作为临时租界的杨虎城公馆。

关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转变，采何种态度问题，周恩来谓自第六次大会以后，第三国际曾决议各国共产党应注意各该国之民族性与地方性，七次大会以后，此事更无问题。

至于若干人主张之“立即抗日”与“反准备论”，周谓为皮毛之见。无计划的，无准备的对日作战，是自取覆败，不过，准备应在对内不战争，而在和平统一条件之下，始有其意义。

他说共产党此时之政治目标，在争取党的自由，希望不至于再被任意逮捕，政治上希望慢慢走上民主的道路，则共产党放弃反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取消苏维埃，同时红军取消名称，并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他们对于张学良个人，认为他是非常聪明与勇敢，政治感觉异常敏捷，可惜经验不够，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

来。

因周恩来先生的介绍，到西安新城后面上贤庄从前一位德国牙科医生的诊疗所去看叶剑英先生。无疑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当时在西安的半公开机关。仅仅一层的西式洋房，大门进去，有一个小小天井，正屋里有许多青年人紧张的工作着，有的从这个屋，走进那个屋，有的聚在一块谈话，有的很忙碌的操纵无线电，这部无线电机似乎专为秘密工作用的，天线没有显在外面，同时发报声音很小。这群人的服装，非常随便，仪貌上除了热烈的表情外，没有什么严格的礼节。

“剑英！”周恩来向着一位正在纷忙的人招手。

随着周恩来的招呼声，一位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的汉子，和我一齐进入一间小办公室里。

叶剑英的风度，有几分西洋人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民国十六年广州暴动的基干是那时张发奎先生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相信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先生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腹心，则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

“双十二”之前，叶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研究东北军之改造问题，叶对于东北军之政训工作提出意见。他之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

他那时认为政治的统一战线成功之后，共产党对红军之政治领导，仍然存在。因为如果开始了抗日战争，军队政治工作应有加强的必要。

“双十二”以后，从北方来陕的某几位最左翼政治人物，曾到西安，极力反对和平妥协，周恩来为此和他们辩论很久，结果是各行其是，二月二日事变之发生，在思想上很受这般人影响。

对于是否即刻对外战争问题，周恩来谓红军不愿过早挑动对外战争，因此红军入山西之后，虽倡“过境抗日”之口号，而并未全力出绥远，原因即在乎此。

（二）万里关山

西安政局，既已开展，记者又奉命入陕北。二月六日在博古先生和罗瑞卿先生陪送之下，开车直驶肤施（延安）。两辆载重车，载些鞋子衣服等，我和博古车上，装了一车的“左派幼稚病”小册子，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面飞来的几十万法币。同行有西安新闻界和学联的朋友。

那天城内外的东北军和陕军都在纷乱的撤退，汽车大车牛车毛驴，什么交通工具都有。而运送的东西则从军火军实至破铁炉子也全带上，真是彻底的搬家，秩序异常零乱，大概撤退命令太仓猝一点。陕变主力的特务团士兵，更是无精打采的退出西安，低着头，倒拿着枪，好像不胜颓丧的样子。

路上和博古先生谈起天来，他曾一度作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主席”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他今年刚三十岁，身材中等，很有学生生活泼气。我们首先谈战争，特别是关于红军行动经过。

五次围剿“广昌大会战”之后，陈诚将军取得重大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中央苏区，朱德、周恩来和博古三人退到

战场南面一间小村中，商议今后的办法。红军主力牺牲很大了，主要战场破坏了，再度决战的前途是相当可怕了。后来毛泽东赶到，细加商量，乃决定“突围而出”！

围是突了，沿途所遇到的困难却非常之多，单是沿途所过的大河，已就可观了。他先说“过乌江”。那里没有桥，渡船也被省军破坏，水急而深，又没有普通架桥材料，大家到了河边，皆望河兴叹，河那面还有人把守。后来刘伯承赶到，乃集中所有工兵人材，尽力想法。首先泅水过去十人，赶走守兵。然而各种架桥尝试，皆告失败。乃发动工人伐竹，削竹为筏，绞筏成索，编筏成筐，以索系筐，筐内盛石，抛入水中为锚，作成急水中架桥之基础，然后编竹为筏，以锚牵筏，联筏为桥，而乌江天险始得渡过。

过了乌江，是直进川西南，川军郭勋守着土城，彭德怀去进攻，据侦探报告是二旅，以为满可以打下，谁知越打越多，打出五旅来！老彭损失不小。郭勋作战颇为沉着，他们在后面用望远镜看郭勋的后方，有几次都有动摇模样，然而皆被郭勋镇定了下来。

金沙江之偷渡，亦甚有趣，后面追迫很紧，他们乃以少数部队佯走大渡口，而大部急走小渡口，小渡口是某土司所辖地，他已奉令将船只靠在北岸，南岸红军无法渡河，后来捉着了土司的“文案”（书记文牒之类），用他出面叫船，船夫不察，放船南来，才算混了过去，而大渡口的部队，亦飞速转到这一路来。因为船少人多，他们曾用粗布为练，想架索桥，结果是布力太弱，不能胜重，完全失败。

金沙江曲之中，会理西昌一带有未开化的夷族，他们的社会经济还在游牧时代，捕获外族的男子，有时杀戮；有时

收为奴隶（称为“娃子”），利用其劳动力。红军的开路先锋走到森林里，被他们突如其来的打死将近一百，而且死得很惨。因为夷人对付人的方法，是很原始的。刘伯承对于西南情形很熟悉，还是他出来办交涉，和黑夷首领吃血酒，相约各不相犯，即古代春秋战国“歃血于盟”的办法，这种迷信方法对他们很有效的。

石达开将军从东南经西南绕出西北的伟大军事企图，是失败在大渡河边，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遁逸他的踪影。石将军最后的停住处是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是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河对面是杨森一营的军队布开着，后面呢？遍地的原始黑夷，退也成问题了。谁知安顺场团总还有一只船，靠在南岸，他准备红军来了以后再跑的。然而笨拙的团总行动太迟了，红军先占了他的渡船。然而，河水太大，无人敢于划船。乃重价征船夫，每人划对河一次，代价一百元。重赏之下出勇夫，居然有人出来应命。但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败杨森之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之泸定大桥，大队亦从南岸星夜向泸定桥前进，前锋至时，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锋乃攀铁索而进，以攻拆桥之守兵。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为慑，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

最后一次险地，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拉子口。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成汛涉。拉子口两岸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至不能再开处，乃架一木桥

至对岸绝壁上，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故此地如将木桥拆却，十万大军到此，亦只好徒呼奈何。甘肃方面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亦未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咸阳至三原途中，遇到许多徐向前旧部，他们是被胡宗南关麟征腰击而没有渡过黄河的队伍，现归萧克率领着，他们多一半是四川人，听不懂博古的话，我还作了一次翻译。

西安三原间，要经过三个渡口，第一是渭水，有桥可渡。第二是泾水，有船可渡。第三是泾惠渠，那时可以涉水而过。路上往来的车辆很多，因为撤兵的原故。

三原附近，零星的住些红军，黑军衣黑军帽，帽上有红星，是他们外形的特点，他们多半是年青活泼的人。普通军队的形式军容，看来他们很不注意。

那时三原城，成了小西安，许多西安原有的团体，如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等都移到三原来。许多青年都纷乱的向渭河北岸三原一带跑，他们对于中央军入西安有些过分的恐惧。

因为等保护的部队，恐怕路上遇到土匪，费去很多时间，当晚住三原。大饼和开水解决了晚饭，一间小客店的小屋土炕上，还睡着我和博古两个人。

傍晚在三原街上还遇到叶剑英夫妇，他是到附近二十里云阳地方的彭德怀那里去，他穿着学生服安闲在街上走着，谁也难看出他是作战异常果断的旧任红军参谋长。

我们坐的那辆车子，是红军自己买的。在西安事变前十个月，已经挂着王以哲军军用车牌子，在西安延安间往来运输，西北之必然会出乱子，已不是西安事变前短时期之酝酿

了。

博古那时谈红军将来之地位，谓名称编制更易之外，原有领导干部应维旧状，政治委员可以由中央派去。因为政治委员的制度，来自苏联，苏联革命初期，红军缺乏军事人材，故不得不利用有军事技术之旧军人，而用忠实党员为政委，居监军的地位。中国红军之军事干部皆为党员，故不必要政委也。

七日起身，各人自己收拾行李，不出十五分钟，博古的行李已自己弄好了，这是长途行军练成的。汽车夫反而落在后面。

同店有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他要去当红军。他无论如何吃不消的。理由是他在西安参加过救国会，他听说恐怕将来“不得了”！

三原北去有许多台状地带，九十里至耀县。耀县城外有一座新式大木桥，桥基坚固，桥身宽敞，有些重要国营公路还不及它，陕西省公路建设当局，至可敬佩。

县城里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人，他们过半是单裤，最不过穿棉衣，问他们，答案是：“穿多了不好跑路。”我们穿双层皮的人，完全是平日少锻炼之工了。

城市商业照样维持，原因是红军对于社会秩序，已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他们行动的事实，已在商民中建立信仰。

三原到耀县从前架有轻便铁道，供陕北剿匪军运输之用，现在和平解决后，这条铁道是无的放矢了。

同官以上，进入山地，所谓“北山”区域，从此开始，陕北和关中就在这里分界。同官至宜君完全在山沟里走，有好十几座水门汀桥，修得整齐美观，皆陕西省建设之成绩。沟

尽，山行不远，即到宜君。

不妙的是在不到宜君十里左右油房台山上把车坏了一辆。只好放下些东西，把人先用一车带走。

坏车处，小山村老嫗出来关照我们：“诸位老爷以后过车，请留心我的孩子，不要把他压着了！”她不问我们是如何来历人，专是想到她自己的事，专为她自己打算。一切皆为自己打算，这是人生和宇宙的大法则的流露，也就是“约法三章”和“为民请命”这一套所以成功的原因。

宜君位于山上，小得可怜，开水无地喝，而鸦片则到处皆有。县政府又在县城山头上，这完全是古代战争城堡的修筑法，不合于经济生活的原则。

七十里至中部县，穿城不过半里，和宜君有难兄难弟之分。宜中两县都在破碎的黄土高原之中，陕北贫瘠本相，至此一目了然。

车到洛河渡口名交口河地方，大冰冲坏了便桥，过不去，而修桥亦非短时可能。我们一面派人至洛川打电报到肤施要车，一面寻附近村庄过夜。破土窑洞里，又成了高谈政治的地方。

红军士兵的生活，仍然比官长要苦些，不过和旁的军队，程度有差别，将来军费充足后，相差的程度怎样，还待事实的表现。

涉冰过洛河，八日住洛川，县城在原上，张学良指挥剿匪，曾坐镇于此，今则红星帽士兵随处可见。红军初到陕北时，不懂方言习惯，他们夜间驻营，总向民间借门板等作卧具，所以常向妇女说：“老板娘！你的板子借我睡一吓。”她们必起异常羞惧与不安，答应一个“不！”字。当然这边再

行说明理由的继续要求：“板子睡了退回你还是好的！没有关系！”而他们所得的回复是：“我怕！”原来陕北所谓“板子”是指女人特有的生理部分，当然她们不能随便借给人睡了！

红军的政治工作相当成功，送我们的士兵，谁也可以讲一篇大道理，“帝国主义”，“殖民地”，“革命”，……无比其多的新名词，他们讲得无不顺理成章。俨然受过多年政治教育。

这些年轻的红军官兵，说起打仗完全是儿戏，没有紧张意味。好像中学生谈赛足球，李惠堂那一脚踢得如何有劲，叶北华如何传了一个好球。少年和青年人的精力充足，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焰，他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充盈的。

在洛川县政府里过夜，木炭余烟，把我昏迷了过去。我心里明白，只是动不得，说不出话来，而且呼吸急促得快不能继续。我感到危险，拚命挣扎，好容易滚下了床，开了门，爬到室外雪地呼吸冷空气，几分钟后，才恢复了清宁。几乎走上丁文江先生的老路！个人生命实在容易毁灭，不及时作些事，很快就告结束了。

晚间曾大雪，九日赴肤施途中，只见大雪盖满山谷。汽车经行破旧的黄土高原，上下三个峻急的山坡，不是机器好的汽车万万上不去的。

郿县城外汽车站旁，有飘红旗的红军联络站，他们相互间“同志”“同志”的称呼，态度非常亲切。

郿县北行不远，公路旁有泉水涌出，结冰盖路面，下临高崖，滑溜可怕，车行其上，直赌命运。此后道路，乃顺洛河东岸北进，以趋甘泉。河东西山头上尽力碉堡，村庄墙院

亦已完全碉堡化，皆东北军剿匪时之陈迹，而今大有人去楼空之感矣。

甘泉县不及内地中等村庄之富厚，城内房屋凋零，人家无几，县长无多少事可做。盖酃县以北，已成苏区，田地皆经分过，另有苏维埃政府管理，县府连钱粮等亦收不到，县府经费，全恃省府津贴维持。

午尖于甘泉红军联络站，腹饥甚，面条煮好，皆虎咽狼吞。

甘泉是过去剿匪大战之场，东北军某团长被擒的榆林桥，何立中阵亡的劳山，红军中人皆为我们指手画脚而道之。

甘泉再北去肤施，路与洛河分离，另遵谷道进，谷中平日有四川人利用山中泉水种稻。谷尽，过富有森林之山峡，出峡，顺北谷下，沿途人家稀少，土地荒芜，村庄残破，无一不象征大兵之后者。沿途标语，极为划一，有“统一战线”标语，有“一致抗日”标语，有“改良工农生活”标语，最多不过十几种。绝无反国民党，反国民政府，及反对蒋委员长标语，“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的标语也没有了。

将至肤施，遇到近百的徒手红军，系下乡打柴作燃料者。服装残破，单裤居多，十四五岁小孩不少，他们在路上到处打打闹闹开玩笑。

（三）肤施人物

抵肤施，先至城外外交部接洽，旋入城，满街是黑衣红星青年人，服装较外间为完好。商业亦较热闹。下车至红军

大学休息。

红大，那时已改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门上贴了许多欢迎我的标语，因为中国新闻界之正式派遣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袖在苏区公开会见者，尚以大公报为第一次也。标语中有一条是“欢迎××先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看了有几分不好受！

校里首先遇到的是××先生，现任红大校长，对我要算地主之地主了。他领我去看他们学生的活动，有些在打乒乓，有些在打篮球，教官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没有人介绍，很难分别，因为服装都是一样的不好。寝室内务，不大讲究，官长学生之间，也无多礼节，他说他们不赞成形式主义的。自然他们是以苏联红军作蓝本，而苏联红军的兵学原则，是法国拿破仑的遗留，重自由，重活泼。和德国兵学派的重形式者，完全相反。日本学德国，中国有些部分又是学的日本。红大的教育方针，是自动多于被动，讨论多于上课，室外活动很注意，每日上课时间，最多不过三四小时。

其次和我见面的是宣传部的吴亮平先生。他小小个子，清秀的面庞，无论他吃过多少苦头，还保留着书生面目。他的外国语文很漂亮，苏区对外英文广播，就是他担任。他说话是清晰，明白，有系统，并有平和而坚定的见解。美国记者施诺 Snow 入陕北，就是他给毛泽东作翻译。他是一位漂亮的宣传家。

随后廖承志来了，这是廖仲恺先生的哲嗣，何香凝先生的痛爱者，他会好几种外国文字，会画，会唱，会写，会交际，而且会吃苦，这是红军中多才多艺的人物。《红色中华日报》现改为《新中华日报》的就是他主编。

刘伯承一会来了，身体看来很瘦，血色也不好，四川人有这样高的个子，要算“高”等人物。他之有名，不在到了红军以后，西南一带，对“刘瞎子”的威风，很少人不知道的。他作战打坏了一只眼，身上受过九次枪伤，流血过多，所以看起来外表不很健康，然而他的精神很好，大渡河也是他打先锋。行军时，飞机炸弹还光顾了他一次，幸而不厉害。他在莫斯科曾经令佛洛西诺夫敬佩过的。“红军总参谋长”是每个红色战斗员都知道利害的。

天已黄昏了，屋内地上燃着火，再进来一位老者和中年汉子模样的人，前者是林祖涵先生，后者是朱德先生，林先生真是老而益壮，朱德已有五十多岁了，而面目仅如四十岁人之健壮。他说他每天打篮球，说话完全四川音。“半生军阀，半生红军”，他自己笑着自道。他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悄然出现的是丁玲女士，我们是初见，而不想到见面在这样地方。她打算在陕北搜集些材料写东西，将来当有些特别的东西出现。

现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先生（洛甫）戴着不深的近视眼镜，出现于人群中，他的谈风轻松精利，不似曾过万重山者。

最后到的毛泽东先生，许多人想象他不知是如何的怪杰，谁知他是书生仪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为长一点。

同毛泽东先生进屋的，还有一位年近古稀的徐特立先

生，他公然从江西走到陕北，这是了不得的事件。

围炉坐着一大圈，谈话的火线，打得很紧。以后中国的政争，最好也用这种方式，大家不要动武，免得老百姓遭殃。关于和平统一后之党和军队问题，那时他们的意见，还是主张维持原有的组织和系统。

那晚的宴会，也有海参之类，大概是招待“布尔乔亚”的，他们平时吃这些东西，恐怕太不易找到了。宴会中，只有张国焘先生没有来，说是病了。饭后，我特去看他，因为我次晨要走，不看他一次，觉得很抱歉。他现在是红军总政治委员，我们去时，他果然已经睡了，他立刻起身，咳嗽很凶，他的风格带严肃性，深沉性，这是另一作风。

然后赴毛泽东窑洞作竟夜之谈。到时已夜十时。

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他对于窑洞发生了感情，因为它冬暖夏凉，适宜居住。他说薛仁贵回窑回的是这种窑，不是南方的砖窑。他因为过去行军作战关系，作计划下命令，都是夜间，于是白天在卧式轿里睡觉，夜间才紧张的作事，弄成和我们新闻编辑一样的日夜颠倒。他用脑过度，脑血管膨胀，经常兴奋，不容易睡着，神经受点影响，如果在行军时，身体有劳动机会，睡觉可以好些。他平常很爱读书，外间舆论的趋势，他很清楚的和我谈论。

他最喜欢谈战略，他在红大教战略一科，说到战略问题，精神特别好了起来。他说五次围剿中他们失败在不应当广昌大决战，不应和陈诚先生指挥的主力硬拚。应当暂时放弃苏区，分红军为四路，猛出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

点，施以佯攻，以诱动江西兵力，然后择弱点一战，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苏区可以保全。不得已放弃江西之后，最初的目的地是湘西，并不敢预定说能到遥远的西北来。先命萧克去探路，只想从湘西凭借贺龙偷渡长江的技术，从三峡区域，北过长江，再图发展。谁知追兵太紧，湘西不能立足，乃想图贵州，贵州四面受敌，而且太穷，乃转而想从四川西南转入川西北之松潘一带，暂驻以观形势。土城一败，逼得走云南川边，辛辛苦苦到了川西北，乃是蛮荒千里，不宜居人，且松潘要地已入胡宗南手，不得已始出甘肃到陕北。他们入山西是政治的目的，不是军事目的，中央军那时如果不自东压迫，他们将割汾河流域沃野，一面补充自己，一面激动全国对外空气。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并非如萧克之有预定计划。至于红军大会合于会宁静宁海原一带之时，进攻目的在宁夏，西连甘凉肃州，确立西北根据地，徐向前过黄河，意即在此。“双十二”以后，政治形势变动，这些都用不着了。

他以为共产党的要求，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当可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善运动。这当然是共产党爱国主义的新转变。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他以为是不彻底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停止阶级斗争的原因，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缩小内在矛盾，先解决外在矛盾。

天将明了，我回去红大休息一会，即登车南返。谢谢××和罗瑞卿先生，他们很早起来招待。

十日南返，晚至宜君，被军队驻满，无立足地，乃黑夜开出，欲寻山庄。天大雾，对面不见人，车上玻璃结冰，司机不能辨路，继而地下道路结冰，滑不能行，但车已至半山上，前后皆无办法。司机乃伸首侧窗之外，勉强前进，费数十分钟，不过行一二里，司机声言不敢再开，乃停于荒山大雾中。幸下车发现山边有窑洞，入内视之有人家，我们遂买些猪肉作面条，来过这废历的除夕。

夜间大风雪，昨夜如梦境。十一日起身，白雪满山涧，清凉爽目。旧历元旦，路无行人，爆竹满北山，炊烟不见出。人家正过愉快之晨也。

到三原无处买饭吃，还是到一家东北退伍军人开的馆子对付几个饺子，继续开西安。至泾河过船处，东北军少数军佐强欲扣车，无法，我只好故作镇静，对他们笑笑。他们摸不清，问我是什么人，我初不告之，他们的态度转于疑惑与平静之中。再问，乃轻语之曰：“我是‘陕北’来的，到西安有事！”他们是不会扣红军车的。果然他还替我出主意，说咸阳一带中央军扣人。等我到中央军区域后，我已平安完成了我的任务了。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

（选自《塞上行》，大公报馆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版）

一面光荣的旗帜

白 朗

“ 慷慨悲歌哀烈士
坚决战斗慰英灵 ”

赵一曼，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响亮地传诵于松花江畔，她那为抗击日寇而英勇战斗，和慷慨就义的悲壮动人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松江的流水为了她的死而呜咽，珠河两岸的垂柳为了失掉她而低泣！而她的壮烈殉国也使东北人民蒙受了无上的光荣；使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土地的抗日英雄们、热情青年们更加坚强，更加英勇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流洒鲜红的热血，就连那群寡廉鲜耻的汉奸走狗们也不能不为她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而惭愧汗颜了！他们更怎敢正视她的碑碣呢？

她是四川人，本姓李，因为天资敏慧，又受了较高深的教育，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便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虽然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并带着一点小姐气味，可是当她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以后，便能遵守党的指示深入下层，接触群众，积极地领导着上海女工运动。

后来被送到莫斯科深造，归国后便同她的丈夫老曹——真名不详，京汉路二七大罢工时的工人领袖——同在上海做地下活动。九一八后，被派到哈尔滨满洲总工会工作，组织了电业工人，已经死去的戴平万同志当时也在满总工作。赵一曼夫妇到哈后，接受了当时满洲中共中央代表罗登贤同志^①的指示，领导了哈尔滨电业工人的反日大罢工。

一九三四年春东北中共组织遭敌人巨大摧残破坏，罗登贤同志被捕后不久老曹便失踪了（八一五后始知老曹早囚死狱中）。

当时的赵一曼虽然非常关心着老曹的生命，但她自己也正是敌人想攫获的红色的反日人物，于是她顾不得寻找丈夫的下落，便带着一颗悬悬的沉痛的心，然而却是满怀壮志地到珠河工作去了。

到珠河以后，便把珠河（又名马吉密河）两岸的妇女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后更在珠河铁道北（滨绥线）担任区委书记。

赵一曼同志，无疑地是一个伟大的女革命家，她有坚强的性格，富有毅力和魄力，同时她又是一个天才的女演说家，她的讲话充满着极强的煽动力，没有一个人听了不感动振奋的。她能够把群众讲得振臂高呼，也能够使群众痛哭流涕，因此，珠河一带的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拥护爱戴这位值得尊敬的妇女领袖的。在她领导之下的一批妇女干部，为了不暴露姓氏，使敌人无法捉摸，大家都姓起李来了，她们

^① 罗登贤同志是省港罢工的领袖者，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者。一九三三年回上海，被国民党捕杀于雨花台。

是用大李，小李，黑李，白李，红李，高李，矮李，胖李，以及小辫李，瘦李等等来区分的，赵一曼同志比较瘦削，因之瘦李便是她的代表名字。她领导着这批女干部活动于铁道以北。

一九三五年，敌人在珠河采取了烧杀归大屯政策，在残酷地毁灭着东北人民的生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火光四起中，哭声遍野，惨叫连天，在这种情况下，赵一曼悲愤不能自抑，于是她领导了几个干部，用红缨枪组织了几千个农民自卫军，在珠河东部关门嘴子附近和敌人做了一次英勇的大决斗，虽然敌人有着优良的武器，而他们却以原始的装备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利，给顽强凶残的敌寇以极大的打击！使得汉奸走狗们一听到瘦李的名字便抱头鼠窜了。

后来，这个自卫队加入抗联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而这一团的政治干部很多是姓李的干部，在王惠同团长英勇机智的领导之下活动于黑彪宫，秋皮屯，关门嘴子等地。和敌人做了好几次搏斗，当时的赵一曼同志便是铁二团的政治委员。

铁道北的房舍全烧光了，在遍野荒凉四无遮掩的形势下，这支有力的抗日队伍便不得不奉命撤回铁道南继续活动，坚持抗战，然而，铁道南也不过仅余农民数人，茅舍数间而已！冯仲云同志当时就在那区域担任县委宣传部长，他们在艰苦地和敌人死拼着。

正是秋末的时候，他们又被派到铁道北坚持游击。当时群众领袖周北学到反动武装去做说服工作被捕后侥幸逃出，后和他们在一起活动，刚过铁道，由于内奸告密即被千余优势日军所包围，在敌众我寡，及敌军重重包围的形势下，全

团三百多优秀的游击队员誓以身报国，坚持血战，最终几乎全部牺牲了！侥幸突出重围的仅十五六人而已！而王惠同团长也因重伤后被俘，英勇牺牲慷慨就义于珠河县的小九站了。

在这次战斗中，赵一曼同志腿部中了一枪，便和幸未受伤的周北学同志隐藏在一个地窖中，不意又被叛徒告密，在一个雪深没胫的寒天里，赵周两同志便同时被捕，做了敌人的狱囚！周北学同志则就义于珠河县。

在珠河，赵一曼的名字，早已是遐迩皆知了，一些汉奸走狗，土豪劣绅们，为了好奇，当她被解进珠河县城时，都跑来想一瞻为抗日而光荣被俘的女英雄——瘦李——的丰采，而我们的女英雄却不领受那些污秽眼睛的无耻瞻顾，她悲愤地痛骂着，教训了那些不肖之徒，他们被骂得羞愧难当的夹着尾巴跑掉了。

不久，敌人便把她解送到哈尔滨，押在特务机关里，对她施尽了非刑，直到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而我们的赵一曼同志却始终坚不吐实，忠实于党，忠实于流血奋斗中的同志，使敌人在她身上得不到半点机密。

但敌人仍不甘心，还梦想在她的口中获得一些宝贵的线索，怕她因伤重而死，于是便把她送到许公路公园附近的滨江医院疗伤。张伯岩医生为她的英雄事迹非常感动，他细心地为她疗治着刑伤，并安慰着她受了创伤的心灵，她的伤慢慢地好起来了。

始终尽忠于革命的赵一曼同志，即使在伤重期间，也决不肯放弃过一个宣传的机会，当她的精神稍微恢复了一些的时候，便面向着松花江的流水，用她那婉转动人的声音，向

看护她的董护士和敌人派来看守她的警士讲述抗联的悲壮故事，并用种种方式，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水平，因之他们不久就成了赵一曼两个最可靠最爱护她的群众了。

敌人呢，当然更不肯放过他们每一个逼问的机会，当赵一曼同志伤势稍愈之后，他们便不断地来逼供，她为了避免烦恼，便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在敌人未来之先吃些安眠药，当敌人来审讯时，她已是沉鼾大睡，千呼不应了。

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她的伤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于是经过秘议布置之后，便在一个夜里她被最可靠的两个群众抬到雇来的小汽车上开到三棵树，而后换乘火车，三个人一同逃了出来。

不幸得很，很快便被敌人发觉了。在敌人看来，跑了赵一曼这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便马上全城戒严，到处搜查，很快的那个送走赵一曼的白俄汽车夫便被查出了，他报告了逃走的方向，这样，我们的赵一曼同志逃到离游击队所在地仅二十里的地方又重陷虎口，翌日，便在最末一次严刑拷问之后英勇赴死了！

在殉难之前，她是愉快的，没有在敌人面前表示一点死的畏怯，她面向着松花江悠悠的流水，仰望着辽阔的长空，引吭高歌起来：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殓着战士们的尸首！
尸首还没有僵硬，
红色已染透了旗帜，

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帜，
誓不战胜，总也不放手，
畏缩者呀，滚就滚你的，
唯我们誓死以守此！

.....

.....

牢狱和断头台，
来就来你的，

.....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歌声亦悲亦壮，弥漫于低暗的苍空，赵一曼同志在亿万可爱的东北群众痛悼下慷慨就义了，从那时候起，她便诀别了白山黑水，诀别了还在敌蹄蹂躏下的东北人民，诀别了还在浴血抗战中的同志们！

日寇法西斯是感到胜利了，他们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这个“胜利”的消息，称她为“赵尚志的宣传部长——红妆白马的女匪首”，日本的改造杂志还为文追悼了她。

赵一曼同志的血染红了松花江水，灌溉了东北抗日园地，更安慰了为革命而早死的英灵！

在今天看来，敌人是否真正胜利了呢？

（选自《一面光荣的旗帜》，光华书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版）

挥手之间

方 纪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山下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早得了消息，纷纷相约下山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去。

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近两个星期来形势的发展，真如天际风云，瞬息万变；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复杂关系。记得十日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带着刚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一路喊着从我们的窑洞门前跑过，不到天亮，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第二天晚上，南门外新市场上便出现了群众自发的庆祝集会。卖水果的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花红果子抛向空中，喊着要人们吃“胜利果实”。有些学校的学生，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扎在棍子上，蘸着煤油点起火把来，在大路上游行。

当时群众对抗战胜利的热烈心情，是谁也不会觉得过分的。但是过了两天，令人气忿的消息便接连传来：蒋介石下命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阎锡山派兵进攻上党解放区……新的内战危机，忽又迫在眉睫了！毛主席八月十三日

做了报告（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这几天，不要说那些烧棉袄的人不免后悔，许多人心里都憋了一肚子气；把胜利的欢喜，化做对蒋介石的愤怒，早从精神上百倍地警惕起来。

前天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这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昨天夜里，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甚么也转不过弯来；并且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也许，那天夜里，延安的许多同志，各个解放区的许多同志，都是在一种焦急和不安当中度过的吧？谁不知道蒋介石是个最无信无义的大流氓？谁不知道是美帝国主义在支持蒋介石政府挑动中国的内战？虽说赫尔利假惺惺的跑到延安来，难保不是一伙强盗做就的圈套！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真是令人不安！不少同志义愤地说：谈判自然可以，这无非表示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强大；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和平愿望；不能不承认苏联战胜法西斯以后，国际形势更有利于和平民主罢了。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他蒋介石自己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战场上去见高低！更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

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他蒋介石谈判！

但是，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形势下，我党中央指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要是蒋介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和谈，发动内战，无非是他自取灭亡，革命胜利来得更快一些，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罢了。

这正是我们党在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所采取的惟一正确的方针，所表现的大公无私态度。毛主席的亲自去重庆，更是为国家民族，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单是这一点，已大可以昭革命之信义于天下了。

送行的人群，陆续朝飞机场走去。出了东关大街，转过一个山嘴，不远就是飞机场。机场上停了一架绿色的军用座机。记得去年修飞机场时，延安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劳动，把凿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一块块从山上拖来，一块块按直线铺平，放稳，砸结实，几十个人拉着大石碾子碾米碾去。朱总司令和许多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劳动，和大家一起唱着歌，喊着号子。当时人们都很兴奋，劳动得特别卖力气，心里想着，在延安修飞机场了，这就是说，咱们也要有飞机了，抗战形势要发生重大变化，胜利快来了。

是的，胜利来了。人们所盼望的，所流血争取的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生活，又要被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破坏！为了制止这种灾难，保卫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现在要从这里，从延安的同志们亲手修造的飞机场，动身到斗争的最前线去！

飞机场上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但是，

谁也不讲话，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空气十分严肃，就像是在前线，战斗将要打响前的一刹那。

汽车的马达声清晰地传来，人们一齐转过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驶出山嘴，驶入机场。车上跳下周恩来同志、王若飞同志，后面跟了穿着整齐、身佩短剑的张治中将军。按照当时的情形，张治中将军在延安人眼睛里只能是一位尴尬的角色；何况他那一套标准的国民党将官制服，在飞机场上出现，就显得十分不自然了。这种不自然，大约他自己也感觉到了，站在汽车跟前犹豫了一下。这时，有个同志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寒暄，似乎还开了一句什么玩笑，引得他突然高声地大笑起来。

接着又是一辆吉普车驰来。车上跳下一个美国人，戴黑眼镜，叼着纸烟，衣服特别瘦，特别短，这使他显得脸比胸膛宽，腿有上身的两倍长，这就是美国的所谓“特使”赫尔利了。

人们转过身去，鼓起眼睛望着他——当然不是表示欢迎的意思。这一点，赫尔利是分明地感觉到了。他犹疑地站在吉普车前，一手扶着车门，一手叉在腰间，像是在估量当前的形势。等了一会，看到人群只是静静的，望着他，于是挥一挥手，纸烟也不拿下来，朝人们喊了一声“哈罗”，便急匆匆的朝飞机走去。

谁也不再注意他；人们又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篷子的中型汽车正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驶来。立刻，人群像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成一个整体地朝前拥去。接着，又停下来；正当汽车站住，车门打开的时候，机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完全是像出门做客一样。这立刻引起人们一种深切的不安，和离别的情绪；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他的伟岸的身形，明净的额，温和的目光，和热情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杨家岭山下散步时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们是熟悉的，理解的，怀着无限信任和爱戴，团聚在他的周围，一步不能离开，一步不曾离开！如今，主席穿起了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

一霎时，人们心里，像海上波涛般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目光平视，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坚定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

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又停下来，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

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跟随着主席高大的身形在人群里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了飞机，一步一步踏上了飞机的梯子。

这一会儿时间好长啊！人们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望

着主席的一举手，一投足，直到他在飞机舱口停住，回转身来，又向着送行的人群。

人群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着飞机拥了过去。主席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像是安慰，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一齐挥手，像是机场上蓦地刮来一阵狂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从下面，从远处，伸向主席。

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主席的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像是表达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像是集中了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不在场的所有革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心情，而用这个动作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当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到来的时候，领袖，同志，战友，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之间，无间的亲密，无比的决心，无上的英勇。

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永久的形象；这无比鲜明的、历史的纪录！正是在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愿所有的人，通过这张照片，能够理解和体会，那当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的国家处在十字路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的严重时刻，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飞机的发动机响了，螺旋桨转动起来。随着这声音，人

们的心猛烈的跳动，人们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这架就要起飞的飞机；任凭螺旋桨卷起了盖地的尘砂，遮住了人们的眼睛。这架飞机该有多大的重量啊！它载负着解放区人民的心，载负着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载负着我们国家的命运！

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拥上前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抚在机窗的玻璃上，手指无声地弯动。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起在空中，在头顶上盘旋，然后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地不肯离去。

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最后才签订了“双十协定”。从《毛泽东选集》四卷《关于重庆谈判》一文的注释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实现全国人民要求的和平、民主的生活，我们党是做了怎样的有原则的让步，进行了怎样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果不是九月间的上党战役消灭了阎锡山的三万五千人，恐怕连这样的“双十协定”也不会有！

现在，重读《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以及《关于重庆谈判》等等伟大的历史文献，想起了当时在延安机场上为毛主席送行的情景，真如同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今天和未来……

以后，是在战争中了。蒋介石撕毁了他亲手签订的“双十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了。一个夜晚，在承德前线，读到一位从北平“军调部”来的同志抄在一个小本子上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这首诗第一次在重庆发表出来，震动了整个所谓

“大后方”的人士，他们从这里看到了决定历史命运的真正力量，听到了革命进程的脚步声音！而我们在前线，在炮火声中，在闪耀的火光里望着战士们持枪跃进的身形，这首诗里的思想，情绪，完全变成伸手可触的形象，身置其中的境界了。于是，诗的每一个字，如同火炬一般，燃烧起来。刹那间，整个前沿阵地，仿佛一片通明！解放战争的炮火，正在摧毁旧中国的一切黑暗势力。当时的敌人，看来是强大的；但是，正如诗里所写，决定历史命运的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人民自己，是当代的“风流人物”！

记得初到前方时，部队的同志告诉我：八月二十八日清早，部队上传达了毛主席亲自去重庆谈判的通知，当天十点钟，所有的战士都翘首西望，在天空中寻找那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谛听着飞机的声音；并且当真，他们像是听到了这架飞机的沉重的隆隆声响！那时，我们的战士怀着怎样的心情啊！他们握紧手里的武器，等待事情的结局。如今，战士手中的武器，正在发挥自己的威力了。于是，在震耳的炮火声中，我们不禁高声朗诵起来——

……………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延安机场上送行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了：主席伟岸的身影，站在飞机舱口；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住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慢慢地举起，举起，然

后有力地一挥，停止在空中……

在他面前，是无数的战士，正朝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选自《方纪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三五年是多久

曹靖华

世界上有多少鲜明、生动、细腻、委婉的语言，但哪种语言能把老苏区人民怀念毛主席的心情表达出来呢？

世界上有多少有才能的民间艺人和作家，说出了、唱出了、写出了多少感人的故事和作品；但哪位民间艺人和作家，能把老苏区人民盼望毛主席归来的心情，说出来、唱出来、写出来呢？

没有。

这种不能言传的心情，只有令人用自己的心去领会，去感受吧。

但我却还要记这样的一个故事：

瑞金有个老贫农，他的名字叫刘惟麟。

一天傍晚，他坐在绵江岸上的柚子树下，满树垂着深绿色的柚子。他那恬淡的面孔上，满布着饱经风霜的皱纹，眼睛凝视着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稻子。一个牧羊的孩子，坐在他身旁，照料着吃草的小羊。

绵江的水，徐徐地、无声地流着。周围一片静穆。老人不紧不慢、自言自语似地说起来：

毛主席当年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地种、有屋住、有饭吃、有衣穿……样样都好。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教我们要高瞻远瞩，胸怀世界……

一九三四年，有一天，忽然天变了，黑云把太阳遮起来。不知什么人，也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不祥的消息：

“红军要走了，毛主席要走了！”

我们就像坍了天，都不愿相信。

说话之间，毛主席真要走了！临走时，紧紧握着我们手说：

“同志，坚持下去，斗争下去，我们终要胜利的！红军要回来的，我们要回来的，三五年就回来的！”

说走就走了。我们就像坍了天……

国民党来了，带着恶霸地主来了，带着特务流氓来了。把土地夺去了，把东西抢走了，把房屋烧光了，把人活埋了。

毛主席走了，我们真正坍了天。

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在血火里回想着当年的好光景。在血火里想念着红军、共产党、毛主席。在血火里想着毛主席临走时对我们说的话：

“同志，坚持下去，斗争下去，我们终要胜利的！红军要回来的，我们要回来的，三五年就回来的！”

在血火里想着这些，就觉得红军和毛主席没有走，觉得同当年一样，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浑身是胆，心比天高，志比石坚。在血火里坚持下去，斗争下去，斗争到胜利！

那血火好惨啊。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

血火里，我们想念红军、共产党、毛主席。我们的天坍了。毛主席啊，我们由春望到夏，由秋望到冬，眼睛都望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三五年……”

这“三五年”有多久呢？

啊，是了，“三五年”，就是一九三五年！明年就回来了！坚持下去，斗争下去，斗争到胜利，毛主席明年就回来了！

可是……

一九三五年过去了，红军不见回来，毛主席不见回来。

那血火好惨啊。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

血火里，想念红军、共产党、毛主席。我们的天坍了。毛主席啊，我们由春望到夏，由秋望到冬，眼睛都望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三五年……”

这“三五年”是多久呢？

啊，是了，“三五年”，就是三年或五年。三年或五年就回来了！坚持下去，斗争下去，斗争到胜利！毛主席三年或五年就回来了！

可是……

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毛主席不见回来。

那血火好惨啊。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

血火里，想念红军、共产党、毛主席。我们的天坍了。毛主席啊，我们由春望到夏，由秋望到冬，眼睛都望穿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三五年……”

这“三五年”是多久呢？

啊，是了，“三五年”就是三年加五年，八年！八年就回来了！坚持下去，斗争下去，斗争到胜利！毛主席八年就回来了！

可是……

八年过去了，毛主席不见回来。

啊，那血火好惨啊，血火里的日子多难熬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多少人都葬身在血火里没有熬过来啊！

血火里，想念红军、共产党、毛主席。我们的天塌了。毛主席啊，我们由春望到夏，由秋望到冬，眼睛都望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三五年……”

老根据地劳动人民，怀着这种难得推算的“三五年”的期待毛主席归来的心情，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血海里站起来，满腔愤火，齐声高呼：

“男女老少齐向前，消灭反动派，誓作顶天柱，用胜利迎接毛主席！”

……

忽然间，霹雳一声，满天黑云顿然消失了，太阳出来了，红军——人民解放军来了，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同它的特务、流氓滚了，恶霸地主斗倒了。啊！“三五年”，一九三四，一九四九^①，恰恰三五一十五年啊！红军——人民解放

^① 瑞金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解放。

军终于回来了！从血火里站起来的人民，欢天喜地地重建起家园了！

只是毛主席还没有同红军——人民解放军一起回来。毛主席啊，你使我们重见了天日，我们怀着火一般的心想念你，想念你回到当年你手创的红都——瑞金来。

……一个消息忽然从天外飞来。这消息好比一阵春风，把老苏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心，都吹得一齐开了花，把老苏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脸上都吹得堆满了笑，笑得连嘴都抵不住地奔走相告着：

“毛主席派人来了，派访问团来了！他本来要同红军——人民解放军一起来的，因为他日日夜夜忙着替全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考虑一些大事，走不开，于是就派人来代他看我们来了。不但派人来看我们，还派了电影队、文工团、曲艺队给我们演节目，派医疗队给我们治病……啊，天地间谁能像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

访问团来了，带着毛主席的照片来了，带着毛主席的像章来了，带着毛主席亲笔给我们的题字来了：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①

我们小心地把毛主席的照片挂到屋子正中央，把毛主席的像章缀到胸前，把毛主席给我们的题字：

^① 这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老根据地访问团出发时，毛主席给老根据地人民题的字。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深深地，深深地，千秋万代都磨不去地刻到我们的心上！

绵江的水，徐徐地、无声地流着。树上的柚子，静静地垂着。老人的恬淡的面孔上，堆满了笑，凝视着一望无际的金色的稻子。远山上隐隐约约送来一阵阵的《东方红》的歌声。夕阳的余辉，把大地涂上了一层金色。羊儿吃饱了草，安闲地卧在牧童身旁，望着牧童的脸。牧童坐在老人身旁，静静地、凝神地听着老人的故事……

一九五一年八月于瑞金

（选自《飞花集》，曹靖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 年版）

信 念

袁 鹰

斧头劈开新世界
镰刀割断旧乾坤

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何芳泽同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达县梓桐乡当时三十军政治部驻地门口刻的一副对联。我们今天看到它，却不是在大巴山区的红色乡，而是在首都壮丽巍峨的革命博物馆。时间也已经过了三十年。

三十年的时光不算长，却也不是一步就跨过的，它经历过多少狂风暴雨，多少严寒烈日。多少人白了少年头，多少人抛却一腔血。从梓桐乡到北京，也不是一条普通的山路，这是一条充满了荆棘、充满了险崖陡壁的崎岖道路！

站在革命博物馆里，站在这副至今仍闪着革命红光的对联前，不由得使人想起《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当欧洲资产阶级还是十分强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它的灭亡，预见到“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的日子定要到来。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恩格斯为德文

版的《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在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发动起来的第一次革命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两洲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在法律上确立早已由国际一八六六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尔后又经一八八九年巴黎工人国际代表大会再度宣布过的八小时标准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资本家和地主们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已经联合起来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这里以凯歌似的豪情，宣告了《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四十二年国际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从涓涓的小溪汇合成波澜壮阔的江河。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事情。现在，又是七十年过去了，世界变得怎么样了呢？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们，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深深地感到：共产主义，再不是一个只在欧洲游荡着的怪影，而是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四分之一土地的雷霆万钧、难与为敌的亿万大军！

就在这革命博物馆里，当我们看到南湖那只木船的模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井冈山和瑞金的照片的时候，当我们看

到那些梭标、土枪、马灯和红旗的时候，谁不是心潮起伏、情意奔腾，好像一下子又明白了许多事情，温习了许多道理。在旧中国漫长的年代里，阴霾满天，豺狼遍地，然而，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高瞻远瞩，透过茫茫暗夜，看到了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日，看到了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婴儿，看到了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并且不断地用这种崇高的、坚强的信念鼓舞所有的革命者。

何芳泽同志刻在梓桐乡一家地主门口的这副对联，不是同样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然赢得胜利的坚强信念吗？古往今来，多少为人民事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先驱者身上，都闪耀着这种崇高的精神的光辉。就在这革命博物馆里，我们也看到一幅义和团英雄们慷慨就义的珍贵照片。那个光着上身的义士，交叉着双臂，从容地走向刑场。他的嘴角还挂着微笑，眉宇间显露着一股凛然而又坦然的英气。他的周围，一片刀光剑影，站满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刽子手，然而，他的神色那么安详，仿佛跟前正展现着一幅人民坐江山的宏伟画卷。

试想一下：三十年前，在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的偏僻山区里，既无充足的粮草，又无强大的武器，离开党中央又很远，联系很不方便，甚至不通音息。说境遇艰难，是相当的艰难了；说衣食困苦，也是相当的困苦了。然而红军战士们具有磅礴天地的革命气概，把天大的艰难困苦，一概视同草芥。就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正确的，红旗永不会倒下，相信任何荆棘都不能阻挡革命者前进的步伐。不论现在有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甚至是漆黑的长夜，但是新的世界一定在我们的手中劈开，旧的乾坤一定要被革命者割断，

“赤化全中国”的那一天一定要到来，就如同明天的太阳一定要出来一样地用不着怀疑。

对于革命战士来说，这种信念岂不永远是最可贵的东西吗？它鼓舞着我们在镰刀斧头旗帜前举手宣誓，把毕生献给共产主义的信仰；它激励着我们冲破一切樊篱，坚决、勇敢地斗争；它鼓动着我们在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之后，踏平新的浪涛，驶向新的胜利的彼岸！

（选自《风帆》，袁鹰著，作家出版社 1963 年版）

北 京

老 舍

我生在北京，热爱北京。现在，我更爱北京了，因为伟大的毛泽东住在这里。

自从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五年来北京起了很大的变化。它已不是我幼年间所看到的北京，也不是前十年的北京；甚至于今天的北京已不是昨天的北京！北京天天在发展，一天比一天更美丽，更繁荣，更可爱！

北京的皇宫御苑是多么庄严美丽呀！看，那些绿或黄的琉璃屋顶，那些雕梁画柱，那些白玉石的桥栏，那些多角的各式各样的亭子，和那些金碧辉煌的牌楼，都是多么优美的艺术品啊！这些楼台殿阁，无论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还是在秋风明月之下，都足以使人有身入仙境之感。多少代的诗人曾写出过多少篇诗歌，赞颂这些美景啊！

可是，在我小的时候，人民不但不能到那些琼楼玉宇里边去，连看一眼的福气也没有啊！许多的地方不许人民通行，而这些地方正是最美丽的建筑和亭园所在地。后来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这些古迹名胜或任其颓倒，或遭到破坏，反动派甚至盗窃古物出卖。现在呢，市政府保护古物，

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先后修葺，油饰一新。故宫、博物院里历代珍藏的名画、铜器、磁器，和人间罕见的艺术品都重新整理排列，分设专室，以便人民群众参观欣赏。发掘出的古物随时展览。名闻全世界的颐和园，和天坛，社稷坛，都加以修葺。什刹海修建了很大的公众游泳池。用劳动人民的血汗与智慧修成的，理由由人民享受；在这些名园中的游廊或松阴下休憩游玩的已不是有闲阶级，而是广大的人民。这些宫宇园庭不但受到保护，而且增加了新的卫生设备，施行了科学的管理方法。

在这些原有的名胜之外，人民的市政府还在继续开辟新的公园。昔日的贫民窟和荒凉的城角，现在都有了公园。人民政府首先为劳动人民服务！这是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北京增建了新剧院，新电影院，新的中学小学，新的诊疗所，新的文化馆，新的自来水站，新的马路，新的电灯线，和新的汽车站等。

真的，假若我这几年没在北京，而今天忽然地回来，我一定不认识我的故乡了。谁能凭空想象到在那最荒凉污浊的地带会有了公园或学校呢？以前，统治阶级的宫邸的确是富丽堂皇的，可是北京并不清洁；现在，到处都是一样，紫禁城和最偏僻的小巷都是干净整洁的。卫生运动是普遍而深入的。前几天，我到西城去参加一个区政府的会议。那离我出生的地方不远。我记得清清楚楚，那里原是一大片空地，夏天只有垃圾、野草和积水；小时候，我在那里捉过蜻蜓。今天呢，那里却是一大片楼房！是的，野草、垃圾、积水，已无法在新中国的首都存在了！再看，新盖的大楼有多少座啊！北京，一向是消费都市，如今有了新的工厂啊！这是个

极大的改变。一方面修建了新的工厂，另一方面又整顿了北京原有的、驰名全世的手工业。地毯、景泰蓝、雕漆、象牙雕刻等，现在全有了合作的组织，提高了质量，而且研究出新的形式与花样。

这个大变动，不但使北京改了面貌，连北京的精神也变了。看吧，北京一向是文化城，有许多大学、中学、小学。可是，在解放前，甚至于小学也没有穷人子女入学的份儿。今天呢，大学中学都有很多工农子弟。中学生已有八万多人，小学生有廿八万多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同样的，医院、图书馆、剧场、大饭馆……以前劳动人民不能进去，如今都是为他们预备的。以前，学校只为培养书香门第的儿女，所以课程只限于普通的文学与科学，使青年们得到一点知识，毕业后可以去作官发财。今天，学校的课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谁想得到，我的第三个女孩是去学石油专科啊！

是的，一切都变了，变化最突出的是妇女。看吧，小学校里，女教师占过半数。我的大女孩已是人民教师了。机关里、医院里、一切企业机构里，哪里都有女干部。而且，电车有女司机，工地上有女瓦匠，新选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女代表占了百分之一八点八！北京真是变了，面貌与精神一齐变了，在这变化之中，我们看出来，男女的确是平等了！想想看，在三十年前，我自己的姐姐都圈在家里，专等媒婆来给她们说亲。她们没有到剧院去的资格。今天，我们有多少女演员啊！

只有人变了，才是真的变化——这不仅是变化，而是发展与进步。北京还有古老的城墙，古老的皇宫，古老的文化

传统，可是因为人变了，这些古老的东西便有了新的作用，新的精神，和新的生命！向来就美的，今天更美了，表里一致的美。正如同北京最有名的木刻彩印，它保存了几世纪来优美的技术，可是又加上了新的精神。它使用传统的艺术刻出印出今天人民所喜爱的彩画来，改进了技巧，也改进了刻画的内容！就是这样，新的旅馆、学校，有一切新的设备，而保存了建筑的民族风格。屋脊上的绿琉璃的奇形怪状的兽头，变成了绿的和平鸽。绿琉璃鸽既不奇形怪状，而且象征着和平！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推陈出新”。一切都是这样。

这就是我所热爱的北京，也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福利，一切为了和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建设着的新中国的首都！

（选自《我热爱新北京》，老舍著，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

中国的春天

——为苏联《文学报》而写

丁 玲

今天，是一九五二年春天的日子，是温和的阳光落在我书桌上的时候，是雪在悄悄融化的时候，是我阔步走在莫斯科广场的时候，是苏联的和平建设，高度的文化教育着我的时候，一个题目来到我的生活里面。它像淡黄色的阳光一样来到我的书案上，它清楚地美丽地被写在我的洁白的稿纸之上，它深刻地印入我的脑子里：啊，“中国的春天”，中国的春天啊！“中国”这两个字不就是春天的化身么？当你想起中国的时候，你就看见无处不是新鲜，一切新事物都在绚丽的阳光之下，在温柔的和风之下发芽，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四处都感觉得到有一种不可压制的力量。这个力量正如果戈理所形容过的永远追不着的三驾马车，“地面在它底下飞扬着尘土，桥在发吼，一切都留在它的后面。”中国啊！中国正在奔向光明，奔向集体化，奔向毛泽东所指示的方向。

“中国”，春天的中国，当我要为你讴歌的时候，从我的心中，好像升起了一股喷泉。我无法清理这些汹涌的热情，也来不及找到恰当的语言。我羡慕莫斯科大戏院的歌手，他

们的确能把他们所要表现的，所应该表现的情感，倾泻无余，而又恰如其分地感染着人们的心。但我不管这些，我要欢呼！我要用我的全力欢呼：中国！人民的中国，毛泽东的中国啊！你带来了浓郁的春的气息，百花齐放；带来了生命，活泼有力而且是温暖和幸福！

然而，当我为你讴歌的时候，为你的今天而讴歌的时候，我却不得不起了你的昨天——严寒的冬天。你曾经用过多么艰难的步骤，走了一个长长的历史阶段。你在几十年之中，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翻了一个身，你使五万万人自由地站立起来，你打倒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你在自己的领土上消灭了万恶的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者。你发扬了中国人民传统的美德，勤劳和勇敢；你又在肃清资产阶级所留下的腐化的庸俗的思想。中国是在斗争之中长大的，它还在斗争中。它为着它的理想，要战胜一切阻碍它前进的力量。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古老的年代去吧。是果戈理的时代，是托尔斯泰的时代，是雪甫琴科的时代，是高尔基的童年的时代，我诞生了，诞生在中国的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虽说在俄罗斯已经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时期，有了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革命，但我出生的那个乡村，有什么不同于果戈理小说中，雪甫琴科的诗句中的情形呢？今天苏联的儿童，带着红领巾，走到儿童宫去学习科学和艺术。可是，是些什么东西在那时教育着我呢？当我还是一个应当捉迷藏和跳绳的幼年，没有什么旁的，只有封建地主家庭的黑暗腐朽和一切暴政，以及吃人的礼教。人们都是这样。人们得学习着忍受，锻炼坚强的意志，和储蓄着一切反抗的力量。我

没有学习到什么，和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只学到了一个思想：“旧的应该打毁，要砍断一切锁链！要冲破牢笼，为了光明，为了祖国，要做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家庭的叛逆。”

我也曾有过最可羡慕的青春。我应该充满了生的喜悦。我应该去跳舞、去滑冰。可是我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只是像一个灯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找寻光明。我甚至像一个老妇人，伏在地上，亲着潮湿的土地而哭泣。我觉得我的身子太轻了，负载不了这时代的苦痛。我曾在中国有名的杭州住过，这曾为中外诗人们所称赞过的地方。但我只能在山巅上高歌，以排遣我的抑郁。我甚至一点也感觉不到湖山的美丽。我也曾踟躅在旧北京的街头，如一个饕餮者贪馋地去吞食知识，想从西方文化中得到道路。我到今天还不愿仔细地回忆那可悲的青年时代，应该像春花一样美丽的时代，却填满了忧愁，愤慨，挣扎，和反抗。然而我也应该感到愉快，就在这样的年代中，我慢慢地走到了实际，我找到了真理，我和人民在一起，我站在一个多么可爱的人的麾下，毛泽东的麾下，充当一名小小的兵士。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投身到热烈的革命的火焰当中。我们已经不再醉酒狂歌，而是举起革命的火把，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已经再不徘徊街头，而是以整齐的步伐，向反动者进军！我们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开始了新的生命。曾经是多么困苦的，但走过来了，走在到光明去的大道上了，走到一个有伟大理想的大道上了。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斯大林，我们有毛泽东！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着复杂的、曲折的、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早在一九二六年间我们就曾经胜利

过。可是绅士们再也不能酣睡了，他们发抖，他们叫嚣，连知识分子的脸也变白了。于是反动者们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人民胜利的果实。我们还能忘记一九二七年反动者给予我们的血的教训么？我们走到哪里，哪里都在逮捕和屠杀。四处都布满了白色恐怖。但是，啊！你，毛主席，你把红旗在井冈山上高高升起，你像一线阳光照在人们心头，你像黑夜中海上的灯塔，你指引着革命的方向，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你把希望和信心传播给人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南北十几个省份野火般地燃烧起来了！革命的力量聚集起来了，革命的经验在被积累着。毛主席！你知道现在的这些老区的人们是多么骄傲地谈着他们的过去，远远近近的人民又多么向往着这革命的圣地啊！

人们最不忘的，永远要被诗人们当作歌颂的题材的，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铁的红军，从江西走到陕北，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在惊险的浪涛中，在没有飞鸟也没有野草的雪岭上，在无边无际的草泽中行进。他们还通过一个少数民族区，又通过一个少数民族区。他们前边有敌人，后边有追兵，左边是反动派，右边是地主的武装，可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这“铁流”。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又一个奇迹，当一个红军的兵士在月夜的草原上，想起了家乡的歌谣的时候，他跟着就想起了那睡在离他们不远的毛主席。他们就再也不能睡了，他们要守护这块土地。他们就要擦亮他们的枪，为着那个睡在他们不远地方的毛主席去杀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了。这长征，这胜利，本身就是一首伟大的史诗。诗人们写了，留下了不少的诗篇，可是我们最爱读的，百读不厌的，写出了这气吞山河的长征的诗的，也还是这史

诗最重要的创作者，毛泽东同志。我们愿意再温习一下这感情，我们愿意再朗诵这名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国革命的中心到了陕北，毛主席驻在延安。延安这小小的偏僻的山城，便成为世界的名城。抗日的统一战线在这里，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在这里，革命的力量扩大和巩固在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也在这里。延安啊！你曾经培养了多少干部、改造了多少人的思想。你那个大礼堂上，到今天还留着毛主席的题字：“实事求是。”所有在延安住过的人，都曾把你当一个家，惟一的家，都舍不得离开，离开了便永远怀念。陕北的人民，原就是长于歌唱的人民，自从有了毛主席，他们就更会歌唱了，更爱歌唱了。老农民孙万福见了毛主席，口诵了很多的诗，到现在这首歌唱遍了二十几个省：“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解放区的太阳是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农民李增正唱出了所有人们心中的话：“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个歌，我在莫斯科听到过，在斯大林格勒听到过，在格鲁吉亚的首都梯比里斯也听到过。苏联的朋友们啊！我想你们会懂得我听了这陕北小调后所涌起的无尽的情感啊！

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胜利了，毛主席引导着我们

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胜利的红旗，人民解放的红旗，和平的红旗从北往南插，从东又插到西。全中国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从世界的东方，升起了曙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拍手欢呼。中国的解放，给世界和平增加了多少力量。新中国是站在拥护和平的一面，站在苏联的一面，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这一面！

那一天，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北京的天，蓝粉粉的，北京的人们穿着新衣，心里被烧着似的兴奋，心随着歌声，随着“万岁”的呼声飞向一个地方：天安门。人的河流也奔向天安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是一片人的海，旗帜的海。红色的波浪翻滚着。人们重复着一个声音：“毛泽东万岁！”人人仰首望，天安门上也站满了人，人人在人丛中找，啊，那个高大的个子正是人民心上的人。啊！毛泽东！啊，毛主席！我们要永远跟着你，永远服务于人民，做一个不掉队的小兵。这一天，毛主席站出来了，人人都看见了他，他的声音响彻了天安门，响彻了北京，响彻了全中国，也响彻了全世界。他宣布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新的一切，便从这一天开始了。春天来了，中国的春天啊！

在春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起着巨大的变化。天津有一个姚大娘，她曾经这样说过：“我，是一个穷苦老婆子。过去，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挨饿受冻，受尽欺凌侮辱。我男人蹬三轮车，摔坏了腿没钱治，我儿子卖冰，拉大车，赚来的钱不够全家人吃山芋面的。孩子们饿得哭，我生小孩两天没进一口汤水，饿得眼前冒金星，从炕上摔下来……”可是现在呢，她说：“解放后我们的日子一步登了天，我们吃的饱，穿的暖，再也不受气。我两个儿子都在工

厂有了工作。”这个姚大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她逮住了一个特务。人民四处表扬了她，她便又说道：“这本来是我分内的事，可是人民却那么热情地拥护我，送我很多锦旗和礼物，请我到各处做报告，报上也登了我。我心里真说不出是怎么个滋味。我黑夜睡不着觉就想：这别是做梦吧，一个穷人还能有今天？连市长见了面还和我握握手。”她猛地站了起来，看见满屋子悬挂的耀眼的镜子，彩色缤纷的锦旗，她忽然在这些中间看见一张相片，毛主席的相片，她于是兴奋地叹道：“这是真的啊！我有了今天不就是他，毛主席、共产党给我的么？”

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人们的要求便也不同了。七十岁的老人们也每天夹着书本去到识字班，他们不愿落在年轻人后边。湖南《大众报》在报纸上讨论土地改革、生产、时事问题，有一千个左右的农民很热情地写稿来参加讨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旗帜，他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写信给毛主席，说的是他思想认识上的变化。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懂得了城乡关系，懂得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懂得了要关心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农村里在大量地使用新的技术和新的农具，他们从变工互助慢慢地走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采用按劳动日计酬的办法，他们还逐渐地增加着公有的生产资料。而且在东北的北满草原上，在松花江的南岸，一个幸福的集体农庄出现了。庄员们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他们一年一年地改进了管理方法，他们有丰富的收成。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每家有几间房子，房子里有电灯。他们有过节日的衣裳，书架上摆上了新书。他们读《社会发展史》，他们读《米丘林

生平》，有人读《我们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有人读《新文学教程》。这个完全理想的生活实现了，这个新闻正被全国农民注意着，他们正走向苏联农民那样幸福的环境。他们的灿烂的前程，就是我们大家的远景。赶上去啊！全中国的农民啊！这并不辽远，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很快便要同他们一样的哪。

工业的成就，数不清。铁路增多了，江河畅流了。人们坐着宽敞的新的列车，飞驰着前进，车窗外展现出那么美丽的肥沃的辽阔的田野。车窗内人们听着音乐，读着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人民响应了这个号召，三百万人组成了一支雄壮的大军，他们要改变历史，要和自然斗争。工人把技术教育着农民，干部团结着技术专家，他们联合在一起展开了和洪水赛跑、和时间赛跑的激烈战斗。淮河修好了，千百年来为灾为害的祸水驯服了。他们有了闸，有了水库，还要有电气化。淮河将要成为一条美丽的河，一条可爱的河了。

工人阶级摆脱了压迫，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后，就自然发生了主人翁的感觉，树立起新的劳动态度，生产率一天天提高，一个新纪录压倒一个新纪录。他们提出劳动竞赛，他们订立爱国公约，他们展开了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运动。劳动模范像雨后春笋地争着出来了。这短短的白纸写不尽他们的新的成绩，和那些光荣的名字。而且他们进工人学校了，进人民大学了，进中央文学研究所了。他们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登在《工人日报》上，登在《文艺报》上，登在《人民文学》上；他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演了他们自己的戏，《不是蝉》这个戏自石家庄演到太原，又从北京演到

上海，工人们爱看，作家们为他们开座谈会。他们要件件事都走在前边。

人们在一切的运动中，迅速地变了样。人们抛弃了自私自利，生长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抗美援朝了，人人都起来保卫和平，这里示威，那里游行。年轻人上了前线。老太太们也拿着簿子，征求人们在和平书上签名。我们的志愿军从一九五〇年十月到现在一直是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不顾美帝国主义残酷的轰炸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的细菌武器的袭击。绿山烧成黑山，黑山又被炸成黄山，土地变色了，鲜明的红旗却屹立在阵地上。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把来自祖国的香烟盒中的画片钉在战壕里，“祖国啊，我要为你战斗到底！”全中国的老老小小都明白，我们的战士最可爱。他们是人民的战士，是和平的保护者，他们永远忠于自己的神圣的职责。

中国是胜利了，中国到处都充满了春天的阳光，中国正走在开满鲜花的道路上。喝水的要不忘挖井的人，是谁使我们这样？老百姓都在歌唱，是毛主席的恩情，是共产党的主张，是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和苏联人民的帮助。中苏两国永远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成了世界和平的保障。

中国胜利了，中国四处都充满了春天的阳光，中国正走在开满鲜花的道路上。毛主席告诉我们：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还要进行长期的复杂而艰苦的斗争，才能保住我们已得的胜利，才能获得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今天，是一九五二年的春天的日子，是中国在原来的成就上更向前飞跃发展的时候。我跟随着中国人民，爬过了一

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个浪潮又一个浪潮，到现在走进了这幸福的年代。我越活下去，我就越充满了爱。我爱新生的一切，我爱这朝气蓬勃的祖国。我爱新的人民，在毛泽东教育下，一切都变得那样好的人民。我看见我们的妇女都打破了封建的锁链，得到了解放，她们在各种岗位上都显出了和男子们一样。我看见我们的孩子们也带着红领巾，受着日趋完美的教育。我看见我们的老年人都年轻了，满怀着对世界的希望。我看见坏人正在变好，劳动改造了他们。我们已不再褴褛，过去苍白的面孔上，现在已经充满了血色。中国人是多么漂亮而有精神的人物啊！我到处看见的都是阳光，我到处都感觉得到生的气息、生的力量和生的喜悦。我曾经悲叹过的、忧愁过的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欢乐，到处都听到雄壮的歌。我曾经以我的笔作为武器，去揭露黑暗，反抗暴力，现在我要以我的笔去歌颂新生活的一切。虽然在我的鬓边，已经悄悄地爬上了白发，但我却觉得好像生命才开始。我同中国一样，同中国人民一样，有的是充沛的力量。我好像成天都在诗的境界，诗的句子常常涌到我的心中，我要为中国而创作，我要为毛主席而创作。我常有一个希望，让春天的中国在我的创作中发芽吧，生长吧。让我好好拥抱着春天的中国！

一九五二年三月写于莫斯科，四月改于北京

（选自《丁玲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介绍“志愿军一日”

巴 金

听见窗下的蛙声，我又想起了朝鲜。四年前我在开城附近一个村子里住过几天，晚上很少点蜡烛，免得成为美国飞机投弹的目标。我打开窗倾听月夜里的蛙声，我感觉到朝鲜土地的温暖。大炮在不远的地方轰鸣，朝鲜的小女孩在大树下的一块空地上唱歌。接着响起了一个中年女人的笑声。在战地上我看到的不是恐怖和死亡，却是无穷的生命力，是不可制服的勇气，是像迎春花那样开满山野的友爱。

有一天我从这里走到山上去，在坑道里住了好几晚。每天跑过交通沟，通过封锁线，去访问前沿阵地的志愿军连队。深夜，敌人炮弹片落到坑道口，我出去看岗哨是否安全，年青人的笑脸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像这样的笑脸我每天都看见。在战争中的朝鲜，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的朝鲜，我不知见过了多少这样可爱的年青人。在仲秋的一个凉夜里，年青的指导员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盖在我的被子上，因为我是从祖国来的客人。在志愿军的一举一动上，我都看到了对祖国的热爱。

的确，在朝鲜，我每天都过着兴奋的生活。在坑道里，在掩蔽部里，在农家的茅屋里，我不断地听到志愿军的指战员讲的英雄故事。每天我也亲眼看见在我周围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四个字虽然是人们用滥了的成语，字里已经没有了歌声和眼泪。可是生活在朝鲜的土地上，生活在志愿军部队中间，不论是在战争中或者在战争后，我都觉得：生活多么丰富！人们的感情多么深厚，多么强烈！这种感情都是用每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爱和恨，到必要的时候甚至牺牲生命。譬如，敌机投弹的时候护士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在困难的时候，战士们节省自己的粮食送给朝鲜妇女。战斗激烈、任务紧急的时候，每个人都勇敢地去迎接死亡。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志愿军的行动不仅引起朝鲜友人的眼泪，而且常常成为朝鲜妇女歌唱的题材。这些歌子会流传万代，因为它记录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在朝鲜我听惯了这样的歌子，我也听惯了志愿军写的更多的歌子。文工团同志们唱不完战士爱祖国、爱人民的深情，战士们也唱不完他们那种“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会写的就用笔写出来，会唱的就用嘴唱出来，不会写、不会唱、不会讲的就用行为表达出来。这一切里面都含有一样东西：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在志愿军中间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从我们农村里来的朴实、平凡的好青年。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里面何止千千万万！可是他们一旦到了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恨表现得最突出的地方，他们就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事情，他们做得很自然，没有一点勉强，好像他们不能不这样做一样。有一

个朝鲜老大娘跟我谈起来，他说志愿军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感情，只有爱和恨是共同的。谁不爱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祖国和人民？谁不爱勇敢、勤劳、活泼、热情的朝鲜人民？谁不爱和平建设的劳动生活？谁不恨将美丽的城市沦为废墟，使和平人民血流遍地的敌人呢？在这尖锐的斗争中，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得到培养而开花了。

像这样的花朵在朝鲜每一寸土地上都找得到，他们点缀了朝鲜的美丽的河山，敌人的飞机、大炮炸毁不了它们。一切现代化的武器在它们跟前都失去了效力。它们向全世界发射光芒：暴力终归要失败，和平终归要恢复，正义终归要伸张。生活在朝鲜的人哪一个不曾为它们歌唱？访问朝鲜的人哪一个不曾有过感激的心情？什么人能够不用它们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多少人从它们那里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舞！在朝鲜的时候我常常同朋友们谈到这个，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应该写，应该多写，让每个中国人都看到这样美丽的花朵，可是要靠我们写是不够的，而且我们的笔又是多么软弱无力！倘使参加实际斗争的志愿军指战员们能够动笔写出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多么好！倘使发动志愿军写出他们的英雄事迹，哪怕是一鳞一爪也一定含得有发光的珠玉般的东西；要是把它们凑在一起，一定会是一幅很出色的大画面。

现在“志愿军一日”终于在大家的盼望中出版了。这是一部空前的书。这是多少英雄们的创作，它不仅是充满热情的文章的总集，更重要的，它还是实际斗争的记录，而且还是充满献身精神的行动的总结。执笔的人都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指战员，他们写那些给他们印象最深的事情，从副司令员

杨得志到战士朱友恒，每个人都写得那么朴素，那么诚恳，那么真实，没有丝毫的夸张，而且不带一点文艺腔，却又那么动人。每个人的叙述都证明一事实，他曾经为他写的每一句话付出过很高的代价。就拿指挥部“突破临津江”的杨得志同志来说，他为着组织这个战斗花费了多少心血，他当时是以全力从事的。他知道自己要是稍微有一点疏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伤亡，甚至不能完成任务。打仗不比写文章，错了没法改正。再拿万福来连长来说，他的关于黄继光烈士的报告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他的文章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叙述。但是先有了通讯员黄继光用身子堵枪眼的英雄事迹，才有万福来连长的激动人心的文章，而且万福来同志本人在战斗中也多多少少贡献了自己的鲜血。“连中三元”的战士朱友恒同志不管自己胸前一大片血迹，咬紧牙冲出工事，用火箭筒打坏了敌人的装甲车。可以说，他的文章是用自己的血写成的。他不是叙述别人的故事。他是抱着必死必胜的决心在参加战斗，所以他的笔下的每个字都有很大的重量……

我用不着再举出更多的例子了。那些不朽的文章比我的话更有力量。我说“不朽的文章”，并非盲目的颂扬。我相信，它们里面流露出来的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可以万古长青，连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也会在它们里面找到温暖。每一个诚恳的读者都会从“志愿军一日”中得到益处：你读它，认真地读它，它会使你变得更好！

（选自《解放军文艺》1956年9月号）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臧克家

毛主席视察黄河，一张留影告诉了我们这个消息。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了。这是望到了壮丽的远景，从一个伟大心胸里流露出来的欢笑。这笑里带着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必胜的信心。这笑是有力的，动人的，富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追随在毛主席身后，紧跟着他的脚步前进的六个人，不，应该是六万万人，也都笑了。

毛主席在笑着向黄河打招呼，好似说：“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黄河啊，不能再任情纵横了，我们要你为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

远在童年时代，读了地理和历史教科书上的描写，就使我对于孕育古代中国文明的这祖国第二大河，产生了一种豪迈的景仰感情。

古代诗人们的诗句更把它美化了。长河落日的雄浑景象，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伟大气势，是会令人为之心怀壮阔、志气昂扬的。

黄河，这流经七个省份、流长五千公里的来自天上的

水，是任性的、骄纵的、粗野的，简直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饥饿的猛兽。

不必向前代的典籍上去清查它那残酷灾害的记录，听一听千百年来挂在人民口头上的这血泪凝成的一句谚语吧：

“黄河百害，惟富一套。”

富庶的河套，是黄河所给的一点甜头，这一点点它口里所吐出的，和被它所吞没的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了。

黄河，不简直就是黄祸吗？

过去黑暗社会的统治者，对于自然的灾害，不是设法去控制它。为了个人的野心，反而放纵了它。就像解开饿虎颈上的铁链，把它驱向善良的人民。

1938年国民党炸决花园口黄河大堤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于这次以八九十万人民的生命和无法估计的财产作牺牲的人造黄泛，我也是它的一个见证人。我在豫东虽然只见到了它的一点余波，那景象已经够动魄惊心的了。举目茫茫，一片黄汤。树木的梢头，挣扎出水面，遥遥地向人招手。日用家具，像小船随波飘荡，时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着，好似恋恋地舍不得分开。平地上行船，高的屋脊鱼群似的掠船而过。在退了水的土堤上，走动着一一些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受难者，他们有的睡在露天里，有的在树上打一个吊铺，时间仿佛倒退了一万年，二十世纪的人民，在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

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悲惨的景象，都会对受灾的同胞，发生无限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十分愤慨。对于黄河呢，认识到它为害的惨烈，从心里兴起一种制服它的愿望。

这种制服黄河，使它滔滔的洪流安澜的愿望，不是自今日起的。远古时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大禹，不就是人民智慧、人民希望的一个化身吗？他那凿龙门、疏九河的气魄和毅力，他那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惶惶不宁居处的忘我精神，是叫人肃然起敬而且为之深深感动的。历代以来，凡是在治黄方面尽过一些力量、作出一些贡献的人，人民铭记着他们的名字，用感激与尊敬的心情怀念着他们，甚至替他们立了庙堂，把他们当成神来供奉。

可是，由于历史性的限制，由于旧式的社会制度的阻碍，对于为害巨烈的黄河，只能凭一次又一次惨痛的经验，作出一些消极性的防御工作，如何从根本上控制它，使它对祖国和人民作出有益的巨大贡献，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把“等到黄河水清”和“日头从西边出来”看做同样是不可能的。

是的，滔滔的黄河，流过荒古的北京人时代，流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流过蒋介石反动统治时代，它那贪婪的大口，吞进了千万顷良田沃土，在大地上留下了漠漠荒沙，它把几千年前的水纹留在峭壁上，它把惊险留在一代又一代三门峡船公的心头，它把报警的锣鼓声、大堤溃决时绝望的呼号，永远留在人民深深的记忆里。

黄河，终于流到了毛泽东时代。

千万年蛮横任性的黄河，今天，我们要叫你服服帖帖地顺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指标前进。

千万年来滔滔的浑黄浊流，我们要叫你一清见底。

黄河，一个领导全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巨人，走近了你的身旁。他笑着向你打招呼，他也要你彻底翻一个身。在他的

笑容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河远景：

规模相当于第聂伯河水电站的一个水电站，巍然屹立在三门峡上，这里的电门一开，无数工厂的机器立刻轰鸣了起来，数以亿计的电灯，一齐放出了亮光。

拦河坝，拦腰把黄河拦住，成为一个又一个人造湖。它的绿波，映在旭日和晚照里，会使人想起“澄江静如练”这美丽的诗句所表现的境界来。黄河两岸，树木成林，绿草如茵，秋天来到的时候，一望无边的黄土地上，火似的沉甸甸的高粱的红穗在风里摇晃。

成队的汽车在柳阴大道上疾驰而过；汽笛叫了，满载客人和货物的轮船正行走在河面上……

毛主席站在黄河身旁，望着它的壮丽远景，笑了。

1955年10月

（选自《在毛主席那里作客》，臧克家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新疆在欢呼

碧 野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在这伟大光辉的日子，当天安门的礼炮轰鸣，当全国人民欢呼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在这遥远边疆的城市——乌鲁木齐，各族人民为了庆祝国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穿着各式各样的盛装，载歌载舞地列队在长街上前进。

在旗帜的飘扬和鲜花的挥舞中，各族人民的步伐和脸孔，都表现出欢乐幸福的昂扬情绪。他们当中有熟练地掌握了最新机械技术的工人，有给国家增产高额棉粮的农民，有善于牧放牛马羊群的牧民，有打枪百发百中的猎人，有用灵巧的手指织出绚烂的地毯的织女……这些祖国优秀的儿女，正为自己强大繁荣的祖国，正为自己民族自治的美丽理想的实现而狂欢。他们感谢他们幸福的缔造者，他们的每一颗心此刻都朝向北京，朝向正站在天安门上的英明的领袖毛泽东。

六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平等和自由。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的剥削、压迫，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那被奴役的惨痛日子

已经永远过去，那男人被杀戮、妇女孩子挨饿受冻的凄凉岁月已经永远不复返。新疆的各族人民，今天已经美满地生活在民族的大家庭里。

现在，当新疆各族人民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欢呼“亚夏颂”^①的时候，当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等等民族的人民同声欢呼着毛泽东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不难理解他们这种无限真挚的感情。解放以来，由于党的正确的领导和亲切的关怀，由于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千年万代无边的戈壁荒滩，已经出现了无数水光闪闪的纵横渠道和水库，已经出现了无数爽心悦目的绿洲。这片绿洲一年比一年扩大，一年比一年互相接近、毗连，麦子、棉花、稻子和玉米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往昔的不毛之地，现在已变成了祖国的大粮仓。在这无边的戈壁荒滩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集镇和村庄。发电站、钢铁厂、纺织厂、汽车修配厂和拖拉机修配厂的高耸云霄的烟囱在冒烟，果林掩映的医院，花草围绕的托儿所，灯光明亮的剧院，充满了笑声的俱乐部和幽静的图书馆，显示出一种崭新的美丽的生活。

当然，你光凭着地图，是很难正确地认识今天这祖国的边疆了，即使是最新一版的地图，它也赶不上这一地区实际的飞速进展。在地图上你用手量一量那塔里木盆地，它比四川全省还要大吧，但它也已经被农田逐渐占领。在地图上空着的戈壁滩上，现在已经出现了明珠似的城市，这就是玛纳斯河畔的石河子新城、喀什噶尔河畔的新阿图什、孔雀河畔

① “亚夏颂”即万岁。

的新库尔勒、阿克苏河畔的新沙井子……

几年来，这边疆变得繁荣、富饶和美丽，是由于人们响应祖国的号召，用辛勤的劳动改变了大自然，创造了新的生活。在自古著名出产良马的焉耆，那无数的骏马已不是用作征战，而是在套着犁耙耕耘，在供给老人、姑娘和孩子以最富营养的马奶。在古时被称为龟兹国的铸造宝剑的库车，现在在巴哈河岸上，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为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砍伐的利器，而成排成列的鼓风炉正在为自己的农民兄弟打着各式各样的农具，那些鬓边倒插着一枝鲜花的俊俏的姑娘们，也已经从幽暗的闺阁走向明朗的田间。

在阿克苏的沙井子，往昔人们受不了国民党和地主的压榨，逃离自己的故乡到这里来开荒，可是地主却跟踪追来，站在高地上把手杖一指，这些刚开垦出来的土地又成了他的农庄。往昔这片滴满了眼泪的被榨取的土地，现在已变成了农业合作社的田园，人们的眼泪已经化为欢笑。

是的，悲痛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在喀什，维吾尔族妇女们不再跑到香妃墓前，靠着墓墙哭诉她们的不幸，她们的丈夫不再远走千里去谋生，她们的儿子不再被抓兵，她们的女儿不再被蹂躏。色满乡肥沃的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不再被地主夺去，不再有一年的辛苦劳动只剩下一堆麦秸的事了。她们的丈夫有的已经成了村长或农业社长，她们的儿子有的已经成了耕作队长或组长，她们的女儿有的已经成了播种机或收割机的驾驶员。她们的庭院像披上了朝霞似的垂满了红杏，她们的打麦场上已经铺满了金子似的乌克兰麦子。

在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巩乃斯河川，哈萨克牧民们不再驮着帐篷赶着稀少的牛羊到处流浪，他们运用了新式农具

初次进行了耕作，在丰收的季节，他们尝到了谷物的香甜；在清蓝的卡波河和高耸的雪山之间，那千里牧场上，处处是膘壮的马群在嬉逐，处处是姑娘们在挤牛奶做酥油，处处是羊群在游动。那人高的野花布满了山岗，像连延不断的绚烂的织锦；那辽阔的牧场，像用熨斗熨过的蓝绸那么平整而鲜明。牧民们的妻女和羊群不再被土匪劫掠，不再光有一匹瘦马辗转于山野间乞食。现在，他们已经有为牧群过冬储草的割草机，已经有为孩子们设立的小学校，已经有为人畜的健康派来的医疗队和兽医队。有一个哈萨克老牧人，利用工作余暇，每隔几天就要制造出一把“东不拉”，他说他要让全牧区的年轻人为今天美好的生活而弹唱。

不论你是从昆仑山边的喀什市到阿尔泰山边的阿山城，或是从国境西边的伊犁到接近甘肃的哈密，各族姑娘们最爱穿的是刚刚出厂的天山花布裙子，蓝底白花，像绿波间的白莲。这是七一棉纺织厂的产品。在过去反动统治年月，三冬六夏上无整衣，下无完裙的姑娘们，现在已经有了鲜艳的舞裙。她们的歌喉变得清亮而甜蜜，她们正以自己纯洁的爱情歌唱着驻在这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

我们英勇的解放军，不但使这边疆的各族人民摆脱了黑暗的灾难岁月，走进了光明的幸福年代，而且还百倍勤劳地参加了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不仅给姑娘们建筑了印织花布的工厂，不仅教会各族农民使用新的农具和运用新的耕作技术，而且在无边的戈壁滩上建立起许许多多大规模的示范农场。

不论在焉耆、在阿克苏、在喀什、在乌鲁木齐、在哈密、在伊犁、在玛纳斯河流域，辽阔的军垦农场上的庄稼

海洋。那像在绿缎上面交织着银丝线似的田间水渠，那像晨妆时开启着的镜面似的清明的水库，给这丰盛的大自然添上了动人的魅力。

当你看见为支援内地建设而来到这祖国边疆的山东姑娘们在平坦无边的棉花地里拾花的时候，你能不觉得她们格外可爱么？当你看见我们身经百战的英雄战士们驾驶着拖拉机，在清晨、黄昏和黑夜的地边开荒，从千年万代的原始荒滩翻出黑色土壤的时候，或驾驶着康拜因在万顷麦田上收割的时候，你能不感到喜悦么？当你看见我们的水利战士们□着冰冷的雪水完成建筑水库和拦河坝后，又到另一个荒山野谷去开辟新的工地的时候，你能不衷心向他们致敬么？当你看见参加基本建设的战士，在严寒的风雪中刚给人们建筑成一座美丽的新城，立即又背起他们的行囊和工具去建筑另一座新城的时候，你能不对他们寄予崇高的爱戴么？当你看见我们的牧放战士，是怎样在无边的牧场上搭起帐篷，不管夜雨浇身或烈日晒顶，日夜背着枪防狼，牧放着羊群，他们亲手剪下的羊毛织成你身上的毛衣，他们以自己的辛劳使你身上发暖，你能不感谢他们么？

是的，我们有些战士曾经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负过伤，曾经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留下了伤疤，又曾经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流过血。这些热爱祖国、对党忠贞的无敌战士，现在又在为国家为人民创造无限巨大的财富。他们身在边疆，但感情却紧紧地联系着党中央，紧紧地联系着祖国和人民。他们亲切地念着领袖，念着老首长，当他们看见从关内远来的兄弟，第一句话就要问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的健康；他们也殷切地探问着内地的建设和人民的生活，当他们

知道要开发黄河水利根治黄河水害，为千百万代的子孙造福的时候，当他们知道长江大桥兴建的时候，当他们知道将用崭新的技术设施建立武汉和包头钢铁联合企业的时候，当他们知道刚毕业的青年走上了各种美丽的工作岗位、孩子们又开始了新的学年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感到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啊！

在海拔五千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我们的边防战士们时刻巡逻在即使是六月天也还是风绞雪的国境线上。他们生活在冰山暴裂，雪深到马肚子，空气稀薄，长年吃不到新鲜蔬菜的环境里；但是战士们懂得自己肩负的神圣责任，他们用自豪的感情形容自己是“祖国的眼睛，和平的哨兵”。不论是雪光刺得眼睛发肿的白天，或是皮帽檐结着冰珠的黑夜，他们都忠勇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他们使千百座工厂安全生产，使千万个农庄获得丰收，使昆仑山、天山和阿尔泰山的牧群繁殖；他们使各族的老人度过平安的晚年，使各族的年轻姑娘不再受到凌辱，年轻母亲不再受到惊吓，婴儿吃足奶后甜蜜地在微笑中安睡。

这就是为什么当大雪封山之前，各族人民争相送柴火到边卡上去，当山路开冻之后，又相走报讯让边防指挥部快快把粮食送往边卡。当炎夏山洪暴发，激流的雪水滚动山石，个别战士因紧急任务渡河，失足被水冲走的时候，他们就会惊呼呼喊，在激浪中把战士救起，妇女们就会拿起战士的军用水壶，装进白雪，在怀里暖热，喂给战士喝，让战士苏醒。

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军民建立了血肉的关系，各族人民形成了无间的团结，进行了辛勤忘我的劳动；也正是由于党

的领导，边疆的建设事业正像奔腾的巨流汇入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海。南北疆成了我们祖国的大粮仓，阿尔泰山脚和昆仑山脚出现了丰富的油田，千秋万代荒凉的天山成了我们祖国的宝库——人们正在开采世界上最珍贵的各种矿产，采伐无尽的松木良材，而且利用群峰的雪水，灌溉开垦出来的千万顷良田，和发出巨大的电力。

正在日夜铺轨的兰新铁路全线通车以后，繁忙的列车将满载而来又满载而去。到那个时候，关内的人民就可以吃到新疆生产的面粉，就可以穿到玛纳斯河流域由每朵六七公分重的棉花织成的天山花布衣裙，就可以用上和阗的华丽的地毯和多彩的丝织品，就可以穿到库车的子羔皮，就可以大量吃到哈密鲜瓜、吐鲁蕃无核鲜葡萄、伊犁的大苹果和喀什的又香又脆的巴达杏仁。

当新疆通达青海柴达木盆地，和通达敦煌、安西的公路修通的时候，金鸿山、旧玉门关和阳关古道都将成为繁华的地区；当新疆通往西藏拉萨的公路修通的时候，昆仑山将向我们低头，乌鲁木齐和拉萨将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再被雪线以上的群峰所阻拦。

祖国在前进，祖国的边疆在前进。当你看见今天庆祝国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乌鲁木齐的长街上的欢腾的各族人民的行列，载歌载舞地前进的时候，你会感到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光辉，会感到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各族人民是多么团结，是多么热情而豪迈，会感到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正和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地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

（选自《在哈萨克牧场》，作家出版社 1957 年 9 月版）

黄浦江的早晨

靳 以

我走下车来才发现夜色已经淡下去了，滚滚的黄浦江横在我的面前。多少年来它就是这样平稳地流着，近百年来它也和中国人民一样忍受着耻辱和痛苦，江面上横行着宰割中国人民的强盗船，到处漂泛着陈腐的渣滓。十年前随着上海的解放，它也扫清积秽，浩浩荡荡地畅快地流着。它重新为人民所有，成为人民热爱的一条美丽的江。如今，初升的太阳灿烂的金光正静静地落在江心上，码头边待发的轮船，还亮着千万盏明灯。因为潮水高，庞大的轮船就像一座水上的楼阁。

我站在江边，向东眺望，那是浦东，烟雾迷蒙处，是全国平炉利用系数最高的上钢三厂。过去帝国主义者也曾把魔手伸过江去，建立了修船厂和油栈，这些如今都是人民的财产，一切耻辱的烙印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人民受凌辱受压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朝北望去，这就是过去的一寸土地一寸金的外滩，望不尽的高楼大厦，都是中国人民双手造起来的。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分子盘踞在那里吮吸上海人民——应该说是全中国人

民的血，而中国人民在那里却没有任何自由。那用大石块垒起来的中国江海关，过去为外国人掌握，出入的无非是洋人和奴才，那里连中国文字也不通用。今天它是中国人民的海关，保卫着中国人民的利益。那座蹲伏在南京路口的有高尖塔的大楼，就是曾经不许鲁迅先生坐电梯上楼的华懋饭店；今天它是和平饭店，招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和平代表和其他外宾。它的对面是古老的汇中饭店。过去每天下午靠街的大窗口上坐满衣冠楚楚的吸血虫们，捧着圆滚滚的肚子，露着贪婪的微笑，望着窗外来往的行人；如今这座建筑已是建筑工人的工会，出出入入的都是修建房屋的工人们。过去压榨中国最凶狠的汇丰银行——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金融大本营之一——今天已属于中国人民了。门前两座铜狮仍然踞伏着，它是时代的见证，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把帝国主义驱逐出去，使一切属于人民所有，一切都为人民的事业服务。

江边，从前停的是外国船只，是洋人洋奴和地痞流氓的天下，是善良的中国旅客的鬼门关；如今，那些疔疮早已连根拔掉了。经过几年来辛勤的培育，树木已经长大了，土地盖满青青的嫩草，玫瑰和月季绽出红红的花朵，现在我就是顺着这花间的小径安闲地向前踱着。左右的长凳上坐着准备功课的学生和即将离去的旅客。对着南京路的小广场，有几位老年人正在打太极拳，看样子都是六十以上的人了，飘着银须，可是身手矫健，正像壮年汉子。我被一位红光满面的老人和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吸引住了，他们在推手，那个青年不时地被老年人推得站不住脚，向后趔趄着，那老年人赶紧又一把拉住他。当他们停手的时候，我向那面不改色的

老年人致意：“早上好，先生，您在带徒弟吗？”

“不，是一家人，他是我的大孙子。”

我稍稍吃了一惊，接着就问：“那么您今年——”

“我还小呢，今年才交七十。”

“那可真看不出，身体好，精神也好。”

他捋捋胡子笑了：“也就是从解放这几年才好起来的。几十年来我在这黄浦江边当搬运工人，我的脚把石子都磨圆了。日本强盗进上海，穷得我没有路可走，我跳过黄浦；亏得穷哥们把我救上来，当时我还怪他们多事呢！解放后，日子才转过来，我还光荣地到杭州去休养过。如今我退休了，在家养老，可是我不服老，要把身体搞好，多活些年，再做一些事情，看看共产主义。你看看我们这老弟兄几个，都是老伙伴，有的比我还大，要进入共产主义是我们大伙的愿望，谁也不愿意少走半步。”

他大声笑着，所有的老年人都笑起来；他们一无挂碍，过着幸福的晚年。他们充满了快乐的心情，等待着人间最高理想的实现。

我在江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我想：如果这时候有船来坞多么好！最好是一只远洋轮，载来多少年没有回过祖国的游子，他对于上海是完全陌生的，或者只有旧日的残破的记忆。当他走上岸来的时候，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美丽而快乐的图画，一幅望不尽的长卷，他自己也就成为快乐的画中人了。他会深深体会到，可爱的祖国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第一眼望到第一脚踏上祖国的土地的时候，他就被强烈地吸引住了。

当我在遐想的时候，果然有一只轮船进口了，驶近的时

候我才看到那不是远洋轮，是民主三号。这条船对于许多人说来是并不陌生的。它曾经在沪甬途中触礁沉没；当时，由于乘客中的解放军同志协同船上的人们努力抢救，尽管无法挽救它沉没的命运，可是全体乘客都安全脱险。只有一个资本家，他不愿意和全船的人“同归于尽”，背上救生圈，独自一人跳入茫茫的大海中，结果只有他一个孤独的牺牲者。沉没的船也捞起来了，经过修理，仍然在海上行驶；可是那个想自走一条道路的资本家，从此深沉海底，无踪无影了。

这时，一只汽轮拖带了六只满载的货船迎面驶来，民主三号就鸣着汽笛放低了速度，这样使我看清了船舷上站满的乘客，他们正热烈地向岸上挥手呢！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早操的音乐响起来了，路上有好些人停下来随着音乐锻炼，一切是那么自然，一切是那么和谐。

过了一些时候，一艘高大的船从十六铺开过来了。因为载得轻，浮在水面上的船身就显得更大。我觉得十分眼熟，终于看清了它就是去年江南造船厂只用五个月十二天造出来的五千吨货轮和平二十八号。我曾经参加过它和大连船厂造的同型货轮和平二十五号的会师典礼。它们共同掀开了我们造船史上崭新的一页，如今两个船厂的工人都在为祖国造着万吨的远洋海轮，有一天它们将到海外去探望生活在异土的中国人民，送去祖国的问好、祖国的荣誉和骄傲。

海关的大钟悠扬地打了八下，街上的人，电车公共汽车里边的人也少了，人们早守住自己的岗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早晨八点钟的太阳正辉煌地照着黄浦江和上海，它也同样地照着中国广大的乡村和数不尽的城市。

（选自《收获》1959年第4期）

大青山的颂歌

玛拉沁夫

我第一次来到大青山山区。这里是我很早就敬慕和向往的地方，它是著名的内蒙古抗日根据地之一。这里的一切景物，对我这双看惯了无边草原的眼睛，全是新奇的、美妙的。那崇高的大青山的白雪峰头，和那万丈陡坡上结着毛茸茸的冰霜，从远看去像是白玉雕刻似的树木，那天梯一般直入云霄的盘山小道，和那深涧中闪着银光的冰河……啊，这一切是多么壮丽而又令人心胸开阔啊！

人们在不同的环境里，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当你在广阔的草原纵马驰骋时，那慍悍而豪放的草原人民，会时刻地激励你，今天，当我站在这气壮势雄的大青山上时，山区人民那坚韧、朴实的性格，又像熏风一样陶冶着我。每当我想到可爱的山区人民时，一个人的巨大身影，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不，他不是非凡的巨人，他的一切很普通，他的名字叫杨芝堂。

杨芝堂，刚满五十岁，全村的青年们称他为芝堂叔；老年人们却还亲切地称他为“三娃子”，这是因为他在弟兄当中排行老三。杨芝堂，个子不高，但是却像生铁铸成的一般

结实，那被山风吹紫了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两只大脚蹬着山区特有的千层底布鞋，平时，把一件补了又补的羊皮袄，往肩上一披，走起路来，皮衣一扇一扇的，恰似一只雄鹰。

为了看望这位老游击队员、生产队的党总支书记，我一早就出发了。攀过一座座大山，涉过一道道冰河，晌午时分，来到了阿里板村。这山村坐落在大青山山腰上，村前村后有几道洁白的泉水，像蒙族妇女头饰上的玉穗般嘻刷地从山上流下来。

我来到一座院落门前停住了。一副奇特的对联吸引住了我。这一家的两扇大门上贴着两个醒目的大字：革命。

革命，这是多么伟大的字句啊！尤其将它用斗大的红纸贴在丈高的大门时，这两个字就像两团火，照亮每个过往行人的心胸！

一推开贴着“革命”二字的那两扇大门，我就看见了杨芝堂那副憨厚的笑容。

我在他家里度过了整整一天。下面记述的故事，就是他讲给我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这故事，也像杨芝堂本人一样：平凡、近人、结结实实……

去年，在一个风雪的冬夜，女共青团员王珍珍突然腹痛起来。她躺在炕上暗自计算着生产的时间：“大半是要提前生产吧！”她倾听着窗外一阵紧于一阵的风声，焦急地想着，“可巧，他又不在家里！……”

王珍珍的爱人张英，前两天领着共青团员们组成的青年打猎队进山去了。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正是狩猎的好时机，

珍珍知道她丈夫的脾气，不超额完成狩猎任务，他才不会下山来哩！再说，按正常情况来计算，她的产期还没有到啊！

但是，她确实预感到要生产了。这是她第一次生产，疼痛和恐惧同时袭击着她。怎么办啊？叫人到公社去请接生员吗？不，十几里路，还隔一座大山，来不及了；找邻居的老大娘来吗？黑灯半夜的……再说，要是今晚不生产，不是惹得人家也不安宁？在困难面前，她像小孩似的拿不定主意了。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有谁曾经遇到过王珍珍这样的困难呢？风雪，深夜，孤零零一个人，就要生产了！

一个人遇到困难时，也许会想起他们的亲人和朋友；甚至可以说，在困难突然来临时，你不由想起的那些人，才是你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王珍珍，想到的是谁呢？

“应当叫人去找芝堂叔！”

难道总支书记那双满是硬茧的笨手会接生吗？不会。难道杨老汉他有什么神妙的方法，能够推迟一个女人的产期吗？也不会。

那么为什么，王珍珍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杨书记？王珍珍不会向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她完全是“本能”的想到了芝堂叔。

十分钟以后，芝堂叔走进屋里来了。他曾遇到过多少风雨，曾为群众解决过多少难题，但是，今天晚上，当一个就要生产的女人，找他来帮忙时，他确实难为住了。但是，当他一迈进她家房门，听到一个女人产前费力的喊声：“芝堂

叔”时，他的心，突然变得那样火辣辣的，啊，这位在日本鬼子的枪刀下九死一生的硬汉子，却两眼湿润了。

“她把我看作是个党员啊！”

他上前轻轻握住与他女儿同岁的王珍珍发热的手，安慰她说：

“珍子！我派人骑马请接生员去。”接着，芝堂叔出去了一下。当他回转身的时候，看到王珍珍的痛苦的脸上出现了微笑，珍珍说：

“芝堂叔，您一来，我的心就落地了。”

杨芝堂渐渐平静下来，他开始苦思怎样才能使珍珍消除产前的恐惧和痛苦。

他有意的把话音变得松快一些说：

“珍子，你别慌，我倒想起一段故事来了。”

“芝堂叔，这可不是讲故事的时候哩！”

“哎，你保险喜欢听。”

珍珍不言语了，好像既不想听他的故事，也不反对他讲故事。杨芝堂用席子片拨了拨油灯捻，有声有色地讲起他的故事来：

“一九四一年秋天，日本鬼子围剿咱们大青山根据地，为了顺利地进行撤退，我们化整为零，进了北草地。三四个人一组，我们那个小组，除我，还有两个小鬼，和一位快要生产的女同志。”

“快要生产的女同志？”显然，珍珍开始对他讲的故事发生了兴趣。

“嗯。大家叫她黄大姐。她躺在牛车上，我们慢腾腾地一天走不了三二十里路。有一天，我们正走在没头没边的大

草地的时候，黄大姐就要生了，这一下，把我们急得要死要活，每个同志都想帮她一手，可谁也不知道咋个帮法！正在这时，鬼子兵追来了。我们马上把拉着黄大姐的牛车，赶到背眼地方。鬼子兵没有发现我们，七八个家伙吹着口哨从我们旁边走过去了，我们的手多发痒啊，可是为了保护黄大姐，就放过了鬼子。但是突然从那辆牛车上响起了枪声。”

“是黄大姐开了枪？”

“是啊，黄大姐三枪打倒了两个。”

“后来呢？”

“我们也开了枪，鬼子兵没有准备，全被我们消灭了。”

“多了不起！”

“是了不起呀，等我们消灭完鬼子，走到牛车旁一看，黄大姐向敌人开枪那时就生产了。……那天晚上，我们把她安置在一位蒙族牧民家里，就又继续撤退了。”

“她和孩子都好吗？”

“他们现在住在呼和浩特，她已经是厅长了，孩子是大学生。”

珍珠再也没有问话，她陷在深深的感动里。她是个共青团员，敬慕一切伟大、崇高的事物，每当她听到那些震人心弦的革命故事时，总是用全部感情去体验它、领会它，把它吸收于自己的心里，脑海里，血液里。她今天所听到的故事，更使她如此了。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马蹄声，接生员来了。

杨芝堂！你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是多么高大啊！在去年大修水利时，我曾看见你不分日夜风雨，穿着你那身沾满泥土

的衣服，指挥海水一般的人群。抢工、奋战。脸上生出一把张飞的胡子，你没有空儿去刮；嗓子喊哑了，你用手势代替语言；那时谁不称赞你是气魄宏伟的指挥员！但是，当你为咱们队里那些光棍汉们张罗补鞋缝袜，解决那些这儿缺一团线那儿少一根针的琐碎又琐碎的问题时，你多么像个慈善的老大娘啊！

杨芝堂！当你在冬季北方特有的暴风雪中，为了营救散了群的羊而冒着被风雪吞没的生命危险时，你显得那样年轻、勇敢，使人联想起董存瑞。但是，有时我却觉得你像传说中的“孝子”。有一次队里七十五岁的张老奶奶患了眼疾，你为了减轻她老人家的痛苦，一夜走八十里山路，进城给买来药品，感动得那老奶奶抱住你只喊：“我的儿子呀！”

当我告别大青山的时候，我的心更加激动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呀，有一个如此崇高的形象！

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

（选自《春天的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 1963 年 7 月版）

登上地球之巅

郭超人

珠穆朗玛银色的山峦间开始升起浓密的白色云雾，绒布河上的冰层破碎了，奔腾而下的激流撞击着岩石，发出响亮的水声，冻土松软了，山坡上枯黄的野草丛中又吐出淡绿色的嫩芽，矫健的喜马拉雅高空鹰突然增多了，三三两两旋飞在珠穆朗玛山区的上空……

已是五月中旬，天气渐渐转暖，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不久，印度洋上的季风就要吹过珠穆朗玛山区，接着，连绵的雨季就要开始了。

珠穆朗玛峰下登山队大本营的气象工作人员们变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张而繁忙。红色的探空气球不断地升上高空，矗立在山坡上、岩石旁的各种气象仪表不停地运动。人们怀着焦急的心情围聚在巨幅的天气图前，仔细观测各种气象因素的变幻，等待着珠穆朗玛山区在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以便开始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最后一次战斗：夺取珠穆朗玛顶峰。

这个好天气的周期终于等到了。

根据登山队的第四次行军计划的安排，从五月十四日

起，一批批运输队员就陆续从大本营出发，把大量高山技术装备和食品提前运送到海拔七六〇〇米以上的高度，等待突击主峰的主力队员们到来。

五月十七日清晨，绒布河谷上空云雾迷茫，但是，勇敢的登山队员们却一个个精神饱满，整装待发。从今天起，艰苦的攻夺珠穆朗玛顶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在大本营帐篷外面，这几天来，突然增加了许多标语，充分显出了登山队员们坚决征服珠穆朗玛峰的雄心壮志：

行军不落后，
受伤不叫苦。
只要心在跳，
决不往回走。

北京时间上午九时，登山队员们在出发之前，在海拔五一二〇米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白色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委托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要他们克服困难，奋勇前进，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飘扬。

登山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副队长许竞率领下，一个个都激动地举起右手，向庄严的国旗宣誓。

他们宣誓说：

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在第四次行军中坚决征服珠穆朗玛峰。

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在您的教导下，有

了智慧，有了力量，为党的事业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雄心大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一只脚伤了，还有另一只脚；一只手折了，还有另一只手。只要我们的心脏还在跳动，坚决为党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为攻克珠穆朗玛而奋斗到底。

敬爱的党，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毅力势不可挡，我们的团结力大无穷，我们全体队员向您保证，不拿下顶峰誓不收兵。

在震天响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登山队员们告别了大本营的战友，踏上了征途，向云雾重重的山岭间挺进。

为了争取在好天气的情况下登上顶峰，登山队员们用一天的时间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了六四〇〇米，第二天就登上了著名的北坳冰坡。

经过几天艰苦的行军，五月二十三日中午，许竞带着十三名登山队员赶到了海拔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并在这里把第三次行军建立在岩坡上的突击营地，改建在极其难得的一块倾斜度约三十度的雪坡上。突击主峰的队员即将从这里出发，攻下耸立云霄的珠穆朗玛顶峰。

五月二十四日清晨，阳光灿烂，珠穆朗玛尖锥形的顶峰耸立在蓝天之上，朵朵白云在山岭间缭绕不散。

北京时间九时三十分，年轻的登山队员运动健将王富洲、运动健将刘连满、运动健将屈银华和一级运动员贡布（藏族）四人，背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镐，开始向珠穆朗玛顶峰最后的三八〇米高度进行冲击。其他队员们撤回到八一〇〇米的营地，养精蓄锐，在需要的时候对突击主峰的队员

进行支援。

突击顶峰的队员为了尽量减轻负重，他们只携带了氧气筒、睡袋和登山队委托他们带到顶峰的一面国旗、一个高约二十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以及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日记本和电影摄影机等。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前进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因为从五月十七日上山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体力有了巨大的消耗。

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走了大约两个钟头，才上升了约七十米。这时，“第二台阶”拦阻着他们的去路。

突击队员们沿着第三次行军侦察的路线，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陡滑的岩壁上前进，他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也很难使脚步踩稳。走在前面开路的运动健将屈银华，一连滑落好几次，但这位来自四川林区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咬着牙，坚持前进。

在接近“第二台阶”顶部最后约三米的地方时，岩壁变得垂直而溜滑。运动健将刘连满走到前面开路，他用双手伸进岩缝，脚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地上升，但是身体稍为一歪，便又跌落到原来的地方。刘连满一连攀登了四次，跌落四次，弄得全身酸软。

人们停下来想办法。这时，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刘连满笑了笑，就决定采用搭“人梯”的办法，蹲在岩缝底下，让战友们踏着他的双肩，当作支撑点，再慢慢用力站起来，让他们向上攀登。在这样的高度上作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的反应。刘连满的眼睛里冒着“金花”，两腿颤抖，呼吸也变得沉重。但是，这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直坚持着。他先把屈银华托了上去。然后又托贡布。最后，

王富洲和刘连满借着上边放下来的绳子的帮助，也爬了上去。

登上“第二台阶”的岩顶，他们才发觉，由于体力减弱，他们攀登整个“第二台阶”，竟使他们花费了五个多小时，而攀登这最后的约三米的高度，他们竟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天色已开始黑下来，寒风凄厉地呼啸。

人们事先以为在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现在看来，这种估计显然是不足了。黑夜，即将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二道难关。在这人类从未到达过的珠穆朗玛峰北坡最后二三百米的路途中，人们将要遇到什么困难，要走多长时间，确实很难精确估计。

勇敢的登山队员们还在向前挺进。但是，由于在前一阶段花费的时间和体力过多，他们背上氧气筒上的气压表指示，氧气的容量已经不多，继续前进可能会受到缺氧的威胁。这时，刘连满因为过度疲劳，体力已经非常衰弱，每走一两步就会不自觉地摔倒，但他缓慢地站起来仍然继续往前走。

在体力虚弱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进行黑夜高山行军，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有什么困难能阻挡得住勇敢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前进的步伐呢！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完成全国人民的委托，为了在雨季到来以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内登上顶峰，四位勇士仍然勇往直前，继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当他们四人来到海拔八七〇〇米的高度时，氧气更少了，刘连满的行动也更加艰难。这时，王富洲、屈银华和刘

连满这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停下来，就在这被西方登山界称作“死亡地带”的山坡上，举行了党的小组会。

王富洲——这个地质学院的毕业生激动地说：“登上顶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也要前进！”

从小在高原森林里伐木养成一副倔强性格的屈银华说：“如果现在就后退，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脸回去见党呢？”

刘连满也坚决表示：“不能走，爬也要爬上去！”

考虑到刘连满的身体，同时为了争取时间，党小组会决定刘连满留下来，其余三人以最快的速度向顶峰挺进。

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继续向顶峰前进以后，刘连满靠在一块避风的大石头旁边。他拿起自己的氧气筒，看里面还剩下几十个压力的氧气。这时，他想起了正在与顶峰搏斗的三位战友，他决定哪怕自己忍受着严重缺氧和疲劳的袭击，这最后一点氧气也要留给战友们回来时使用。于是，他便毅然地连忙关紧了氧气筒的开关。并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封短信，然后就昏沉地睡去，他在信中写道：

王富洲同志：

我没有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艰巨任务。任务交给了你们三个人去完成吧！我这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留给你们三个人胜利回来时用吧！也许管用。

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与此同时，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正在苍茫的夜色中艰难地向前行进。

他们三人沿雪坡继续前进，愈走愈陡愈滑。他们翻过两

座岩石坡以后，开始攀登一座雪坡。藏族队员贡布在前面开路，不到几分钟就累得不行。于是，屈银华上前开路，他经过很长时间才前进了两三步，但两腿一软，又滑回到原来的地方。最后，又换上王富洲走到前面，他坚持着为大家开出一条前进的路线。

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珠穆朗玛顶峰还露出隐约的轮廓。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匍匐在地上，依靠着星光和反照的雪光，辨认路途，吃力地前进。

夜深了，远处山下一片漆黑，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顶峰的黑影在他们面前越加显得低矮了。

到达八八三〇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了。当时风渐渐小了，这对攀上顶峰十分有利。他们站在岩坡上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同志们，我们三个人现在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虽然可能发生危险，但是我们能后退吗？”

屈银华和贡布异口同声地回答：“继续前进！”

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开始了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历程。

现在，他们每前进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由于高山严重缺氧，使他们感到眼花、气喘、无力。他们的行动更加艰难了，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忍受着这一切，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地前进着。

在越过东面一段雪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向右绕至北面的岩石坡继续向上攀登，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

雪交接的地方。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峰山区的群峰的一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现在，在他们三人的头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再向上攀登的山岩了。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这时，夜光表的指针正指着北京时间四时二十分，这已是五月二十五日黎明前的时分了。

珠穆朗玛峰南面是一片皑皑的积雪，北面是灰褐色的岩石，在积雪和岩石交界的一块近乎椭圆形的地带，这就是神秘而为世界各国登山家所向往的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经过了近十九个小时的搏斗，英勇的登山英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虽然已极度疲劳，但是，胜利的喜悦使他们变得那样兴奋和激动。

藏族队员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了登山队委托他们带上顶峰的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小型白色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放到顶峰西北边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

这时，王富洲摸着黑，拿出一本“体育日记”本，用黑色自动铅笔在上面写道：

“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四时二十分”。

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双手又被严寒冻僵，王富洲花了约三分钟时间才歪歪斜斜地写完了这行字句。

贡布走过来，帮他把这张值得纪念的纸条撕下来，放在一只白色羊毛织的手套里，然后也埋进了垒垒的细石堆里。

为了纪念登上顶峰的胜利，他们拣了九块岩石标本，准备回来带给毛主席。

他们在山顶上停留了一刻钟的时间。北京时间四点三十五分，他们开始下山。在海拔八八八二米的高度不使用人造氧气，这在世界登山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不久，东方开始发亮，美丽的旭光首先欢迎他们凯旋归来。

他们看到自己攀登顶峰时在雪上留下的脚印，二十五岁的四川林业工人屈银华立即把它摄入电影镜头——这将是纪录这次伟大登山事迹的影片中最宝贵的画面之一。

留在海拔八七〇〇米的地方的刘连满一觉醒来，发现在通向顶峰的雪坡上留下了脚印，他知道王富洲等三人已经上了顶峰。一股劲就使他站了起来。当他看到王富洲等三人安全地回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的最后几十个压力的人造氧气。当他把氧气筒交给王富洲等三人使用时，他们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直到当天下午北京时间六点钟，他们才回到了海拔八五〇〇米的“突击营地”。这时，离他们五月二十四日从这里出发的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二个半小时了。在这一天多的时间内，他们虽然没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毅力，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最后胜利。

五月三十日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他们四个人和全体登山队员一道，全部安全地回到了山下大本营，他们在世界最高峰上生活了两个星期。

中国登山队获得胜利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传遍了全世界。苏联、保加利亚、尼泊尔、日本、印度、英国的体育组织或友好组织，以及国际和平人士等，纷纷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荣

的任务——从过去一直被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某些西方报纸尽管散布了种种怀疑气氛，但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人的成就是杰出的”，“荣誉被中国得去了”，“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登不上去的北坡”……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年轻的中国登山队员们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人类登山史上九十年来没能突破的最复杂的难关呢？

这正如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所说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些是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泉源；因为我们有着一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赤诚的心，因而我们就能够做到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做到的事。”

是的，答案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的中国人民！

（选自《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0 年版）

因为我们是幸福的

曾 克

解放后的第二个“三八”节来临了。

在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欣喜和快乐。因为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的祖国是这样美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大陆上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蒋介石匪帮，并且正在彻底肃清着在以往长久的岁月里给予我们痛苦、灾难、侮辱和损害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及其一切有形无形的荼毒。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已经获得了为人民也为自己，为祖国也为全人类的说话、做事、生产、战斗、唱歌、跳舞，爱与被爱的充分自由；我们已经获得了爱祖国与恨敌人的神圣权利和义务。我们的孩子，今天已经可以读到自己要读的书，明天就可以得到自己最喜爱的糖果；多少妇女的丈夫今天已经不再为职业而忧愁，明天就一定感到生活更丰美！这是春天，这是百花盛开的季节，这是幸福的开端，我们的胜利的祖国！

在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着说不出

的骄傲和信心。因为我们是幸福的！

幸福使我想到了幸福的来历。我们祖国曾经是灾难深重的。如果说近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三十年来的官僚资本主义束缚，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的只是一副铁的枷锁，那么，数千年的封建荼毒仅仅加在我们妇女身上的，何止是千万重的铁山，姑娘们一开始生活，便唱起《孟姜女》凄凉的故事，刘兰芝（《孔雀东南飞》女主人翁）、祝英台、沈崇的遭遇何尝只是三个人！千百年来，无数姐妹如花的青春，如诗的爱情，被残忍的金银、财宝、权力所绞杀，青石牌坊到处扣压着女人的命运！

七十年前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曾经写过沙皇铁蹄下的女人——“同奴隶结婚，做奴隶的母亲，到死做个奴隶之身！”而我们姐妹们千百年来，血泪和痛苦，像黄河，像长江，横流在祖国的大地上，千百个诗人写也写不尽！

然而，自从我们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我们的眼泪就变成了无比的勇敢，我们的血就变成了无敌的胜利，我们的劳作就变成了无尽的幸福，我们的忧愁就变成了无限的欢乐！我们的刘胡兰，王秀鸾，以及花木兰式的郭俊卿和各行各业的英雄，便在英雄祖国的大地上孕育，生长，壮大起来，我们祖国将永远胜利！

在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我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激怒和愤恨。因为我们是幸福的！

不论谁，只要感到我们祖国的光彩和幸福，就必然感到敌人的卑污和可恨。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破坏和平、幸福的“专家”，是制造战争和灾难的罪魁。他们要我们的明媚春天变成灰暗的严冬，要我们的欢乐变成哭泣，他们要

在全世界奸淫，抢劫，杀害真理！在朝鲜战场上，被他们杀死的和平妇女和儿童简直无法计算，在那里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已经给他们一败再败的惩罚，使他们感到了惊恐，然而恬不知耻的杜鲁门之徒，却又置“波茨坦公告”于脑后，公然要同日本单独媾和，给日本军国主义者起死回生，企图让日本强盗卷土重来，替华尔街打冲锋！这是何等毒恶的畜牲！

八年的抗日战争，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在那漫长的苦难中，我们有多少温暖的家室破灭在日本野兽的炮火下！有多少母亲、儿子和丈夫遭受流离，鞭打，饥饿和残杀！我们有多少姐妹被奸污，凌辱，而死于强盗的刺刀下！

记得，一九三八年春天，当一个小集镇遭受日机空袭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一颗子弹从屋顶穿下，把母亲怀里的婴儿打的脑浆飞溅，于是，那母亲就抱着孩子的血肉，漫街奔跑，疯狂的叫着孩子的名字，直到另一颗子弹把她射倒！就这样，一个家，一个母亲的心，希望和命运，在几分钟内便凄然化为血浆！然而，这种惨剧在当时何止千百万起。难道这样惊心动魄的创痛，不就是昨天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写照吗？难道这样的灾难能够让它重新发生在今天或明天的，我们光辉灿烂，幸福无疆的祖国吗！

姐妹们，团结起来，英勇的打击敌人，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幸福是我们的血汗成果，我们的幸福必须用血汗来保卫！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战争贩子的一切犯罪计划和阴谋，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单独对日媾和！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事实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是可以而且必须打败的！他们的一切

罪行，只是加速走进坟墓的历程！他们的一切阴谋，只不过是沉船的海盗想抓住芦苇求生！

让我们把纱纺的更好些，为了战胜敌人！

让我们把布织的更好些，为了战胜敌人！

让我们把土地耕耘的更好些，为了战胜敌人！

让我们把一切工作作的更好些，为了战胜敌人！

让丈夫、儿子更勇敢的去冲击！为了丈夫、儿子、母亲和祖国胜利与平安！

1951年3月5日于重庆

（选自《曾克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雪窗驰想

冰 心

窗外下着大雪，我站在窗前凝望，这雪已经下了几天了，到处是白花花的一片，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

我想，这雪景真美，可是多难描写！这时我脑中奔驰过许许多多小时候看过的书，这几部书里都有一段以雪为背景的故事。首先是《西游记》里的妖魔灵感大王，利用唐僧“取经心急”的心理，在八百里的通天河上，下了一阵“纷纷洒洒，剪玉飞绵”的大雪，把通天河冻得镜面一般，诳得唐僧一行四众，“对着星月光华，映的冰冻上，亮灼灼，白茫茫，只顾奔走……”落到他的手里。再就是《三国演义》里刘玄德三顾草庐之中的第二次，也遇着“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树似银装”的严冬天气。本来不赞成他去的莽张飞，又劝他“风雪甚紧，不如早归”，刘玄德求贤心切，终于冒雪到了草堂，却又扑了一空！还有一段是《红楼梦》里，贾宝玉惦记着要在芦雪亭和姐妹们赏雪作诗，一夜没有睡好，早起只见窗上“光辉夺目”，以为是天晴了，揭开窗屉一看，“原来地上已有一尺来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最好的还是《水浒传》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一

段，描写得最朴素，生动，从“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起，描写出一个孤愤的林冲“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迤迤背着北风而行，那雪正下来得紧”……

这四段的雪景里，有不同时代、不同愿望的四个人物……

我的回忆不断的奔驰，多少描写雪景的字句，从我脑中掠过，最后在毛主席的《沁园春》词上停住了。这首咏雪的千古绝唱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气呵成，上半阕是祖国纵横数十万里的土地，下半阕是历史上，上下数千年的英雄，最后是今日此地掌握了马列主义、自己解放自己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短短的几十字中，看出我们伟大的领袖，胸襟之宽，气魄之大，而我们伟大的领袖，又何等地为这一代的风流人物而感到欢喜而自豪！

银灰色的天空中，大雪仍在飘飘扬扬地下着。我的心中，感着无边的宁静与欢喜。我不再驰思，我只望着这片白茫茫的大地，“玉簇”的小山上，有几棵小树的枝头，还留着几丛枯叶，茸茸的雪片堆在上面，好像朵朵的棉桃，我想起我所看过的几个人民公社，和公社里的平整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有许多黝红的健康而朴素的笑脸。这几天的大雪，应当给他们以很大的喜悦吧！我记得上月底在邯郸访问期间，邯郸也下了三天的大雪，农民们高兴地说：“小麦盖上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这十四个字里，没有一个“雪”字，却描写出了“雪”给他们的喜悦——但是我知道我们勇敢勤劳的农民，是不会“枕着馒头睡”的，他们不是也说过

“跃进再跃进，年年争取更大的丰收”么？

1960年1月23日

（选自《拾穗小札》，冰心著，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的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途的旅伴，战场的战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那是一辆普通的纺车。说它普通，一来它的车架，轮叶，锭子，跟一般农村用的手摇纺车没有什么两样；二来它是延安上千上万辆纺车中的一辆。的确，那个时候在延安的人，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也无论是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或者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在延安，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想困死我们。我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彻底粉碎了敌人围困的阴谋。在延安的人，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人，不但吃得饱，而且穿得暖，坚持了抗战，争取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开荒，种庄稼，种蔬菜，是保证足食的战线；

纺羊毛，纺棉花，是保证丰衣的战线。

大家用纺的毛线织毛衣，织呢子；用纺的棉纱合线，织布。同志们穿的衣服鞋袜，有的就是自己纺线或者跟同志同工劳动做成的。开垦南泥湾的部队甚至能够在打仗，练兵和进行政治、文化学习而外，纺毛线给指战员发军装呢。同志们亲手纺线织布做的衣服，穿着格外舒适，也格外爱惜。那个时候，人们对一身灰布制服，一件本色的粗毛线衣，或者自己打的一副手套，一双草鞋，都很有感情。衣服旧了，破了，也“敝帚自珍”，不舍得丢弃。总是脏了洗洗，破了补补，穿一水又穿一水，穿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随心。西装革履，华丽的服饰，只有在演剧的时候作演员的服装，平时不要说穿，就是看看也觉得碍眼，隔路。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胳膊疼腰酸；不过在刻苦学习和紧张工作的间隙里纺线，除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意义而外，也是一种很有兴趣的生活。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嚶嚶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会拧成绳，线会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练的技巧，可不简单，需要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下一番功夫。初学纺线，往往不知道劲往

哪儿使。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纺手急得满头大汗。性子躁一些的人甚至为断头接不好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可是那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师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的。熟练的纺手，趁着一豆灯光或者朦胧的月光，也能摇车，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优游自如。线上在锭子上，线穗子就跟着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劳动后收获的愉快，那是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比拟的。这个时候，就连起初想砸碎纺车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①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

纺线有几种姿势：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

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家也进行技术改革，运用物理学上

① 曹植：《白马篇》。

轮轴和摩擦传动的道理，在轮子和锭子中间安装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把手工生产的工具变成半机械化。大多数纺车是在纺羊毛、纺棉花的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木工做的；安装加速轮也是在劳动实践中大家摸索出来的创造发明。从劳动实践中还不断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譬如，纺羊毛跟纺棉花常有不同的要求：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因此弹过的羊毛要卷成卷，棉花要搓成条，烘晒毛卷和阴润棉条都有一定的火候分寸。这些技术经验，不靠实践是一辈子也不知道里边的奥妙的。

为了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纺线也开展竞赛。三五十辆或者百几十辆纺车搬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里比纺线的数量和质量。成绩好的有奖励，譬如，奖一辆纺车，奖手巾、肥皂、笔记本之类。那是很光荣的。更光荣的是被称为纺毛突击手、纺纱突击手。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更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那种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近，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纺手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儿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无论是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

就这样，用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纺线，不只在经济

上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人大家有衣穿，使大家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在思想上还教育了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①的意义；自觉地克服了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②。劳动为集体，同时也为自己。在劳动的过程里，很少人为了个人的什么去锱铢计较；倒是为集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艰苦的、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了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记一辆纺车。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春节

（选自《吴伯箫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这一天成了这个山冲的真正的节日。人们激动、快乐，有些小孩子欢喜得流出了眼泪。大家站在韶山招待所门前那块细沙地坪里，用欢呼、拍手，和山居男女的朴质恳切的笑谈来迎接自己的亲人，也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领袖。

两天经历的细节，山里人至今还不能忘记。下边的记述是根据人们的回忆写成的。

回来的第二天是个晴天，毛泽东同志穿一件洁白的衬衣来到了他的旧居“上屋场”。这房子一半是瓦屋，一半是稻草盖的；人们说，过去它就是这样。“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匪帮把它没收了，糟蹋得不成样子。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收回来，按照冲里一些老人的记忆修复了。毛泽东同志走进堂屋，背后跟着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小小的堂屋原先只有一半属于毛泽东同志的父亲毛顺生先生。和湖南的普通农舍一样，这屋子靠里端的板壁上供着神龛（k n 刊）子。随行的同志问道：

“当年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同志笑笑回说：

“是这样的。”

从堂屋的后房绕到灶屋，穿过横堂屋，他们一群人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双亲的卧室。房间左边墙壁上挂两个镜框，嵌着两位老人的放大的照片。毛泽东同志站在两帧遗影的面前，静默地凝望一阵，然后对旁边的人说道，“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意思是说，不会由于那样的症候去世那么早。

毛泽东同志的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去世时五十三岁；顺生先生逝世于同年，仅四十九岁，得的是重伤寒病。这两种病症现在都不难治好。

到了毛泽东同志自己当年的住房，这是卧室，也是书斋。青少年时代，他常常在这里点起一盏竹筒络起的桐油灯，熬夜读书。床头墩椅上，还摆着一个古旧的、简陋的灯盏。

左边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是毛泽东同志跟他母亲以及两位老弟的合影。对这帧相片，他似乎感到极大的兴致，含笑问道：

“这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接着又说，“这怕是我最早的相片了，你们看，跟我现在像不像？”他用了“拱出”这样纯粹的湖南土话，意思是冒出。

据人们考证，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毛泽东同志二十六岁时的留影。那时候，他刚刚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碰巧他母亲由毛泽民同志陪同，在那里诊病。他们一起拍了这张合照。他站在老人坐椅的右边，身穿一件白竹布长褂，魁梧

奇伟，面颊丰满；眉宇间流露一种英俊和果毅的神情。

这房间的木格窗子的近边，有个楼口，没有梯子，不能上去。楼口下边的墙上，挂了一个嵌着说明的镜框，大意是一九二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间楼上，召集了韶山农民当中的先进分子，成立了雪耻会，后来又建立了党小组。毛泽东同志看后改正道：“是党支部。”

他们由前室走进一间小小的里屋。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毛泽民同志在家时居住的房间。床铺右边墙壁上挂着烈士的遗像，头戴一顶红军帽子，身穿灰军服。毛泽东同志看了一阵，说道：

“这张相很像。”

在长期的、尖锐的、剧烈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一家牺牲了六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一九三〇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二十九岁；他的大弟毛泽民同志一九四三年被盛世才匪徒杀害于新疆，年四十七岁；小弟毛泽覃同志一九三五年和国民党匪军作战，阵亡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交界的地区，年仅三十；他母亲过继过来的小妹毛泽建同志一九二九年牺牲于湖南衡山，年仅二十四；他的长子毛岸英同志一九五〇年殉难于抗美援朝的前线，年二十八岁；他的侄儿，也就是毛泽覃同志的儿子毛楚雄烈士一九四六年牺牲于湖北、陕西交界的地方，年仅十八岁。

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的家庭，真正是一门忠烈！这个可敬的家庭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义烈和敢于降龙伏虎的无畏的气概。由于这一种精神，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终于打退了侵略，摆脱了压迫，扫灭了一切害人的精怪，像巨灵一样地屹立在宇宙之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她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

出了后门，来到了小小的晒谷坪。这上面的山，下边的田，是毛泽东同志早年劳动的见证。山将永存，田将永在，毛泽东思想也将永远磅礴于世界。

地坪边上有一座黄土筑墙的小茅屋，人们说是秋收时节放稻草用的。小坪的下面有几块菜土，豆角蔓、苦瓜藤和紫苏叶子都翡青繁茂。毛泽东同志经过时问道：

“菜是哪个种的呀？”

“我们种的。”管理旧居的一位老同志连忙回答。

“给哪个吃呀？”

“给招待所的人吃。”

菜土旁边的山上有棵不大不小的枇杷树，牌子上说明是毛泽东同志亲手栽种的。

“是您栽的吧？”有位同志问。

“不记得了；不过那时候我很爱栽树。”

晚上，毛泽东同志住在山腰丛林里的一座房子里。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整整的三十二年，他没有到过这里。如今回来了，多少青年时代的记忆涌到了他的脑际啊。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段出现了澎湃的翻天的巨浪。一直到黎明四点，红绒幔子遮住的他房间的玻璃窗子的缝隙里还透出微弱的烛光。他一夜没睡，吟成了一首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同志平素爱睡硬板床，寓所为他准备了一张。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他在硬板床上睡了一会，起来洗脸，就往外走，没有说明要到哪里去。罗瑞卿同志和一些工作人员跟在后面。到了“上屋场”对门的“谢家屋场”，他走进他从小认识的贫农毛霞生家里。屋里只有一个妇女，没有其他的人。这位中年农村妇女平常从相片上认熟了领袖，这时候，突然看见领袖来到了自己屋里，后面还有其他的首长和人员，她惊喜交集，仓猝间未免有一些紧张和拘束。毛主席站在堂屋里，问了问她的家庭、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就离开她家，走上她屋后的山。罗瑞卿同志和其他人员不知道他上山干什么，都跟了上去。这小山茅封草长，连小路都没有。主席到了山顶，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面站住了。这时候，大家看了墓碑，知道小坟是领袖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为了保护这座坟，韶山的穷人们曾经和国民党展开过斗争。

“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在浏阳一带举行了有名的秋收起义，红旗又举起来了。湖南军阀何键派一连人来到韶山，要挖掉毛泽东同志父母的坟墓。他们的意思是要破坏红军的风水。匪兵们追问老百姓坟墓的地点，谁都不肯说；有一个穷人笑道：

“老总，跟我来吧，我告诉你们。”

匪兵们一人扛一把锄头跟那人上山。找到两拱坟，贫农指着说：

“这就是的。”

于是开挖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抡起锄头，把坟顶刨开，把腐朽了的棺木撬起来，把里头的白骨东丢一块，西抛一根，于是，一声呜喙下山了。那个贫农心里高兴得要死，因为，他哄匪兵挖开的是一个地主祖宗的坟墓。

坟山的风水是没有的。但护坟的故事充分表现了贫苦农民爱护共产党领袖的亲人的深情和厚意。

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没有准备花圈，连纸花也没有带一朵。幸亏有位青年同志头脑还灵活，他在近边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毛主席。他从容地献在坟前，在肃穆的空气里鞠了一躬，大家也鞠了一躬。于是，略停一会，他就转身沿着茅封草长的山坡往回走，人们跟随着。路上有人问：

“要不要把坟修一下？”

他边走边说：

“不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到达山下，毛泽东同志随即去视察韶山学校。

这个学校有小学和中学两部。校舍建在半山腰上。后山的青翠的松林衬托着红砖砌墙的整洁的新屋。望见毛泽东同志跨过校门外面的木桥，快进操坪时，学生们从各个角落，各个课堂一群群拥出，欢呼、拍手，把老人家团团围住。宾主都笑得那么开怀，那样尽兴。这些幸福的丫头们将要跟全国亿万少年儿童们一起，接过毛泽东同志和他亲密的战友们最初点起的光焰冲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炬，一代一代传

下去，一直到一切帝国主义和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全部消灭干净的时候。

从孩子群里跑出一个小姑娘，庄重地、略现紧张地朝毛泽东同志跟前走去。她叫彭素清，韶山公社竹鸡大队一个贫农的女儿。她恭敬地行了一个少先队的举手礼，然后从自己颈上解下红领巾，立起脚来，系在毛泽东同志衣领的上面。

“你不要了？”毛泽东同志笑着问她。

“送给你。”

“我这样大了，还带红领巾？”

带着红领巾，毛主席被孩子们的笑脸簇拥着，照了一个相。

韶山公社有一座韶山水库，水深而冷。毛泽东同志走到水库大坝上，脱了外衣，穿起游泳裤，扑通一声跳到水肚里。这位几次横渡长江的游泳家用侧泳的姿势游了一阵，然后仰脸躺在水面上，好像睡在床铺上一样，稳稳当当地，不沉也不动，岸上的人们笑了。

这一天，回到绿树成荫的住所，毛泽东同志吃过中饭，就午睡了。

午后，罗瑞卿同志到那修建在半山腰上的住所去看毛主席。主席午睡刚起，在穿衣服的时候，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接着又说，“我下次再回，还得去看他们两位。”

毛泽东同志在韶山，还询问了韶山公社的生产情况和规划，召集了韶山革命老人的座谈会。他在这里停留了两天一夜，就由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到长沙去了。

韶山成了中外驰名的圣地。这里流传着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好多的故事。相传有一年秋收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家里在那个小平地里晒了谷子，在旧居前坪，别的一家也晒了谷子。忽然之间天空里乌云密合，大雨来了。南方山里的夏天，天老爷落雨照例是不把信的，说来就来了，叫人搞手脚不赢。在倾盆大雨里，毛泽东同志不顾自己家里的谷子，连忙跑到前坪帮助别人收谷子去了。

新近开放的韶山陈列馆的解说员小王同志是一位愉快的、微胖的北方姑娘。她告诉我说：

“听这里人讲，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有组织的才能。七岁的时候，跟冲里的一群孩子在山上放牛，他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分成三组，一组看牛，一组砍柴，一组采摘野果子。每天到断黑时候，牛吃饱了草，柴砍得不少，苦楮子、毛栗子也捡了很多。毛泽东同志把柴火和果子分给大家，一人一份。他自己的一份常常让给别人。”

毛泽东同志从小就是这样热爱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孩子们的。

一九六五年除夕

（选自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羊城晚报》）

遵义的早晨

张树钦

当曙光映出凤凰山的秀丽轮廓，晨风吹动遵义会议会址楼顶的红旗，历史名城遵义沸腾了。宽阔的马路上，成群结队的工人，大步流星地拥向新建的炼钢厂，拥向著名的丝绸厂，拥向一个个厂矿的大门，那流水般的自行车队，不断发出清脆的欢鸣；城郊公社的青年拖拉机手，也发动了小巧灵活的山地拖拉机，跃上九曲十八盘的山路，开往层层叠叠的梯田，嘟嘟的马达声震动着山林；在芙蓉江边，一队千里拉练学传统的解放军战士走了过来，他们忘记了夜行军的疲劳，撩起江水洗把脸，深情地仰望雄伟的遵义，江水被他们拨弄得跳起来，唱起来……遵义的清晨在欢跳，在喧笑。

然而，在城中那条不到三米宽的古式巷里，这时却显得格外恬静。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战士在巷里静静地走着，其中有年过半百的老红军，斑白的鬓发挂着战斗的征尘；有膀阔臂壮的青年工人，手上带着厚厚的老茧；有饱经风霜的老贫农，带着一身浓郁的泥土香；有朝气蓬勃的红卫兵小将，口袋里装着火热的决心书……人是那样的拥挤，脚步又都是那样轻，甚至对脚下每块青石板，他们都要深情地

看上一眼。是啊，这里印下了中国革命的足迹。四十年前，在那茫茫黑夜里，干人（贵州方言，即穷苦劳动人民）的血泪曾洗刷着这里的每块砖，每块石板，他们盼望光明，盼望救星。一九三五年的早春，也是这样一个黎明，乌云突然散去，红日含笑升起，遵义的天晴了，凤凰山的红茶花开了，芙蓉江里的浪花欢跳起来。住在这里的军阀抱头逃跑了。干人们打着三角彩旗，点起爆竹，欢呼着拥向丰乐桥头，迎来了红军，迎来了人民救星毛主席。人们像久旱的禾苗逢雨露，一下子直起了腰。毛主席风尘仆仆地走进这条小巷，走进一座灰墙飞檐的小楼。在这里，毛主席为挽救革命，挽救红军，挽救党，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用中国革命战争的严重教训，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路线教育工作，为遵义会议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当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消息传出时，多少红军战士望着这条小巷，心上燃起欢乐幸福的火焰；多少干人举起火把，跳起花灯舞，眼里涌出喜悦的泪花。这是中国革命的航船由迷茫走向光明的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啊！今天，人们走进这条小巷，望着毛主席住过的小楼，望着毛主席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怎能不思潮横溢，想起那风狂雨暴的岁月，喜看团结胜利的今日，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

在毛主席住过的房间前，一位两鬓露出银丝的部队首长停下脚步。他弯腰把脸贴在窗上，看了很久很久。他的目光由床上的旧军毯，移到了床旁的桐油纸伞，又移到了桌上的旧式马灯，最后停留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上。他的神情是那样

贯注，以致使一群跑上楼来的青年都戛然停止了说笑。

“老同志，您在想什么呀？”跑在头里的扎羊角辫的姑娘，禁不住轻声问道。

“我在想一次战斗。”首长回过头，望着这群青年，兴奋地说着。

那是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重新展开了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经过二渡赤水，把国民党军队甩到长江两岸，直向遵义城逼近。战士们边打边走，情绪越来越高涨。先头部队里有个圆脸盘、长着一对虎牙的小战士，一边大步往遵义追击敌人，一边还哼着贵州花灯调：

川军像条牛，
我们牵着游；
黔军像条狗，
我们打着走……

当红军先头部队逼近遵义时，城里没逃掉的两团敌人，拼命用大石头堵塞了城门，用机枪封锁了进城的通路。于是，红军一支攻城突击队，冒着雨点般的子弹，匍匐到城墙下，准备搭人梯爬城。这时，小战士突然冲上来，跳上战友的肩头，随着人梯的增高，翻身跃上城墙，向敌人机枪手猛扑过去，一把攥住枪管，用力一扭，使机枪掉转了头。突击队随后冲上来，枪声和刺刀的碰击声交织在一起，敌人像堵烂墙一样稀里哗啦地倒了下去，遵义被攻下来了。当连长冲到小战士面前，见他鬓角流着血，已经昏了过去，那手仍死死地攥住机枪，手掌被火热的枪管都烫烂了。连长忙叫卫

生员包扎，这时小战士醒了，他睁眼看看城头，到处是红色的旗，红色的星，红色的领章，他龇着小虎牙笑了，说：“连长，这仗打得多痛快呀……”

首长说到这里停下来自言自语：“是痛快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斗，我们有了胜利的希望，胜利的把握！”

青年们听迷了。首长讲罢，又指着远处凤凰山麓的遵义会议陈列馆说：“我们到那里去吧！那里能告诉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比什么都重要呢！”

老首长打头，青年们随后，激动地走出小巷，来到遵义路的丁字口。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进遵义城时就经过这里。那时路旁垃圾成山，低矮破烂的屋檐下，满是沿街乞讨的穷人；现在这里成了遵义最繁华的地方，宽阔的马路两边修建了高大的百货商店和壮观的影剧院，路边批林批孔大字报的长廊，吸引着来往的行人。他们走过新华桥，来到当年的天主教堂。毛主席曾在这里向红军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现在这里是遵义市图书馆，一群年老的、年轻的工人、干部、学生，正说说笑笑地走了进去，到那里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学习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知识。过了图书馆，便是遵义老城的中学操场。当年红军曾在这里帮助遵义县人民建立革命委员会，召开了遵义有史以来的万人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而今这里成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学校，学生们正沐浴着早晨温暖的阳光，有的做操，有的唱歌，有的在和教师、工宣队员们讨论着教育革命问题。过了学校，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了。大家在门前停住脚步，仰望着楼顶的红旗，抚摸着门前的红方柱，谁也没说话，但心里都在想：没有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这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呀！

当大家走进遵义会议陈列馆时，都被每件革命历史文物强烈地震动了：红军渡江用过的船篙，红军穿过的草鞋，红军甩过的马尾手榴弹……件件都记载着火和血的战斗。大家仔细看过去，突然在一间陈列室里看到了一张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青年们不觉读出声音：

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

布告的纸虽然有点发黄了，但石印的大字依然可见墨黑的光泽。首长抑制不住激动，也跟着青年们读出声来。是的，在那艰苦奋斗的年代里，体现毛主席光辉思想的红军布告，像宣言书一样，宣布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中国革命必将胜利；布告上的每个字又像播种机播下的红色种子，在干人心中生根、开花，鼓舞着战士们迎着风雨去战斗。今天又见了当年的布告，怎能不激动呢？啊，是谁把这样宝贵的布告保存到解放？

保存布告的是一位穷苦的布依族老人。

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一个十二户的布依族山寨——板袍传来红军打过来的消息。地主和伪保董吓破了胆，把干人都赶进深山，自己也逃到城里。只有杨登凤老人躲过了伪保董，留在寨子里。他想：地主怕红军，可见红军是打地主的，咱穷人应当高兴才是，为什么要跑！白天他到

寨口上跷脚望，晚上他不上门问，生起一堆火，点起松油灯，坐在那里专等红军来敲门。可是，等了一夜，红军还是没来。天亮了，他又走到寨口去望。哎呀，小路边，田坎上，细雨里，浓雾中，坐着一片又一片，都是头戴红星、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哪。他们脸上带笑，操着南北口音，亲切地喊他同志、老表和老乡，向他问寒道苦。老人不知怎么好了，他把红军领到家里，想好好招待一下，摸摸米缸，米缸空空的；掀开锅盖，锅里冰冷。他只得端出半小罐甜酒，热一热给战士们驱寒。战士们吃完他的甜酒，顺手放进罐里铜板和银元。怎么，吃这点甜酒也要给钱呀？只见一个红军战士，像是回答他的疑问，从布包里取出一张布告，贴在板壁上，指着对他说：“老人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毛主席叫我们这样做呢！”老人摸着布告，流下了热泪。红军走了，老人知道这里又要布满乌云，就从板壁上揭下布告，藏了起来。地主伪保董窜回寨子，在他头上甩过皮鞭，在他背上抡过手杖，老人咬牙挺过去，不露布告的一丝踪迹。在以后的艰苦岁月里，老人虽然每天带着一身鞭痕和杖印，依旧上山砍柴，下田拉犁，但他的心上，却珍藏着布告写的一切。布告像一束火炬，照明了他前面的路，温暖着他的心……

首长和青年们怀着对这位舍死保护布告的老人的敬意，走出陈列馆，到了小龙山。这儿也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现在，这里已被开辟成红军烈士陵园，苍松翠柏掩映着光洁的墓碑。老首长手抚松树，默默地站在红军坟前；青年们也早已停住了说笑。一个背着背包的小伙子，随手采了几枝野花，折了两束松枝，轻轻地放在墓碑下。老首长看着小伙子的动作，不由得想起当年的老班长。

那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他们所在的连队多次被敌人包围。一次，老班长手提大砍刀，腰上别了十三个手榴弹，带着全班左突右冲，杀倒一层敌人，又围上来一层；左边刚杀开缺口，右边又压了上来。老班长纳闷了：这仗怎么打得这样别扭？这决不是毛主席的打法呀！当他们冲出重围后，老班长已身负重伤。这时，班长带伤折了几束松枝，放在了已经牺牲的战友墓前，然后把大砍刀交给他，含泪再三嘱咐：“要杀出去，杀出去，去找毛主席呀！”他们把班长安置在一个贫农家里，他就带上那把大砍刀，跟着毛主席，进贵州，夺遵义，四渡赤水，节节胜利。在一个雨蒙蒙、雾茫茫的下午，他们开始南渡乌江了。在雨雾中，他看见帮助红军搭桥的群众里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穿着单衣，打着赤脚，扛着一块远远超过体重的门板，一步一闪地往浮桥上奔去。看着这个男孩，他是多么兴奋啊！不是吗，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打仗，仗就打得好；按照毛主席的政治主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群众的积极性就像团火！他高兴地大步穿过抬竹筏的群众队伍，跑到孩子面前，亲切地招呼：“小兄弟，我换换你！”孩子向他一笑：“不！我给毛主席的红军做事呢，不累！”他感动地从身上取下那把大砍刀，挂在孩子的肩上：“小兄弟，说得对，有毛主席指挥，咱打胜仗的日子还在后头哪！等你长大了，也来当红军哪！”他笑着摸摸孩子的头，告别了，走远了，走到抗日的前线，走到解放全中国的战场，走到今天。

在老首长因回忆而激情洋溢时，那个羊角辫姑娘问跟首长来的一个年轻战士：“这位首长是谁？”

“是我们副司令员。”战士回答。

“不，还是战士。”首长忙回头纠正。

“战士？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战士啊？”羊角辫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怎么，岁数大？”首长摇摇头，笑说：“别以为只有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继续革命的万里征途上，我们同样处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呀！我现在就要到五·七干校去，怎么能说不是战士呢？”

那个年轻战士笑着解释道：“我们副司令员要到五·七干校当校长去啦。”

“是乌江边上那个五·七干校吗？”背背包的青年忙问。

老首长拍拍小伙子的肩膀：“是的。那里是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今天再到那里去战斗。”

小伙子拍拍背包，跳了起来：“哎呀，我们都是到那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呀。”

老首长爽朗地大笑了，笑得额上的细纹都舒展开来，他亲切地看看背背包的青年，看看那个羊角辫姑娘，又看看身旁的年轻战士，意味深长地说：“好喽，我们走的是一条路，是毛主席指引的路！过去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到了今天，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就一定能走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这是一条光明的路，胜利的路……”

这时，朝阳已从凤凰山后跃上了崖顶，给满山翠柏和整个大地镀上了一层艳红，遵义会议会址空中飘展的红旗更加鲜亮了……

遵义的早晨是年轻的，是朝气蓬勃的！

（选自《长征路上花烂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76 年版）

红 玛 瑙

刘白羽

汽车轻快的奔驰着，驶过甘泉，驶过劳山，驶近延安。……这时间，对于像我这样，认为自己真正的生命是在延安开始的人来说，面前一切都引起多少回忆啊！正这样想时，忽然，车窗外，墙壁上闪现出一行朱红大字：

地球是颗红玛瑙，
我爱怎雕就怎雕。

这诗句像通明的火光，一下照亮了我的眼睛。急忙往上看时，墙壁却一阵风一样一闪而过。车子又轻快的歌唱着向前飞驶了。尽管黄昏的阴影，已悄悄笼罩了陕北黄土高原，和“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河床，同车人还是把脸凑到车窗上，谁也不肯放弃对于延安最初的一瞥。这时间，那两句诗在我脑海中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一颗晶莹、透明的红玛瑙，愈来愈胀大，愈来愈光亮，这不正是我所走过来的和我正在经历的整个一个新世界吗？它，像鲜红的朝阳，使我欣快，使我感奋。仿佛我自己的全身也都被照透照红了。但是

我的思路被身边一片喊声所打断，“杜甫川！”“七里铺！”就像当年每一次从前方回来，走到这里，闻到扑鼻的炊烟一样，这是一些多么响亮而又亲切的名字呀！我们已经到了延安了。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时，带着两肩尘土、一颗真心，踏破黄河两岸的冰雪，在这崎岖的小路上，第一眼看到延安，那一刹那间，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那是从黑暗中，第一次看到黎明的幸福的眼泪呀！是的，我们的庄严的、战斗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冰封雪冻的进军中叨念着它，我们在胜利欢腾的狂热中高唱着它。在困难中，它鼓舞我们战胜困难，在欢乐中，它要我们看望更欢乐的明天。我们念着它，去涤荡大地上的污垢，我们念着它，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开辟路程。现在，当我再来到它面前时，我将告诉它一些什么呢？……这时，一片明光闪烁，仔细看时，原来是电灯熠熠放明。回想从前延安夜景，从那一排一排、错落不齐的窑洞里透出来的千万灯火，像繁星一般迷人。而现今，这雪亮的电光真是一派新气象了。我从汽车里面跳出来，是多么急于想看一眼延安的新面貌呀！但，这深秋之夜，却像一道幕布一样把延安遮住。我想它是想找寻另一时机，在突然之间，给我一个崭新的印象吧！

早晨，我爬上山顶。这时，朝阳有如万道霞光，把眼前的一切染上一层淡淡的红色。看，延河！那亮晶晶的蜿蜒的延河。看，那不是清凉山！而那高耸空中的宝塔，依然像一个守卫者，欣然看着这一个明朗的早晨。这时，各种嘹亮的声音，从我记忆深处升起：——这是那悲壮而又庄严的历史年代的声音呀！千千万万人的脚步，从全国各地聚集，从这

古城中的石板路上响过去，从城门外那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响过去。我记得，一个黄昏，北门外路边上，一圈人影，一盏马灯，毛主席在跟青年人讲话呢。我记得，当时青年人的脸，都像早霞一样明亮，在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革命真理的新书。我记得人们高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自由的灵魂里点燃起真理的火焰。而后，歌声从这儿冲破滚滚尘砂，飞过黄河，飞过长江，战火闪烁，战鼓雷鸣，人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染红了我们那英雄战争的年代。可是，透过一切轰鸣，你仔细听一听，你会听到一种最优美的声音，那是一片雪白的羊群后面，一个头扎羊肚毛巾，身披半截老羊皮，有着红彤彤面孔，亮晶晶眼睛的陕北青年的声音，他把鞭子甩得噼吧一响，放开喉咙高唱：“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这是令人心醉的歌声，它给我们无比清新的快感。而后，在这宏伟的大时代的合唱之上，响彻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这是黎明的歌声，这是延安的歌声。现在，阳光把一个新延安照得如此光明温暖，让我带着这记忆之中最最优美的歌声，进入这瞻仰革命圣地的旅程。

也许住过杨家岭的人，想问一问你住过的窑洞还在不在？也许到过枣园的人，想问一问今年梨树的收成？延河还那样清澈？谷穗还那样金黄？西红柿怎么样？波斯菊怎么样？你有没有去看看我们赶着毛驴去驮水的那条小径呢？我可以回答：延安变得更年轻了，延安现在是多么整洁的一个城市。从南市场到北门外贯穿着两条大马路，一座大桥联结着去东关和去杨家岭的道路。我可以数说：勘探的钻塔，工厂的烟囱，学校的校舍，桥儿沟的拖拉机站和柳林公社的秋

收。深秋季节，早晨地面上已敷了一层薄霜，晌午太阳却又那样热烘烘的。当我在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和枣园走着、看着、想着的时候，站在河岸上，听着延河缓缓低吟，穿过城中石坊，走向毛主席故居的小路，那一个庄严而壮丽的大时代便又回到我的眼前来了。是的，我们在这儿过过最美好的生活。在这些纪念馆里，我看到了陕北工农红军战斗的长矛和南泥湾开荒用的锄头，有纺车，有镰刀，有扁担，有白色原木钉制的办公桌椅，有马兰纸印的报刊文件，我像看到了最亲的亲人，这一切都在散发着当年生活的芬芳。这是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的生活。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吗？中国人民从战争烽火中，推山倒海的站立起来了，在黎明晨光中，带着血迹与征尘前进了。现在，当我们生活在充满着光明、洋溢着欢乐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回想一下，那时，我们穿着灰粗布军衣，束着皮带，穿着草鞋，但我们的眼睛是多亮啊！在凤凰山，杨家岭，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我还深刻地记得，当时，在这儿见到毛主席的情景，特别是他谈着话，有时微笑，有时深思的面容。而我知道，就是在这静静的窑洞里，纸窗下，木桌上，毛主席度过了多少可珍贵的日夜。那是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日夜，他经常深夜不寝，等候着黄河两岸、大江南北来的战报。而当他把工作布置停当后，他又以多么欣悦心情，迎着着每一个新的黎明。我有多少次从他住的山脚下走过，望着他窑洞窗上的灯火，立刻得到了无穷的力量、无限的鼓舞。是在这里，他宣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今天，当我在延安——这温暖的土地上走着时，眼泪又

一次溢满我的眼眶。这一草一木，哪怕是一朵金黄的野花，都萦回着多少革命的、战斗的情怀呀！但，那真是令人永远振奋的年代：敌人要把中国革命陷于绝境，而我们用自己双手创造一切。滔滔黄河流不尽，漫天黄沙匝地来，而盈盈的春意在那时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二年大生产运动的春天。我记得，延河里还漂着冰凌，可是你站在延河岸上向四处望一望吧！各处山巅上都在放荒火，白天青烟弥漫，夜晚红影憧憧。只要回想一下，我的心还忍不住激动。那是一场大战的前夜，不过那是人向大自然开战。到处一片紧张、忙碌。丈量了荒地，运来了工具，选好了籽种。到深夜，窑洞前的山径上，人们还提着马灯，走来走去。有一夜，落了几星春雨，隐隐响了两下雷声，泥土的气息弥漫空中。次日，天刚放明，满山满谷，晨雾迷蒙。每个人都把准备好的锄头扛在肩上，爬上高山。向高山之巅望去，各个雾气笼罩的山峦上，都是一行一行的黑人影，这里那里，一下都响起“开荒啊开荒”的歌声，这是党发了号令，谁也不肯落在后面，奋力扬起锄头。

由于敌人封锁，那一年的冬天，我们没有穿上新的棉衣，每个人膝头肩顶都补着补绽。我们的伙食也相当困难，一盆洋芋汤上漂着几点油花。但我们是那样欢乐，到处是发亮的汗珠，到处是发光的笑脸，整个延安充满用自己劳力创造财富的革命精神。像我这样生长在城市的知识分子，手掌磨粗茧，汗水透衣衫，但我第一次尝受到劳动的光荣、劳动的喜悦。就这样，延河里的水好像流得更畅亮了，蓝天上的太阳好像更温暖了。春风吹绽了深谷中的桃花、杏花、梨花、鲜红的野百合花、淡紫的马兰花。我们每早起来都先望

一望我们的耕地。而后，碧绿的田野代替了荒山，多美丽呀，那是我们亲手织出的大地的花毯呀！这时，心中说不出的舒畅。这一回，当我在又一个时代，崭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时代里来到这儿，我走着，沉思着，“延安风格万岁”这几个字从我心灵中涌现出来。这时我想到的，就是那开天辟地的风格，敢于从困难中打开胜利道路的风格，用自己双手创造新世界的风格。只要回想一下，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每一点光明，不是从那时开辟出来的吗？

让延河日夜不息的歌唱吧！我们喝过延河水的人分布全国四面八方，我们就像吃过母亲的乳汁一样，忘不了延河的声响。延河的歌是美丽的但也是雄伟的，你看那春天的涓涓溪流，但一到夏天，山洪暴发，它就白浪滔滔，直泻千里。

今天的延安已经是一个新的延安了，但又是一个保存着优良传统的延安。人们还记得出席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群英会的申长林吧？他已经六十八岁了，但二十年如一日，他一直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党的事业第一线上。今天，如果你到蟠龙去，你还会遇到申长林揽着生产队的羊群在行进呢。到现在，延安一些干部，还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作风。常常把小行李卷一背，就下乡了。开完会如已夜深，把袄子一裹就在老乡家睡了。手里拎着根木棍，不管荒山野岭，拿起腿就走了。遇事跟群众商量，一蹲下去就是几月。还是一身棉袄，打上几块补绽，穿上几个冬天。现在，就让我们就近到杜甫川和少陵川之间的柳林去看望看望吧！

人们该还记得，就是出名的刘建章南区合作社所在地的柳林。在当年合作社作仓库使用的一孔大石窑里，如今是柳林公社柳林生产队的办公室。同志们生了一盆炭火，炒了一

锅南瓜子。我们就围桌而坐听李有华同志谈了一段经历。他是延安地区头一批走合作化道路的一个。他还跟我们在延安时所习见的农民干部一样，戴着一顶旧蓝布棉帽，脖颈间围绕一条白羊肚毛巾，他告诉我说：

“我家在横山，从小就是一个给人家揽活的人。工农红军到横山，我成了赤卫队员。后来白匪反攻，那些逃亡到榆林城的地主老财又赶回来收地、倒算，折腾得穷人一点活路也没有。后来我到延安来寻红军，才到了柳林。一看这里能安置，正月里回去引下婆姨娃娃，六口人背一堆烂铺盖，来柳林揽长工。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刘建章叫我搞变工，我说没农具，他答应合作社帮添农具，我组织了九户横山来的移民，一人两只手一把镢头，没有田地就开荒……”

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那时李有华的九户变工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柳林公社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正像延安人跟我说的：“你该还记得从前那烂袄袄、皮裤裤的年月吧！那年月一个劳动人民一辈子能买起几丈布？到三边去驮盐的人，晃荡着一杆鞭子，不都穿着白板皮裤吗？现在，你到农村里看看，到处干干净净，哪一个队员不是新布棉裤棉袄，妇女剪了头发，穿着花布袄，哪家炕上不堆着花花被子，咱们的人生活变了，精神面貌也变了。”

这是一个响晴天。我们从山岭上看了托儿所下来，转过小河那边。生产队的牲口棚里静悄悄的，牲口都放出去吃草了。前面那大场院上，却一片马嘶人叫，队员们正赶着打场呢！坪场里面这堆金黄的小山，是谷子；那堆焦黑的丘岭，

是荞麦，红的高粱，白马牙玉茭，扬着风，一阵阵烟雾腾腾，马蹄答答响，石碾子咕噜噜转着跑，人脸晒红了，汗珠在眉峰上闪光，灰尘披满衣衫，声音却分外欢畅、洪亮。给暖洋洋的日光一蒸发，空气中弥漫着新粮食的香味。正在这时，我转过身，真使我惊喜万分，就在场院一边的土墙上，我又看见那火热的诗句，而且这一回，我看到了整首诗：

地球是颗红玛瑙，
我爱怎雕就怎雕，
按着毛主席的好图样，
驯服山河建天堂。

这时，就像电炬一下照明了面前的大道，突然，像浮雕一样把我重来延安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刻画出来了。是的，正是在这里，正是在那庄严、艰巨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毛主席就一步进一步地雕着这一个晶莹、透明、通红、发光的红玛瑙的新世界了。而为了塑造这一个新世界，首先就雕塑了一批又一批能创造新世界的人。他们给共产主义思想阳光照耀后，像血一样鲜红，像火一样明亮，他们的灵魂，像红玛瑙一样坚固、纯洁、闪光。向这一切不正象征着我们整个中国革命、战斗的形象吗？

就在这天夜晚，我正对秋高气爽的夜空凝视，忽然，宝塔山上的宝塔，像一串珍珠、一簇纓络一样亮了起来，这简直是梦幻世界啊！当年，我看夕照，看曙色，看月光映出这宝塔，现在电灯却把它装扮得如此美丽。我不禁进入沉思：“……如果说一个革命者，当他获得革命真理时才获得了真

正的生命，那么，延安，在多少人心灵上点燃起那最初的一点火焰啊！而这火焰，从此便在你生活中永远熠熠闪光了……’就在这个黎明之前，延安山城还沉在宁静的安眠之中，我又坐在汽车上登程了。又一次向延安敬礼告别。想到不知何时再来，心中说不出的依恋不舍。车轻快的奔驰着、奔驰着。我心中自言自语的勉励着自己：“让延安这个灯塔永远在我记忆中闪光吧！要创造一个红玛瑙一样鲜红、通明的新世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鲜红、通明的红玛瑙一样的人吧！”这时严霜在地，晨寒袭人。高原、山岭、河川、树林都还朦朦胧胧。这时我两眼注视着前方，前方无限辽远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小小一点光亮，开始像一枚金红色小片，但随即扩大了，展开了，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我再向四周看时，不觉之间，黑夜已为晨光所代替，而新的一天就这样诞生、开始了。

一九六〇年

（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秋 色 赋

峻 青

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陌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

多么可爱的秋色啊！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作《秋声赋》时，把秋天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

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得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

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橙橙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

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

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

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今年，胶东半岛上雨水充足，气候适宜。一开春，小麦就长得很好，得到了可喜的收成。六月间，当我乘坐胶济列车经过昌潍大平原时，看到那金色的麦浪，像海洋似地荡漾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而打下来的麦子，则像一座座的山岭堆在铁路两旁的场地上，心里禁不住欣喜万分。当时，我曾把这种欢乐的心情，写信告诉过许多和我同乡的战友，让他们和我一起共享这故乡丰收的快乐。现在，时间过去了刚刚三个多月，前几天，当我乘坐由青岛开往烟台的列车经过胶东内地时，又看到了一幅秋天大丰收的欢乐景象：金黄色的谷子刚收割了不久，高粱又熟得火红一片，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紧张秋收的人群。村头上、打谷场里，到处都堆着像小山一样高的庄稼秸子和金光闪闪的包米穗子。胶东，这个不愧为水果之乡的半岛上，今年的水果特别丰收。列车经过莱阳车站的时候，车站上摆满了著名的莱阳梨，这梨又大又甜，人们告诉我：今年梨的产量，大大地超过了去年。

在烟台西沙旺，我曾参观了以盛产烟台苹果著称的幸福公社。现在，正是苹果成熟的时候，一踏进那绿色海洋般的果林里，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苹果香气。人们告诉我，六十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凉的沙滩，那赭黄色的沙地上，什么都

没有。栽植苹果，只不过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而苹果的大规模发展，却是在解放之后，而尤其是近几年来。瞧，那一棵棵枝叶茂盛的果树上，累累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有的树枝竟然被苹果压断了，而大多数树枝不得不用木杆撑住。生产队门前的广场上，收摘下来的苹果堆得像小山一样，成群的姑娘们正在把这驰名中外的香蕉苹果包装到雪白的木箱子里，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又把这包装得整整齐齐的苹果运送到海关码头和火车站去。很快地，国内各大城市和国外一些地方都尝到了这芬芳甘甜的美味了。让那些吃到这种美味的朋友们，也都来分享一份我们丰收的喜悦吧。

前天，在威海市的陶家夼，我又看到一派更令人喜爱的秋色。那里，除和烟台西沙旺一样有着成片的苹果林以外，而更有特色的却是葡萄，那简直是一个葡萄的王国。九十多户的山村，整个的都笼罩在绿色的葡萄架下。那风光，就别提有多么幽美了。就请想象一下那条奇特而美丽的街道吧。这是一条完全由茂密的葡萄枝叶所搭成的街道。因为街道的两旁也栽遍了葡萄，那茂密的枝藤顺着架子交叉着爬满了大街的两旁和上空，使得大街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绿色的走廊。现在，葡萄全都熟了，那一串串亮晶晶的淡绿色、紫红色、米黄色的葡萄，挂满了大街的两旁和上空，人在这大街上走着，就仿佛走进了一个琥珀和珍珠缀成的世界。

一条从山谷的深处流经村庄前面的小河，小河的两岸和上空，也长满了葡萄，姑娘们在葡萄架下面洗衣服，那五光十色的葡萄和姑娘们的影子一起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

家家户户的院子里，也都盖满了葡萄。头一年栽下一棵小小的枝丫，第二年就爬满了整个的院落，使得院子和屋里

都充满了绿色。人们就在这葡萄架下吃饭乘凉，妇女们则在葡萄架下做针线活儿。

今年的葡萄特别丰收，一般的每棵都收摘到一千斤以上，其中有一棵竟然收摘了两千六百多斤。这种丰硕的收成是令人可喜的。然而更加令人欣喜的还是那种在陶家柞村民中普遍形成的高尚风气：在这里，不论是大街上或是小河旁，那遍地触手可及的葡萄，竟没有一粒丢失的。且不说大人，就连七八岁的孩子，也都把集体的财物，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去年，陶家柞在超额完成了国家的收购任务之后，把多余的一万多斤苹果分给了社员们。社员们却把这分到的苹果按收购牌价卖给了公家。这是多么令人钦佩的高尚品质啊！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丰收，是一种精神品质上的丰收。而这种丰收，比起谷物果木的丰收来，更加可贵，更加令人兴奋。因为一般的谷物丰收，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风调雨顺的角落里，而这种精神品质上的丰收，却只能出现在我们这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出现在毛泽东时代里。

我们中国有句农谚：“不行春风，难得秋雨。”

这句话，不只是一种气候上的规律，也是人类生活中的一条哲理。谁都知道，眼前这丰硕的收成，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尤其是在那连续几年的严重灾荒之后。

我们并不讳言：前两年，我们的确有过一段相当困难的时刻，但是这种情况改变得很快。记得今年三月间，当我乘坐由济南开往烟台的列车经过昌潍大平原的时候，看到铁路两旁的田野里，到处都是紧张忙碌的人群。那时候，天气还很冷，潍河里还在流着浮冰，平原上整天价在刮着扬天揭地

的老黄风。人们就在这大风中刨地耕田，生产热情是那么高，干劲是那么足。这时候，和我同车的一位老汉站在车窗前面，眯着眼睛，向外望着那一群群在田野上耕作的人们，望着那扬天揭地的大风，自言自语地说：

“好哇，大风，你就使劲地刮吧。你现在刮得越大，秋后的雨水就越充足。刮吧，使劲地刮吧，刮来个丰收的好年景，刮来个富强的好日子。”

这老汉大约有六十多岁，胡须头发全都白了，但是精神却很好。他看到我在注意地看他，就冲着我一笑说：

“‘不行春风，难得秋雨’。同志，你听到过这句成语吗？”

我点了点头。

他又问：“可是，你知道这春风是从哪里刮来的吗？”

我摇摇头，觉得他的问题提得有些奇怪。

老汉神秘地一笑，指着正北的方向说：“喏，从那里，北京。”

“什么？北京？”我益发困惑不解了。

“嗯，北京。”老汉严肃地点着头，笑眯眯地说：“从北京，从党中央。”

哦！我明白了。

老头子指的是另一种春风。他把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的号召称为春风。

我不禁高兴地称赞道：“好，好恰当的比喻。”

老头子说：“这是我一辈子的亲身体会：不管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只要能按着党的指示去做，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你说我这个体会不对吗，同志？”

为什么不对呢？而且，有着这样的体验的，又何尝只是这老汉一个呢？可以说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体验，是全中国人民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所摸索出来的一条真理。

春华秋实，没有那浩荡的春风，又哪里会有这满野秋色和大好的收成呢？

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发表了。这又是一场令人兴奋的春风，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看到滋润大地的秋雨和灿烂丰硕的收成。

国庆节的晚上，我和威海市的人民一起欢度了国庆之夜。尽管这里是地处偏僻的东海之滨的一座小城，然而，我们的节日仍然过得是那么热闹、隆重。从清早起，四乡八舍的人们就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城中心的广场上，来到了清洁的马路上。他们有从大海里渔罢归来的渔夫，有从深山果林里赶来的农民，有机关的干部，也有工厂的工人和学校里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满面春风地流露着愉快的神色。

这天夜里，在市中心的职工俱乐部里，我又看到了另外的一种丰收：一个不久前才由机关、工厂的业余戏剧爱好者所组织起来的吕剧团，演出了丰富多彩的节目，非常令人兴奋。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有天才有前途的演员，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两年前还是工厂的工人或者初中学校的学生呢。看到这精彩的演出，怎能不为这艺术幼芽的成长而感到万分欣喜呢？

春风浩荡，秋雨滂沱。

在这大好的秋收季节里，成熟和丰收的又何止是上面所写到的那几个方面呢？几天来，我不断地漫步山野，巡行田间。眼前那绚丽缤纷的大好秋色，真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

暇。

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

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渥然丹者为槁木，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映。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

我爱秋天。

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我愿这大好秋色永驻人间。

1962年国庆节次日写于威海市

（选自《秋色赋》，峻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雪 浪 花

杨 朔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刷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鑿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拢岸的渔船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

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的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像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

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瞥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有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

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么？”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像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

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鱼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份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时候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说：“你有七十了么？看不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不行了，胳膊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剪子，胳膊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是胳膊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像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谁料想

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我告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

老泰山说的有点气促，喘吁吁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我的驴，你的屁股，爱骑不骑，怎么能诬赖人家是红胡子？赶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轻松，望着我乐得闭不拢嘴。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的驴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岛，到处找不着你。我就告你。一告，这不是，就把红胡子抓来了。”

我忍不住说：“瞧他多聪明！”

老泰山说：“聪明的还在后头呢，你听着啊。这回倒省事，也不用争，一张口他就给我十五块钱。骑上驴，他拿着根荆条，抽着驴紧跑。我叫他慢着点，他直夸奖我的驴有几步好走，答应回头再加脚钱。到秦皇岛一个来回，整整一天，累得我那驴浑身湿淋淋的，顺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问道：“脚钱加了没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说：“见他的鬼！他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说是上回你讹诈我五块钱，都包括在内啦，再闹，送你到警察局去。红胡子！红胡子！直骂我是红胡子。”

我气得问：“这个流氓，他是哪国人？”

老泰山说：“不讲你也猜得着。前几天听广播，美国飞机又偷着闯进咱们家里。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的亏，这笔账还没算清。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强力壮，今天我呀——”

休养所的窗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就用大拇指试试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一九六一年

（选自《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土 地

秦 牧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辟人类新历史的光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对许许多多的自然景物也都产生了新的联想、新的感情。不是有无数人在讴歌那光芒四射的朝阳、四季常青的松柏、庄严屹立的山峰、澎湃翻腾的海洋吗？不是有好些人在赞美挺拔的白杨、明亮的灯火、奔驰的列车、崭新的日历吗？睹物思人，这些东西引起人们多少丰富和充满感情的想象！

这里我想来谈谈大地，谈谈泥土。

当你坐在飞机上，看着我们无边无际的像覆盖上一张绿色地毯的大地的时候；当你坐在汽车上，倚着车窗看万里平畴的时候；或者，在农村里，看到一个老农捏起一把泥土，仔细端详，想鉴定它究竟适宜于种植什么谷物和蔬菜的时候；或者，当你自己随着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地冒出脚缝的时候，不知道你曾否为土地涌现过许许多多的遐想？想起它的过去，它的未来，想起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为要成为土地的主人，怎样斗争和流血，想起在绵长的历史中，我们每一块土地上面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事迹，他们

的苦难、忿恨、希望、期待的心情？

有时，望着莽莽苍苍的大地，我骑着思想的野马奔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才又收住缰绳，缓步回到眼前灿烂的现实中来。

我想起了二千六百多年前北方平原上的一幕情景。

一队亡命贵族，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然而看得出来，他们疲倦极了，饥饿极了。他们用搜索的眼光望着田野，然而骄阳在上，田垄间麦苗稀疏，哪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一个农民正在田里除草。那流亡队伍中一个王子模样的人物，走下车子来，尽量客气地向农民请求着：“求你给我们弄点吃的东西吧！你总得要帮忙才好，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的了。”衣不蔽体、家里正在愁吃愁穿的农民望了这群不知稼穡艰难的人们一眼，一句话也没说，从田地里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王子模样的人物面前，压抑着悲忿说：“这个给你吧！”王子模样的人显然被激怒了，他转身到车上取下马鞭，怒气冲冲地想逞一下威风，鞭打那个胆敢冒犯他的尊严的农民。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臣模样的人物上前去劝阻住了：“这是土地，上天赐给我们的，可不正是我们的好征兆么！”于是，一幕怪剧出现了，那王子模样的人突然跪下地来，叩头谢着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土块，放到车上，一行人又策马前进了。辘辘大车过处卷起了漫天尘土……

这是《左传》记载下来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在亡命途中发生的故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除了因为这群贵族是在亡命途中，不得不压抑着威风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他们

心目中，土地代表着上天不可思议的赏赐，代表了财富和权力！他们知道，只要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永无休止地榨取农民的血汗。

古代中国皇帝把疆土封赠给公侯时，就有这么一个仪式：皇帝站在地坛上，取起一块泥土来，用茅草包了，递给被封的人。上一个世纪，当殖民主义强盗还处在壮年时期，他们大肆杀戮太平洋各个岛屿上的土人，强迫他们投降，有一种被规定的投降仪式，就是要土人们跪在地上，用砂土撒到头顶。许许多多地方的部落，为了不愿跪着把神圣的泥土撒上天灵盖，就成批成批地被杀戮了。

啊！这宝贵的土地！不事稼穡的剥削阶级只知道想方设法的掠夺它，把它作为榨取劳动者血汗的工具，亲自在上面播种五谷的劳动者，才真正对它具有强烈的感情，把它当做命根子，把它比喻成哺育自己的母亲。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好些令人掀动感情波澜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那些当年被迫走投无路的破产的中国农民，飘流到海外去谋生的当儿，身上就常常怀着一撮家乡的泥土。那时，闽粤沿海港口上，一艘艘用白粉髹腹，用朱砂油头，头部两旁画上两个鱼眼睛似的小圈的红头船，乘着信风，把一批批失掉了土地的农民送到海外各地。当时离乡别井的人们，都习惯在远行之前，从井里取出一撮泥土，珍重地包藏在身边。他们把这撮泥土叫做“乡井土”。直到现在，海外华侨的床头箱里，还有人藏着这样的乡井土！试想想，在一撮撮看似平凡的泥土里，寄托了人们多少丰富深厚的感情！

过去，多少劳动者为了土地而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悲壮斗争！当外国侵略者犯境的时候，又有多少英雄义士为保卫它

而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在我国福建沿海地方，历史上就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保卫土地的抗敌爱国故事。在明末御倭和抗清的浪潮中，那里曾经进行过保卫每一寸土地的激烈斗争。有的地方，妇女的发髻上流行着插上三支短剑似的装饰品，那是明代妇女准备星夜和突然来袭的倭寇搏斗的装束的遗迹。有的地方，从前曾经流行过成人死后入殓时在面部盖上白布的风俗，那是明朝遗民羞见先人于地下、一种激励后代的葬仪。这些风俗，多么沉痛，多么壮烈！在我国的湛江地方，有一座桥梁被命名为“寸金桥”，就寓有“一寸土地一寸金”的意思，这是用来纪念当年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们的。土地的长度和面积计算单位可以用丈，用公里，用亩，用公顷，然而在含有国土的意义的时候，它的计算单位应该用一寸、一撮来衡量。因为它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一寸土都决不容侵犯，一撮土都是珍宝。这里，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版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一定要使它真正完整地完整无缺。台、澎等地还被一小撮反动派所盘踞，我们必须把它解放。从福建前线，我们听到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啊！不仅我们英勇而强大的海军和空军，给予美蒋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就是民兵队伍，也巧妙地打击了敌人。就是好些少年儿童，在大炮轰击中也自动奔跑接驳电线，传信送物。他们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保卫每一寸国土的坚强意志。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许许多多被殖民者奴役着的地方，也正在进行着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土的斗争。啊！一寸土，一撮土，在这种场合意义是多么神圣！

提到了一寸土这几个字，我又禁不住想到一些岛屿上的

人民战士。登上那些岛屿，你会更深地认识到“一寸土”的严肃意义。我到过一个小岛，那岛屿很小。然而，岛上的生活却是多么沸腾啊！这里的海滩、天空、海面，决不容许任何侵略者窥探和侵入一步，人民的子弟兵日夜守着大炮阵地，从望远镜里、从炮镜里观测着海洋上的任何动静。这些岛屿像是大陆的眼睛，这些战士又像是岛屿的眼睛。不论是在月白风清还是九级风浪的夜里，他们都全神贯注地盯着宽阔的海域。不仅这样，他们还把小岛建成花园一样美丽。本来是蛇虫蜿蜒、荆榛遍地的荒凉小岛，经过他们付出艰苦劳动，在上面建起了坚固的营房，辟出了林阴大道，又从祖国各地要来了花种，广植着笑脸迎人的各种花卉和鲜嫩的蔬菜；还建起畜牧栏，竖起鸽棚；又从海里摸出了石花，堆成小岛的美术图案。看到这些，令人不禁想到，我们所有的土地，一个个的岛屿，一寸寸的土壤，都在英雄们的守卫和汗水灌溉之下，迅速地在改变面貌了。

在我们看来很平凡的一块块的田野，实际上都有过极不平凡的经历。在几十万年之间，人类在这上面追逐着野兽，放牧着牛羊，捡拾着野果，播种着五谷，那时候人们匍匐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风雨雷霆，电光野火，都曾经使他们畏惧颤栗。几十万年过去了，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一片片的土地像被带上了镣铐似的，多少世代的农民，在大地上流尽了血汗，却挣不上温饱，有多少人在这一片片土地上面仰天叹息，椎心痛恨！又有多少人揭竿起义，画着眉毛，扎着头巾参加战斗，把压迫他们的贵族豪强杀死在这些土地上面。到了近代，又有多少人民的军队为了从封建地主阶级手里，把土地夺回来，和帝国主义的军队、剥削者的军队在这上面

鏖战过。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革命斗争，打垮了反动统治者，推翻了剥削制度，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的镣铐才被彻底打碎，劳动人民才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我们热爱土地，我们正在豪迈地改造着土地，使它变成一片锦绣。当你这么思索的时候，大地上的红土黑土，黄土白土，仿佛都变成感情丰富的东西了，它们仿佛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息壤”似的，正在不断变化，不断成长，就像是具有生命一样。

几千年来披枷带锁的土地，一旦回到人民手里，变化是多么神速啊！你试展开一幅地图，思索一下各地的变化，该有多么惊人。沙漠开始出现了绿洲，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濯濯童山披上了锦裳，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有一次我从凌空直上的飞机的舱窗里俯瞰珠江三角洲，当时苍穹明净，我望了下去，真禁不住喝彩，珠江三角洲壮观秀丽得几乎难以形容。水网和湖泊熠熠发光，大地竟像是一幅碧绿的天鹅绒，公路好似刀切一样的笔直，一丘丘的田野又赛似棋盘般整齐。嘿！千百年前的人们，以为天上有什么神仙奇迹，其实真正的奇迹却在今天的大地上。劳动者的力量把大地改变得多美！一个巧手姑娘所绣的只是一小幅花巾，广大劳动者却以大地为巾，把本来丑陋难看的地面变得像苏绣广绣般美丽了。

你也许在火车的□望车上看过迅速掠过的美丽的大地；也许参加过几万人挑灯修筑水电站大坝的工程，在那种场合，千千万万人仿佛变成了一个挥动着巨臂的巨人，正在做着开天辟地的工作。在华南，有些隔离大陆的岛屿给筑起了一条堤坝，和大陆连起来了；有些小山被搬掉填到海里，大

海涌出陆地来了；干旱的雷州半岛被开出了一条比苏彝士运河还要长的运河；潮汕平原上的土地被整理成棋格一样齐整。我们时代的人既以一寸寸的土地为单位在精细工作着，又以一千里，一万里，更确切来说，又以全部已解放的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和工作着。这十几年来，同是千万年世代相传的大地上，长出了多少崭新的植物品种啊！每逢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庄稼，看到刚犁好的涌着泥浪的肥沃的土地，我的心头就涌起像《红旗歌谣》中的民歌所描写的——“沙果笑的红了脸，西瓜笑的如蜜甜，花儿笑的分了瓣，豌豆笑的鼓鼓圆”这一类带着泥土、露水、草叶、鲜花香味的大地的情景。让我们对土地激发起更强烈的感情吧！因为大地母亲的镣铐解除了，现在就看我们怎样为哺育我们的大地母亲好好工作了。

事实上，无数的人也正在一天天地发展着这样的感情。你可以从细小或者巨大的场面中觉察到这一切。你看过公社干部率领着一群老农在巡田的情景吗？他们拿着一根软尺，到处量着，计算着一块块土地的水稻穗数；不管是不是自己管理的，看到任何一丘田里面的一根稗草都要涉水下去把它拔掉。你看到农村中的青年技术人员在改变土壤的场面吗？有时他们把几千年未曾见过天日的沃土底下的砾土都翻动了，或者深夜焚起篝火烧土，要使一处处的土地都变得膏腴起来。

几万人围在一片土地上修筑堤坝，几千人举着红旗浩浩荡荡上山的情景尤其动人心魄。那呐喊，那笑声，尤其是那一对对灼热的眼睛！虽然在紧张的劳动中大家都少说话了，但是那眼光仿佛在诉说着一切：“干啊干啊，向土地夺宝，

把我们所有的土地都利用起来。一定要用我们这一代人的双手，搬掉落后和穷困这两座大山！”有时这些声音寄托于劳动号子，寄托于车队奔驰之中，仿佛令人感到战鼓和进军号的撼人的气魄……

让我们捧起一把泥土来仔细端详吧！这是我们的土地啊！怎样保卫每一寸的土地呢？怎样使每一寸土地都发挥它的巨大的潜力，一天天更加美好起来呢？党正在领导和率领着我们前进。青春的大地也好像发出巨大的声音，要求每一个中国人民都作出回答。

1960年

（选自《长河浪花集》，秦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路 标

魏 巍

—

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伟大的灵魂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就是雷锋这个普通战士的灵魂。他使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二十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还不到两个年头；可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活得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光彩啊！他的生命是过得多么有价值有意义啊！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人能够这样活着，即使活上一天，也胜似那浑浑噩噩的一百年！

有人说，雷锋的事迹是平凡的。可是，正是在这平凡里，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雷锋的历史上，虽没有上甘岭冲天的火光，也没有云周西村惊人的风雪，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同黄继光、刘胡兰同样的伟大；或者说，他就是我们祖国建设年代的黄继光和刘胡兰！

雷锋，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新人。我们这样说，是因

为我们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个人主义终将被集体主义所代替的时代；雷锋呢，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活生生的完美的典型么？你听他说：“力量从团结来，荣誉从集体来；”你再听他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朵花打扮不出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他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毫不勉强地要“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自觉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动人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歌声啊！雷锋的伟大行动，正是这种思想的耀眼的火花。正因为雷锋的周身甚至每个细胞都浸透了这种情绪，所以能同几千年私有制度留下的旧思想、旧习惯彻底决裂；这就使他有别于任何历史时代、任何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真正的新人。

雷锋啊，你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但人们从你身上，也从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身上，却看见了未来的人类，共产主义的人类。在这些日子，我常常看见你，看见你那褪了色的军衣，看见你那谦逊的微笑，你是以多么崇高的精神，招引着人们前进啊！

二

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仿佛听到一种深沉有力的呼喊：“人们啊，在你自己的一生里，你究竟打算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谁在呼喊？这是生活在呼喊。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作出毫不含糊的回答。

雷锋的出现，对于我们辨认生活道路，是一个多么有力的援助！

在以往的战争年月里，人们穿行在崎岖的山径和茫茫的荒野，每当风声怒号，夜色深沉时，多怕迷失了方向，迷失了道路，而又多么容易迷失方向和道路啊！可是，这时候，只要在路边，借着模糊的星光发现了前人设置的路标，人们就会发出惊喜的喊声，更加振奋地向前行进。

现在，雷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不正是一支叫人惊喜的路标么！

现在，我们的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冬夜，欢度着阳光明媚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在初春天气，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起的暖流进行搏斗最激烈的季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一方面，新的人、新的思想以令人目眩的壮丽姿态茁壮成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仍然以各种形式大量存在，它们每时每地都在拉我们的后腿，阻挠我们前进。这种斗争，不仅表现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反映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生观的领域里所进行的战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战争，也同样是多么尖锐剧烈啊！人们看到，就在同一家国营商店的柜台里，这边一个人是满面笑容百问不厌，那边一个人却愁眉苦脸，发出“十年寒窗付流水”的慨叹；在同一块田地上，有人为参加农业战线的斗争、促使祖国农业早日过关感到光荣，同时就有人埋怨“修理地球”耽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同样的青春，同样的年龄，有人跋山涉水，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另外却有人认为糊糊涂涂地吃喝玩乐那才算没有

虚掷自己的年华……这是一场多么激烈的新旧斗争啊！我们的年轻一代，正是在这场难解难分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人生观的交战中前进。他们思考着，判断着，争执着，觅寻着自己的路……

雷锋出现了！他，有如一座光芒万丈的金塔，矗立在共产主义的思想高地；他，有如一支鲜红的路标，高高插在我们生活的十字路口。现在，面对着这个伟大的战士，人们有机会再想一想：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究竟是像雷锋那样活着，做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尚的共产主义者有价值有意义呢，还是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有意义呢？或者是开一个“公私合营”的杂货铺，一年四季患得患失地度过一生有意义呢？对照雷锋的思想，我们再看一看那些旧时代的、剥削阶级的偏见，是显得多么渺小，多么可怜，多么没有意义啊！为什么人一定要当“官”或取得其它高级职位才算是活得有“价值”呢？为什么一定要高人一头、超人一等才算是“前途”呢？为什么只有清闲、少劳动或不劳动才算是“幸福”和“快乐”呢？为什么要把服务性行业看得那么卑贱见不得人呢？这是些多么可怕而又可鄙的偏见！现在正是这些剥削阶级留下的臭垃圾阻塞着我们的去路，影响着许多方面建设事业的前进。我相信，雷锋的榜样，不仅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且加强了我们同一切旧思想、旧习惯坚决斗争的勇气。假若我们自己头脑里有这些东西，就毫不客气地同它开火吧，正如雷锋所说的，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在学习雷锋中，有人说雷锋虽好，却高不可攀。实际上，恐怕是对放弃个人主义还缺少勇气吧。有人就坦白地

说：“我要丢掉个人主义，就没有积极性了，因为前进的发动机被摘除了。”是的，摘除了一个人的“发动机”，这的确是可怕的；可是，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动机”呀，破旧不堪，经常在集体事业中发生故障！摘除这样的“发动机”，就可以换上一架最新最美、保你使用终生的十万匹马力的“发动机”。雷锋同志也正是装置了这样的“发动机”，所以才精神奋发，力气无穷。这架“发动机”的名字，就是他从毛主席著作里取来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取得一架这样的“发动机”飞腾前进吧！

我们要做雷锋那样的人！

我们要走雷锋那样的路！

三

学习雷锋的运动，正在我们的国家迅速展开。

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扩展阵地的运动；这是一个促进我们的新人大批成长的运动；这是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运动。我们欢呼这个运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下去。

这个运动现在刚刚开始，在我们的周围就出现了多少动人的景象啊！过去没人打扫的走廊，现在忽然变得干干净净，你查不出是谁打扫的；过去被忘却了的煤堆，风吹日晒，现在忽然大家争着去把它团成煤球收藏起来；家庭困难的学生，书桌上忽然出现了无名氏赠送的笔记本；丈夫出门在外的产妇，屋子里忽然降临了一位烧水做饭的姑娘；不安心工作的炊事员，开始求师访友，急着提高烹调技艺；见了

熟人就躲起来的理发学徒，也愉快地拿起刀剪，脸上出现了笑容……在这些日子里，就是幼儿园的孩子，也在争着给老师抹桌子、擦钢琴，连留在家里的小病号，都悄悄地把一床床被子叠好。雷锋啊，你的生命放射出来的光辉，在一刹那间，照亮了多少人的灵魂！

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深远意义，越来越清楚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应该说，像雷锋这样的英雄是不少的；但是，对于我们所进行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不管在哪一条战线上，都需要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雷锋。随着运动的发展，想想吧，假若我们的工厂、公社、仓库的管理人员们，都能用雷锋拣牙膏皮的精神进行节约；假若我们的学生、干部，都能用板子上□钉子的精神进行学习；假若我们服务性行业、商业部门的同志们，都能用风雨中送人母子回家的精神为人民服务；假若我们的艺术家们，都能用雷锋那样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和赤诚去歌唱；假若我们大家都像雷锋那样去帮助同志：我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将会提到怎样的高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何等沸腾的景象！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相信：在我们的队伍里，在各条战线上，必将出现千百万个雷锋！一个拥有千百万雷锋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定会以更高的速度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必定会更早地建成！这就意味着，一切今天没有的，明天就可能有；一切没有达到的，明天就会达到！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晨七时

（选自《壮行集》，魏巍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朵朵葵花向太阳

季羨林

我们生活在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天天在这里活动。只要一出门，就会遇到成百上千的人。在公共汽车上，在电车上，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公园里，在卖菜的 market 里，你都会遇到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都会遇到领着孙子孙女出来游玩的老奶奶，都会遇到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卖票姑娘，都会遇到忙忙碌碌的街道干部。这些人，你随时见到，随地见到。有的面孔你看过不止一次，你觉得十分熟悉了。她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面带笑容，心平气和；她们似乎再也不会引起你的任何幻想：你看她们已经看得习惯到不能再习惯了。

但是，如果有人问：你真熟悉这些人了吗？你知道，她们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吗？你知道她们的憧憬和愿望是什么吗？

这样一问，恐怕就将了你的军，你恐怕就要交白卷。

我自己正是一个要交白卷的人。

对我来说，这确是一件新鲜事儿，自己过去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天天遇到这些人，看惯了这些人。我只觉得她

们平平常常，和和和气，我对她们什么都没有想过。

但是我最近参加了一些对城市居民进行宣传的工作。我天天见到的正是这些人。这一次不是在公共汽车上、电车上、大街上，不是在商店里、公园里、卖菜的市场里；而是在她们家里。我不仅仅见到她们，而且向她们说明一些事情，同她们谈话。天天在一起，她们也就不再把我当做外人；她们对我谈她们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她们对我谈她们的憧憬和愿望。这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一些平平常常和和和气的人们，心里面竟有这样多的事情，竟有这样复杂艰苦的经历，竟有这样多的爱和恨。我蓦地发现：原来我认为十分熟悉的人，竟是十分陌生，我仿佛走到一个新天地里去了。

在小组会上，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感受。有的人说：她七岁给地主当丫头，三年只挣了一件短褂子。临走的时候，地主连这一件短褂子也不给她，把她扒得浑身精光，赶出了门。有的人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给地主鬼子逮住，十冬腊月，脱得一丝不挂，用鞭子抽；浑身流血，他们就铺上麻，等干了的时候，再往下揭，连皮都揭掉一层。有的人说：小时候穷，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人家是下雨往屋里跑，我们是下雨往屋外跑，怕房子塌了砸死。后来给地主家去当丫头，地主婆每天夜里来打她。她每次上床的时候，心里就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出来。她亲眼看到，地主婆活活地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用席子一包就拖了出去，脸上的汗毛也不动一动。有的人说：她从小被父母卖给地主家当丫头。夜里地主和地主婆吸大烟，要她在旁边侍候。她一打盹，地主婆

就用大烟杆子扎她的嘴，扎她的手，把一只手扎成了残废。有一天，她的父母来看她，地主不让见。据说父母留下了两方小手巾，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她才知道自己姓什么。她父母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死活不知。就连她这姓，她也有些怀疑；地主那样说，她也就只好那样信了。她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大家边说边哭，有时候引得全场流泪，会都不得不暂时中止。正在大家谈得十分热烈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霍地站了起来，啜泣了一阵，就开了言。她说，她不善于说话，一说心里就哆嗦；她不愿意提过去的事，一提就哭。但是，今天非提一提不行了。小时候到地主家去要饭，地主放出狗来，咬烂了她的腿。地主拿出来几张煎饼，她以为是给自己的呢。可是地主用煎饼擦了擦她腿上的血就丢给狗吃了。十来岁就帮母亲给挑水的工人洗补衣服，仍挣不上吃，母亲又叫她要饭。父亲受了人的骗，把她许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当老婆。这个人不务正，只知道赌钱。头一胎生了一个女孩，饿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个男孩，第三胎又是一个女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还没有出月子，就锯木头卖钱。坐在洋灰地上，整宿拉锯，又硬又凉。好容易挣了几个钱，丈夫偷去押宝输了。男孩子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已经睡下，丈夫回家，掐着她的脑袋说：“我给你商议一件事。我们把男孩子卖了吧，一百块大洋。”她一听就生了气，说道：“你爱咋办就咋办吧。反正我从娘家什么也没有带来，孩子都是你的。”她出去赊了半斤烧酒、五盒洋火，泡了泡就喝了下去。孩子不懂事，看到花花绿绿的洋火盒，喜欢得了不得，伸手抓过来玩，她自己想：“再过半小

时，我就看不到我的孩子了！”心里简直像尖刀割滚油浇。别人用胰子水灌她，幸而没死。丈夫拿起两床被子，卷了卷，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她千辛万苦，拉巴两个孩子。受中国有钱人的气，还要受日本人的气。她公公和舅舅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好不容易熬到解放，她算是从地狱里一步登上了天堂。现在儿女和儿媳都是国家干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穿不愁。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她的骨头早就烂在土里了。她经常把过去的苦处讲给儿孙听，告诉他们不能忘本。如果她年轻二十岁，她还想学一学产科，当一名助产士哩。

她一提到“解放”这个词儿，大伙儿立刻振奋起来。仿佛这个词儿有大神通力，它仿佛是暗夜的灯光、严冬的太阳、绝望中的希望。大家脸上的愁苦为之一扫，立刻拨云雾见青天，转寒秋为阳春。原来“单轨制”进行的谈话，一下子变成多轨制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有一个老太太说：“从现在到共产主义，路还远着哩。没有指南针，一定会迷路。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指南针。”另一个老太太说：“从前我自杀过，现在我倒不想死哩。”又有一个老太太说：“解放前的日子过一天就够了，现在却是越过越想过。”一位四川口音的老太太站起来，兴奋地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来得不容易，谁要想捣乱，我们一定阶级斗争他！”她把“阶级斗争他”说了三遍。

在一刹那间，我有点呆了。难道这些人就是我平常看惯了的那些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领着孙子孙女出来游玩的老奶奶吗？我原来认为十分熟悉的人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然

而我是多么喜欢这些暂时间似乎是陌生的人啊！她们心里埋藏着对于旧社会的无比强烈的恨，宛如汪洋大海，深不可测。她们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决不允许他们复辟。同时，她们心里也埋藏着对于新社会的无比强烈的爱，也宛如汪洋大海，深不可测。她们用火热的心爱着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这是她们的命根子，决不允许人碰一碰。正因为她们恨旧社会，所以才更爱新社会。也可以说，正因为她们爱新社会，所以才更恨旧社会。这爱与恨都是达到顶点的、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这样人民的国家是伟大的。我感到振奋与骄傲。

通过她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我蓦地仿佛看到了她们的心。在我眼中，她们的心都变成了向日葵；每一颗心是一朵，我眼前就有上百朵向日葵；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向日葵，花朵特别大，颜色特别美，开得光彩焕发，兴会淋漓，在骀荡的东风中，怡然自得。我的眼睛透过了墙壁，看到了全国，我眼前就有六亿五千万朵向日葵。所有这一些向日葵都向着—轮巨大无比的太阳开放。这一轮太阳赤红如炽炭，威猛如火龙，辉辉煌煌，高悬在宇宙之中，吸引住了朵朵的葵花，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光芒直上三千大千世界。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

（选自《朗润集》，季羨林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大河与浪花

杨 沫

我回顾一生，如今已是一抹霞光照射着生命之流。我放眼望去，无边的原野绿色葱茏，绿得使人心醉。在这绿野上，一条大河在奔流。它时而汹涌澎湃，一泻千里；时而又流动迟缓，礁石嶙峋。它有时也混着泥沙，失去了闪闪的光泽。然而，它却不停地流着，流着，绕过不断出现的险滩、暗礁，奔腾不息地流着，一直流向无边的大海。

我眼中的绿野，是祖国广袤的大地。我眼中奔流的大河，是我们的党。而在那大河里时而泛起的小小水泡，那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之流附着于党的河流里，我要和党的长河一同流向大海。

我只要回顾自己的一生，一条光辉夺目的大河就会出现在我的心头。党在祖国的大地上已经奔流六十年了；而我这个小水泡——有时，也许会激起微微的浪花，也在党的河流里浮泛四十多年了。使我永远难忘的情感，是那寻觅、追求党的纯净而又狂热的情感。那是一九三三年初，正当北京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刻，正在失学失业寻找出路的我，得到革命朋友的启发、教育，又如饥似渴地读了些革命书籍，于

是，我热烈地追求、寻觅起党来！因为我有了新的信念：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可是，那时党在白区遭受到百分之百的破坏，我所认识的革命朋友不是不见了，就是被捕了。四顾茫茫，我到哪里去找党啊？然而，我还是要找！我不愿我的生命掷在毫无意义的个人衣食上；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理想使年轻的心燃起火样的激情。彼时我虽然没有入党，可我已经跃入党的河流，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随着她飘浮。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因为找不到党，我苦恼，我梦魂不安。意想不到竟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我走在街头，每当看见一个衣着朴素、面容严肃的人，我就伫足多看他（或她）几眼，心里带着渺茫的希望，猜想、企盼：“这个人也许是个共产党员吧？他要是，他要是能够介绍我入党，那该有多好啊！”真是想入非非！不相识的路人走远了，我还在怅惘地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叹息。

一九三六年冬，我终于参加了党。那幸福啊，怎么说呢？今天生活在党的身边的年轻人是不会想象得出的。你渴望已久的理想一旦实现时，它会给你一种梦寐般的感觉。带着这梦寐般的幸福感，我投身在抗日战争的硝烟烈火中，度过了漫长的艰苦岁月。而这岁月直到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充溢着幸福感。入党前后虽然热情横溢，但对党毕竟混杂着小知识分子美妙的幻想和主观的想象。党究竟伟大在何处？正确在哪里？她将如何领导人民打败敌人走向胜利？我是茫然的。只有当敌后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危险的阶段，在多少次被素不相识的农民群众，用他们的生命、鲜血从危急中挽救了我的生命后；只有当抗日战争的进程，一步步按照毛

主席《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预见，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我的思想、感情才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就是从革命的实践中，从切身的体会里，我才真正认识了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我才深切感受到我投身革命、拥向党的怀抱是何等有价值、有意义！假如没有党，我想象不出我会成了个什么人——作家嘛，连想也不敢想。更多的，我恐怕早在那旧社会的魔窟中沉沦了。……今天，我还在党的长河里冒着小小的浪花。这浪花使我的生命充实，心灵幸福，我禁不住欢快地呐喊，我也禁不住有些忧虑。

这是为什么？

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中，我又听见了风雨声，听见了波涛滚滚的呼啸声。我感到我们的党又面临着新的困难的课题——我们何时才能实现人民的意愿，建成一个既有高度精神文明、又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呢？“四人帮”留下的烂摊子，垃圾成堆，如何清除？党的优良传统遭到种种有形和无形的破坏，怎么恢复？人口多，底子薄，困难重，阻力大，而我们的任务又是这样的艰巨……想到这儿，我的心黯然而了。可是，不一会儿，我的眼前又出现了美丽的绿色原野，又出现了那条越过重重险阻奔泻不停的大河。不是么，万里长江还有三峡险滩，党的六十年有过多少危急、艰难的日子啊！她不是都一一渡过来了么？如今，在三中全会正确方针路线的指引下，尽管暗礁累累，尽管泥沙重重，然而，水流千遭归大海，一切阻拦时代前进的淤泥，终将被人民的巨浪冲毁、铲尽，大河总会闪着明亮的光辉滚滚向前。我——一个附着在明净河水里的小水泡，也将被带到浩瀚的大海。不仅如此。在晚霞中，我还望见了千千万万朵小浪

花正在后浪推前浪地欢跳在白茫茫的河水中。千层浪啊万朵花，你何等年轻！何等美丽！晚霞渐渐西沉了，早晨的太阳会把河水照得更加绚丽多姿。我笑了——因为我看见了那么多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也在党的大河里翻着浪花。

（选自《大河与浪花》，杨沫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党又跨上了战马

魏钢焰

八月二十日晚上，我正在秦岭山中的一座山城里，立路边，望着从那乌黑的山峦深处，浓浓的夜雾里，一列列欢庆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的游行队伍不断走来。在城郊的公路上，一排排身影在蒙蒙夜色中欢跃、疾走。时强时弱、此伏彼起的锣鼓声，不断叩敲着人们欢跳的心扉；一挂挂爆响的鞭炮，迸射出耀眼的火花。一列过去了，一列又走来，仿佛那深邃的秦岭山丛，孕藏着走不尽的千军万马。这，不就是又一次大进军么？又一回大会师么？又一个入城式么？

同志，你可记得一九四九年那些动人的入城式么？当我们看见战士们穿着整洁的军服，刚上脚的妇救会做的布鞋，带着崭新的美制枪炮，从面前雄赳赳喜扑扑走过的时候，可知道：那军服上曾渗透过多少汗水血渍么？那脚掌有多少血泡厚茧么？那飘飘的战旗穿过多少层烽火硝烟么？可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走来，如何走来的么？革命是怎样行进的么？我们的党是怎样战斗过来、又向哪里长征么？

从满头秋霜的老战士，到今天还戴着领巾的红小兵，哪一个没经过面临革命的欢乐，而并不深解其含意的懵懂时刻

呢？人们懂得党，知道革命，只是在自己经历了一次次风雨征途，一回回交手搏斗；为革命淌过如雨的汗水，鲜红的血滴，痛心的热泪以后，才懂得革命是如何走过来的，才懂得什么叫曲折征途和胜利的伟大，才懂得我们那面由毛主席以太阳的光辉、战斗的火焰所编织绘制，以无畏气概、革命胆略继续高举的红色党旗，有怎样的分量，怎样的威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党还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吹起嘹亮的大革命的号角，率领革命人民征战在疆场。当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朝革命的背上砍下了狠狠的一刀，以为扼死了党和革命而举杯狂欢的时候，我们的党从血泊中站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士的尸体，又投入了新的战斗。毛主席在井冈山点燃起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这星火，像不落的北斗、发光的红旗，穿透了漫漫黑夜，沉沉大地。几十年来，国内外的反动派，狂雪似地向这星火扑来；党内机会主义者，黑霜似地向星火压去。多少次啊，这熊熊烈火，暗弱了、又炽燃，分散了、又聚会，顽强不息地燃烧、燃烧……它，活跃在遵义城头的灼灼北斗、奔赴大渡索桥的飘飘火炬和草地上的绵绵篝火；它，闪耀在杨家岭的金色灯光、太行吕梁和五岭山丛战马铁掌溅起的火星中；它，隐伏在山区引路的艾绳头上和平原地道中的豆油灯花内；它，升腾于沙家店山沟拚刺的钢花、淮海战役的排排炮火和飞渡长江的信号弹光里。井冈星火，飞跃，扩展，狂舞，漫卷，把黑沉沉的中国映得通红，照彻从井冈到北京的漫长历程。

革命的画卷是壮丽辉煌的。然而，不正是在我们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在我们目睹身受了难忘的

一九七六年之后，才较深地懂得它么？

同志，你还记得去年九月那些个不眠之夜么？秋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我们搐成一团的心！夜很深了，只听见雨点敲击梧桐叶的急鼓似的声音。我在屋中无休止地来回踱着。在这万籁无声的时刻，我仿佛看见，一双双酸疼的眼睛大睁着，人们全心倾听着中南海的每个细小声响！我仿佛看见，多少个轻轻颤动的背影，默立在毛主席像前，凝望着那洞察一切的眼睛。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在人民心海中回荡：难道，由无数先烈和革命人民传递过来的党的红旗，要被阴谋家毁掉么？由毛主席点燃传播的燎原之火，会被“四人帮”的兽蹄踩灭么？今夜啊，每个革命战士、每个劳动人民从自己跟党战斗的不同经历，回念着党的阳光雨露，源远流长的革命江河，红旗飘飘的斗争画卷的时候，怎不从心底喊出：我们伟大的党啊，快率领我们决战！你一次次挽救了民族危亡和人民苦难的党啊！你一回回率领我们从绝地险境杀向胜利的党啊！在今夜，比任何时刻都清晰地立在我们身边，活在我们心中！在这雨弹光鞭的漆黑夜晚，我们胸中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半个多世纪党所走过的漫漫脚迹，重映出风旗云马、烽火连天的英雄历史；使我们坚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无比威力，相信这场生死决战的胜利！

历史作了回答：我们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

这么短暂的瞬间，这么险急的决战，这样辉煌的胜利！革命，又越过了腊子口！党中央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踏上了新的征途！今天是掀开新的历史篇章的十一大，明天是走向世界前列的二十一世纪，后天……将来……啊，

我们有着如何坚强的党！我们将有怎样壮丽的进军！多么辉煌的未来！

队伍，还在源源不绝地由秦岭山中吐出。人们，倾听着广播中的胜利公报。从公报里，我们又望见毛主席那慈祥抚爱的目光，又看到毛主席全歼顽敌时的坚决手势，又听见毛主席的雄浑声音所发布的新的进军令！党中央，又跨上了战马！革命，在策马前进！

1977年8月26日于太白

（选自《绿叶赞》，魏钢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洪波启示录

涂怀章

又是一年洪波涌起。

赭色激流和雪白浪头奔腾骤至，呼啸之声排山倒海。天似乎低了，江堤霎时变矮，树影一夜疏落。浮云形容憔悴行色匆匆，疾风搂住劲草喘息着站不稳身子，江鸥躲进远空的苍茫。闪电轰然落水，溅得漫天透湿。沉静的大地上引起无可回避的震颤。

此刻——只有经受浪涛撞击的此时此刻，我才备感脚下巨岩的坚实。平日身在大山竟没能觉察高峻雄伟，关键时方体验出峰峦触天气度非凡。

独立江畔，胸中波澜壮阔。

你啊，祖国第一大江，世界第三长河。一部万古闪亮的神圣经典，一卷饱载沧桑的庄严史书。

自小偎依你有力的岸，听你知识的启蒙学你朝诵夕读。时常扑进你宽阔的胸怀领略沸沸扬扬的真挚热烈，感受浩浩荡荡的丰富深沉。你洗去我的幼稚与慵惰，引我走过无数的坎坷。近半个世纪了，虽不能说完全读懂了你，但我敢向世人保证：读你是人生巨大的幸福。

大江啊，每当尘世上空风起云涌，每当茫茫人海发出紧急询问，每当智慧与汗水感到疲惫，我总要把你的雄浑浩瀚呼唤到面前。

万古雪原。僵硬刺骨的苍白笼罩着，垒筑着。鬼斧神工的险峻增高着，加固着。摧毁一切的凛冽昼夜布防、巡逡，寒冷和巨石凝为无限的沉寂与重压。然而，终于未能封锁住你晶莹的生命奔腾而出，一泻万里。好气魄哟，这就是你的开篇。

日月星电光热声色，一齐被你汇成澎湃的力量，自扉页流向情节的大曲大折。拍岸穿空荡泥淘沙劈关夺隘，由细浪涌向骇浪直奔高潮，从小霹雳趋于大霹雳化为落地惊雷。何等磅礴何等雄奇何等轰动！然而，这一切之中若不升起人的歌声，不等于存在。大自然因有人而彩色缤纷，江河水因有人而蔚为壮观。

或许是人类仿效洪波的汇合，或许是大江对人类心智的启迪，另一条平行的长河在生命竞争中形成。一个人一滴水，千万人聚成流。起伏，跌宕，旋转，翻腾，交汇，分散，拼搏，相持，抗衡……于是，有主流，支流，顺流，逆流，湍流，缓流，旋流……有的滋花润果、推舟扬帆，有的夺地索命、酿灾播祸。世有杰出者能使洪波汇纳人间善意造福天地，化为力量化为果实化为光明奔向壮丽的前景，即谓伟人。

二十五年前洪波涌起的时候，我曾亲眼望见一位伟人，观赏到人潮与江潮汇合奔涌的旷古奇景。他先是伫立在一艘快艇上，白衬衣带给江上大片晴朗的天空。当他的笑容如旭日灿烂于人们的视野，当他发出“人民万岁”的春风般的问

候，万头攒动于欢乐的浪花和红旗掩映之中向他拥去。人民是最衷情的，一句“万岁”即以万句相谢。

大江在伟岸的身影下流淌。倏忽化作十九世纪末叶的湘江。我望见乌云笼罩着郁苦，成群纤夫弓背拖着枯柴般的身影发出“嘎吱吱”的断裂声，黄沙扬起血泪浸透的号子：“百姓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穷人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身后的破船颠簸摇晃几欲倾覆——这就是当时中华民族命运的写照。“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越过两岸房屋的破烂向远望去，仍是房屋的破烂；越过纤夫憔悴的脸色向远望去，还是憔悴的脸色。富饶的河山躺在封建王朝和列强的脚底呻吟，勤劳的炎黄后代在死亡线上挣扎、反抗，但一次次倒在血红的失望里。一位老纤夫悲叹：“何时出了真龙天子，这苦日子就有尽头了！”一个年轻纤夫愤愤然：“什么真龙天子？古话是骗人的！只要有才智出众的人领头，我们就有出头之日！”人民，多么需要领路的伟人啊！

他来了，从湘江的支流涟水之滨，从形同长剑直刺云天的韶峰之下。魁伟的身材，蓄着长发，面如满月，目光灼灼。他投身工友、农友和学友的洪流。投身浦江、南湖的涌浪。索性脱掉长袍换上短衫腰束皮带肩扛雨伞奔向井冈山的人潮。

充满激变的历史，常常造就一代伟人；而一位伟人的作为，又往往推动一个伟大时代的出现。历史已经镌刻了这样的奇迹：当他头戴八角帽，身着灰布军装登上遵义城楼，中国历史的洪流开始真正被认识被驾驭住了。如椽大笔从娄山关落墨，然后疾书于赤水、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之间直至

很远很远。后来他画了个漂亮的句号，除东南角几个小海岛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尽在其中。于是，世界历史上增加了极其光辉的一章。他顺应、推动中国劳苦大众心上的恨潮，逼退了阻挡民主自由的逆流，以真诚的奉献换来了今日的爱潮。长江是自然的大河，人民是历史的长江。历史的潮流总是由爱潮和恨潮合成的，历史就在爱与恨的合力线上前进，时快时慢，时悲时壮。他脱下庄严，现出全身心的赤诚跃入洪波。他也是大江里一朵浪花，与无边的波涛共同向前。

那年他七十三岁。如此高龄却毅然顶风入浪，怎不引起我蓬勃邈远的思索！他向世界昭示某种性格，给予后代一种精神。作为常人，他青年时代就吟咏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作为伟人，老了还在吟哦“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不惧怕风浪，却格外重视风浪。他膂力过人，却极佩服民众之力。他认识到一切离不开人民，便真诚地把自己交给人民，与大江共奔腾。何等可贵的心态！茫茫人心是历史的河床，河中洪波晶晶莹莹与浑浑浊浊一齐滔滔滚滚。常人从洪波里看到风险，庸人从洪波里看到混乱，伟人从洪波里看到力量，看到情感的炽热和理性的秩序。他的思想总是在洪波中和谐地奔涌。迈步，他是长河出色的浪；立定，他是河畔嵯峨的山。

他曾被拥至神话中的地位，人们以心目中最崇高的词语为他祝福。当他穿上那件洁白底色流溢深蓝条纹的泳衣融进蔚蓝的天空以后，大江之上始终滚动着深切的怀念，回荡着他伟大功绩的赞歌。但他不是神，不是完人，不是万能者，自然免不了也有过错。一位与他在延安住过隔壁窑洞后

来于共和国政府大厦接受过部长任命书的老战士，多年以后与我偶然相识并成了“忘年交”，于江上结伴航行时讨论过这一问题。老人曾经受过他那管“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巨笔的委屈，被放逐到松花江畔一座小型工厂当“公仆”，茹饮了他所给的二十几年的惊悸和怅惘。然而这位老战士说：他毕竟是伟人。他对祖国和人民是真诚的，他的智慧是超群的。他一生的情感主要代表了民族心理，而中华民族的心理活动就是中国历史的洪流。伟人也是人，功勋磨不灭，过失藏不住，允许后人评说实属正常，只有那些彼一时受观念局限、此一时按某种功利需要持极端之说者，才真正荒唐。作为战友或后辈，我们是不是能理解任何一段历史进程的复杂与艰难？多数人在潮中甚至潮外，而伟人在潮头。弄潮是惊险的，跟潮是不难的，观潮则是轻松的。在历史舞台，主演是紧张的，配角是谨慎的，而观众却是闲散的。撰写历史异常艰辛，评点历史总是便当一些。假如我们有过多的时间耿耿于指责大江上前人留下的某段弯曲，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着手改直它？历史永不十全十美，更非永恒不变。置身中国河畔放眼世界洪波，我们每个人是否也该想想自己：你为生你养你的民族做了什么？诚然，你还不是伟人。你既然有那么多要求于伟人，那么也来做些实事吧。伟人总是由常人造就的啊！

老战士一席话，使我的灵魂在汹涌的波涛中颤动。他抛弃了个人的恩恩怨怨来看伟人，看自己，看当代人。他显然觉得人不能太狭隘太自私，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不能不要民族这个角度。

我曾经在长江边一个弯曲处见到两个漂亮的青年，他们

于风和日丽之时在布满裂缝的江滩散步。一个婷婷少女，一个潇洒儿男。他们在“江畔的伊甸园”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搂搂抱抱，甚至滚地嬉戏。他俩是在防护林中迷了路向我打探方向时我们才开始对话的。得知这是两名学文学的大学生之后，我的兴致浓得如饮醇醪。

秋天的大江，两岸高崖，满眼红叶，一江静谧。那个小伙子，身如灼灼朝阳里的棕榈，可他说他像眼前的秋江，平平静静自自由由过日子，不留痕迹不起浪花。那个宛如溶溶夜月下的梨花般的少女，对我大谈萨特、弗洛伊德和庄子，谈“自我、本我、超我”，“存在主义”，“自我实现”。她计划毕业以后专写那种纯粹反映自我情绪的作品。倘不成功，就去做生意。他们相信知识可以使自己活得洒脱、痛快，可以从人家的口袋里把钞票赚出来重新分配。他们还要自由自在地狂爱……看得出，观念够“新潮”的，也颇有才华。

可是不知为什么，凝望缓缓的江流，听着这对年轻人谈个人的憧憬，我心里忽觉怅然。朝霞一般美丽的青年朋友，你们的梦就如此简略吗？该允许你们追求个人的甜醉，允许你们“实现自我”并有自己的解释。可你们真像眼前的大江么？江流即使表面毫无浪花，底下并非没有大的追求。你们想过我们的民族、国家怎样“实现自我”吗？

没料到这几句话竟在他俩心中激起了波澜。他们说，一家一室的幸福毕竟是有限的，只考虑个人甚至是卑下的。他们何尝没有满腔热血？何尝不想为祖国做出些辉煌事情？可话中的浪头立刻泡沫般破灭。他们抱怨现实河道中雾气绰绰，礁石太多，他们不是伟人，没有力量改变。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位伟人说过这样的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

光明的？他们颌首。但又说，从总的规律上看是这样，可是，人生几何？若一辈子活在曲折里，奈何？我沉默了许久。这话的字面不尽无理，不尽有理。曲折和光明其实是相对应永存的。人类不可能改直世上所有的江河，而消除某一段的弯曲是完全可以的。

大江奔流，洪波时有。速度愈快可能浪头愈高。请不要为河道弯曲而气馁，亦不必为浪花澎湃而惊惶。人心激跳，众口议论，是生存度、自由度加高的吉兆。真正的伟人在洪波涌起的时候，是清醒的，也是沉静的；是热情的，也是睿智的。当今中国，有英雄豪杰致力改革，虽然他们面临前所未见的弯曲。有志士仁人正在调整心态和世态，不调整我们的民族无望。有青年听从当代伟人的召唤，仿效历代伟人认识历史、驾驭历史，从自己做起，从周围做起。这些人，只要他们献给时代的是心灵而不是意图，是真诚而不是欲望，他们之中或许会有新的伟人诞生。自然，他们必须有勇气经受持久的浪击潮颠。面对历史的洪波必须能疏能导。必须将茫茫浪花引向麦穗，引向蔬菜，引向甜果，引向丽日蓝天，引向良辰美景。疏导之后是什么？必是一位哲人所说的：健康、美丽、力量、富庶。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悲观和气馁是倒退，而热忱与奋斗即是进步。看漫江洪波，不正是为新的伟人铺开了书写新历史的长卷吗？

滔滔大江，滚滚洪波，流走多少日日夜夜，流走多少风云人物。但是，流不完时代前进的动力，流不完人类永恒的追求，流不完强烈饱满的浩然之气。每当略感疲倦之时，每当稍觉步履沉重之时，我便来到你的面前。我极目四望，立刻心旷神怡，任万种情思在风浪里畅游。我觉得自己的胸襟

立时扩张、拓宽，与广漠无边的宇宙同样壮阔。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和波涛一样气势磅礴，整个生命平添自强不息的巨大力量。我听见隆隆的涛声忽而在水面高歌，忽而在大地上哧笑。忽而像是对我说：

河床是永恒的，而洪波却常新。

让每个浪头弹响你心中的昂扬吧！……

1991年1月9日于扬子江畔

（选自《山东文学》1991年4月号）

启 明 星

杜 宣

每当曙色苍茫的时候，在一钩残月旁边，有一颗明亮的星星，她就是启明星，又叫做晓星，参星。人们看到她的时候，意味着黑夜即将过去，黎明已经到来。

启明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阳光和温暖。

在我的记忆中，更有像启明星一样的、永放光芒的星星，指引着我们前进。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我的童年时，是在江西南部的永丰县度过的。这是群山环抱中的小县，盛产稻谷和茶油。有一条叫做恩江的流沙河，涨水的季节可以通航载重八百担稻谷的木船。全县的农产品就靠这条河道运出去，然后换回一些工业品。县城坐落在恩江的北岸。一座红砂石砌成的人字形拱桥，横跨在江上，沟通南北交通。和其它各县一样，文庙是少不了的。永丰县的文庙建筑在县城外的西边恩江北岸上，这是全县最辉煌的建筑。当年这一带比较荒凉，附近人烟稀落。文庙斜对面的江心中，有个叫做龙蟠洲的，这是千百年来沙碛的岛屿，上面渺无人迹，长满了密集的大毛竹，是羽毛十分洁白、十分美丽的一种水鸟栖息之所。

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冬天，我当时是十一岁。以在吉安师范上学的宋大勋为首的几个青年，从吉安回来度寒假。宋大勋住处离我很近，他和他的寡母住在张王庙旁边一所十分败旧的小房子里。他的母亲靠着替人洗衣服和插爆竹引线，度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一个阴霾的寒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分，宋大勋来找我，说带我出去玩玩。过去他常带我去县立小学，到了学校后，他向体育老师借一个大足球给我在操场上玩，他则去和老师们谈天。这天，他却带我走了另外一条路。我跟着他走完了城外那条用鹅卵石砌成的窄小的街道。一过状元楼，就是没有修过的道路。沿着恩江堤岸，走到文庙前竖立着刻有“文武官员到此驻轿下马”字样的石碑时，他对我说：“今天带你到文庙里面去看看。”我跟着从侧门走进，绕过月池，看到一排雕着盘龙的大红砂石的柱子和褪了色的五扇朱红大门，给了我十分巍峨庄严的印象。由于无人管理，阶沿以外全长满了枯黄的杂草；又由于年久失修，殿墙斑剥，门窗残缺，再加上暮色朦胧，寒风飒飒，使我产生了一种阴森落寞的感觉。

宋大勋没有带我参观文庙，只是从大殿穿过，由围墙中的一扇门，走进另一排较矮的房子。他告诉我这叫做“考棚”，十多年前，当清朝皇帝还没被推翻的时候，县里的秀才就在这里考试的。我们走进大约是最后一间房子，门口贴了一张用纸新写的“恩江学会”的牌子。室内吊了一盏煤油灯，放了两三张条桌和几条板凳。靠墙放了一个书架，上面放了极少的书和杂志。室内有两三个人在等着宋大勋。他们谈些什么已无记忆。我对他们的谈话，也完全没有兴趣。在这个房间外，已一片黑黝黝地，使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

不敢出去看看，房间内又没有其它什么东西，只有到书架上翻翻书。上面放的是些什么书，也已毫无印象，只记得有一本《马克思主义 ABC》吸引了我的注意，因当时我刚刚开始学英语，看到有 ABC 三个字，我就拿起来看了。当然我还不懂 ABC 三个字用在这儿的涵义。封面上有张长头发大胡子外国老头子的相片，当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线装书，对于“洋装书”有新鲜感。这个外国老头子的照片，又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除了天主堂的一个外国神父外，我没有见过其他外国人。这本书内容我当然看不懂，只知道这个老头子叫做马克思。

这以后，我常和宋大勋去“恩江学会”，也去过“龙蟠洲”。照例地他和人谈论一些问题。他总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我则由着自己的性子随便玩。有一次我问他：“你们究竟是谈些什么啊？”他摸着我的头发说，你还小，长大了就会知道的。我从宋大勋那里，陆续认识了袁振亚、薛佐唐、帅开甲等同志。后来他们也成为了我的师友。

寒假过后，他们又到吉安去了。宋大勋不久就到南京、上海、杭州一带旅行，当时的师范学生毕业前照例有一次公费旅行。回来后他还送了一些纪念品给我们。我现在已回忆不起他毕业回乡后，什么时候又到外地去的。不久忽然听到他在新淦附近被反动派暗杀的消息。噩耗传来，他的老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伤痛欲绝。在我幼稚的心灵上，也像尖刀一样刻记了难以磨灭的哀痛。

由于年岁的增长和革命斗争的教育，童年时这些生活，在我记忆里逐渐清晰了起来。宋大勋烈士是永丰县的早期共产党员，他一手筹办的“恩江学会”，是永丰县最早的宣传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半公开的组织。他当时是吉安师范学校的学生，利用假期回到县里，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恩江学会”，将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起来，成为永丰县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

宋大勋烈士牺牲后，我就没有再去过“恩江学会”。似乎这个学会，也停止了活动。但我时常看到帅开甲。他的左脚拐了，走路比较困难，不能去吉安上师范学校，便在上西坊我的同学家里教几个学生，以维持生活。一边教书，一边刻苦自学。他看的书极多，学识渊博，当时大家都叫他“翰林公”。他的字写得好，常常为一些财主写寿屏，得一点报酬。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帅开甲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章江门外。“记取章江门外血，它年化作杜鹃红”，就是他在就义前留下的壮烈诗句。

大革命失败后，我就离开了永丰县，不久又离开了江西。由于白色恐怖和关山阻隔，情况就完全不了解了。全国解放后，才知道袁振亚、薛佐唐等同志均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先后牺牲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恩江可能更加淤塞，龙蟠洲可能已经和陆地接连了起来。经过无数次的兵燹，永丰县的文庙和“恩江学会”的旧址，可能已经湮没了。但“恩江学会”的创始人宋大勋烈士和帅开甲、袁振亚、薛佐唐等烈士的理想和遗愿，已经在我们祖国大地上，逐步实现了。

在我的故乡，夏天的夜里，人们倚坐在竹椅中，在门前空场上纳凉的时候，常常会仰视星空，老年人这时候就会指着银河系的灿烂星辰，对孩子们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星，每个人都有一颗星啊！”当孩子们天真地争着

问“我是哪颗星啊？”老年人就很茫然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每当我想起中国革命的一些先驱者的时候，我就常常用启明星来比喻他们。不正是她，从茫茫黑夜的尽头，用她明丽的光辉将人们引向天明的吗？

（选自《杜宣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梦绕南湖

童嘉通

南湖的梦，早就萦绕在心头了。那是 25 年前的我站在镰刀斧头旗帜下举起手臂的时候。

在我的梦中，碧绿的南湖是只摇篮，那条平常而不平凡的船，就是躺在摇篮中的婴儿：在我的梦中，那条船就是摇篮，摇出满天星斗……

南湖乃江南游览胜地之一，它与南北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此次去嘉兴，瞻仰南湖，正是多年的夙愿。那天，初夏的雨正下个不停，我们一行却毫不犹豫按原计划冒雨前往，为的是找寻那一个闪光的坐标点！

哦！雨中的南湖，水天□□，湖上挂起珠帘、腾起烟雾。讲解员说我们运气真好，遇上了这样一个游南湖的好天气。此刻的烟雨楼，恰似一幅中国画挂在一片迷□之中。还是游艇最了解我们心意，像支箭径直朝画舫飞去。

那条使我朝思暮念的船、那深深印在我记忆中的一片火红已在眼前。

画舫为单夹弄丝网游船，长 16 米，宽 3 米，前舱搭盖弓篷，中舱为客舱，顶上有汽楼，夜来高悬罩灯。许是被我

们冒雨瞻仰而感动，工作人员破例邀我们进入中舱。舱内置一八仙桌，六椅、四凳和两张茶几；房舱安放一藤榻；后舱则是厨台、灶房。当年，中舱里的那张红木八仙桌，供开会，供用餐，一听得李达原夫人王会悟在船头哼起嘉兴小调，并用折扇敲打舱门时，八仙桌上便响起搓洗麻将牌的声音。

“12名代表、代表全国57名共产党员的‘一大’在这里胜利闭幕”，话音刚落，讲解员察觉到我们似有疑问，她又接着说：“应该是13名，那一名是广东代表陈公博，上海会议后他害怕了，携着新婚的妻子到杭州西湖度蜜月去了。”

此刻，我猜度着这12颗星座的位置，更想听到年轻的毛泽东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发言；然而，风雨七十年，除王会悟老人健在外，其他都成了历史。但是，中国人最珍惜历史的记忆、最懂得思辩的人生，那句名言应改作：子在川上曰，逝者并不如斯！

回到岸上，我们还发现在这条画舫的后面系着一条小篷船。讲解员告诉我们，那是供船娘进城打酒买菜用的。

雨中，我们告别了南湖。那天晚上在南湖饭店的床上，我做了一个南湖的梦：一只红船，穿过风风雨雨，从遥远的地方驶来，船头高扬，充满着坚定、自信……

（选自1991年7月1日《光明日报》）

临江楼记

何 为

闽西上杭县浮桥门东边的临江楼，是一座革命的小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生住过的旧居何止千百处，这不过是其中的一处，而且时间只有二十天左右。但是，对每一个衷心景仰的来访者，临江楼却是不同寻常的革命楼。它令人神思飞越，引起了多少人的深切思念！许多人都这样猜测：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间写下的《采桑子·重阳》，就是在这江天万里秋风劲吹的临江楼头构思成篇的。

临江楼原是一家名为“广福隆”纸栈的旧址，后设为酒店而改名。厚实的木门内，一个小小的庭院，迎面一座三层楼的珠灰色楼房。楼的底层和二层走廊前，上下各有石砌藻饰的三个拱形廊檐，远远望去，宛如六个巨大的永不凋落的花环嵌在屋前。楼外近处，一棵威严的百年老榕树，顶着擎天的华盖，昂然挺立，遥相对望。大榕树盘根错节伸出来的根茎，比一般的小树还粗壮。青枝绿叶，俯临江水。这条江就是毛主席著名诗句“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中提到的汀江。如同一条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不由使人回溯到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汀江两岸，老红军们，赤卫队员们，少先

队员和儿童团员们，用梭标和红樱枪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血雨腥风中被断送了。是毛主席挽救了革命，在井冈山披荆斩棘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毛主席又率领红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纵横千百里，播下了一片又一片革命的火种：发动土地革命，展开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星星之火”燃遍了汀江两岸！然而时隔不久，红四军受到了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离开了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领导，给中国革命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力挽狂澜，同错误路线作斗争，还坚持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仅到上杭一地就不下十次。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毛主席又一次来到这里，就住在临江楼二楼一间明朗的前厢房内，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主席得了病，由几个赤卫队员护送，进入解放了的小山城。其时，临江楼外暮色渐浓，秋意很深了。毛主席与同来的赤卫队员们一个个握手，感谢他们一路上的细心照顾，热情挽留大家在城里留宿一宵。老乡们却婉言辞谢，怎么也留不住，一问，才知道他们要连夜赶着上路，回家去过重阳节！

据老红军回忆，那时临江楼的楼上楼下，确实种了很多菊花，连小小庭院里都种满了黄菊。霜晨，站在三层楼上，四顾江天空阔，汀江岸边盛开的菊花，经了一夜寒霜，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深深浅浅的黄色，黄灿灿如同遍地耀眼的碎金。就在前不久，红四军和地方武装力量解放上杭县城，战场上硝烟未尽，万里霜天下，战地黄花显得更为娇艳夺目了。在老红军炽热的记忆中，在他们心往神驰指指点点

的手势里，将近五十年前一页革命历史的图景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在经历了那些心碎的追思和悲怆的哀悼日子以后，我第一次来到毛主席早年居住过的临江楼头。讲解员低声说，贴着前边走廊，楼上的这间向阳卧室里，外面那间没有天窗的明净楼厅里，毛主席带病日夜操劳，为了拨正中国革命的航向，和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耐心帮助，毛主席时常工作到深夜。到临江楼来的人也是日夜不断。向毛主席汇报过工作的一个老红军记得，那天他下了楼梯，回首仰望，毛主席身穿朴素的灰布长衫，脚穿黑布鞋，面容清癯，亲切地安详地笑着。他高高的身材，站在楼台上挥手的姿势，永久闪现在老红军心里，正如毛主席每一句令人鼓舞的亲切教导，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一样。

第二次重登临江楼，只不过隔了几天。这一天，门前挂着“上杭县革命纪念馆”的临江楼是一个学习日。可是今天却又不同于平常的学习日，人人脸上都浮现着难以抑制的喜悦。留下过毛主席足迹的临江楼啊，我又来了！登上楼屋最高处，在空旷的平台上临风而立，红军时代遗留的山城旧址，屋瓦接堞，尽收眼底。

一阵秋风把我从往昔的斗争岁月中拉回来。仅仅几天以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纪念楼时，心头还凝结着重重愁云。然而这一回，层层乌云过去了，晴朗的秋空更高更明净了。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亿万群众用最强烈的声音，最激越的语言，千百遍欢呼人民自己的胜利，欢呼光明的中国的胜利！在这胜利的十月里，我在临江楼上极目远眺，只见与当年毛主席率领的红军血肉相连的

汀江秋水，浩渺旷远，流向天际，更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光艳的秋阳下，阵阵秋风吹着我灼热的脸，连同我的燃烧的心。“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时，只有在这时，我似乎对这博大精深的词句稍稍懂得多了一些。人生有尽，宇宙无穷，红心永在！中国是有希望的。人类是充满希望的。迎接灿烂辉煌的明天吧，胜利一定属于战斗的无产者！

离开上杭县前，第三次到临江楼，恰是一九七六年的重阳节。连日以来，北京的捷报频传，整个山城都沸腾了。欢庆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男女老少倾城而出。从爆竹的脆响中，从礼花的纷飞中，从锣鼓的节奏中，从起伏似海涛的口号声中，从纵情欢笑而又热泪盈眶的人群中，从举国上下的一片欢腾中，宣告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纪元！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经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摧枯拉朽，要扫尽一切妖魔鬼怪。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灿烂春天。人人只感到春意盎然，有如置身于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里。而对那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历史无情，人民对他们将予以最严厉的审判！

我从临江楼走向深深扎根在汀江水边的老榕树下，凝望着绿阴低垂的水面。这棵生机旺盛的大树，数十年来守望着临江楼，在这个金黄色的秋天，更显得容光焕发，青春长在。秋风吹过，满树繁枝密叶飒飒作响，似乎连这棵大树顿时也感到振奋起来，一遍又一遍随风传播那高亢激越的诗篇……

（选自《难忘的记忆》，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9 年版）

谒雨花台

紫 风

这是几颗小小的雨花石，我常常把它们捧在手掌上端详：一颗是暗红而带褐色的，一颗是乳白色而略具裂痕的，另一颗则是泥黄色的，如果浸在水里，又各各现出隐约的斑纹。虽然，它们没有钻石的光亮，珍珠的圆润，水晶的透明，但是有着比这一切更加吸引我的东西。

我端详着它，往往忘记了时光的飞逝，想得很远很远。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曾在香港一间半山上的学校教书。那时候，正临近“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日子，敌人越接近死亡，便变得越疯狂。在从上海、南京溃退的前夕，到处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但是，革命的熊熊大火是扑不灭的，革命的人民前仆后继，越战越勇。有一天，一位来自烽烟中江南的朋友，带来了这几颗浸染过革命烈士鲜血的雨花石……

解放后，我揣着这一撮石子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每次端详着它的时候，就好像端详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秘密：有时感到它渐渐的变高了，变大了，变成了一座座高插云天的纪念碑；有时又觉得它变深了，变长了，变成一道道波涛翻滚

的历史激流。而在一些节日大典里，我更浮想联翩，仿佛看到无数纪念碑前繁花披覆，汹涌澎湃的激流上洒满霞光……

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来到莺飞草长的江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进谒雨花台、瞻仰烈士的丰碑，献上一片心灵的花瓣。

两年前的秋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这是一个风雨的早晨，我披着凉风，穿过雨雾，踏着泥泞，来到了这个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杀人的刑场、革命烈士献身的场地、光明和黑暗的分界岭、革命和反革命搏斗的最前沿。当我通过葱茏的花木和两旁森森的松柏，踏上一级级庄严的石阶，远远望见那巍峨矗立的纪念碑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感情的奔腾了。

雨花台在南京市南面，地势较高，登上这里，可以俯瞰全城，也可以遥望滚滚大江东去。据说，古代这里曾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名胜区，吸引过不少游客。相传梁武帝时，有一位高僧在此讲经，讲得天花乱坠如雨，因此得名。自然，这是不足深究的神话了。不过，雨花台的风光，特别是那彩色斑斓，传说为天花化成的雨花石，确曾给人带来过深远的意境。

但是，自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来，这一带就成为他们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刑场。这里的刑场还一再扩充，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敌人在北刑场行凶，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又扩展到东刑场屠杀，西刑场则埋葬下无数死难者的遗体。漠漠荒原，愁愁惨惨，弥漫着腥风血雨。在那漫漫长夜，魑魅起舞的二十二年间，估计牺牲在这里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及各界爱国人士达二十万人以上。

革命烈士的热血渗透了雨花台的每一寸土地，染红了每一颗雨花石。当时，草木含悲，山川怀愤，仇恨燃烧着大地，志士临刑前的高歌怒号，有如雷霆霹雳在夜空轰鸣……

今天，我们踏进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仰视着墙上一幅幅烈士的遗像，迎着他们深邃而坚定的眼光，仿佛感到一颗颗滚烫的红心仍然在剧烈跳动，四周仍然回荡着他们的慷慨歌声。在这里，看到他们挺胸抵住敌人刺刀、昂头朝着敌人枪口的不屈雄姿；看到他们把法庭变成讲台，愤怒控诉反动派罪恶的激昂神态；还看到他们从容题下绝命诗，泰然走向断头台的崇高身影……尽管在他们的旁边，是一座座阴森恐怖、层层电网缠绕的囚室，无数染血的刑具和罪恶的子弹，但他们对这一切是如此轻蔑，甚至唇边还浮上冷笑的影子。

在这里，激动人心的故事和不朽的诗篇，正在世代流传，不断发出奇光异彩：

一位早岁跟随毛主席参加革命的同志，一九三三年因叛徒出卖被捕，解到南京，受尽毒刑，遍体鳞伤，仍然坚贞不屈。最后，敌人派一个叛徒来劝降。这位同志怒不可遏，拿起一个饭钵子掷过去，把叛徒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英勇就义于雨花台。

一位志士在临刑前的一刻，敌人还对他作最后一次的劝降，那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了。他巍然屹立山坡，手指长江北岸，面对汹涌澎湃的波涛和远远传来我军的炮响，用雷鸣一样的声音对敌人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人民的英烈，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怀着日月般光辉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透过阴森的高墙、铁闸、密布的电网，已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辉，听到百万雄师大炮的轰

鸣。

一位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被捕，在黑狱中被囚禁四年之久，击退敌人无数次威迫利诱的女战士，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临刑前一刻，对敌人作出这样的嘲笑：“你们关了我四年，花了不少心机，什么也没有得到，可见你们是失败了。我虽然手无寸铁，但是凭了真理，凭了我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的教育，粉碎了你们一切阴谋诡计，可见我是胜利了……”

这一位二十八岁的女共产党员，是这样怀着胜利的豪情献身的。对于她来说，为革命而死，就是生命最光荣的凯旋。

人们含着泪，从她的遗像前缓缓走过，读着她烈火般的遗言，和凝视着一件件留下她的手泽的遗物。她没有白白度过四年的铁窗生活。在狱中，她苦心地把铜元磨成心形的铜片，在上面刻下“永是勇士”的字样。她把铜元磨成五角星，涂上殷红的颜色，寄托深沉的思念。她在枕套上绣上“起来！”“为真理而斗争！”的英文字样，还精工绣上一只展翅重霄的大雁，向往着自由美好的世界，并为难友朗诵自己创作的《雁之歌》。四年，一千四百多个白天和黑夜，她不停地战斗着，而且始终是一个胜利者。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人会死亡，而只是觉得她永远高高举着火红的战旗，走在我们的前面。

这里，有十七岁便把彩虹般的青春献给祖国大地的少女，有经过千锤百炼、熟谙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老革命家。他们在“未进来之前，倒想到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进来了，倒从未想到会出去”。他们告诉后人：“播下的麦子，没有霜雪不会有丰收，播下的革命种子，没有流血的革命斗争，便不

会有成功。”他们高吟着“哪有斩不除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的诗篇，直至最后一刻。不，这不是最后的一刻，而是无尽的千秋万代。

烈士们一串串闪光的遗言，像一支支号角，一声声战鼓，永远响在我们的耳边。

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英名，因为我知道这里留下名字的毕竟还是少数，更多是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中有我们认识的，但更多是素昧平生的人。正是这千千万万我们不认识，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人，喷洒热血灌溉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创建了光披万代的共产主义大厦，而我们就生活在他们的荫护之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人民的英雄，英雄的人民。他们的丰碑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树在亿万人民的心坎中。

在归途中，我低低弯下腰来，拾起几颗雨花石。我觉得它比钻石还要光亮，比珍珠还要圆润，比水晶还要透明，因为它染上过世界上最崇高、最殷红的烈士血液，致使一切人间珍宝为之失色。

写于 1978 年

（选自《樱桃和茉莉》，紫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延河灯火 ——献给七月

罗夫生

1. 延安，一个窑洞的小油灯，幻化出人民共和国的灯火辉煌！

这光辉，照亮了共和国家家户户的每一根窗棂，也照亮了我年轻的眼睛……

2. 这一燃烧，如疆场的战火硝烟，半个世纪里，将黑暗烧尽，出落得一个水灵灵的东方的红太阳！

于是，爆发灯花，以一个燃烧的希冀，烧结成少男少女的花期……

于是，走过寒夜，走出黑暗，跨过陷阱，穿越迷雾，战胜阴霾……

3. 延河灯火，以阳光的色彩，以升起的长虹，进入新世纪！

小油灯，与领袖娓娓交谈共产党人的真诚心灵；在诉说，探索不尽的人生！诉说，痛苦的血，诉说，辛酸的泪……

因了延河指引，因了这延安窑洞的小油灯，便在七月流

火的日子，诞生了一个辉煌的共和国。

4. 照耀这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是延安窑洞的小油灯！这圣洁的新世纪之光，一个活着的伟人的心脏，一个南巡的讲话，改革与开放的主题，便驱除贫穷，驱除黑暗，驱除阴霾，驱除愚昧，驱除心灵的创伤……

5. 啊，延安窑洞小油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是希望的“恒星”！孕育人类最高智慧的同时又包容中国哲学的最高意境，永恒地横亘在延河上！

（选自《散文百家》，1994 年 7 月号）

广场一片情

吕锦华

一九八七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第一个休息日便去天安门广场。

从挤得冒汗的车厢里出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啊，广场真大！

向往了多少年。我一步一步在铺满方砖的场地上慢慢走着。耳边，忽然飘过无数的声音。这里曾经是明清王朝森严壁垒的禁地。死一般的沉寂死一般的涩重；没有笑声没有鸟声；生命蜕变成空空的躯体游荡的幽灵。这里狂风扫荡过它大火烧灼过它异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过它；当然，无数志士的热血亦染红过它。这里有屈辱蹂躏辛酸悲怆；这里更有奋争呐喊反抗自强。也是这里，一个受尽凌辱的苦难民族向全世界宣告站起来了，那欢闹的情景那隆隆的礼炮，至今在几代人心中回荡。这里的每一块方砖都承受过痛苦磨难欢乐幸福；这里的每一块方砖，都是一页会说话的历史。我，可是要读懂它字里行间蕴含的每一层涵义，或铿锵或委婉或凄凉或悲壮？

广场上游人如织。人虽多，却没有大声的喧哗。从不同

的穿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肤色上可以品味到海南岛的一缕椰林绿韵兴安岭的一片雪海风光天山牧场的一份宁静秀丽江南古镇的一抹端庄典雅；我真想说，哦，广场，你可囊括了天下之富呐！

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挺立在广场中央。须仰视才是。碑无声，人有情。在纪念碑前留影的人穿流不息。记得那天最让人忘不了的是位身穿黑布衣衫、裤腿用细麻绳扎紧了的高瘦老人。老人满面清泪站在碑下。陪同的伢子取出一块手帕让老人揩去泪水，老人竟越揩越多，急坏了等在一旁的摄影师。记得那天，目送老人远去的身影我竟也激动得不能自主。老人为啥非要在纪念碑下留影？他为啥把纪念碑看得如此神圣？无疑老人来自老区。也许，为共和国的诞生曾经献出了儿子。我忽然想起大西北祁连山麓一个荒凉寂寞的古战场。野草瑟瑟的山坡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坟头。这里长眠着一支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军连队。由于实力悬殊由于疲惫不堪。然而，就因为坟头里还埋着被红军战士杀死的白匪，这里始终没有竖起一座纪念碑。也许，那里正长眠着老人最疼爱的儿子，而儿子的墓前，却始终没有一块高高的墓碑……记得那天，我多想对老人说一声千万别难过。我要告诉他，那活在亿万人心中的怀念便是永恒的高高的丰碑。

黄昏的广场愈加迷人柔美。天蓝得不掺一点儿杂质不带一丝儿云絮，像一块没有瑕疵的透明蓝宝石，静静覆盖在广场上空。四月正是放风筝的季节。那摹拟各种鸟儿的风筝简直可以乱真。远远望去，就像一群活泼泼的鸟儿在蓝天下盘旋追逐搏击翱翔。我倏然感到一种童心的萌动一种青春的鼓荡，一种回归故里的亲昵一种拥抱自然的怡旷。多奇妙的广

场啊！远处，飘动的风筝中有一枚凝固不动的红点。那是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它像烈士深情的眼睛，正默默祝福着这块安谧的土地。

那份情，有多重？

（选自《总想为你唱支歌》，吕锦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梦 秋 白

张 惟

我没有见过瞿秋白同志。当他从上海来到闽西苏区——我的红色故乡时，我才刚过一周岁。后来我长成少年，在半秘密中阅读鲁迅的作品，也读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集序言》，并且还知道他是《国际歌》和高尔基《海燕》的译者。这样一个大文化人，听说就牺牲在我们这里附近，不禁使我为之一震，也深深牵动着我的心。我曾悄悄约了三两个伙伴，潜行罗汉岭，只见松岗乱石，一□黄土，何处寻觅哲人影踪？入夜，我们投宿古桥侧的教堂内，躺在长木椅上，听着汀江汨汨流去，怀思悠远。忽从江面上传来客家女子的幽怨悲愤的山歌：

罗汉岭前是深崖，
烈士碧血开红花。
共产党员气节重，
生开红花死不谢！

啊，我终于在故乡的土地上，在百姓的心中找到了他。

从此，他常萦绕于我思绪缱绻的梦中，絮语倾谈。

1950年，我已经成了部队的文艺战士，跨越漫漫汀江，随军跋涉到长汀，追索梦境的现实，直奔罗汉岭。一派绿茵的青草，一座无名荒冢，草已经修剪，墓前开满山花：白的、紫的、黄的、蓝的，中间衬托出一簇特别显眼的火红的木棉花。

我扑到花前，激情涌溢，不禁恸哭！这时，我刚刚读了他著译的《海上述林》，和由他从事编辑的许多刊物，了解到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他不仅是文化巨人，还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袖之一。他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的危难中，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拯救了党和革命。1927年8月周恩来率领叶、贺部队入汀，发给闽西党组织一百条枪；1929年春朱、毛红军开辟闽西苏维埃区域，这些都是“八七”会议的方针在我的故乡所结的果实啊！

当我于深沉的哀思中回过头，望见一位饱经风霜、白发苍苍的老人凝视着我，他问：“你是他的亲人吗？还是北京派来的人？”

我说：“大伯，我也是汀江的儿子，我想知道，这里是他确切的墓地吗？”

老人点了点头：“是的。十五年前，他从从容容，唱着共产党的歌，从西门走到这里的草坪上，盘腿坐着，喊一声‘共产主义万岁’，就躺在我们先人开辟的土地上了。当夜，我同几个乡亲，悄悄把他埋葬在这罗汉岭盘龙岗上，等待他的亲人，等待党里的人来祭他，为他安魂。”

我握着老人瘦骨嶙嶙的手说：“大伯，你替我们党办了

大好事，你替中国文化办了大好事，我们千千万万的后人都感谢你。”

入夜，我肩荷步枪，在驻地的古汀州府孔庙大门口放哨，万籁俱静，只有北山送来阵阵松涛声。仰头望，对面一座塔式尖顶的建筑物上，可以隐约认出“秋白播音室”几个大字。于是，在这沉寂的山城之夜，似梦非梦之中，我的面前仿佛显现了秋白那沉思而坚毅的面容——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是的，秋白的灵魂，就在他的著作里，在他和鲁迅共同开拓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中，在他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中。

1955年，党中央派人专程来汀取走他的骨殖，为他在北京举行了葬礼。长汀人民则在他就义的罗汉岭，建立了一座“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这碑是我的故乡的骄傲，矗立在我年青的心灵上。他的战友和伴侣杨之华亲手在碑前栽了一棵青松，寄托了江南和北国的怀思……

之后，我到了上海，有了一些党内生活的知识，了解到秋白同鲁迅亲密合作，创造性地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的时期，正是他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斥和打击的时候。但是，他却带着重病之身，每天顽强工作十几小时，著译190万字。这样一种奋然不顾的精神，卓敏的才思，确是令人肃然起敬。更加难忘的是，1933年春天，他身居斗室，一连三天，煎着汤药，于病榻上一口气读完鲁迅先生的全部

杂文，而后挥写出那篇著名的序言，宣称鲁迅是封建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战士。他代表着我们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全面地、科学地、公正地评价了鲁迅。鲁迅兴奋地题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它表达的是鲁迅同党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和谐的感情，以及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两位主要奠基人的生死不渝的友谊。

啊，我的梦境从汀江延展到黄浦江，秋白的身影总在我的梦中，心往神驰，梦魂萦绕。

然而，接着是一个可怕的噩梦！

在北京，周恩来总理题写碑文的秋白墓被摧毁了，我也随着动乱的潮流，被放逐到故乡汀江之畔。我的第一个心愿，仍然是扑到罗汉岭。啊，青山不语，汀水含悲，“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的字迹被抹去了，碑前的青松被砍掉了，当年瞿秋白囚室，又囚禁着这位伟大战士的哀魂。高耸的“秋白播音室”，这时发出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魔鬼的狂叫！

唉，我心灵的梦境被粉碎了，比死还悲哀。我白日放牧在罗汉岭下，夜晚，躺在这青青的草地上，忽然，那梦的低语又回到我的耳畔：“地底下放出来的光明，虽然还很脆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探求者和新文化先驱者的声音，就在我躺着的这个地方，他以生命殉了这一清醒的信念和理想，我们有什么理由倒退到20年代末的颓废派思潮？

梦幻中，我仿佛又听到了童年时代听熟了的客家女子的

山歌，从高高的盘龙岗上传来。

于是，我追踪歌声，登上了月光迷惘的盘龙岗。微光里，我望见了一个山村打扮的秀丽的女孩子，坐在月影中唱歌。我走近前说：“啊，20年前，我听过你唱这支歌，也是在这地方。”

她先是惊讶地望着我，接着便点点头说道：“我小时候，阿爹就告诉我，这土坟里葬着一位了不起的共产党人。长大了，我就编了歌唱他。现在，有人说他是叛徒，还要毁掉他的材料。但，历史，是毁不掉的……”

我刚想说什么，忽然狂风大作，飞砂迷了我的眼，我拼命揉眼睛，还是睁不开……当我终于睁开眼时，一切却原来是在梦中。

此后，我设法找到了有关秋白的资料，放牧归来之后，便认真地阅读起来。于是，秋白的灵魂回到了罗汉岭，又进入我的梦中。

我愈爱秋白了。

他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当本世纪显现了十月革命的曙光，他不甘“如隔窗纱看晓雾”，毅然开始了《俄乡程》，1922年2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写了大量著作，表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的政治领袖的科学远见和卓越才识。

1934年2月，他通过汕头——大埔——永定这条我党工农通讯社的交通线，进到中央苏区，他兴奋地在崭新的土地上开展了大众文化的实践。年底，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认为他是一个“过时的人物”，把他多病之身留在瑞金，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当时，留

任中央工农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同志，闻知瞿秋白尚未走，急忙赶到下肖区，把自己的快马送给他：

“你快骑上去追赶部队。”

“不行，组织上决定我留下来。”

“唉！”陈毅急得跺着脚：“我们要转入打游击，可你这身体。左翼文化战线，鲁迅那边，又多么需要你。”

秋白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不要紧，我会跟着你们打游击。”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与何叔衡、邓子恢等由江西突围，不料，行至长汀水口小径村遇敌，何叔衡跳崖，邓子恢跑脱，瞿秋白藏于石洞中被捕。

瞿秋白落到敌人手中后，化名林琪祥。他曾通过关系，写信至上海给杨之华，用暗语向鲁迅和周建人通气，要他们设法找铺保以求释放。

鲁迅闻讯，苦思种种办法。他艰难中筹划了一笔钱，想开个铺子，作为铺保，等保释秋白后再关掉。

这事正在进行中，不幸，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四月下旬，他被押至国民党36师，单独囚禁在师司令部的一间房子里，瞿秋白此时神思遐逸，心境淡泊，吟诗刻石，以待终日。蒋介石指派少将特务王杰夫等三人来汀劝降，瞿秋白大义凛然，于诗赋述志中却之。蒋介石遂下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1935年6月18日，旭日照临北山，云霞溢彩汀水，瞿秋白晨起梳洗，而后临窗铺笺挥毫。

……夜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

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正写至此，敌36师特务连长突然进来，垂手肃立：“恭喜瞿先生，今日是先生的好日子。”瞿秋白闻语，眉梢一展，泼墨加跋数句：“云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话，乃狱中言志耳。瞿秋白绝笔。”而后，瞿秋白从容理墨整衣，步出牢门，回眸凝视门口的矮桃勃发新叶，若有所思，便坦然上路了。

瞿秋白步入公园凉亭，敌师长宋希濂从亭内迎出，呈示蒋介石手令：“请瞿先生恕罪，我奉命来了。倘使先生略有幡悟之意，仍可电请委座免刑。”

瞿秋白接过手令，掷于地下：“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宋希濂肃然退出。瞿秋白遂独坐亭之中央，手把酒杯，自斟自酌，爽然笑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酒毕，卫士请拍照存验，瞿秋白起立，青衣短褂，立于亭之内，安然自若，露出了沉稳、平静的笑容。

赴刑路上，瞿秋白洒然漫步，用俄语哼起了国际歌，随后就用他自己翻译的中文唱了一遍。到了养济院左侧的草坪，环视四周，席地而坐，从容自语：“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最后高呼：“共产主义万岁！”饮弹溘然而逝。

死后，传出了他于囚室中写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是一个共产党员严于解剖自己的自白，打开了自己灵魂的窗户，照出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他当时仍处于王明路线打击排斥的逆境中，且又沦于敌手，于中不免流露了某些低徊感咏的情绪，但这正是不加掩饰的他自己，坦荡地留给历史和后人。它没有出卖党和同志，细心地保护了鲁迅先生。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秋白就义前的14天，《国闻周报》记者访问霍秋白的报道：

谈至此，遂与辞，并携《多余的话》稿本出……阅未及半，为主管禁押人员催索取去，立即另抄一副本寄与记者。

《逸经》杂志《关于瞿秋白之种种》还披露，瞿氏身份暴露后曾写有四千余字的“笔供”：“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指中央苏区——引者）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指中华苏维埃政府——引者）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

此中曲折，其意自明。

“伟大，真实，一个无可比拟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最后的死也是独具悲壮的。这是我们党的光荣！”我披阅资料数月，引证汀江老人的亲闻目睹，不禁拍案起呼。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总不会百分之百的，杂质总是与光辉的本质同在，同时在被时代的烘炉所冶炼着，唯严于解剖自己者，才更显得真实、伟大。我们党从历史的痛苦中，应该深刻识破那伙“百分之百”的阴谋家、野心家了。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也要坚毅地挣脱瞿秋白同志早已预言的“农民意识笼罩一切”的沉重桎梏，我们的伟大民族才有真正的希望。

现在，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终于又重新矗立在罗汉岭上——在汀江畔，在全中国，在人民群众的心上，这是永远也推不倒、轰不垮的了。

（选自《处女海》，凌渡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与《人民文学》

周 明

我万万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 30 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风雨中，有泥泞、有坎坷，自然也有成就事业的欢乐。更有难忘的经历，那便是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文学》的关怀与支持。

60 年代初期，凡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的老编辑，大概谁都不会忘记 1962 年 4 月间，毛泽东同志复信同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的词六首这件激动人心的事。复信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给当时的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同志的。收到主席的信和诗稿后，编辑部内我们这伙年青人和主编一样的兴奋、激动。

这词六首是怎样来的呢？它是早在 1958 年编辑部的同志通过各种途径，几乎是从流传于民间和老同志之间，而广为搜集起来，其中有些是陈白尘同志派涂光群、萧德生从邓拓同志处收集的。一共有十几首。由编辑部小楷字写得顶好的老编辑张兆和同志（沈从文先生的夫人）抄写得工工整整，并由主编代表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主席校订这些诗

词，同意在《人民文学》中发表。一九四五年过去了，没有音讯。1962年初又重抄出来再次送呈主席审定。这封信（含诗稿）是由当时的年轻编辑崔道怡送往中南海的。接待的同志热诚答应一定尽快呈报主席。老崔还带回了一个纸条，他生动地向我们大家描述了一番中南海送信经过。

不久后编辑部便收到上述复信及词六首的校订稿。毛泽东同志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我们当时反复琢磨“马背上哼成的”一句，觉得意味深长。词六首发表在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上。刊物出版后是由我送往中南海主席办公室的。

后来，我们曾又请求毛泽东同志同意继续刊发他未曾发表过的诗词。于是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即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不曾发表过的诗词十首，引起社会上的热烈反响。

1966年6月，在那急风暴雨的荒唐岁月中，《人民文学》被迫停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出现法西斯文化专制局面，没有百花齐放，没有文学创作，更没有文学刊物。直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人民文学》才得以复刊。这时，中央首先从“五·七”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原任副主编、诗人李季同志主持筹办复刊工作。由于李季同志坚决抵制“四人帮”的恶行，他们觉得信不过，也不顺手，复刊时又更换了其他人担任刊物领导工作。

《人民文学》的刊名，创刊以来基本上使用的是郭沫若

先生的题字。这时，编辑部的同志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个新的面貌，动议使用毛泽东同志1962年给《人民文学》信中所写的字为刊名。主席所写“人民文学”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写得也十分潇洒。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请求他同意。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大粗铅笔眉批“可以”。从此，自1976年1月起至今，《人民文学》的刊名一直用的就是毛泽东信中的字。

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1976年1月号，是1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全国刚刚解放的1949年七八月间，他住在北京饭店筹办《人民文学》的情况。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结果主席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艺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他写，茅盾便请郭老写了。他说，为此毛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笑了，慈祥地说：在，在。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

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

这封信，对于我这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感到格外亲切。我自然也希望我的同事们也能看到这封信。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商量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茅盾说：“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呢！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编辑部的同事们争相传看，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件拿到“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茅盾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1993年11月冬雪夜，北京

1994年8月改稿

（选自《雪落黄河》，周明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便是寻常百姓家

毛新宇

感谢有关方面的特意安排，在爷爷 97 周年诞辰这天，使我们能够在纪念堂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

爷爷仍平静地躺在那里，山岳般静默。他一生的奇伟此时凝固成完美的静谧，一种撼人心魄的永恒。当一个人停止生命却仍然不停止思想时，他的周身——以及他身后那些继续思想的人，便有着江河般永恒的气息。

当我走近爷爷，看到爷爷那动人的平静时，我才强烈地感受到永恒的真正含意。

从纪念堂出来，我们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凭栏遥望纪念堂，就像现实和历史对望。遥想爷爷等老一辈革命家英姿勃发当年，爷爷亲自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天地间的豪气便扑面而来。

我们来到中南海，来到爷爷生前的故居。我——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在追溯与沉思中来到丰泽园……

在短短的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里，我走过了一段宏阔的历史。强烈的历史感撞击着我的心扉，我急于表达却又不可名状。直到曾在爷爷身边工作过的周叔叔向我们介绍爷爷用

过的几件遗物时，我才从恍若踏梦中悟出，因此，才成为这一纸短文的缘起……

爷爷卧室那普通的木板床上，书如高原般隆起的背景前，只剩窄窄的一条了。上面平铺着一条毛巾被，一条枕巾，都是素色。毛巾被上层层叠叠，缀满了补丁，数一数，竟有六十多块！而那枕巾上也是密密麻麻十来块补丁，真可谓星罗棋布。据周叔叔介绍，这几件遗物从没展出过。倘若展出，势必就会沾上灰尘，若如此，毛巾被就会被损坏。而且要眼睁睁地看它损坏。因那毛巾被无法洗涤——它早已不堪洗涤了。现在，经专家技术处理之后，用透明塑料密封好，才得以展出……

周叔叔说，主席是从不盖被子的，他嫌盖了热，睡不着。而主席的睡眠是极重要的，可以说是国之大事。若睡不好，就会影响工作，岂不影响国事？因此，这毛巾被的利用率就极高，位置也极“显赫”。一床毛巾被，在一般人看来，服役期也就是几年的事，几个暑夏一过，也就视之如敝屣，不再经意了。而主席却对这床毛巾被非常珍爱，好像它是有生命似的。主席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一定认为万物皆有性，有其自己的生命形式。这床毛巾被他竟盖了十多年……

我是学历史的，历史曾给我以冷峻，又给我绮想。那翳凤更骖，霞佩切云冠的帝王中有过这等事么？

丰泽园外，另有新辟的展室。那里边悬挂着爷爷穿过的衣服，低平柜里，放置着爷爷用过的物品。它们朴实得像农民的衣饰，上面仍是补丁擦着补丁。那柜中更有两排火柴盒，像是一簇簇火苗执著燃烧在视线里……

这是十个普通的火柴盒。

说它普通，是在最偏僻的山村，在那皂角树掩映下的泥屋里，在那炊烟袅袅的锅灶旁，就会发现它。

说它普通，是因为它才两分钱一盒……

火柴是爷爷吸烟用的。他从不用打火机。当他在劳累时，“哧”一声划着了火柴，听那磷石和火柴头摩擦的声音，大概能点燃灵感吧，所以他爱用火柴。静静的丰泽园里，常有那“哧啦”的火柴燃烧的声音，就像思想的长翼遨游在天际……

火柴用完了。

只是火柴盒还很新。

工作人员要把火柴盒扔掉。

爷爷说，它还是好好的，扔掉多可惜。爷爷舍不得扔，他叫人买来散装火柴装进火柴盒。天长日久，火柴盒上的磷擦没了，爷爷仍然舍不得扔掉火柴盒，他又让工作人员买来磷硝水涂上继续使用……

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家，一个共和国的领袖，一个共产党的主席，在生活上却节俭如此，精细如此，真令人感慨万千。

惊异与感叹顿生，且在我们一行中共振：

“那时，这是两分钱一盒的东西啊，便是寻常百姓家，也哪有这等事……”

“便是寻常百姓家”，这句话拨动了我的联想之弦——

当年，爷爷从故乡韶山冲“寻常百姓家”走出，踏遍千山万水，终成就革命大业，但不管身份有了何等变化，他老人家却始终不忘脚下故土，从不让我们毛家超越出“寻常百姓家”的门槛。

伯父就是作为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一员，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而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的。

今年，在伯父牺牲 40 周年之际，我有幸拜谒了他的陵墓。随后，我们又回湖南参加了奶奶牺牲 60 周年纪念活动。就在这次，大姨和妈妈亲手将中南海爷爷故居里整理出来的伯父的遗物，移交给了韶山和板仓两个纪念馆。其中，有伯父的两件衬衣。衬衣的袖子穿烂了，被伯父剪下来，用来补了领子。伯父把长袖变成了短袖，照样穿在身上。还有一件是干部服军袄，伯父把它进行了改造，那棉花是活动的，春秋把它掏出来作夹衫，冬天再把它塞进去。伯父的遗物中还有一双袜子，大概袜子破的时候找不到与之相近颜色的布，伯父就用黑布做补丁，加上补丁上歪斜粗大的针脚，使人想起伯父缝补袜子时的急迫心情——再也没有可以替换的袜子啦，而还有多少路要走……

我突然想起，伯父用他那双略显粗笨的大手穿针引线中，突然记起了爷爷当年送他这个“洋学生”进中国的“劳动大学”时，曾把自己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披到他身上的情景……

今天，便是寻常百姓家，恐怕也很难找到有打补丁的衣服了。补丁的陈迹，似乎已离我们这一代人远去。

但是，是谁编织出美好的今天？是谁让补丁成为历史的陈迹？

所有公正的人都会说：

是爷爷这样的共产党人！

我想，爷爷他们飞针走线的时候，不就是为着编织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未来吗？这其中有一种爷爷他们老一辈

身体力行提倡的精神在。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何况我们新一代？

我愿补丁之类离寻常百姓家远去。

我愿做爷爷伯父所希望的“寻常百姓家”。

我的眼前出现了爷爷山岳般平静的面容。

我从纪念堂前潮水般涌来拜谒的不竭人流中找到了爷爷
何以山岳般平静的注脚……

（选自 1991 年 5 月《时代文学》）

周总理与第一次文代会

吴泰昌

最近翻阅阿英同志遗留下来的关于第一次文代会时期的几则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一些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材料。

第一次文代会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平召开。这是长期被迫分离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隆重会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莅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使这次大会成为我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从阿英同志的日记中可以知道，在三个月的大会筹备期间，周副主席曾多次找文艺界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两次几乎是通宵达旦。五月十三日日记：“今晚约谈话。八时，去中南海。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扬、沙可夫、胡愈之、萨空了、茅盾、何其芳，亦先后至。十时恩来同志来。首先谈文代会问题，次新闻纸问题，又次上海文化工作。第二部分谈完后，夜饭，旋继续谈至三时半。”显然，这是周副主席为了开好大会安排的一次重要的了解情况会。从参加的成员看，包括各解放区、国统区及刚从港澳、海外归来的文艺界知名人士。谈了近五小时，内容相当广泛，中心自然是文代会问题。所谓“上海文化工作”，据有些与会同志回忆说，

是指周副主席关心地询问起有关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事。“新闻纸问题”，是指研究了今后出版书刊用纸如何解决的问题。另一次是在大会正式揭幕前几天。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日记记载，文代会党组曾长时间讨论了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六月二十六日，周副主席及时听取了党组的汇报，该天日记载：“晚九时，与周扬同志等去中南海，向周副主席汇报，至晨四时许完。”这次汇报近七小时，可见汇报是何等详尽，周副主席听得何等仔细，指示又是何等具体。

从日记中得知，在会议前后，周副主席还亲自过问处理了文化界一些重大的带有政策性的事情。例如，郑振铎同志和阿英同志曾谈起，当时一些珍贵的文物无人管理，有散佚和被盜、被损坏的危险，希望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管理这方面的事，他们将这个建议向周副主席汇报，很快就得到了周副主席的支持。五月二十七日日记：“与振铎同志谈散佚文物事，拟成立组织整顿之。请彼计划，再找周副主席研究。”五月三十一日日记记载郑振铎来找阿英，阿英当即“写信给周副主席”。六月三日日记：“晚饭后，得周副主席电话，云十一时来访。候周副主席至夜四时，未见来。”六月四日日记说明周副主席昨夜临时有事未来。六月七日日记：“周副主席约下午五时谈话。到中南海，与周副主席洽谈了文物管理组织等等问题，至七时。与颖超同志、李琳同志同回北京饭店。晚访振铎同志。”周副主席从党的统战政策出发，对文艺界一些名人的安排，也作了重要指示。例如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会后是回上海还是调北京，周副主席都亲自指示。七月三十日日

记：“齐燕铭同志来电话，谈梅先生问题，周副主席要其留下。”

这几则日记，虽然简略，但可看出周总理对革命文艺事业的亲切关怀，但因相隔时久，已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由此，也使我想到几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经历了不少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当事的同志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如果他们能将这些往事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记录下来，这对研究当代文艺发展史，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人帮”颠倒黑白，把毛主席、周总理领导关怀的文艺战线诬蔑成“黑线专政”，把周总理亲自倡议成立的文联各协会打成“黑组织”。介绍这几则日记，重温周恩来总理的教诲，也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个生动批判。

一九七八年二月

（选自《艺文轶话》，吴泰昌著，工人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束鲜花

李玲修

听过无数有关鲜花的故事，但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像周恩来这束鲜花的故事如此动我心扉。

吟过无数有关鲜花的诗词，但没有任何一首诗词像周恩来这束鲜花的诗情与哲理如此令我深思。

那是1957年的秋天。北京体育学院的田径场上正准备进行一场田径赛。不是什么全国性的重大比赛，更不是国际邀请赛。但是一阵秋天清爽的风飒飒吹来一个喜讯，运动员们兴奋起来了：“周总理来了！周总理和贺老总看咱们的比赛来了！”

这时，中等个儿、脸色黝黑的田径教练黄健正在帮助他的学生郑凤荣做准备活动，听了这讯息，他把期待的目光转向郑凤荣。

20岁的郑凤荣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一个偶然的机缘，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教练黄健发现了她。尽管有人对郑凤荣的条件不以为然，但他们俩人却在心头埋下了一个夙愿：冲击中国田径史上，也是亚洲田径史上无人打破世界纪录的零！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对师生为冲击世界纪录所付出的呕心沥血的思考与艰苦训练，但大家却看见郑凤荣的成绩大幅度的上升，现在，她已经逼近那座高峰，距离 1.76 米的世界纪录只有两公分的差距了。

郑凤荣咬了一下嘴唇，暗暗下了个决心，豁出命来跳！争取打破世界纪录，那是对周总理、贺老总的最好汇报！

扩音器里传来了裁判员的命令，身穿白背心白短裤的郑凤荣起跳。“铛啷”一声，金属的横杆被她碰落在地上……

第二次冲击开始，只见郑凤荣像离弦的箭向横竿射去，哎呀，又失败了！这时周围的运动员和教练都替郑凤荣捏把汗。黄健虽不动声色，但他心里的那根弦比谁都绷得紧。

最后一次起跳了，黄健甚至想闭上眼睛，他给自己打气，会成功的，她有潜力，有潜力……

“铛啷”一声，横竿落地的声音打断了黄健的美好遐想。

在场的所有运动员、教练、裁判员和工作人员都失望地长出一口气……他们不是抱怨，但他们毕竟失望，因为在郑凤荣起跳前他们也寄予了美好的期望与祝福。然而这个期望与祝福被横竿的三次落地声打碎了。

郑凤荣呢，她低着头，泪花在眼里转，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个工作人员向他们跑来：“郑凤荣，黄指导，让你们到主席台上去！周总理和贺老总在那等着你们哪！”

到主席台并没有多远距离，但黄健和郑凤荣每走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毅力——郑凤荣灰溜溜地想：“反正是没跳好，等着挨克吧！”

周总理主动伸出手来与黄健和郑凤荣握手，郑凤荣惭愧

地低下头，咕噜了一句：“总理，我没跳好！”

不料总理却说了句：“跳得不错嘛！你还年轻，时间长着呢！”说着将主席台上一束鲜花递给郑凤荣。

郑凤荣既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是怎么回事，自己跳成这个样，总理还说跳得不错，还把鲜花送给自己，不是做梦吧？

郑凤荣正手足无措，贺老总在旁边开了腔，“郑凤荣，总理给你花，你还不快接着！”

郑凤荣的泪水刷地一下子流了下来，她接过总理的鲜花，心怦怦地跳着，她想向总理解释，今天为什么没跳好，还想告诉总理，她可以比今天跳得更好，又想向总理保证，下次一定以最好的成绩向总理汇报……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手捧着鲜花，望着总理那亲切的笑容，任感情浪涛不断地拍打着她的心岸……

27天后，郑凤荣以1.77米的高度正式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当她胸前捧着无数束祝贺的鲜花时，她眼前却涌现出周总理那束永不凋谢的鲜花。

30余载过去了，周恩来的这束鲜花仍然盛开在陈凤荣的心田里，也盛开在中国所有运动员的心田里。

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鲜花，我就会想到周总理的这束鲜花，想到这束鲜花所蕴含的胸怀，诗情与哲理……

（选自1991年7月1日光明日报）

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

刘成章

一踏上延安的山路，看见路上羊蹄蹄敲打下的白痕，嗅着青草和羊粪蛋蛋的气息，就感到无比地亲切了。想儿时，一双不愿受束缚不肯穿鞋子的小脚片儿，曾经踩在这样的路上，踩在这样的路上东瞅西瞅，羊羔羔似的，想着怎么能够趁八路军不注意，偷吃一颗他们种下的西红柿。想羊羔羔渐长，学过了“ $X + Y$ ”，也是在这样的路上，与同学们一起，缅怀伟人立下的不朽功业，效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个个立志此生不成龙则变虎。也袒露心灵最隐秘的一角，谈论爱情，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苦钻古典文学的同学心里却充满了罗曼蒂克，他说整个延中的姑娘他没有一个能看下的。那么，哪儿的姑娘他才中意呢？北京？杭州？“不！”他说，“苏联！”热爱老大哥，便爱上了老大哥的妹妹，但妹妹如花隔云端。大伙笑了，他却不笑，而是认真又执著：“即使最终只是泡影，也起码要和苏联姑娘恋上几天爱！”今日我来，又走在这样的路上。想起桩桩往事，怎能不暗自微笑？但往事如烟，今日的我已不是昨日的我了。没有了儿时的天真。没有了青年时代的壮志。廉颇老矣，羊儿老矣，羊儿备尝世

事的艰辛，黑毛落上了白霜，白霜冰冷着抑郁的思绪，脑子里常乱哄哄的，今日走来，已经甚感气力的不足了。然而，这脚下亲切的山路，还是使我的心湖澄澈了许多。好了，且让我尽情享受这延安山野间母亲般的温馨吧。

山路两边，崖上洼里，槐花开了，丁香花开了，山丹丹花开了。就连叶片很小，满枝是刺的灌木狼牙刺，记忆中经常用它烧火，好像是不开花的，却也开了那么美丽的花儿：半白半蓝，白白蓝蓝，蓝蓝白白，像我儿时常见的一种民间织染的花布。一群黑白间杂的羊儿，自由自在地啃嚼着茂盛的青草，而拦羊老汉任着它们的性儿，不理，不管，只顾自己舒展地躺在地畔，轻声哼唱着古老的民歌。几个背着柴火的后生从山梁下来，看样子，心头一时兴起，亟欲宣泄，便随地放了柴捆子，捡了土圪□朝沟里乱扔，一边还鸣儿喊叫。哦，这种种亲切的情景，把我的心儿引入哪一片艺术境界中去了？是古元的木刻？是李季、贺敬之的诗歌？抑或，是丁玲的小说散文？李季和丁玲是已经长眠于地下了，但古元和贺敬之还在。还在，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回来，一遍一遍地“手抓黄土我不放”，一遍一遍地把黄土“紧紧地贴在心窝上”。对家乡延安情深如我，却远远比不上他们。我毕竟是当年的羊羔羔，是后来人了，没有在那个时代开荒纺线，没有把青春搅在那个开辟新世界的浪涛之中。我心中的延安，家乡的成分多些，革命的成分少些。他们则不同，因而他们的心中能喷出那么深厚的真情。几十年间，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怀想着他们，一如怀想着也曾在延安留下瑰丽诗篇的杜甫和范仲淹。由于他们的艺术创造，使我的家乡干巴巴的土地上，增添了一层灵动的无穷的魅力。而我，延安母亲

的土生土长的儿子，既然涂鸦日久，怎能不更加发奋，也给家乡的艺术花环上，增添几滴红艳和馨香呢？

延安的淳朴憨厚的老百姓，对“公家人”实在是太好，有一种特殊的爱心，我不论走到哪个村庄，不论路过谁家，他们一看见，就是一脸笑容，就忙喊“快回来”，“吃了饭再走”。好亲切的笑容，好亲切的喊声啊！仿佛我就是他们家的人，仿佛我就是他们的至亲骨肉，仿佛我就是他们家孩子的舅舅或者姑父。“草色呐喊连绵的鲜碧”，迎羊儿回来，迎我回来。大概由于离开家乡好多年了，对这样的热情，我很有点诚惶诚恐，而延安当地干部却显然习以为常，处之泰然。甚至，他们到了老百姓家里也竟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地随便和理直气壮。领我访问的小高同志就是这样。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的窑洞，主人是位年轻的妇女，她的丈夫在乡政府工作，不在家，身边有个孩子。聊了一会，小高同志说：“给我们做点饭！”那口气，那神态俨然像她的丈夫。我大为诧异，很怕得到的是一种难堪，便忐忑不安地观察女主人的反应。不料女主人却说：“你看我这个死人，连你们吃饭没吃都忘了问了！”她慌忙放下手中正纳的鞋底，又烙饼子，又熬米汤，让我们吃得很香，还抱歉地说：“那碟酸菜你们吃惯不？叫你们受屈了。要是早知道你们来，我瞎好也得准备一下。上街买上几棵鲜菜。”快不要说了！我肚子早已装得满满当当的了，怎么还能盛下你这么多的情意！？自然，我这也是一片真心。多年来在外面学下的虚假和客套，实在抵挡不住你的真挚，几乎在你放下鞋底的时候，就完全崩溃了。你使我想起了你的也是我的先辈。他们当年就是这么对待“公家人”的。在他们心中，“公家人”意味着什么？先锋，

楷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对“公家人”一往情深，不但捧出好吃好喝，而且不惜以鲜血和生命加以保护。当年形成的鱼水之情，浅白地说，是惯了，一直延续到今天。难怪无数老革命，一回到延安，就感到十分温暖，而其中一些人一旦身处逆境，更是急切地想回一回延安。当年的羊羔羔呢？我们这一辈呢？我们这一辈没受过延安老百姓的恩泽吗？不！就说说我的那个想“起码和苏联姑娘恋上几天爱”的同学吧，文革中，他被扣上“企图里通苏修”的帽子，遭到批斗。那时他在一所农村小学教书，批斗他的人什么粗野的话也能说出来，有人这样吼叫：“你那武器就比别人的劲大？陕北还×不下了，中国还×不下了，还想×到西伯利亚去，就不怕西伯利亚的大森林把你那肉武器划烂了？”他自知自己曾经想入非非是不好的，现在也只娶了个农村妻子，常常痛悔读书时的狂妄可笑；但他受不了这蹂躏人的尊严的侮辱，愤怒了，扇了那人一耳光。后来批斗升级，他潜逃而去，造反派到处搜寻。是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延安老百姓，隐藏了他，使他免遭大难。每当想起这些，我们怎能不像那些老革命一样，对延安的老百姓，产生一种深深的爱戴和感激之情？

山路漫漫，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我的脚下延伸，延伸。向南几百里，是轩辕黄帝的陵寝；向北几百里，是李自成的生身热土，是成吉思汗纵马飞驰又折戟荒沙的地方。南北之间，便是这宝塔高耸的延安，便是毛泽东的延安，便是革命圣地延安。一代伟人选延安作革命大本营，实在是选对了。我们古老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弥漫在这片土地上，如此浓重。那是云雾一样飘浮的可燃气体。火种一旦触上了它，

便是千里雷声万里闪，便是天翻地覆。好像是很轻松了，不，那火种也来之不易。曾经踏破了铁鞋。曾经拍遍了栏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圣火。我们找了五千年才找上了。因为有了这火，伟人便自豪地朗吟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风流人物又数哪里呢？伟人没说，但民歌却透露出这片长着五谷田苗子的土地的光荣，连一十三省的女孩子也要数延安的兰花花好啊！其实伟人在另外的文字中也说出了他的厚爱，他说延安的老百姓对革命是有巨大贡献的。延安老百姓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充分显示了他们的风流的极致的。一个小小的延安，一些数得见的老百姓，在解放战争中支前所投入的民工人次，与整个陕北解放军的人数相比，硬是翻了好几十番！如果说这还有些抽象的话，那么，我这回在山路边听到的故事，却不能不使人受到震撼。那故事说的是七只羊。真的是一个老人说的，绝不是因为我这个当年的羊羔羔，为了文章的所谓前后照应，而在瞎编。老人说，那会儿战争打得紧，前线等着军粮，村里就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大小牲口一鞭子吆上，背，驮，运输。风雨无阻。没明没黑。挣断骨头不叫苦。可是尽管这样，还是赶不上军队的需要，有人就出了个主意，让各户仅有的七只羊，也奋蹄上阵。哦，羊！上天生它，本来只让它给这世界提供肉和皮毛，除此而外，便没有它的任何义务，而让它尽情地享受清福，尽情地品尝水草的香甜，尽情地沐浴明丽的阳光，尽情地呼吸新鲜的空气，尽情地唱它的“咩咩”的通俗歌曲。开天辟地到如今，羊的老祖先可以作证，辈辈羊儿都可以作证，它们从来没有驮粮的本事。让它们驮粮，就像打着鸭子上架一样。然而，为了夺得战争的胜利，人们还是狠

着心让它们这样干了。可怜这些羊了！它们举步维艰。它们趑趄趑趄。它们浑身蒸腾着汗气血气。它们走几步望望主人，发出痛苦的声音。几天驮下来，每只羊的脊背都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未了，乡亲们把这些羊送到野战医院，想让伤员们补补身体，可是羊宰了，伤员们却不吃，因为他们看见，那剥下的羊皮，一张一张都是驮粮磨下的窟窿！他们不忍心再吃这些羊肉了！老人说得眼泪汪汪的。老人本来想通过这七只羊的故事，让我从一个侧面了解延安老百姓当年的壮烈风貌，而我觉得，我延安的父老乡亲，那时候，就是那七只羊啊！他们曾经为革命忍受过多么巨大的磨难，付出过多么惨痛的牺牲啊！他们当然不是那七只羊：羊儿是被动的，甚至还发出乞求怜悯的哀嚎；他们则是主动的，自觉的，被时代召唤到他们本来干不了的战争上，深情在胸，义无反顾。他们当然是那七只羊：像羊儿一样，一直坚持到最后，死了也把躯体献给了革命。怎能不是羊呢？这片土地上的民歌早就唱过：“羊群走路靠头羊”。这是个起兴句子。那么，下边一句呢？“陕北起了共产党”！共产党是头羊，他们是羊群，是靠着共产党指引前进的方向的。头羊伟大、光荣、正确，羊群跟着走，走得坚定、豪迈、充满信心。而这片土地呢？虽然贫瘠却不乏好草，既养肥了头羊，也养肥了羊群。反动派眼急了，因而发动了那场战争。

我是当年的羊羔羔，现在不只长大了，已经说过，而且有些老了。不过毕竟还不是廉颇，还没有到“尚能饭否”的时候。岁月的风雨，不曾剥蚀完我的记忆，而今天，在这山路上，即使是已经剥蚀掉的那些，又奇迹般地得到了复原。哦，那是既遥远又切近的情景。羊羔羔吃奶双膝跪。羊羔

羔吃奶脸贴着娘。羊羔羔吃奶娘喜欢。我知道，我曾经吮吮着的，是沾着青草气味的带血的奶头。也许就是那七只羊的奶头。哺育过我的先辈，以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气磅礴的精神，辉煌了一整个时代。摔倒在地上的中国近代史，由于他们的奋斗和牺牲，终于续写出了站起来了的骄傲篇章。我的先辈是伟大的。有时候我晕头转向，老夫聊发少年狂，觉得自己能写点文章，也是蛮伟大的，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连老婆都说她还没有看将出来。我曾在杨家岭的大门边栽了一棵洋槐树，几年过去，洋槐树长得高大挺拔，枝叶婆娑，心想这洋槐树长在伟人住过的地方，便可以 and 伟人的故居一起永存了，但不料那年再去看时，早已没了踪影。我想我的文章也是我栽下的洋槐树，虽然写了伟大的先辈，却不能因此而得到长青。文如其人，其人还没有大写出自己。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我平凡！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平凡不过刘成章！我知道，在老一辈的羊群面前，我只能自惭形秽。我即使忘却自我，意气风发地全力奉献，奉献出自己所有的全部的肉和皮毛，也很难抵上他们的万一。而现在，首要的是，我不能郁郁寡欢，不合群。虽然在外面生活了那么些年，然而，卧在黄土地上我不应该嫌脏，见了青草我应该有很好的食欲。我虽然气力不行了，但也应该振作精神，跟上踏青的队伍，并以自己发痒的嗓子，唱一曲跟上时代节拍的“西北风”。绝不能让人家指着脊梁说：“那是一只乏羊。”我想我儿时的伙伴、中学的同学，也都会是这样。我想当年的羊羔羔繁衍下的又一代羊羔羔，都会是这样。我有三个可爱的羔羔。老大的雄心脏过我的当年，到大洋彼岸吃草去了。为了吃草，羔羔不得不洗碟子，端菜盘，相当辛

苦。他说，他曾在电视荧屏上看到延安，那一刻，他哭了。
他说，他想延安。

（选自 1990 年 7 月 30 日《陕西日报》）

我怀想最初的年轮

贾宝泉

终于，戎装，卸去了。

一觉醒来，正好六时。急忙披衣下地往外走，却被妻子拉住了。我立刻领悟了什么，笑了，是一种很不自然的笑。是的，每天六时半的晨操，是再也不需要参加的了。

新的单位，新的同事，新的战程。同样有亲切的微笑，会意的点头，深心的理解。

累了，我常常从厚厚的一叠稿页上抬起头来，踱至窗前，向着大街细细地静静地审视。有时，我也到街两侧的便道上散步，看滚滚的车流是怎样幻作塞外坦克、装甲车的长阵，挺拔的白杨树是怎样连绵成跋涉于大漠峰岭之上，喷溢着勃勃英气的年轻的士兵，由迤迤的行人品味老根据地的乡亲们迎送拉练大军的浓烈的亲情……

或许是为着有了余暇，或许是因为连自己都无法驾驭的积习，心中的缆，总是在既往的河上系舟。

二

接通知。告别。换装。一颗红星再加两面红旗，在身上摆成个“品”字。由老百姓到军人的激变，居然快得连自己也眼花缭乱。

但思想并没有转过弯来。进出营门，哨兵看我们是上衣缀四个口袋的“官”，必定要行礼，我们这些学生官却嘻嘻哈哈，不理不睬，扬长而去。

根据军党委的安排，我们先到连队锻炼代职一年。连长见我们是从军部来的干部，极敏捷地行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举手礼，我们几个忙说：“我们是您的兵。”但他并不在意，依然很亲切：“革命军人是要互相尊重的。”

从此，我们就像乱蹦乱跳的马驹子戴上了笼头套，就像满世界乱流的荒野水注入了河床，受到了约束。宿舍楼离食堂不到一百米，吃饭必须排队去。看电影谁都得去，看过了也得去。放映前四十分钟集体整队入场，小板凳一律拿在左手。往地上放凳子，坐下，都得按口令行事。坐下后，二十几个连队要举行歌咏比赛。

讨论发言我不在乎；集体唱歌我也不怕，大家都唱得那么认真，就给了我滥竽充数的机会。可我不想一看再看同一部片子，我想寻点空暇吟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和两汉的文赋。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连长，他说：“部队就是要培养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作风，加强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锻炼。平时争胜要强，战时才能舍得一切冲上去。你要是想参加，就算了。”

连长以心换心，我也不能铁石心肠。再说特殊兵的滋味

并不好受。碰上不爱看的电影、演出，我便闭上眼睛，在心上追溯当年苏轼的游踪，于风涛江上，“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抑或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关于“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优美的描写点染为跃动的画面。

最悸动人心的要数紧急集合。半夜里睡得正美，也许是花前月下，湖岸溪畔，你和什么人谈兴正浓，却突然听到值班员急促的哨音，急得你顾不上与那人握别，道一声珍重，便从床上爬起来。摸上一支枪就往楼下跑。连长冲锋在前，一百多人跟着冲，大路不走走小路，小路不走走田边，免不了跌倒在水田里。天亮了，大家检查着装，发现洋相不少：帽子戴反了，鞋是布鞋胶鞋各一只，枪是别人的……紧急集合虽然不可能夜夜都有，却叫你每夜都睡不踏实。我开始感到对戎马生涯的不适应。用那时人们爱用的话说：路走对了，门进错了。但过了不久我就认定“门”也进得对。

三

部队生活虽是紧张，却也有逸愉闲适的时候。有年晚秋，连队要为团里筑一座砖窑，任务重便显得人手少，人手少便大家齐上阵，一连七八天，都是从朝霞初涨干到晚霞沉落，淌下的汗几乎要打湿路面和成泥，不少官兵都是带病出工，拉不动胶轮车就用小筐提土。在这个节骨眼上，连长却通知我立即回连部，“不要回工地了。这是命令。”一进门，炊事班长双手举一碗面条迎来，那上面黄的白的，是鸡蛋。他亲亲热热地说：“辛苦了，请用这碗生日面。”哦，记起来了，这天果然是我的生日，可我并没有向谁说过。问他如何知道的，他却笑而不答，我也始终不知。连队规定，战士过

生日要由炊事班做生日面送到宿舍，战士则写一篇日记，为连队建设提一条建议。我吃罢面条，身上心上都暖烘烘的。

战士们素来争雄斗胜，有时候却也你推我让。年终评比先进，老兵说新兵谦虚勤快有朝气，进步快；新兵咬定老兵知冷知热像兄长，贡献大。推让的结果，常常是“便宜”了新兵，包括我——拗不过老兵啊！又常常是新兵给家长写信报喜，家长给连队写信致谢。干部就表扬老兵榜样作用好，带兵有方。新老兵都有劲头。又到年终评比，老兵走了，新兵补充进来，原来的新兵升任老兵，他们还是像他们的老兵那样奖掖新兵。

这些兵虽说心肠硬得硌人，有时也泪涔涔的叫人可怜。冬季野营拉练，一昼夜长途奔袭一百八十里。开始走得挺昂首头蛮标准，不出十里路腿弯子里头就长了锈，什么步枪、背包，小铁锹，手榴弹、子弹带、水壶、米袋等等，都像长出了手指卡你的脖子。脚上起了泡，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九九归一，泡全通了。我一步一瘸，又羞于被收容队收容，就设法减轻负重，擦脚毛巾扔掉了，日记本上没有写字的白纸撕掉了，甚至连钢笔水都挤掉，拔一根头发腿也轻。这时候班长过来从你肩上抓过步枪，咣啷一声挂到全班只有他肩上才有的备用子弹盒上。你不用硬充好汉，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四只眼睛对看一下，什么话都就说完了。你可以流泪，他决不会以泪相陪，至多高喝一声“快跟上”，先自远远去了。进了宿营点，房东早烧暖了土炕，烫脚水就凉在瓦盆里，大伯大哥迎上来夺过背包，大娘大嫂子拿热毛巾在你脸上左一下右一下抹汗，孩子们两只眼瞄着你腰里的盒子炮。吃罢饭，家家的大娘大嫂子都要用针给战士挑脚泡，

家里没住兵的也要拿根在灯头上烧过的大针串户找兵，看见你脚板上烂乎乎的皮破血流，那大娘叫声“我的儿！”自己先就哭了，那大嫂就从自己头上拔根头发从泡中穿过去。流泪最多的是军属，她想像她亲人脚上的泡比你还多，疼亲人够不着，那份情意全泼在你身上了。夜里老人照例来看望，热炕头上盘起腿，一声“孩子们”，话音儿恳切得跌在地上能弹得起，不容你不答应。“闹日本的时候咱村上住过八路军。”“潘家峪血案以后，咱村上十二个青年投奔大军，找小日本报仇，十个阵亡了。”“听说有的还叫小日本拉出了肚子，老长。狗杂种！”“咱村上最先有了共产党，在这个县……”老头们是村里的活碑，活的村史志，一个个全是圣贤，肚子里装满了功过是非，经国大略，要甚有甚。唠得正在兴头上，房东大娘来轰了：“孩子们累成这个样儿，还叫他们陪着你们熬夜？老不死的！”老头们挺舒心，说声“明儿见”，走了。第二天拂晓要出发，大娘端出半夜里煮熟的鸡蛋，洗净的大红枣、山里红，硬往你口袋里塞，揪下你的帽子装，大喇叭唱着“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大嫂们拉着你的手说：“多咱行军打这儿过，到家来。”闺女们好害羞，亲热话儿说不上口，就会用滴溜溜转的黑眼珠儿同你惜别。这时候战士的心啊，搜遍了《辞海》也说不出来是啥滋味儿，钢铁的肠子早化了，任是眼窝子再深也装不下那么多泪，也就跟着大娘们哭起来，真想扑下身去叫一声“娘”。叫大娘“大”字发音轻，结果就叫成了“娘”，大娘听了又掉泪，大嫂子们闺女们也陪着。其实，亲娘待你又怎样，也不过如此吧？

四

我还有过一次扬眉吐气的站岗呢！我锻炼代职的部队执行迎接外宾的任务，经常有外国军、政代表团来参观访问，看军事表演。1970年暮春时节的一个上午，某国总统（兼该国武装部队统帅）来部队参观，连队派我站岗。我严格执行了队列条令——脚跟靠拢并齐，两腿挺直，小腹微收，自然挺胸，上体正直，头正，颈直，闭口，收颌——下决心站出军威、国威。我目不旁视，他的车子到我跟前我也不东张西望看新鲜。他下了车，举起右手，向我敬礼，很慢，但郑重，内涵，又登车而去。当天夜里，又是我站岗，当远星的寒光在刺刀尖上跳闪，当夜的大幕沉淀了白日的烦扰，我又反刍起白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那位外国总统向我敬礼，并不是向我本人，而是向百战百胜的中国武装部队，向站起来的东方巨人新中国致敬。他慢慢举起的右手，不只属于他本人，还属于他的民族，他的国家，这是一个友好国家向另一个友好国家致敬，是地球上两个大洲在相互问候、祝福。我真正体会到了“兵”的光荣、自豪、神圣。想到这里，我认为自己已经是共和国大厦的粘合剂，钢铁长城的一粒分子团，当兵当到这步田地，大抵就算当出了极致，品出了个中三昧。

地球一圈圈环绕太阳运转，大地上不停地回黄转绿，又回绿转黄；征鸿一年年去而复归，归而复去，十多个春秋逝去了，我终于离开了这支军队。

我是树木，我怀想最初的年轮；我是江河，我眷恋遥遥的源头。

连队里我所熟悉的战友已经全部离去，但连队还在；当年我在营门前手植的小树早已长大，但树还是树；受过连队砥砺的我成长了，我还是我。

尽管军人的生涯已经成为过去，但每天的清晨，我还是听到了悠扬、清越、奋激的军号声，不是在耳畔，而是在心头。在连队时那种“每夜都睡不踏实”的精神，今天于我还是有用的。让军旅的鼓点继续伴随我征行的脚步吧！最初的年轮并没有失去，它已经烙印在我的心壁；所有最可宝贵的，经过时光的洗劫，都还庄严地活着，在以后长长的人生旅途中，我将不感到寂寥与困惑……

（选自《人生，从序走向跋》，贾宝泉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太行这条龙

郝宝铭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出入塞焉……”于是遂兴挖山之想。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行动感动了天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之，一放雍南，一置朔东。”

一则“愚公移山”的神话流传千代，老愚公的形象曾经给了后人多少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

翻开中国地形图，哦，这纵贯南北，蜿蜒冀晋豫三省的巨龙就是老愚公曾经挖过的莽莽太行山？西望延伸，它自不如玉龙飞舞的天山，横空出世的昆仑，比起那耸入天际的喜马拉雅，也只可谓“依绕膝前如儿孙”了。不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太行不高，几千万龙的子孙不算神仙么？太行不是水，是山，是脉有灵性的山。中国人用惯了龙的比喻，如果把它看作是一条头探河洛，尾摆幽燕的巨龙，不是仍然十分恰当、特别生动么？

北京房山应是龙的小腹了。五千万年前的猿人遗址，给太行挂上了古人类发祥地的勋章，这是巨龙产下的最早的子孙。

不过，古都邯郸西部山脊上的娲皇宫的壁画却是这样描绘的：上古时代世上无人，天神女娲抟黄土造出一个个黄皮肤的男人和女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轩辕黄帝将蚩尤驱逐、搏杀在涿鹿之野——巨龙之尾。

隆尧县的尧山该是巨龙伸向平原的一支巨爪了，史载“昔尧登此山，东瞻洪水，务访贤人……”是尧纳舜的地方。

大禹治水，劈开龙门，河洛龙门山该是太行巨龙的龙首了。

太行龙从头到尾几乎全身都扣打着“人之初”的印记，展示着龙的传人文明史的进程。

西依茫茫黄土高原，东襟浩浩华北平原，两大地理板块各以自己的特色影响太行。巨龙左揽右抱，得天独厚，将平原的风采与高原的性格熔于一炉。

大平原的杏花春雨湿润了龙的坡谷，所以，清山丽水显示出特有的丰满与富足。且不说满山遍野的稻麦黍稷，单是数不清的丹柿、紫栗、麻核桃，不就是它养育子孙而吐出的内丹珠玉么？

大平原的色彩斑斓熏染了龙的峰峦，因而，巨龙无疑是风姿翩翩和神秘莫测的。于是引得峰恋蝶逐，鸠占鹊贪。隋皇的女儿选中了清丽的苍岩峰作为自己清修的圣地，清朝的帝王霸占了易县的永宁山作为延续龙脉的陵寝。不过，龙毕竟还给予孙留下了天桂山的峻拔，小五台的雄奇，贺坪峡的险绝，野三坡的幽趣。就连最近发现的号称“北方第一洞”的临城“崆山白云洞”，也是太行袒露给世人的内腹的瑰丽。

如果说，辽阔的大平原给太行以地理形貌的优势，那

么，雄浑的高原则给巨龙以历史品格的特征。

黄土高坡金戈铁马的西北风，吹皱了太行的每一片鳞甲，因而留给它更多的是云飞电舞的强悍和威武不屈的凛冽。

剖开太行巨龙纵深的延伸，在它历史的横断面上，可以看到无处不镌刻着风云叱咤的历史遗存。

它自然不会忘记，韩信兵出井陘，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搏杀场面；也不会忘记，唐平阳公主的娘子军旗也曾在娘子关上飘起巾帼雄风。

燕赵自古多慷慨，大概是因遗传了巨龙不屈性格的基因。

不屈的黄头巾战死在灵霄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率众起义的誓言似乎仍在松风柏涛中激越。

在黄巢祭刀的邢台西山“黄巢岩”下，残破的《黄巢山佛殿碑记》说：“自古及今凡有功德于民者无不存以庙宇而祭以春秋者也……”这是人民对于起义领袖千秋功罪的公正评说。

龙魂系子孙，所以龙的传人反抗压迫，更反抗侵略。

内邱县西部有个牛王寨，据说就是南宋初年牛皋率领八字义军抗击金兵的山寨。

八字军是太行的忠勇，不过，还是近世纪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战争才显示出太行巨龙的真正神威。八字军将“保家救国，警杀金贼”的口号刺在脸上，八路军将民族解放的大旗印在人民的心里。

有人说：长城是条龙。卢沟桥的枪声，平型关的捷报，

标志着太行巨龙已义不容辞地重新挺起了身躯，筑成了抗敌的新的长城。陈毅元帅有诗说：“黄河东走汇百川，自来表里太行山。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华在此间。”左权将军鲜血洒在太行的脊背之上，白求恩大夫长眠在龙的怀抱之中，五壮士在狼牙山树起壮烈的丰碑……

太行与战士，巨龙与子孙还能分开么？

足以引起太行骄傲和自豪的当然还是伟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来到了西柏坡。有个嵌在巨龙鳞甲缝中的小小山村，简直可以和井岗五井、红都瑞金、圣地延安相提并论。小小山村做出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策，这是蛰龙奋起的风雷；小小山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里轰响起巨龙升起在东方的声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太行巨龙用自己膏腴的物产养育了众多的龙的子孙；
太行巨龙用自己不屈的豪气影响了无数的龙的传人；
太行巨龙用自己坚强的身躯抵御了敌人的进攻；
太行巨龙曾经孕育了共和国的黎明。

光荣啊，太行！
英雄啊，太行！
好一条太行龙！

（选自 1990 年 5 期《散文百家》）

荒原的图腾之城

赵建英

远离故乡，在异地的寒冷里瑟瑟发抖。

求学的生涯充满了艰辛，离开这艰辛又一无所有。

这时便遥想东部荒原，荒原上的故乡、城市、黄河、大海，想起让年少的我开始懂得城市之梦的小小列车房。

故乡的荒原似乎在一夜间耸起了那座现代化的城市。但没有人知道，在我幼年时代的心里，那座城市是立在钻塔平台上的。年幼的我平生第一次站在钻塔上眺望故乡的风景：旷阔的平原、湛蓝的天空、稀疏的村庄和荒原了无尽头的坦荡……我在上面感觉到了山峰或者说是“巅峰”所造成的高耸与开阔的感觉。

随着机器轰鸣带来的震颤，我突然觉得这片荒瘠的原野正开始生长一种前无古人的景观。

我是如此地熟悉和亲近着荒原。当我还是小姑娘时，就跟着父兄去荒原深处谋生了：拾麦穗捡柴火放牧牛羊……那儿人烟稀少，却生满了大豆高粱苜蓿和芦苇。我走入荒原，深入它的辽阔与浩瀚。“你们不是说荒原是绿草芦苇庄稼和野兔的天下吗？”我问身边的大人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铁

家伙？”“这是钻塔提油机，这儿是油田。”大人笑着告诉我。我看看他们的脸，怀着神奇的思绪凝望着耸立于绿色海洋里的连绵不绝的钢铁山峰！

一阵阵机器的轰响回荡在荒原上，东部大地的鸥鸟翱翔于被工业文明笼罩的天空里！

我常常在劳动的间歇走近井架，走近提油机。看到井架上昼夜不灭的灯光照亮了荒原，看到提油机音乐般上下翻转的翅膀，被它们的新奇诱惑得快乐无比。当黑色的石油喷溅到地球上，我便想象我脚下的地心深处藏匿着怎样的风光？不明白几亿年前的森林如何变成了黑色的黄金？

就这样，石油工业的气势以它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给所有深入荒原的人一片想象的天空，给童年的我充满希望的神秘与诱惑！

我开始慢慢地接近那些年青的年老的钻井工和采油工，在他们居住的小小列车房里感受到乡村所没有的生活。看见他们这些可以移动的家园，令我想起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在一座住着五个人的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吉他和小提琴，也听到了它们真实的迷人的音乐。而且也是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机，一个长着大眼睛的大哥哥还告诉我：以后，这儿会有一座城市，我们就在一座有公园、马路、高楼和电视台的城市里生活，像电视里的城市一样，不，比电视里的城市还要美丽漂亮……

遗憾的是，从没有接触过工业文明与文化熏陶的我只靠少年的想象还想不出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它叫什么名字呢？我的家也在高楼里吗？学校的教室会不会也有电灯？……

我没有来得及看着城市一点点地从荒原上立起来就早早地远离了故乡。十年之后，我重回荒原，十年后的荒原早已面目全非。我再也找不到那一座座一排排的列车房，见不到会拉小提琴的大眼睛哥哥。井架依旧高耸入云，提油机树一样绿透了大地。在我割过苜蓿拾过麦穗的原野上，一座城市奇迹般地矗立着。在它的入口处，耸立着一只仙鹤的雕塑。城的周围遍植着绿树、鲜花，在昔日曾经苇絮如云的深秋季节里，城市的街上飘满了花香与金色的落叶，有音乐在街上汨汨地流淌，令人想起城市的地下深处涌流不息的石油之河。

陌生了的荒原风吹乱我的思绪，城市如突起的山脊，在荒原腹地凝立为巨大的雕塑，当年列车房里的工人、吉他和小提琴们，今天这儿有你们的身影吗？

依然是钻塔井架上那昼夜不息的灯火，引导我走向荒原与大海的交接处，登上连绵百里的拦海大堤极目所望，东方的大海浩淼无垠，堤内的荒原排列着密集的井架与采油树。我虽然看不清憧憧人影，却感觉到人的声音像蓝色海浪一般流动在东部荒原上。而与荒原互为母子的大海，在堤外静听着这一切，看她创造出来的荒原上越来越多的人与城市潮水一样漫过地球的东部顶点。

我又走遍了荒原，遍数了荒原上的图腾。这使我在又一次更久更远地离别它们以后，心里永远留下了城市入口处那座关于城市随想的雕塑，记下那片被石油工业重新缔造与刻画的荒原上连绵于时空间的图腾：大海钻塔采油树列车房黄河拦海大堤以及耸立于一切图腾之上的那一座城市！

（选自《散文百家》1995年4月号）

浪花拥抱的热士

孙友田

海南省是祖国南部的一块浪花拥抱的热士。改革开放以来，大潮拍打着椰林之乡。我们过琼州海峡抵达海口的时候，“椰子节”刚刚结束，节日的气氛尚未散尽，高大的椰树间仍扯着欢迎到海南来的横幅标语。

次日去拜谒海瑞墓。明代的海瑞是海南琼山县人，为官期间曾平反一些冤狱，被誉为包公再世。72岁病逝于南京任所，灵柩由水路运回海南，葬于现海口市郊区滨涯村。穿过刻有“粤东正气”的石牌坊，就想起“文革”的那一场劫难。一座圆圆的石墓，倒生出多少枝节……那一块被打断了又重新竖起的牌碑，不愿再提往事，让海公枕着琼州海峡的波涛，做一个好梦……

苏公祠也在海口。宋绍圣四年，60岁的苏东坡被贬往海南，老诗人带着儿子苏过，在海口金粟庵住了二十多天，才去贬所儋县。他留在海口的是一页页诗笺，那崛起的楼房闪亮的一个个窗口是诗笺上一个一个方格，等着当代诗人去填写海南大改革、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的诗篇。

我们结伴乘旅游车去三亚，去天涯海角。饱览海岛风

光，感受特区气息。

公路两旁随处可见厂房在奠基，游乐场在平整土地。

车过文昌，导游小姐说，文昌县古路园村是宋庆龄的故乡，建有宋庆龄纪念馆。并说文昌是椰乡、侨乡、文化之乡、排球之乡。

当晚，住在兴隆温泉度假村。兴隆为印尼华侨农场所在地。1961年，印尼归国华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此艰苦创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开发，使兴隆闻名全国。兴隆盛产咖啡、胡椒和热带水果。我在度假村里看到一棵菠萝蜜树，枝叶间挂着二十五个像冬瓜模样的菠萝蜜。

终于走到了天涯海角，不远处，新兴的三亚市雄据海岛最南端，凤凰机场正在兴建，银色的凤凰将把“天涯”驮向遥远。

在三亚市，我在解放四路大车山公司为妻买了一串珍珠项链，与店员攀谈中，得知这公司为台湾一位珠宝商的独资企业。这位被称作“珊瑚大王”的珠宝商，投资200万美元在三亚市创办了目前中国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场，“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海南珍珠为世界珍珠佼佼者，这位珠宝商的眼力不错。目前，台商在海南投资的企业已近200家，总投资额仅次于港资。一种“根基在台湾，生产在海南，市场在世界”的琼台两岛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三亚，我第一次喝椰子汁：花一元钱，抱起一个像排球大小的椰子，尽情喝下其中清香、微甜的液体，比花九角钱喝一杯“雪碧”痛快多了。第一次吃槟榔：槟榔在海南是喜庆之物，婚礼上主办人常把槟榔当喜糖撒给亲友。卖槟榔的姑娘用一片绿叶包着一点像牙膏一样的东西和槟榔一起递

给我，让我放进嘴里嚼，开始还品不出是什么滋味，越嚼，越觉得清香可口。第一次吃菠萝蜜，弄得两手都是胶一样的粘糖汁……

美丽的三亚气候温和，四季花开，具备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阳光、空气、绿色。实为旅游胜地。

在风光如画的“鹿回头”留影，在牙龙湾沙滩上拾贝，到洋浦开发区创业，到万泉河中游泳……五指山正伸出巨手，欢迎海内外的朋友。

（选自《散文百家》1993年4月号）

红日下，那片黄土地

冀 人

有一块地方，我童年时曾在那里逗留过，如今仍无时不在惦念着，想再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走一走、看一看曾被黄水漫过、黄风刮过、黄沙埋过，既让老百姓得以生息繁衍，又给他们带来了不尽磨难的那片土地。我总觉得冥冥中自己的血脉与流经那里的黄河水有着说不清、割不断的联系。

不久前，我终于去了。

我先去的那个乡就在黄河由华北平原向东北方向拐弯之后的河滩上。此处的黄河大堤如长城般巍峨，堤上有许多民工正在加固堤顶。翻越大堤，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绿得发黑，麦苗长势极好。大路夹在两行水泥电线杆之间，只是一条车辙人踏出来的土路。旁边的路人告知方才晓得，这里修了柏油路也无用处：每年黄河水一淹，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向左近的村庄一指：“去年秋天，大水一来就有四五米高，房子大部分被泡塌了。这不，都是新盖的。”我心里明白，这里已是黄河滞洪区了。

乡的所在地四周有高高的寨墙般的庄堰，上面布满了粗

大的柳根。里面的街道旁边，尽是各家各户高高的屋基土台。乡政府的院子，整个儿地坐落在一个很大的方土台上。院墙外，树木几乎都开始吐露嫩芽了。发芽最多的是柳，其次是吹出小穗的杨，再则是刚刚鼓苞或微显金钱的榆了。

乡长五十来岁，挺热情。他说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老灾区，全乡三万多口人，每年播下的秋粮都没保障。有一年的麦子和大豆长势很好，可是一场大水下来，全冲光了。一个村子附近有个八米深的大坑，大水一退，成了一抹平地！我想起了解放前这个地区每年发水后的惨景，就问他大水来了怎么办？“提前两天上级发来通知，居民就跑到高一些的地方。救济时，一般是汽车把干粮运到大堤上，部队再用汽船运到各村。”他们已经按国务院的要求，在黄泛区实现了村台化，首先保证洪水来时群众的生命安全。“我们这里的地是很肥的，只是收成没保障，不过，努努力，夏季还是可以的。我们这里的人，老年辈子传下来的习惯，种地没保障，就搞副业、跑买卖。现在，这里不但实现了中央要求的一年一季保证口粮自给，而且，发挥了传统优势，鼓励群众搞了多种副业，既繁荣了当地经济，也富裕了自家。”他接着介绍了几个当地农民发挥自己一技之长，创办的防腐工程公司，现在业务已经发展到北京、东北、上海等地大化工企业，每年创产值近二三千万元的例子。真令人振奋！

当我们穿过那乡里的一个村子时，见到许多毛驴车在穿梭般地运土垫房基。在土台上，有不少家的新屋已经落成。此起彼伏的铃铛声不绝于耳，萦绕于高台上幢幢新屋和树丛之间，赶车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的衣着已与城市中的不相上下，只是他们更为健康和朴实罢了。我问一个小伙子，为什

么每个土台子都要垫四五米高时，他不解地看看我：“每年洪水都要淤一回，没几次台子就淤平了，还得再垒台子，再盖新房。”我问他：“那为什么这里的人不迁到堤那边去，省得每年让淹一次？”“那怎么行？到处都是地少人多。”说完他便哼着大平调赶着车子优哉游哉地运土去了。我却在咀嚼着那句话的含意。

翻过黄河大堤西行，我来到了离大堤不远的的一个村子。同这一带的其他村子外貌几乎无甚差别，这村也有高高的庄堰，村内还有许多的树木，房屋却几乎全部是青砖到顶的瓦房，每家前后都留有宽敞的院子。在村党支部书记陈设简朴的家里，我见到了这位已经七十五岁的老人。因他年事已高，牙齿也快掉光了，说话不太清楚，就由会计来介绍情况。老支书是1947年参的军，复员后回到村里参加土改，由高级社时任支书至今未动。我与会计说话时，老人热情地点着头。他头戴洗得发白的蓝斜纹布解放帽，围一条虽陈旧却很洁净的白底黑纹线围巾，身披栽绒领的黑色小大衣，下穿一条劳动布裤，脚上一双白粗布袜子，外套黑条绒尖口单布鞋。脸刮得很光，只有下巴上生出一些很短的花白的胡子碴，一只眼睛无力地闭着，另一只眼睛则是昏蒙蒙地看着外界。但是看得出，他的听力和思维能力却是很好的。他脸上的表情随着我们谈话的内容而变化，时而严肃，时而兴奋……我得知，他们村因距大堤较近，靠近大堤地势较低的土地被河床里渗过来的水弄得盐碱化了，庄稼不能长。只有离大堤较远、地势又较高的一些地还可以种。村子里把这些好地按群众意见公平分配责任田，五保户的地摊给大伙儿负责。另外，根据村子临近公路，交通方便等有利条件，扬长

避短，组织了一些能人，发展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劳力密集型乡镇企业。

会计很尊敬地称老人为“大爷”。“我们村由于有大爷把舵，支部活动还都比较正常。他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打江山的功臣，直到现在还老是搁不下大家的事。村子里的重大事情都请他拿主意。所以，俺村不像有的村那么乱。这几年开放、搞活，不死守着土地打转转了。这也符合俺村的实际，因为，俺村本来就地少，一些人闲着没事，正好跟有手艺、消息灵通的人搁伙计，学点本事。这样，俺村的小厂子，联合体也都建起了一些。有绣花厂、服装厂、丝钉厂，还有把盐碱地开挖成鱼塘养鱼的。反正多了，这一下子个人富了，村子里也富了。”

老支书嘴咕啾了几声，会计就笑着对我说：“大爷不说，我倒一时漏了，还有那些个小妮子用玉米皮编的提篮、小筐、靠垫什么的，通过外贸打到国际市场上，挣了不少外汇哩！”我们都笑了起来，我说：“老支书，您老七十五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老人一比划，会计说：“俺村八十多岁的老人还有十来口呢！”

在规模挺不小的县城里，我们住的那家旅社，位于比较热闹的地段。这里的住客，听口音外省的不少，其中南方人更多。到街上走一趟，视线所及，修理钟表、电器和补鞋、换锅底的小摊，大部都被他们垄断了。人们常说，南方人门槛精。他们家乡的人口密度更高，所以就凭着一门手艺出来闯荡四方。这个偏僻的县紧靠黄河，河那边就是山东地界了，就这样也挡不住他们到这里找饭吃，同时也把自己的手艺和外界的经济信息传递过来。

旅社后面一条背街两边，密匝匝排列了许多个体工商户的小摊，原来这是个集贸市场。这里的布局颇有条理，按服装、布匹、小百货、钟表眼镜等分开。再走几步就是水果蔬菜市场，不仅本地的新鲜蔬菜，就是边远地区的罕见水果这里也可见到许多。这偏僻之处竟有如此商品使我诧异，这里人来人往、交易繁忙，却没有大城市有些集贸市场常见的那种人声鼎沸、纷乱嘈杂的情景。

两个约近六十岁的老太太每天守着各自的铁制双座儿童车搭成的小摊在旅社门前做生意。一个肤色较白，微胖，就像该着她卖炒花生和花生仁似的，另一位则黑瘦，但很厉害精明的却在卖炒葵花籽儿。我们闲聊起来，瘦老太说那胖老太：“他们老两口也很不容易的，买花生每十来斤才能炒出八斤来。老头子每天不停地剥花生，一天要剥出二十斤花生仁呢！也不嫌手疼。还要炒。”原来，这旅社所占的是属于五六户居民门前的临街地，所以就允许这几户在此卖东西。老太太的儿女们都有自己的活计干。但她们是辛勤了一辈子，老了也闲不住。好在身子骨还硬朗，就分了个工，老汉在家剥、炒花生，她们就坐在这儿守摊儿。这些居民都是属于城关乡的，每人在城外还有六分责任田。我问亩产有多少？她们说才二三百斤。我有些奇怪，我刚跑过的几个乡，都说那里好一些的地能打七八百斤、千把斤呢！“我们这儿的盐碱多，打不出什么粮食。”胖老太很健谈：“从前，我们都是熬小盐为生的。挖一车土，能炒二十来斤小盐呢。要不，还不知怎么过日子哩！”

那天，街上人很多，老太太说，按当地习俗，每年这时候都要起大会四天，全城要唱六台大戏，戏台就扎在当街，

是剧团免费给居民们演的，可热闹了。今年虽说怕影响交通，戏台让扎在稍背一些的街上，但是，现在光景好了，城外好远的农民都进城来看热闹呢！

是的，我那次在这县沿黄河大堤内外跑过了好几个乡，路过的村子就更多了。见到的那些村子可以说有几多：村外脱坯、烧砖的多；家里堆满了盖房材料的多；村子里新盖的砖瓦房多。看到的农民们全是吃的白面馍馍，没见到吃粗粮的。穿的也很时新，尤其是小孩子们，年轻小伙儿和姑娘们，简直就和城里的同龄人相差无几。这次所见所闻，无论如何与从前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每年一灾，水漫天际，房倒屋塌，哀鸿遍野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了。是啊，多少年过去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知有多少人洒下了多少鲜血和汗水，这里的面貌终于变了！

我永远清晰地记着离开那里时的情景。那是个清晨，远处墨绿的田野平坦而广袤，公路边那阔而深的渠里缓缓的流水上罩着一层薄薄的蒸气，一座座静谧的村庄，一簇簇叶脉书签似的树木，还有隐在淡淡雾霭之中的那轮巨大的红日……

那是一片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土地呢！

（选自1989年10月《当代人报》）

火焰山下

李禾

想象中的火焰山，应当有火的赤色，其实却是晚霞般的艳红。

我在山下的戈壁奔走，寻访古人的遗踪。一千三百年前，这里曾有两座都城，一名高昌，一名交河。《旧唐书》记载，那时候的高昌王国不但种植五谷五果，还种植棉花，酿造葡萄酒。可笑中原人不识棉花为何物？说它是草，名之为“白迭”。至于交河，被现代人尊为边塞诗人的岑参在这儿做过判官，证据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他的马料帐，虽然被胡人剪成了鞋样儿。由此可见，那时候的火焰山下绝非《西游记》所写的寸草不生，满目焦土，恰巧相反，它实实在在是人庶昌盛之地，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呢！

在故城遗址的一座高大的土墩下，我停下脚步，久久地向它注目。据介绍，这是当年的祭坛，我却想，也许是国王陛下观看歌舞的楼台吧！且看土墩前的广场，好大好大，不是正好容纳全城百姓狂歌劲舞么？想当年，西域乐舞简直倾倒了整个长安城，一曲高昌乐，令人耳目一新，以致唐太宗

也沉醉入迷，下令定为十部乐之一；“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篷舞”，欣赏了胡旋舞的白居易也陶陶然了，欣然命笔题写了诗句。不过，这舞蹈窄袖薄衫，袒胸露肩，曲将终时甚至脱去上衣，长安士人颇有非议，但在这儿，肯定不以为怪，保不准王妃们也乐此不疲吧！

那真是火焰山下的辉煌岁月，它不仅给中原带去了艺术，还带去了胡椒、胡桃、胡麻、胡萝卜，一切带有“胡”字的东西，莫不由此而引进，使我们至今得以享用。“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长安受到的冲击波是如此的强烈，更可见它不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具有多么强大的实力。

都去了，昔日的都城至今只留下一堆废墟，独有交河城下的河水不废，依旧汨汨地流。看惯了千年不息的战乱灾荒之后，它终于迎来了一座新城，那就是吐鲁蕃。

这已经是一座初具现代化规模的城市，有铁路、公路，有高大的建筑，有宽敞整齐的道路，有卡拉 OK 和歌舞厅，特别是吐哈油田的开发，给它注入了新的生机。我在街市上漫游，那时正当盛夏的中午，只见一片静悄悄，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最燥热的时刻，最高气温达 48 度，在沙砾里能够烤熟鸡蛋并非虚言。直到下午四点，人们才走出家门去上班，于是，街市便苏醒了，车如流水人如潮，慕名而来的异邦之客摩肩接踵，经贸洽谈，旅游观光，各色人等操着不同的语言与口音在此交汇，比比划划，相映成趣，真好似千年盛景重现。

当然，吐鲁蕃之所以名闻中外，还在于盛产无核葡萄，游客到了这里莫不去葡萄沟一游。那是火焰山下的一方清凉

世界，一路绿阴盖顶，葡萄举手可摘，盘膝坐于维吾尔族农家小院的葡萄架下，听冬不拉弹唱，品葡萄美酒，自有一番异域情味。但是，不仅仅这一处，只要哪里有绿色，哪里就有葡萄园，就连市区的大街人行道也以葡萄架遮阴。这种独特的景观使它于燥热中又见宁谧，博大中蕴含柔情，带给穿越戈壁的旅人以无限慰藉，千年前的王朝之所以在此建都，也许是看重了这一点吧！

吐鲁蕃正在飞速发展，虽然比起内地稍稍迟慢了一些，但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据点，它已经日益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青睐。只是一宗，它还能召来古老的气韵，重新显现当年的显赫地位吗？这似乎是吐鲁蕃人面临的一大课题。

夕阳西下，我久久地滞留在戈壁，回顾四野，雾光与火焰山相辉映，迸发出艳丽的色彩，我想，这正是厚重的历史积淀与多民族创造的现代文明相融合的象征。这是一片神奇的大漠，既然能在千年前创造辉煌，也就有能力创造现代的辉煌，虽然，这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气去开拓。

一部《西游记》使火焰山大享盛名，如果续写，吐鲁蕃定必又是一个神话，不信，且拭目以待。

（选自《散文百家》1996年5月号）

鹰 与 井 架

吴 强

对于鹰，古往今来的文人雅士已有了很多溢美之词。而使我深深记住它的却是因为那场不可一世的大风，那在大风中摩天荫地又似乎托举着强健的翅膀盘旋于克拉玛依上空的两只雄鹰。

刚到克拉玛依时，仰目一望，头顶尚是蓝天丽日。我策目越过浩大空茫的辽远，庄严静穆的博格达峰看上去好似翘望着太阳的穆斯林，无比鲜明的头颅追逐着斜伸的日脚将一首圣诗潜心涵咏。

带着极大的兴致，我走在盛大纯粹的阳光下，走在克拉玛依无比繁忙的建设之中。漫无边际的行走，不大的工夫，克拉玛依崭新的街渠渐渐远了，而从戈壁上分蘖出来的钻塔却近了。蓦地，一丛丛戳在戈壁旷野上的井架宛如森森的塔松从阳光的滑翔中腾空而出。我趋近井架，石油工人正站立其上，猛地看去，他们的脸庞在阳光的洗濯下，黑里透红，就像深藏在我们记忆中的一些果品，闪烁着生机的光泽。这丰富的景象在我们日常品味过的油画中也许常常出现，但这一幅绝非是洁净殿堂中的那一种，而是镶在戈壁腹腔上的真

切图画。此时，我感觉到数百里的钢色戈壁裸露出纷呈的石子密匝匝向我铺来。它们似乎不声不响，又似乎野心勃勃，只等兴风作浪的时机。

我张开耳朵倾听，采入耳际的除了阳光还是阳光，惟觉眼睛和步态一阵板滞，忽儿就想起了“羊群啃噬着石头上的阳光，除了阳光更是阳光”的意象。是的，在这戈壁滩涂上，只有阳光的视力辉煌透亮，之外，一切生命的河流和植被的摇曳都是徒劳的，草与鸟的姿影早已被生硬的石子击落，而名字不复出现。再回首注视身后不间断的壮大着的克拉玛依城，肩着一身的阳光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和色彩，任你择取何种角度审视，也看不出昔日令人颤栗和惊恐的魔鬼城的痕迹来。这时，有声声铿锵自戈壁底层升浮起来。急忙抹去眼前蠕动的尘埃，俯身细看气贯长虹的输油管道，心就腾地一忽闪：这管道莫非是祖国大步流星时腿股上暴出的一根根强筋？！

同行的友人还站在井架上啧啧指点，我便独自走出井架高擎的格调继续前行。本来是天高秋实的八月，劲风却陡然凌厉起来。我预感到这一刻或许要发生什么事情，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极天深处。兀地，一声长唳从戈壁深处影影绰绰传来，紧接着方才尚不声不响的戈壁顿时簸扬起石子弹向高空。我的眼前接着就漫漫出卷动的尘障，此时，纵使你天大的本事，也识不透十步开外的距离，尽管我朝友人惊呼，也是徒然。这时我只感觉到口形在急风中的丑陋，而感觉不到太阳藏匿起来的方位，更无法确定东西南北。我意识到自己陷落在—场铲根斫梢的劫难中，陷落在十万面金鼓—齐擂动下，剑戈撞击出的风烟沙浪里。

我匍匐在地上，支棱起灌满风沙的耳朵，竭力捕捉着风践踏的戈壁上的可依之物，以及灵魂拢羽之后的栖息之地。我听到了自己内心脆弱的呼喊。我清晰地觉得戈壁石正从我的身边鱼跃升腾，就像踩着浪涛趋向一种人类目力不及的深度。劈劈啪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急遽而来，比人类精心营造的任何引擎声更富阔大张狂……我彻底怯阵了，便磕磕碰碰落荒而逃，当然，我与友人一道奔进了工棚。

我惊魂未定地站在工棚里，嘴巴张得如竭泽后的鱼，一览石油城胜景的兴致被毫无顾忌的大风掳掠一空。顺着友人的手指，我透过咯咯吱吱呻吟的窗子，看到两颗黑色的光点在哗哗啦啦的井架上晃动着，定神一看，是两位高空作业的石油工人，他们的衣衫在风中猎猎招展，仿佛向风强调着自己的誓言。不，那分明是两只凌空展翮的鹰，于井架之上深情地舞动双翅，有一刻，翅膀开得非常大，且在风中缓缓地上升，向我们昭示着一种茂林修竹无法支撑的悲壮和坚贞。他俩在井架上敲击出的叮当声在风中绵延逶迤流向天际。忽然，有一股劲风扑向他俩，井架明显打了个冷颤，显得力不可支。友人们立时哑了，生怕一张嘴说话就会碰落井架上的两位石油工人，然而，在我看来他俩全然对风的闹嚷不放在眼里，神情依旧，该怎么敲击就怎么敲击，给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模样。我心里一热，腹生诗意：啊，鹰/风中飞起的风度/于我们的视野上/刻出一行比感觉强大的意象/风的莽力偃卧/重创累累/而鹰成为极致的王者。

风的脚步渐渐稀疏了。而石油工人的敲击声却越来越猛烈。两位石油工人的笑声完全清晰起来。我想，石油工人就是这样将自己的骨殖栽于戈壁，接受狂风的锻打，气魄厚

重，使风峰坍塌。大漠映日，瀚海育石，而这两只克拉玛依的鹰在戈壁上兀立人生，装点江山，他们高贵的翅膀拍碎了狂风咬牙切齿的梦呓。

而今夜空澄碧，一轮皓月挂在我爬满绿苔的窗棂，恰似曾经令我凝望过的博格达峰银色的语言，仄耳可触。它告诉我，克拉玛依的风又刮起来了，值得欣慰的是那里的鹰从不知道屈服。

噢！克拉玛依，鹰与井架构成了你全部的斑斓。

（选自《散文百家》1995年2月号）

今日兰考

张守仁

清晨从郑州出发，汽车沿着郑汴公路在豫东平原上奔驰。陇海铁路平行地向东延伸，一会儿和公路靠近，一会儿远远地离开，隐没在秋庄稼的海洋之中。车窗外，不断掠过正在收割的玉米地、已经抽穗的晚稻和绿叶叠翠的莲塘。高粱红了，大豆黄了，芝麻黑了，棉田里绽放一朵朵云絮似的白花。五彩的中原大地，正在奉献出丰硕的五谷杂粮。

车子过了中牟，越过开封市区，再往前走，就是中国作协在京会员作者赴河南学习团要参观访问的兰考了。

坐在我身旁的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南丁，对兰考很熟悉。他说：“兰考现在的县委书记叫刁文，有胆有识，是个很有个性、很典型的人物。他调到兰考才三年多，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粮食产量从两亿斤左右增产至三亿一千万斤，一举结束了多年吃统销粮的历史，实在不简单。很值得写写。”

他的话引起了极浓的兴趣。接着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刁文的故事。刁文，山东省胶东文登县人，二十六岁就当了河南禹县县委书记。五十年代末大刮共产风、浮夸风时，他头脑发热，跟邻县比赛放高产卫星，搞得许多社员没房住，

没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结果受到了党的纪律处分。后来调到临颖县当县委书记时，坚决改正错误，处处想到人民疾苦。临颖老百姓没有柴烧，甚至困难到锅里煮的是白薯干，锅下就用白薯干当柴烧。他就动员县委常委和社员们一起拉着架子车，来回走几百里路到平顶山煤矿去拉煤。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去时空车，两辆车拴在一起，社员拉他一程，他也拉社员一程。打歇的时候，他和社员同喝一碗白开水；夜宿骡马店，和大家伙盖一条脏被子。他的模范行动在全县一传开，大家称他为拉车书记，《人民日报》曾发表过通讯表扬他……

我们到了兰考，在县委招待所会议室见到了刁文。他朴朴实实，像是个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农民。握手时，我分明感到了他手心里坚硬的老茧，手劲很大，浑身充满着精力。

坐下之后，刁文对我们说：“兰考历朝都穷，解放后还是穷。吃红高粱，红薯面，红辣椒，就是‘三红’也吃不饱。许多人跑出去要饭，一直要到陕西、湖南、四川去。现在，可以吃上饱饭了。红薯变蒸馍，光棍娶老婆，这就是我们兰考的变化。这变化不算大，比起新乡等先进地区差远呢。不过有差距，就有压力，就可逼着我们前进——我们到路边田头一面看，一面介绍情况，中不中？”

于是，我们坐上汽车，奔向黄河古道反复翻滚过的广阔原野。

汽车出了县城，在郊区公路上奔驰。正值秋收秋种季节，公路边上晒着许多玉米、芝麻、棉花，田里一片忙碌景象。人们干活不像以前那样，排成一溜儿线，大家一般齐，而是三三两两，东一堆，西一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

实劲，出活快，质量高。

我看得兴奋，转脸对刁书记说：“现在社员的积极性真高啊！”

刁文说：“多年来左的政策，把几亿农民的手脚都捆住了。那时干活大呼隆，磨洋工，你纳鞋底我打牌，生产怎么搞得不好？现在我们这里实行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责任制，联产如联心，农民对自己负责耕种的土地又有了感情，他们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土地。结果，今年兰考五十年来没有这样大旱过，也是三十年来没有这样大干过。大旱之年小麦又增产了一成！”

南丁说：“加深农民对土地的感情，看来是个重要问题。”

刁文点头道：“农民和土地有了利害关系，才能热爱土地，才有积极性。现在他们就怕变。有个社员包了一亩西瓜田。种西瓜要下饼肥。一茬西瓜摘下之后，地里还剩有肥力，他担心把包产田收回去，夜里偷偷地把一窝窝上过饼肥的土，掘出来，用车子拉回去。因此，我们就是强调稳定。农业农业，不单是县委领导的事业，首先是农民自己的事业。种地的没有权，农业就搞不好。”

我们的汽车在城关公社田间大车道上行驶，前面出现一片枣林，车子在这里停下。这里弥漫着一种醉醺醺、甜腻腻的枣香味。往枣林里一望，人们正举着长竿子打枣。

泡桐、花生和大枣，原是兰考的三宝。可是过去推行“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政策，大种红薯，搞红薯王国。说是红薯多了吃不完，可以打成土坯盖房，肚子饿时，可掰下土坯来充饥，既备战又备荒，听来实在是荒唐。现在剩下来

的一些枣树，原来也管不住，年年结枣不收枣。一九七八年，城关公社余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针对枣树结枣不收枣的问题，向刁文提出：“枣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刁文答道：“包吧，只要能收枣，不装鸭子屎就是了。”结果当年就收了八万斤干枣，这笔钱就可以买一辆拖拉机。整个城关公社当年收到大枣六十万斤。大伙笑着说：“政策对了头，社员吃甜头，生产有奔头。”

帮助社员打了一阵大红枣，县委书记把我们一伙人，领到余寨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刘廷贺的小院里。

土墙围着的院子里。柳树下拴着一头骡子，一头黄牛。地上卧着一头刚生下不久的小牛犊。主人说，还有一头黄牛、一头骡子轰出去干活了。两头大肥猪挤在猪圈里哼哧地叫唤着，小院里槽头兴旺。

走进正屋，五十八岁的刘廷贺乐呵呵地向我们介绍他们一家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的变化。他家十口人（老伴，三个儿子，两个儿媳，三个孙子），包了四十五亩地。一九八〇年除去上交粮食，收小麦三千三百斤，玉米七千斤，花生四千斤，杂粮六百斤，红薯两千多斤，干枣三百斤。黄豆卖了八百多元，花生卖了一千多元。用白腊条编筐也卖了二百多元。我们看见他屋里的粮食缸满囤圆，墙上贴着一张承包合同，一个“勤劳致富光荣”的奖状，还有《中国农民报》登出的他一家养五头大牲口的照片。

这样一个殷实的农户，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还穷得很，被迫到新乡、平顶山一带去要饭。三年来他们一家起早睡晚，精耕细作，由穷变富，显示了责任制的巨大威力。

我们好奇地问老汉：“你们家有了这么多钱怎么办？”

刘老汉笑呵呵地说：“俺要给儿子盖新房哩。”

近年来，兰考盖新房九万多间。我们在回县城的路上，看见大村小庄，公路两边，到处盖起了青砖到顶的新房。有的村子，竟有一半以上的新瓦房代替了原来的草屋茅舍。新房梁柱上贴着“前世吾家无片瓦，今日平民住高房”和“百事如意”、“感谢共产党”等对联、横幅，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刁文对我们说：“老百姓讲‘兴家立业’，我们也讲‘安居才能乐业’。一家人家没有像样的窝，小伙子再好也找不到对象，当干部就没有尽到责任。我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只有一条本事，就是坚决改正错误的本事。”县委书记回忆过去，一副沉痛的表情。他点了一支烟，接着说，“人的一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这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不干是更大的错误。当个领导，不能一遇问题，就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商量商量，请示请示，一拖就是半年。你在拖，人民的眼睛可是眼巴巴望着你哩。有人说，实行联产责任制倒退啦，乱套啦！我认为，这个办法继承了初级社、高级社好的方面，否定了人民公社左的东西。土地归队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核算单位不变，切实实行按劳分配，怎么是倒退呢？它是适合目前国情的。这样再稳定几年，农村就会大变样。我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

后来，我们又参观访问了黄河古道上的仪封园艺场。今年他们的苹果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四百七十万斤。场长说：“今年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任务到组，责任到人，定额记分，以分记奖，所以获得了苹果大丰收。”

场长还请我们品尝了自酿的葡萄酒。同行的老诗人柳倩

即兴赋诗一首：

黄河归故道，今日花果园。
有酒迎宾客，仪封史无前。
东昏复东明，葡萄满地生。
旨酒飘香日，无负对人民。

逗留兰考四天，我们亲眼看到了党的农业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见面不再议论到哪儿讨饭，而是谈论在哪儿盖房、哪儿能买到化肥。干群之间也不再为购粮证、救济款以及多吃多占等争吵了，关系改善了。甚至父子之间、邻里之间、亲戚之间也比以前和睦了。年轻的大姑娘、小伙子也想打扮打扮自己了。连孩子们的玩具，也不再仅仅是泥的、土的了，玩上了会飞、会叫、会跳的了。有的社员想旅游，向我们打听去北京有没有旅馆住。我们真正体会到：政策政策，实实在在是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

一九八一年十月

（选自《废墟上的春天》，张守仁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雾 岛

徐荣木

雾岛，是共和国海防线最东端的一个哨卡，这里生活战斗着一群年轻的守岛军人，也许是因为小岛太孤悬太封闭，极少有人了解守岛人的生活。六十年代初，全国著名作曲家沈亚威深入雾岛体验生活，在连队黑板上发现战士张焕臣写的一首诗，题为《战士第二故乡》，灵感顿生，情不能禁，一气呵成此曲。后经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演唱，这首歌走红全军全国，久唱不衰，这更增添了雾岛几分神秘几分诱惑。

30多年过去了，今年6月，我陪同北京海政机关的两位同志，第一次登上了雾岛。

雾岛果真名不虚传。以半山腰为分界线，线下，风和日丽，鸥鸟蹁跹，尚有渔民在空峪处安营扎寨，近年来才渐渐举家迁徙至大陆，留下空房，任凭坍塌废弃；线上，云雾蔽日，扑朔迷离。一年中有三分之二天不见曦月。置身其间，人犹进入云雾王国。传说半山腰有个“云雾洞”，洞中住着一位烟神，烟神的烟瘾来了，岛上就雾气弥漫，一溜一片，一簇一团，不多久，眼睛模糊了，脸上有湿漉漉的感觉，用手去抓，怎么也抓不住。这雾不论晴天雨天，不论闪电狂

风，雨打不去，风吹不散。

沿着用毛坯石料砌成的蜿蜒蹊径，我们磕磕绊绊地登上了雾岛高峰，依岛势而筑的幢幢营房井然有序地镶嵌在危岩叠嶂间的平旷处，像基度山伯爵住居的那个神秘的城堡。富有灵性的雷达日夜不停地警视着浩淼无涯的东海大洋上的珠丝马迹。钻进坑道，雾也鱼贯而入，东奔西窜，两壁是水汪汪的，颗颗水珠像悬挂在壁上一颗颗透明的青葡萄，用五夹板装饰的板壁已霉烂变质，千疮百孔，地上更是潮湿，犹如洪水刚刚从这儿穿过，凹处还留着一潭潭清水。长年累月生活工作在这“水帘洞”中的官兵们，不少人患上了腰腿痛，得了关节炎，官兵却对守卫的这片国土异常忠诚，从没一个人私自离过岛。他们晴晴雨雨，朝朝暮暮机械地重复着枯燥得近乎残酷的日子。

说起雾岛的战士，随同我们上岛的福州籍副大队长陈金眼眶里缀满了感情的泪水。这位曾是全军参谋业务尖子的硬汉子，是年初刚从基地训练处到这个部队任职的，作为父母官，他同情士兵，心系士兵，经常作“换位思考”。眼下已第三次进雾岛了，每次来他都要捎带一些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是啊，守岛军人毕竟还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呀。

在雾岛当兵久了，性格都能变，这特殊的环境，使兵们渐渐地被熏陶得老实、能干，甚至有点儿傻气。有的战士入伍三年都在岛上度过，不知岛外日新月异的世界有多精彩。对于艰苦，对于清贫，对于奉献，他们毫无怨言。一次，司务长小邓到沈家门镇买菜，免不了进行一番讨价还价。当他离开时，背后传来一个姑娘低低的吟唱：“阿兵哥，钱不多，

买小菜，穷□嗦……”是的，这司务长不够潇洒，但他兜里那点伙食费早就招算多次，不精打细算行吗？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酸楚。有一名战士在休假途中路过定海，正值华灯初上，他面对遍地的卡拉 OK 舞厅，处处闪烁着的诡谲的霓虹灯，竟不知所措，走着走着，头碰到了一根电线杆子，这位战士愣以为自己不小心碰了人家，下意识地连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

在岛上，我们见到了一位军官的家属，她是守岛部队副指导员陈顺良的妻子。这位热情善良、风姿绰约的杭州姑娘是怀抱着婴儿进岛探望丈夫的。此时，孩子因不适雾岛的气候正闹病。据说，这位杭州姑娘与小陈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相识的，不久又进入恋爱季节。当姑娘将这消息公开时，遭到了父母的竭力反对。在父母眼里，当兵是吃苦受累的象征，跟了当兵的，这娇女岂能受得了苦？何况，女儿容貌出众，温和大度，极有涵养，早有一名富家弟子围着女儿打转，亮出的价码十分诱人：赠姑娘别墅一套，轿车一辆，礼金 10 万……岂料，姑娘一口谢绝。

姑娘认为军人也是人，也需要爱，穷，不是他们的过错，如果让他们去经商办企业，决不会比社会的同龄人逊色，这辈子，我非他不嫁！

这段插曲，几乎把雾岛的官兵震傻，在不少人疯狂地追求金钱，追求享乐的今天，姑娘的举措，陡增了雾岛官兵在婚恋问题上的自信心。现在，这可敬可亲的姑娘踏上了雾岛，使一度孤寂的小岛处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战士把她视作圣母玛丽娅。在她面前，苦恼的舒展了双眉，懒散的变得勤快，懦弱的增添了勇气。战士亲昵地唤她嫂子。她呢，教

兵们唱歌跳舞，阵阵欢歌笑语驱散了云雾的肆虐。她觉得生活在这群年轻的守岛军人中间，心里很充实很惬意。

我们离岛时，官兵们不约而同地列队欢送。待我们登上护卫艇，在长鸣的汽笛声中远离时，官兵们依然痴情地站在海岸边，不知疲倦地挥着手，直到彼此消失在茫茫视野之中。他们知道，涉足雾岛者稀少，待下次岛外来人，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呢？于是我想，雾岛不是岛，是一座海上钢铁堡垒，堡垒里是一群有情的威镇东海的勇士。

此时此刻，李双江演唱的那《战士第二故乡》的优美旋律，又回荡在我的心中：“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这儿正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

（选自《散文百家》1994年10月号）

西藏二题

王宗仁

这里的一切都诉说昨天的故事。

——题记

天 线

重返西藏高原，中间断了三十年。

平息叛乱的那个早晨，我作为一个拿枪的共和国的士兵，和溪卡村那些黝黑的脸上挂着泪花与笑容的牧民，在村口的雪松枝上高高地挂起了一盏汽灯，欢庆用鲜血换来的第二次解放。就是这盏灯把这个结冰的藏村从隆冬里唤醒，结束了几千年饥寒离乱的农奴历史。至今我还记得我的心像手中发烫的枪管一样热腾腾。

溪卡村，我回来了！

村子仍躺在山坡上，坡还是原先的坡，沟边的石头也没有变样，只是那些熏得发黑的帐篷大都被明晰的瓦房代替，多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一间间瓦房像一艘艘古朴的船浮在绿波荡漾的海面。

进了村子，我才发现藏村最动我心的变化固定在各家的

屋顶上——

竖立在屋脊的电视天线，高的、低的、粗的、细的，还有圆的、方的……像一幅美丽的图像，贴在明净的蓝天。这是藏家新生活的触角，汇聚着四面八方的欢乐，冲刷了山乡的萧条，挑开了漫山的花讯。

溪卡村的藏民也许一辈子不曾走出山沟一步，他们世代代守着大山，点一支鼻烟，盼着朝霞红，续一把牛粪火，把夕阳暖在心窝。封闭终有沟通，今天沿着这些敏感的天线，流来了一条又一条载着外面最新信息的河，还有从中南海吹来的微熏的风。它们能把桃花染成红色，能使每一块浸满腐植质的黑黝黝的泥土长出雪莲花。

雪花已经把泥土覆盖，春天和冬日就在天线上更迭。

离开北京前，我还担心：这世界屋脊太遥远、太闭塞。现在反觉得，西藏高原的藏家人把目光放得更远。

有一家牧民的屋顶用生锈的猎枪撑着亮亮的天线，它触动了回忆的心弦，思绪突然回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早晨……

手 镯

铺满高高低低乱石的戈壁滩，很像被野火烧过的一块死地。它把绿色褪给了雅鲁藏布江边这块牧场。好一片绿地毯，那红的、紫的、白的、黄的色彩是太阳给的。

此刻，寺庙里的钟声渐渐地收起了山野白昼的余辉。

夕阳还有一半泡在江里。

钟声清亮，悠悠。

江面上漂满了金灿灿的像鸡冠花似的水波，那是钟声敲

下的夕阳的碎片。

江水储满了太阳的热能，草原的胸脯才这么丰满、多情。

牧归。

草滩深处，牧鸭女的手镯在晚照里，一闪，一亮，她挥动长杆，把散落在草丛中的鸭群吆进江里。扑腾扑腾，溅起的水珠被晚霞染得溢金流银，多像串在藏女手镯上的彩豆儿！

夜幕压窄了江面，钟声消失在山谷。江水慢慢地变细，载着鸭群进了牧村……

那飞溅的水珠儿似乎还留在晚照里，一闪，一亮。

牧鸭女把手镯丢给了雅鲁藏布江。

雅鲁藏布江像历史的手臂，今晚它戴着藏家女的手镯，轻轻抚摸着布达拉宫下这块沉重、丰盈的土地。

明月，悄没声地爬上了西藏的夜空……

（选自《散文百家》1993年5月号）

古城彩道

刘建权

如果说古城洛阳是一个俊俏的少女，那么，横贯洛阳市区的中州大道便是披挂在少女身上的斑斓彩带；如果说古城洛阳是一个绚丽的花园，那么，中州大道便是花园中的彩色长廊。

最近，在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漫步中州大道，平坦的道面，五彩的花带，临街矗立的高楼，穿梭如流的车辆……中州大道使古城变得年轻，使洛阳充满生机。中州大道记录着洛阳的沧桑巨变，也寄托着洛阳人的无限希望。

“大道直如发，春日佳气多。”早在 1000 多年前的唐代，诗人们就为洛阳都城的街道写下了清新赞颂的篇章。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衰败和反动政府的摧残蹂躏，到了解放前夕，九朝都城的洛阳已经变成了市容凋敝、道路残断的破城，全市人口不足 10 万，面积仅有 4.3 平方公里，横穿东西的大街也仅有 1.2 公里长。洛阳“尽失当年雄伟姿，触目皆是断残痕”啦。新中国成立后，古城焕发了青春，洛阳市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如今，全

市市区面积达 43.8 平方公里，道路 366 条，而最使洛阳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要算是横贯市区的中州大道啦。中州大道全长 30 华里，设快车道、慢车道、绿化带，人行道，总宽 50 多米。从早到晚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它是洛阳的大动脉，古城的主旋律！

从东花坛起步，沿着宽阔的中州东道，穿过洛阳的东大门，进入了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突然，这儿街道狭窄，车辆拥挤，人流熙攘，平房低矮，这是怎么回事儿？原来，这里是洛阳古城中的古城。洛阳是我国的七大古都之一，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市，洛阳市政府为了发挥古城优势，开发旅游资源，规划在这个区保留古城特色。1979 年，中州东道打通，使这个区封闭的城门被打开，具有经商传统的老城人民发挥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临街发展起了商业网点。很快，农贸市场，布匹市场，百货市场，饮食市场等 7 个分类市场相继形成，吸引着大批的中外游客。

出了西关口，顿觉豁然开朗。偌大的街心花坛五彩缤纷。好几路公共电汽车从这里始发，通向城乡各地。中州大道在这里又变成了三块道。漫步西行，犹如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两旁的法国桐整齐茂密，两条街心绿带鲜花争艳。进入洛阳市党政机关所在地的西工区，才真正领略到古城洛阳是一个花园式的美丽城市。花坛、花池、花带、花篱……比比皆是。在市中心，鲜花簇拥的喷水池，水柱高达 16 米，四周喷头环绕成水篱。喷泉随着优美的音响而高低升降。四角的喇叭喷头洒下片片珍珠，水下由红绿彩灯照射，使水柱变幻出迷人的色彩。以“花城”著称的洛阳市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加注重城市管理和建设，在种树栽花植绿皮的

同时，对中州大道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饰，硬化了两侧的人行道，美化了两条隔离带，种植了牡丹、月季、美人蕉、百日红等花草，使中州大道“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成为一条随着季节变化而不断变幻的色彩街道。串在中州大道上的珍珠——王城公园、西工游园是人们消遣娱乐的理想场所。这里水榭亭台，楼阁曲廊，玲珑剔透，玩味无穷。每当晨曦微露或华灯初上，住在附近的居民都要来这里散步或乘凉，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这里轻拳曼舞，舒展筋骨，流露出对新生活的会心微笑；英语亭里，青年男女相互提问，切磋技艺，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茶余饭后的各业工人，在这里游览休憩，消除疲劳，以便明朝以更加饱满的精力投入新一天的工作。

爱花成癖的洛阳人对国色天香的牡丹有着特殊的感情，临街的花池花坛里种植最多的是牡丹，每当“谷雨”前后，牡丹盛开，一街两行挂锦缀红，流光溢彩。1982年9月，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命名牡丹为洛阳市市花，每年4月15日至25日为牡丹花会会期。从1983年至今已经举办了七届牡丹花会，共接待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2100万人次。一位国际友人说：洛阳城市很美，不可不来，不可不看。

路，在脚下延伸，跨过七里河大桥，进入了涧西工业区。这里烟囱林立，机声轰鸣，现代化的大厂鳞次栉比。正如欣赏一部话剧，如果只看序幕，而不看冲突的高峰，那简直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漫步中州路也是如此，只有进入涧西区，你那满腔的热血才能沸腾，你那激动的感情才能涌起激

胸壮肺的波澜。涧西区是 1954 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在荒野之中兴建的工业新区。路，在庄稼地里开出来了，一里，二里……中州大道，不断向前。一个个气势磅礴的大厂拔地而起，形成了洛阳的工业新城，构成了洛阳的工业柱石。真是昔日帝都禁苑地，而今中兴工业城。这里有我国最大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有我国三大轴承企业之一的洛阳轴承厂，有我国最大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还有我国大型的铜加工厂，洛阳耐火材料厂也是我国耐火材料生产的重要基地。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使这些大型骨干企业又增添了新的活力，科技又给这些大型骨干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979 年以来，这个区仅 5 个厂矿统计先后就有 65 种产品获省优质产品奖，有 11 种产品分别获得国家金质奖和银质奖。

如果说中州大道是洛阳市区的一条斑斓彩带，那么，这些为国家四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骨干企业就是彩带上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沿着中州大道前进，望着这林立的大厂，听着这时代的强音，你能不为之激动、为之振奋、为之放声歌唱吗？

啊！中州大道，古城的动脉，洛阳的纽带，你连接着旧城和新城，记录着过去和现在，洛阳人民将沿着这条宽广的大道奔向更加妩媚的明天！

（选自 1989 年 9 月 26 日《建设报》）

鸟枪换炮的时候

萧重声

一层层脚手架拆除了，一堆堆破砖烂瓦拉走了，一座崭新的宿舍大楼，岿然屹立在面前。若论高大威武，就像一位巨人，头顶蓝天，臂挽白云，周围那些破旧低矮的平房，匍匐在脚下，露出了无法掩饰的窘态；若论俊俏标致，就像一位风姿绰约的仙子——墙壁是洁白的衣裙，窗户是浅绿的环珮，飘飘然自天而降，正含情脉脉地，聆听我们赞赏的话语，接受我们爱抚的目光。

这望眼欲穿的新楼哟！从图纸上的条条墨线，到成为一个坚实漂亮的实体，整整经过三个年头啊！三年，只不过人生一眨眼的工夫，但对于我们这些住在“鸟笼”、“鸡窝”中的人来说，却是漫长而难熬的。谁不想一膀子扛出座新楼来呢？只是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老来刁难我们，折磨我们：设计师的勒索，“电霸”的敲榨，施工队的揩油，彼伏此起。现在，所有这些让人气愤、烦恼的事情，都被早春这料峭的寒风带去了。我们的希冀，我们的呼声，总算变成眼中亮晶晶的泪花，脸上红彤彤的云霞了。

在一个雨雪纷飞的夜晚，分房方案贴上了墙头。人们挤

在雨地里，打着手电筒，查看自己的名字。排排坐，吃果果，我这当年的“老九”，也在四楼分到了三十多平方米。随即，我领到一张薄薄的纸片和一串铮亮的钥匙。那纸片上写着我的名字和房号，正式肯定了我居住新楼的权利。不好露面的妻子正在办公室里等候消息呢。我摇着钥匙，叮叮铃铃，一步三跳地蹿到她的面前，把住房证塞进她的手心：“走，我们上楼去看看！”

新楼的电灯还没有接火，我们高一脚低一脚，气喘吁吁地冲上四楼，咔嚓一声打开房门。屋内朦朦胧胧，我们尽量睁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转游着，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套房子“一明两暗”，居中的“明间”又被一道玻璃一分为二，进门是过厅，里面是灶房。我举步丈量了一番，这灶房足足有五平方米多，除去水池，要是支上案板，放上火炉，再塞进一张碗柜，恐怕还绰绰有余呢。墙上还有壁橱，把那些瓶瓶罐罐盒盒钵钵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正合其宜。毫无疑问，在楼道里支锅安灶的历史要结束了。灶房外面的过厅，看来比灶房小不了多少，方方正正一块子，既能会客，又能吃饭。摆开一张饭桌，全家四口围坐其旁，用不着担心脊梁骨会贴住墙壁。“亲爱的小女儿们，爸爸将不再让你们爬到床沿上吃饭了！”我心里郑重地宣布着。

居家过日子，除了吃，就数睡了。全家人老是像排骨一样，顺条儿挤在一张大床上，总不是个办法吧？现在好了，这“明间”的左手是一大间，足足有十四五平方米，正好做我们卧室。右边是一小间，也有八九平方米的样子，当然要划归女儿们所有了。仅此一点，就该说声阿弥陀佛！出人意料的是，墙上还有一溜吊柜呢。假若把它竖栽起来顶得上半

个大衣柜。我想：把棉被、网套之类的东西放在里面，不是恰到好处么？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小间隔壁的厕所里，还装着水箱和喷嘴，我拧了拧龙头，一股密集的细雨刷地落了下来，溅到脸上，凉丝丝的。今后，可以不再上街去泡那个污垢厚如铜钱的大池了，周到！想得真周到！在雪中送炭之余，还来了点锦上添花。

夜深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新楼，回到了原来居住的“艺术大楼”。“艺术大楼”在新楼南面，相距不过一箭之遥。若听名字，好家伙，既神秘，又神气。其实，这算个什么大楼哟！不过是地地道道的关中农村的“庵间房”而已。在农村，这种房楼下住人，楼上可以堆粮食和杂物。偏偏我们单位缺房，所以这座破烂不堪的庵间房的楼上部分，也就成为几户人家的“安乐窝”了。

顺着一架又窄又陡的直角形木板楼梯，猫着腰，嘎吱嘎吱地上得“艺术大楼”后，仿佛钻进了黑暗窒息的洞穴。稍不留神，头碰到木椽之上，就会暴出一个核桃。倾斜的顶棚，塌下来了，进门后还得用手撑住。墙壁早患了牛皮癣，斑驳脱落，露出了不知多少年以前的土坯。饶有兴味的是，这座“艺术大楼”的布局和我们新居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左右两间房里都住着人家，只有“明间”靠里的半间——相当于新居的灶房，才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卧室。一张大床塞进去，就顶着两头墙壁。再塞一张桌子，人在屋里就转不过身来。幸亏我们是穷光蛋，除了两口木箱，床下一塞了事，若有大衣柜小衣柜之类，那就更让人发愁了。无处支灶，我们只好因地制宜，利用过道，仅留一条窄缝，供人出入。如果我一人站在那里做饭，其他人就休想上得楼来，这

使我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为了避免摩肩接踵，我平时把孩子们赶下楼去，让她们在院子里“经风雨，见世面”。

因为房小檐低，又塞张大床，临街的小窗户就打不开了。热天，楼上闷如蒸笼，进门后身上立即涌出一层汗水；一觉醒来床上会印出一个湿漉漉的“人”形。总不能闷死在里面啊，经过请示，我们把窗上的玻璃全部打掉，好透一口气。同志们知道楼上的情况，常常开玩笑说：“你别看那地方又烂又窄，其他人想住还住不上呢！那地方住过画家，住过作曲家，住过舞蹈家，现在轮到诗人了。那真是个熏陶艺术人材的地方啊，要不咋叫‘艺术大楼’呢？”这时候，我除了报以苦笑，又该说些什么呢？

谢天谢地，我们要与“艺术大楼”告别了。天色微明，我们就奔赴新房，扑里扑腾地收拾开了。妻子在擦玻璃，那认真劲儿，不亚于绣花。我买来一柄拖把，反反复复地拖着那平整的水泥地板。拖把来来回回，那丝丝的声音，像首温柔、细腻乐曲，撩人心弦，听着听着，心里不禁有些陶醉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图中，扑入眼帘的，尽是迷人的色彩。

这雪白的墙壁，一尘不染。我想，最好不给墙上打一颗钉子，贴一幅画，让它永远保持着洁白和光亮，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美吗？天花板上吊着的日光灯，疼人极了，天蓝色的灯罩，乳白色的灯管，淡雅、妩媚，毫无刺眼和拙笨的感觉。我试着拉拉灯线，一片柔和的银辉立即洒满房间。我那本来蒙着一层云翳的双目，顷刻间也似乎变得亮晶晶的了。像扫瞄器一样，我的目光落到了那碧绿的钢门钢窗上了。无

须讳言，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这玩艺儿我还是头次见到，摆弄了好一会，才找到了开关启合的窍门。这钢门钢窗之外，还镶着一层草绿的窗纱，夏天，凭借这层薄薄的轻纱，就可防御蚊蝇的袭击，碗沿上少了那些红头绿身的不速之客，该减少多少恶心和烦恼呢！

这当儿，几位同志参观我的新居来了。他们在房中转了一圈，欣喜而感慨地说：“这下子，你算是鸟枪换炮了。这房子比起‘艺术大楼’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我听了，心里不免乐滋滋的，老是紧闭的嘴巴，也被惬意冲开了。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人口暴溢的大城市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知识分子，既没有深长的资历，也没有重大的贡献，而终于能有这么一套住房——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窝儿，真可谓“天已降大福于斯人也”！我能不庆幸？能不欣喜！只差没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当晚，我们就住进新房了，往常老爱失眠的妻子，倒睡得安稳，静静地，没有一丝声息。是啊，在“艺术大楼”里撒野逞凶的老鼠，再也不可能突然从她脸上爬过去，吓得她心惊肉跳了。而我，往常头一挨着枕头就会呼噜的人，反而眨着眼睛睡不着了。我披衣而起，点着一支劣等香烟，悠悠然吸着，转着，转着，想着，思绪如同袅袅的烟雾，在房中飘散着——何不把这难得的乔迁之喜，忠实地记录下来呢？大概不会有人认为是浅薄的炫耀吧？

1983. 12. 15

（选自《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小 街 风 情

陈残云

盐运西街是一条靠近闹市的小街，长度大约不足三百米，宽度可行两部汽车，连结三条小巷，是一个比较幽静的住宅区。我住在临街的一层楼宇里，不知不觉已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整洁的街道留下我不少脚印。

刚搬进来没几天，一位当官的老朋友来看我，赞赏说：“你住在这里很好，靠近老百姓。”我本来就是老百姓，无所谓靠近不靠近。我欣赏它的好处却是闹中带静，四通八达，到哪儿去都有汽车可通。

租住的房间也还过得去，是华侨房子，实用面积六十多平方米，三个小卧室，一间客厅，一个走道式的小饭厅，还有独立的厨房、浴室和坐厕。房子狭小而陈旧，但我们一家五口，还可乐业安居，和左邻右里和谐相处。

头五年，住得安静而愉快。清晨，一些年轻小伙子在街上打羽毛球，洋溢着轻快的笑声。黄昏，小孩们在街道上比赛小足球，发出热烈的高叫。这些声音，给人带来快感。我在写作之余，很喜欢欣赏他们的玩乐。

可是一声惊雷，把街上的孩子轰走了。“砸烂狗头”的

疯狂标语，糊满了街上的墙壁，我和一些邻居的门前，也给侮辱人格的标语涂污。我被邻居们护卫着，有人愤愤不平地对我说：“我替你把手标语撕掉！”我阻止。又有人对我说：“谁要抓你，你就躲到我家里来。”在混乱恐怖的“文攻武卫”中，全体街坊邻里自发地集合起来，把街道的几个通道封住，每户派人值班放哨，没有证明不许进入，晚上也派人放哨，我也参加放哨；这里，不管党内党外，“造反派”或“走资派”，大家和衷共济地保住了安宁。这时，我想到老朋友说过的话：“你住在这里很好，靠近老百姓。”这确是意想不到的好处，人们之间的患难相扶是最大的好处。在历史上，广州居民有过不少防乱的经历，这就是经验。

“四人帮”被埋葬以后，清除了垃圾，街道又回复了宁静。

随之而来的是开放、改革的巨大呼声，像山洪暴发一样，震撼了古老的大地，震撼了疮痍满目的乡村和城镇，盐运西街的宁静也被震破了。收录机放出的粤语流行曲、电视机传出的欢声笑语、收音机播出香港商业一台的新闻报道，代替了往日孩子们比赛小足球的欢叫。

接着出现了自由市场。整条小街都摆满了小摊档，猪肉、牛肉、鱼肉、鸡、鹅、鸭、瓜果、蔬菜、蛋品、咸杂，丰富的物品和多彩的色泽，吸引着就近的家庭主妇和周围的居民。附近有几个颇有规模的肉菜市场，如禺山市场、惠福市场、广大路市场，都是“铁饭碗”市场，日渐失去了热力，盐运西街却是闹哄哄的，叫卖声、议价声、谈笑声、低嚷高叫声，不绝于耳，扰乱了街道居民的安宁。

我的楼下就是闹哄哄的市场。好在闹成一股不刺耳的声

浪，听不到谁在讲话，谁在尖叫，只有一片时高时低的嗡嗡响，从早上七时到十二时，下午三时至六时，余外是寂然无声，不大妨碍我写作和阅读。还有点好处，买菜方便，什么时候来了客人，都能买到烧鹅、烧猪肉或盐□鸡来接待，而且还能吃上新鲜的便宜的鱼和菜，例如鲜活鲩鱼早上每斤售价二元，下午六时后一元三、四角就能买到，放在冰箱里，第二天一样新鲜。蔬菜也一样。

下雨天，小街上呈现了一副彩色的奇景。嫣红的、浅绿的、淡素的、深蓝的、乌黑的、洒花的、间条的，各种颜色、各种款样的折骨雨伞，像一条彩龙一样，缓缓地蠕动。色彩一年比一年鲜艳。闲暇时凭窗眺望，有一种喜悦感，雨伞的色泽，仿佛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生活的日新月异。我喜欢雨中的街景。

两年多以前，任仲夷书记曾来探望我，看了周围的环境，有感而说：“看来作家住得并不好。”我习惯于随遇而安，也没有忘怀革命年代的艰苦岁月，对领导的关怀，内心感激。随后，我领着仲夷到楼下察看市场。他对市场的丰富物资似乎感到高兴，而对菜摊上新鲜茁壮的豆芽，却发出疑问：“这些豆芽是不是用尿素培育的？”我回答不知道。新近兴起的自由市场，那时还显得混乱，个体户作伪、短秤、乱抬价的事时有发生，这些事老任不会不知道。他察看一会就走了。

几年来，这市场的物价时涨时落，总的趋势是稳中有降。去年底作了整顿，改善了随处摆卖的混乱局面，把摊档固定了大小位置，排列于街道中心的两旁，顶上盖搭着红、蓝、绿、白的塑料硬篷，遮雨遮阳，整齐美观，入口处写上

“文明经商礼貌待客”的大字，现出一种崭新气象。它的旁边，有一间装饰华美、有空调设备的友谊商店，还有综合商场。

现在，全部摊档井井有条，大致数字是：蔬菜七十档、副杂食品四十档、鲜活水产二十档、鲜猪牛肉二十档，鲜光鸡光鸭十档、熟肉五档、烧鹅四档，明码实价，也不短秤。当然价钱时有变动，如中秋节后的活鲩鱼，每五百克一元八角，鲜牛肉二元半，鲜猪肉二元六角，全瘦猪肉三元八角，光白鸡二元八角，烧鹅五元，烧鸭四元半。蔬菜品种繁多，较大宗的白菜每五百克二角上下。反季节的生菜约四角。几年来的生活指数在稳定中稍微偏高。从盐运西街的市场风貌中，看到了广州市民的生活特色。

和盐运西街相连的西湖路，是一个灯光市场，拥有近五百个卖衣服的摊档。每当夜幕降临，盐运西街市声静止，西湖路上近五百支亮晶晶的光管又照耀着拥挤的人群。灯影笑语，人声喧腾，织成一幅活跃欢快、风情独特的图画。生活这样的环境中，人也觉着年轻。

广州，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城市，开放与改革的歌声给它带来新的生命。

（选自《处女海》，凌渡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

市 声

吴 文

我的故乡是闽南的一座古城。她留给我至今难忘的是童年时期的市声——那没完没了、从晨到夜的亲切声音。

当晨曦刚刚透进窗棂，从小巷深处就传来了“有尿要倒哦——”的呼唤声，那是新门外农业社的女社员，一个个晃着钩形的金银耳坠，满头散发着茉莉花香，丰腴的腰身挑着橄榄形的木桶，进城来扰你的清梦了。

紧接着，不甘落后的，那讨人喜欢的甜嗓音在叩着每家的后门：“买米汤水，买泔水□！”

这时，母亲高高兴兴地迎出去了。母亲清除了泔水、尿桶后能进益一把分币，它给我贪馋的童年留下甜滋滋的回忆。因此，我有一个时期极愿意成为一个挑尿桶倒泔水的。我觉得这种劳动可以穿巷走家，不但新鲜有趣，而且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还俨然是个圣诞老人，给他们送来闪闪的分币。

几乎是她们前脚刚走，卖早点的七嫂后脚就跟来了。“卖碗糕啦！要买的来哦！”七嫂清脆悦耳的声音立刻溅满了我家居住的古宅大厅。年轻的七嫂头髻上盘着玉兰花串，像唱歌般地夸耀着自己的货色。她手上挎的油渍渍的竹篮里摆

满了碗糕，油炸糕，满煎糕……散发着甜甜的油炸香味，诱人馋涎欲滴。这时，再会赖床的我也由不得一骨碌爬起来，赤脚奔了出去。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家门外的市声。

顺着远远传来的敲匙碰碗声，我常捏着五分小票去寻找刘大伯的上元丸担。

这种上锅下灶，围以木框，烧以炭火的小食担有故乡的地方色彩。那框架像小栏杆，还雕花刻人，或是“陈三五娘”或是“红楼二尤”的故事，并髹以红漆。中间的礼帽形马口铁锅，盛的是一格清汤、一格浮着诱人食欲的上元丸。这洁白的糯米丸子，用冬瓜糖、花生仁、桔皮、白糖、芝麻和少许的葱白作馅捏成丸心，香甜可人。它是我童年最喜爱的甜食。

然而仿佛要与这忠厚的刘大伯一竞高低，有一只罐头盒发出“□□”的碰击声，原来是“卖菜三郎”挑了南国特有的小螺担来了。他把担子停靠在龙眼树下，拿起一只剪刀，慢慢地剪着小指甲般大小的海螺尾部，然后把它们集聚在磁盆里，浇以糖、蒜汁、酱油、醋或是辣椒汁。他看我正站在旁边盯着那只磁盆，便大方地给我嘴里塞了一只小螺。这当儿，我觉得自己吮吸的不仅是螺肉，而且是在品尝那大海的风味。

刘大伯对小海螺担嗤之以鼻，常常嘲讽说：“骗小孩子的东西！三郎！你会发大财的！”

卖菜三郎会反讥几句：“赚吃赚吃！不赚没吃！我不像你上元丸包沙，不浮！”

刘大伯于是大惊小怪地喊了起来：“皇天在上！你敢冤

枉人？我这上元丸是粒粒货真价实的！”

这时候，刀拍在木板上吆喝着“切花萝卜！切花萝卜清又脆！”的糖水萝卜担子过来了。他的喊声不但使吵嘴的两位戛然而止，连我也立即转移视线，盯住了走来的拐脚汉子。

大磁盆里有一头是白渍渍的清脆水萝卜，另一头是已经切成各式花样、染了颜色的糖萝卜。

这挑担的拐脚汉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常常戏谑地称他为“摆渡的”。据说他原先是个番客，有一年过番回来碰上土匪，被剥得精光。幸而那帮铤而走险的好汉只打断了他的一只腿，而让他逃了一条命。他会用一把薄刀把萝卜切成不同形状的花样，只要花一分钱就能享受玩与吃的快乐。

普通的一只萝卜，在他的巧手切削下会变成叠折式的花灯，一拉一串的嫩饼灯。萝卜还能串成盆花，浇以花生糖浆入口即化。愿意吃咸的还备有芝麻油拌辣酱。

这些勤劳的手艺人，凭着精湛的手艺劳动吃饭。他们迎合顾客的兴趣，随着节令不同的变化，卖上元丸的到冬夜就会改为卖肉粽，卖萝卜的就会改为卖肉包。但他们待客如亲人的笑脸却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一直在想，生活中倘若失去他们，我童年的梦是不会这么绚烂多彩，我的回忆也不会这么绵缱绻连绵……

我说了半天，真正的古城市声当然不是在巷里。

闹市的喧哗声是任何城市都会有的，但我不想提它。这里，我只想说一说故乡的夜市声。

当夜幕笼罩着古城，城市华灯初上，影剧院飘出悠扬的乐曲声，满身花香的南国卖花姑娘便穿着木屐伫立在街头巷

尾。“买花来□，买花啖！百合，夜来香，玉兰，含笑……谁要花哦——？”脆甜的声音迎着每一个游人。这多情的南国花市，不仅使少男少女动心，也使孩子们着迷。

偏是这会儿母亲要我回家了，满城的木屐声也挡不住母亲的执拗劲。我像一只馋猫，幼小的心灵也能察觉到社会上物质丰富正是市声诱人之处。

到半夜，空巷中还有人在叫卖“三层糕”，那有节奏的叫唤声是我童年梦中的小夜曲。离开家乡多少年了，但我还常常在客梦里听到它。

我怀念故乡的市声，它牵连着童年的多少欢乐的记忆？然而十年后，当我回到故乡，却使我深深地失望了。那是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为避免参加派性武斗，我“逃亡”回到故乡。

家里，父亲和弟弟，大舅和外甥们天天都在无休止地辩论，弄到在餐桌上摔碗丢筷的程度，吵得令人头疼。每天早晨，再也听不到“有尿要倒哦——！”“有泔水卖啖！”的亲切声音，而代之的是高音喇叭里两派激烈的“语录战”。

一天清晨，一阵沉闷的锣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母亲揩着泪从大门外趑进来，“砰”地一声关上门，“罪过！这样折磨人……”我正想问她是怎么回事，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我请罪！我是混进国内的特务分子……”从门缝看出去，原来是那位卖萝卜的拐脚汉脖子上挂着一块大黑牌，手里提着一面大铜锣正从门前走过。这被抢劫过的番客，何时竟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我叹息了。

早餐的桌上只摆着两碟咸菜，母亲用歉意的眼光看着我，说：“街上什么也买不到。”

我问：“七嫂呢？怎不见她来卖早点？”

母亲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我们还差她两块碗糕钱呢！”

我放下饭碗说：“我去送还她！”

“往哪里还？她被送去上山下乡了，说她是无业游民。唉！现在连买一根油条都很难。”

我问起刘大伯的情况。母亲说：“早停业了。大炼钢铁那一年叫他去街道食堂当炊事员，后来……好像搬到新桥头去了……”

我心里一阵荒凉。

一整天，除了汽车呼啸声就是高音喇叭声，童年时期的众多市声仿佛全从地面上销匿了。

然而我却难以忘却那带给我童年欢乐的市声。我怀念那些正直的劳动者，他们倒尿买泔水，肩挑叫卖，不但利人利己，也利社利国。他们还用自己的勤劳和灵巧给生活增添了色彩。而这些，我们难道就从此不需要了吗？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难道只能是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关系吗？

我心里呼唤着：故乡失去的市声，你什么时候会再复苏？

不久以前，为给单位买花苗，我又一次回到故乡。汽车抵达时，古城已是万家灯火了。

蓦地，我又听见了那常萦回在梦中的卖花姑娘的娇唤声：“要买花吗？百合，夜来香，含笑……”激动的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童年的欢乐啊，你又回到了古城！于是我买了一束含笑，紧紧地护在胸前，惟恐把它再失落在花市。

我好不容易才穿过人群走入静谧的古城夜巷。那原先坎坷不平的石子路不知何时已改成了水泥道，变得更加洁净了。夜风飘来一阵阵清幽的花香。童年的回忆一下涌上心头。我徜徉着，寻找着，多么希望能听到往昔的亲切声音。

这时，一阵碗匙碰击声迎面扑来。是一担我熟悉的上元丸担子停放巷口。我下意识地正想开口叫一声“刘大伯”，不料，抬头的却是一张年轻的面孔。

“老牌的上元丸！要哦？”

“要要要！随便来几粒！”我像迎接至亲老友一样捧接过来。几只元宵，寄托我多少乡思。吃进嘴里的汤团，仿佛在诉说离别情。

“你家是……”我嗫嚅地问。

“姓刘！不是当客人面前诉苦，十多年没干这行当了。我是九岁跟父亲学的手艺，20年后才重操祖业！”

卖上元丸的原来是小刘。

“令尊呢？”

“他早过世了。唉！”卖上元丸的一声长叹揪住了我的心。他停住锅瓢，“不在的人多了！你认得卖切花萝卜的拐脚吗？他也被折腾死了。前几天我刚参加街道的平反大会，就有五个……”

我不愿意多听凶耗，逃也似地走出巷子。

一夜里，我在旧居里睡得很不安稳，直到晨曦入窗时我才朦胧睡去。忽然，“满煎糕！油炸桧！烧烫的碗糕啊——”这是多么熟悉、亲切的叫唤声，但已不是儿时听到的那样圆润悦耳，而是带有老年人的嘶哑声了。我披衣走出房门。啊！是重操旧业的七嫂。

七嫂告诉我，她前几年就搬回城了，三个子女都已安排了工作。前不久，商业部门努力增加服务网点，她在家闲不住所以又重新出来干她的老行当了。

她笑着说：“你多年没回来了，该上街去走走，跟你上一次来时比可大不一样了！”

我听了心里高兴极了，推开门，迎着满城诱人的众多市声走去。从故乡复苏的市声中我分明感受到了祖国经济恢复发展，阔步前进的强烈旋律。

（选自《处女海》，凌渡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

昆明夜市

高洪波

在北京住久了，不免生出一种惰性，这惰性的表现形式就是懒于上街。北京的确太大，人也委实太多，以王府井的繁华，大栅栏的喧嚣，东单、西单的热闹和拥挤，都时时在验证着基本国策的必要和及时。若无火烧眉毛的事宜，却要你到人湖里畅游一番，体味一下“人口密度”的滋味，确是一桩令人望而生畏的事。

昆明就不是这样。

在我的记忆里，昆明城是小巧玲珑的布局，一条名曰“东风”的主干道，横贯全城，在中心交会点上，有一漂亮的街心花园。十字交叉路口，常见老妇人摆一小摊，叫卖一种名为“烧饵块”的小吃，此外就是疏朗有致的商店、水果摊。人行道上，还时时被廊房所被覆，使游人免于雨淋之苦。当然，这雨淋之“苦”的“苦”字，只是我个人的理解。而昆明的居民却大多不以为苦，每每在小雨中从容行进，旁若无人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昆明的雨也很可人，常常点到则止，转瞬又让位于明丽的晴空，热烈的高原的太阳。只在空气里留下一缕清馨和爽快，替路面镌上几面浅且

小的水镜而已。雨，雨中的行人，行人脚下的街道，给人留下一一种恬静的印象。

说起来，这种印象已是七年前的事了。最近又有机会到昆明小驻，竟发现了许多变化，这变化于昆明人来说可能感觉不大，对于我来说，则记忆里的那种恬静感被一扫而空，留下的是斑驳陆离的色彩，蒸腾升发的气息，以及富有闹市特征的喧嚣。最为突出的，是昆明风味独具的夜市。

前面已经说过，早些年昆明街头的小吃几乎为烧饵块所垄断。那是一种米粉制成的薄饼，吃时用炭火烤至金黄，然后涂上香且辣的豆瓣酱，左右一合，便可食用了。饵块固然好吃，但未免失之单调，有方便之长处，却又让人感到不便。比如不善啖辣的北方人，只能望而却步；又如口干舌燥饥火如炽的人，更盼望的是汤水齐备的小吃，烧饵块虽佳，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这种缺憾在夜市上是再也找不到了。它已经被各种食品摊上熊熊的炉火烧得一干二净，随着这炉火飘散的，有烤羊肉串的清香，有烧豆腐的美味，有小锅米线和鸡汤饵丝的气息，还有炸鹌鹑和米酒汤圆的滋味，它们混合在一起，夹杂着个体户厨师们热情地吆喝，刺激着人的味觉神经，让你有目不暇接之感。

我在一张狗肉桌旁的长条凳上坐了下来。主人是一位老妈妈，正在极用心地用片刀切煮狗肉，灶上是滚滚的肉汤，桌上排开五六只磁碗，一只偌大的托盘里，摆着半只煮熟的狗，这半只狗好像是小摊上的商标和招牌，在大大咧咧地招呼着馋嘴的游人。左右一望，均是狗肉摊，桌上也都放着半只狗，看来它们确是商标无疑。这种以煮狗为记的狗肉

摊，颇有一点古朴粗犷的气息，或许当年狗屠樊哙也是这般模样，也曾用这半只狗款待他的连襟刘邦！

狗肉是一种让你吃过一次便永远难以忘怀的美味。我因故乡在内蒙，从小便受一种“狗肉上不得席面”的古训，一直没有尝过。究其实，是地方习俗所至，内蒙是畜牧业地区，肉类颇丰，不以狗肉为珍；另外是因为狗能助人牧羊，为人守屋，功劳不小，当地人们亦不忍吃它们。一条狗的实用价值，往往在它的皮毛，肉是常常不吃的。及至参军到了云南，这种观念便渐被打破了。记得初次吃狗肉时，是在一个野营拉练经过的村庄，事务长买得两条肥狗，为了便于报账，在发票上专门注明“地羊两只”。然后在树上吊起狗颈，以冷水灌呛而死。据说这是最高明的杀狗之法，狗血补人，这样能使血一滴不漏地存留于它的体内。更奇怪的是对狗肉的烹制法，浑如北方的杀猪一般，不剥皮而烫毛，然后以利刀刮光残毛，连皮带肉煮成一锅。总之，这次吃狗是一桩十分庄重的事，远非我想象的那种“上不得席面”的狼狈。狗肉煮好，分得满满一碗，一尝味道甚好，和牛肉的滋味相近，于是，在生活中再看到吠叫不止的狗，便多了一番心思，常常捉摸它煮成肉汤的模样，细想来，这未免是对于狗的友谊的一种亵渎，可谓人心不古吧。

老大妈的煮狗肉又别有一番风味。

她先将瓷碗里堆满碧绿的薄荷叶，然后把切好的狗肉片码在绿叶上，碗面便凸突起来，给人一种充实之感。紧接着是过水，水是滚开的，拿起大勺向肉碗淋去，凸突的肉便顿时萎缩成半碗，淋两道滚水，薄荷叶便烫熟了，这时再浇上一勺高汤，连汤带肉端到你手里。鼻子里便顿时嗅到一股薄

荷特有的清香，这狗肉的妙味，令人馋涎欲滴。桌上是各种调料，醋盐椒末甚至味精都听凭自取，兴致高的，还可小酌几杯云南特产杨林肥酒，我的邻座是两位年轻工人，便采取了边吃狗肉边饮酒的方式，喝得兴起，竟于夜色中划起拳来，嗓音浑厚欢快，充满了活力。

薄荷叶与狗肉相合而食，味道是十分独特的，狗肉性热而薄荷性寒，有互相弥补短处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薄荷叶的色泽碧绿，味道清爽，在赏心悦目之余，给口腹以极大的快感。发明此种食狗肉法的人，无疑是一位烹饪的奇才，只是年代久远，已无法去考证了。

昆明的夜市，有好几处。较集中的有大观街、青年路和东风广场。大多是从下午六时开市，到夜里十二点收摊，历时六个时辰。除去各种小吃，尚有花展、衣料服装、游艺等内容，步入夜市，恍若步入了一个热闹的集镇。生活的丰富性一古脑儿展现在你的面前，使你产生一个又一个联想，获得一个又一个刺激，而那些活跃于夜市的人们，都用自己的技艺和嗓音，在呼喊和吸引着每一个游人，他们在竞争，在比赛，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美化、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使生活的滋味永远脱离单调和刻板，一如告别那单一的“烧饵块”。

这，好像是必然的趋势。

在我离开夜市时，在一个角落里还真见到了卖烧饵块的小摊，于是我顺手买了一块，咀嚼着，也咀嚼着一个浅显的道理。昔日的滋味，竟有些模糊了。都怪那碗薄荷狗肉！

1984年11月

（选自《波斯猫》，高洪波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生意人

吴庆安 胡德阳

平顶山的舞钢区有个尚店，尚店有个农民叫王贞，他经营着一个经销店生意做得很出名。一搭上腔，他就倒出了他的生意经——

不瞒你说，生意里边学问大哩，三年能学出个木匠，可不一定能学出个买卖人。做买卖得先得到三勤：嘴勤、腿勤、眼勤。得弄清楚人们需要啥货，喜欢啥牌子。咱街有几个闺女在大城市里有亲戚，经常寄衣裳回来。其他的闺女媳妇，就盯着她们穿的布料颜色，一窝蜂的要买。咱做生意的，没事就得走动走动，打听打听又有啥新式衣裳，瞅准了，就赶紧进货，保证受欢迎。

这二年，在买卖行里出现一股邪气，拿假的充真的，拿次的充好的，净坑人。他们这是菜瓜打锣——一槌子的交易。咱呢，做的是门头生意，赚的是回头钱。别看现在农村日子好过了，人们腰里都有几个钱，是见天喂猪罗罗罗罗叫来的，是鸡屁股眼里一个一个抠出来的。你把人家坑了，坏良心！嘿嘿，不怕您见笑，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多少还有点迷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可不想死了之后，到阴曹

地府受那酷刑。

你们听说过“同盛合”吧，早先是舞阳城里有名的店铺，都说在他们铺里买的东西，秤头只多不少。有个人不相信，去买了一斤盐，出来拿秤校校，真的多二钱。这事传开了头，有了名声，生意越做越旺。你说啥？多给秤头生意不赔？这你就外行了，赔不了，这叫薄利多销。做生意不能暴利。国家有物价政策，按规定，价格可以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浮动，我可从来不往上浮动。比方说火柴吧，有人卖3毛一包，我卖2角5；40码的解放鞋每双定价4块2毛8，我卖4块1。做生意不能光图赚大钱，也得讲个方便群众。只要群众需要，一分钱利的生意也做。

做买卖还得有个气魄，拿你们知识分子的话说，叫取信于人，对吧？这就得不坑人，不哄人，做个老老实实的正经人。只有这样，顾客才相信你，才依靠你。有一回，一个农民来买几块钱的东西，掏出来一张新崭崭的十块票子，我捏到手里觉得有点厚，指头一拨磨，发现是两张新十块票子粘到一起了，就当场还给了他。他说：“你心眼真好！下次买东西还到你这里。”

做买卖单凭货真价实还不行，还得热情待人，礼貌待客。你板着一张脸，像别人欠你二升黑豆钱，谁还上你眼前来？顾客进门，得先跟人家打招呼。有时候你正在数钱，顾客来了，得马上数到整数停下，赶紧招呼人家，决不能叫人家久等。

有的顾客嘴头厉害，好说怪话。不过也没啥，只要你心平气和，一笑就了啦。那天有个留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进店来，我向他打招呼，他朝我龇一下牙。我问他买点啥，你猜

他咋说？他说想买个大闺女。说这话太没教养，我心里直想冒火。可又一想，我是做生意的，不是跟人家吵架的，论年纪，我是他爷爷辈，不能没有一点肚量，就恶气变好气，从货架上拿下一袋印着漂亮妞妞的雪花膏，递给他：“看看这个闺女好不好？”你别说，那小子真有一股邪劲，直着眼看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张两块钱，“啪”一声拍到柜台上，说：“老头，就冲你这份好心，我买了！”他还连声嚷嚷，不叫我找零钱。

来的顾客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各有各的爱好。做生意还得会琢磨各种人的心理，比方说老头儿，想撕块布，你就给他拿颜色重的，能经久耐用的。换个年轻人呢，就得拿颜色嫩一点的，式样新的。要是一男一女羞羞答答的年轻人进店，不用问，准是刚办完结婚登记，他们要买牙刷、牙膏，就给成双配套的；要买茶瓶，就给带双喜字的，保他们乐意。

这几年，我富了，成了俺乡有名的富裕户。我觉得这主要是党的政策好。要不，前些年我年轻力壮，咋没富呢？我一想到这些，就觉得不能忘本，得报答党的恩情。这四年中间，我纳税 800 多块，交管理费 1000 块。我前后买过三辆小拖儿，给群众犁地、打场，不收分文。赵家、李家困难，没钱建房子，我就帮他们 3000 多块。有三四个乡邻想搞副业没本钱，我也支援他们两三千块。大家都富起来多好！乡领翟国友是搞运输的，小拖儿翻车砸死了人，赔人家 3000 多块钱，加上分家负债 1000 多，他躺倒起不来了。乡亲遭了难，我咋能看得下？前后给过他 800 块钱，帮他办了个经销店，每月能赚 100 多块钱，时运慢慢转过来了。……做一

点响应政府号召的事，我心里就舒坦些。

看我，老没成色，老王卖瓜，人家不夸自己夸，惹您见笑了。

（选自 1988. 6. 14. 《河南农民报》）

这里没有冬天

蹇国政

北海市，顾名思义，她一定是位于黄海以北的一个海滨城市。

然而，我错了。“如果到那里去找我们北海市，那只能越走越远！”曾副市长笑着说道。

说真的，在来北海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甚至也不会相信，她竟然会亭亭玉立在我国大陆的南端。

那天早晨，我们早早地就从南宁出发，乘汽车向东南而行，经过钦州地区和合浦县，只用四个半小时，就到达这座名副其实的明珠城市。

花的世界

北海市，它的真实坐标在北部湾的北岸，是一座四季如春、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也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港湾。这儿物产极为丰富，是我国有名的珍珠产地，素有“北部湾的明珠”之美称。自古以来，驰名中外的“南珠”就盛产于这里。“青纓”、“杨梅”等五大古珠池亦在北海。所以古人曾有“明月五池疑鹭社”的诗句。

时令已是 12 月下旬。我从电话里得知，西安的最高温度只有零度，最低温度已经降至零下 10 多度。而北海市却温暖如春，人们连毛衣也用不着穿，街道上简直就是一个花的世界。马路两旁、庭院街心，各种奇花异卉，竞相开放。连北方来的养花能手也叫不出几种花的名字，我们这些疏于养花的人，简直成了花盲。不仅地上如此，连街道两边的行道树也是花红如云。这种树，我们在南宁时听说叫羊蹄树，因其叶子形似羊蹄而得名。到了北海市，有人又叫她红兰花，因为她的花瓣形似玉兰，而色呈玫瑰红。望着这满街满树的鲜花，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这里没有冬天！

南国北戴河

位于市区近郊的白虎头滩，当地人骄傲地称她为南国的北戴河。他们接着又强调说，这里比北戴河还好！她有着更多的未被开发的自然美。这条海滩，长约十公里，地势很平，沙子很细，颗粒也很均匀，全是白色的石英沙，连一颗小石子都找不到。

站在沙滩向海上望去，远处停泊着一排归航的渔船。一涨一落的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涌向沙滩，又很快退了回去，周期性地发出“哗哗哗”的涛声。夕阳把橘红色的光华撒在海面上，映出一束闪动的金色光点。慢慢地，远远停泊在海里的船只几乎成了灰色的剪影，海水则显得更深更蓝，沙滩在夕阳的余辉里泛出一片银白，这一切，把整个海滩装扮得更为美丽迷人。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来自西北高原的人来说，看海，简直成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乐事。几十岁的人，一下子变成孩子似的，在沙滩上追逐戏嬉，拍照留念。有的站在、

坐在沙滩上照了还不行，还要下到水里去照。有的竟然发疯似的一边喊着一边扑向大海，连鞋都忘了脱掉。

一会儿，有位渔民驾着小小的木船上滩了。跟前的几位同志，有男有女，不由分说，便一拥而上，跳了进去，弄得小船猛烈地摇晃起来，差点儿翻了。于是，引得大家一阵痛快的大笑。这笑声和着海水扬波的声音回荡在沙滩上，充满了诗情画意。

面对大海，我似乎才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大”，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人是渺小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

美丽的海石花

北海市水产馆，简直就是一座公园。这里，不仅环境很美，而且水族生物的种类也很齐全。那两尺多长、碗口粗的大虾，一尺见方的海蟹，各种奇形怪状的鱼类和海兽，我几乎都是第一次看到，实在令人目不暇接。

出了水产馆，门外就是一个不小的贝类市场。满地的海石花和贝壳制品，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实在叫人流连忘返。热情的主人告诉我们，别急，等晚上再出来，还有更好看的哩！好容易待到天黑，街灯亮了，街道上一下子变成了海石花的世界。这时候，商店有些已经关门，其他货摊也都收起，惟有海石花满目皆是，好像把满世界的海石花都集中到这里来了。灯光下，一街两行，银光闪烁，如山如海，壮观至极。那一串串用珍珠、海螺等加工的项链，十分精美漂亮。特别是用海石花制作的各式盆景、花篮、日用品和工艺品，更是形态各异，色彩斑斓，有的洁白如玉，有的晶莹得像玛瑙。有一种用贝壳做的小鸟，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似

乎听得见它的啁啾之声。还有那梅花，真的能以假乱真。这不仅是大海的馈赠，更包含了工人的匠心。人们从这里带走的，既是生活的花环，也有主人的一片真情。

登船尝海鲜

还在中午的时候，主人就告诉我们，晚上有曾副市长要请我们品尝海鲜，大家一听都高兴极了。

这是一座船上餐厅。一座大船停泊在一个避风的港湾，潮退了，船便搁浅在沙滩上。他们说，渔民们出海归来，多从这里上岸，所以这个餐厅的海鲜种类最多。在这里，我们吃到了从未听说过的黑鱼。上的鲜贝叫日月贝，又叫飞螺，上红下白，似带子，当地人有个讲究，结婚时一定要吃，取个吉利，是带来贵子之意。还有一种石斑鱼，是石缝里长的，因身上长着许多深色斑点而得名，鱼肉很细嫩，鱼头特别好吃，在香港，一斤多重的一条石斑鱼，要卖一百多元港币哩！

沙虫，又叫沙龙，我们都是第一次品尝。这东西生长在海滩的沙子里。我们曾亲眼见过当地小孩捉沙虫的情景。它很像北方的蚯蚓，只是身上全是白色，形状就像拉面条子一般，还好吃。不过，吃完饭我们才发现了一个秘密，这道菜所有的女同志都没敢动筷子。

最可怕的还是吃海蛇。这是一种毒蛇，其毒性比眼镜蛇还大五倍，被咬伤后有时一分钟就可以致人丧命。从这种蛇身上提取的蛇毒，一克要卖六千美金。奇怪的是，这种蛇在岸上咬人有巨毒，而在海里咬人却不要紧。用作食用，不但不会中毒，还有祛风去湿之功效。虽是这样说，大家还是不

敢轻易动筷子。热情的服务员特意给我舀了一小碗，我鼓起勇气把它吃了下去。过后，我还在心里为自己的勇敢精神自豪了一阵子呢！

和我们一起进餐的曾副市长，话虽不多，但他很有思想，很有性格。一提到北海市今后的发展，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里资源非常丰富，1984年就被列入全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又是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惟一的海上对外通道，已建成拥有两个万吨级泊位的北海港。我们的海产可捕量每年为七十万吨，现在实际只有十四万吨，潜力还很大，而且水域没有污染。石油的储量也很大，去年已经出口三十五万吨。有一口井出的油十分清亮，纯度很高，不用提炼就可以直接加给汽车使用，这在全国都是很少有的。

从谈话中我们还得知，近些年来，这里的渔民也富起来了。他们出一趟海大约十几天，两趟就可以搞到一两万元。现在拥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户已经不少，最多的还有三百万元户哩！

曾副市长的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步出餐厅，来到大街上，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北海市，不仅从自然条件来讲是没有冬天的，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一派盎然春意。那白色的沙滩、白色的建筑物、白色的海石花，把北海市打扮得像一位身着白色西服的英俊少年，正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向大海，走向明天。

（选自《颐北集》，蹇国政著，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我背“长城砖”

黄宗英

年逾古稀，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攀梯下坡都得慢慢的；却还常常得到某些省市的邀请，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观光或参加笔会。我第一个反应是答：“我可不一定能写出什么，我特笨，从不允诺定题交稿。”对方总是很客气很热诚说：“不逼您写稿，您只要肯光临对我们就是极大的鼓舞。”不必答卷，不必写“应酬文”，我还是特喜欢满世界跑的。我是受徐霞客和费孝通影响，特爱远游。虽然我不可能像明朝徐宏祖头戴老母亲手缝制的远游冠，勘踏浙粤及大西南，以游记体按日记旅途中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做详细记录，以一部《徐霞客游记》开我国地理学界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之先河。我也不可能像费孝通有扎实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基础。他于1935年在25岁时，偕新婚爱妻学术佳侣王同惠女士深入广西大瑶山，同惠在勘察途中遇险丧命，孝通忍泪矢志，历万险千辛坎坷挫折始终如一，其行程以环赤道计，著述山积海涵，仅《江村经济》和《小城镇大问题》两篇实地调查论文，已堪称中国以农业经济占优势的新旧两个时代改革图强的理论先锋；他的一生走一村

一县一省则富一方，直到今年他已经 89 岁了，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作风深入、立论不凡；因此各地还像接财神般抢着接他去调查研讨、出主意、定策略。哎呀，小儿学语差远了。人和人难以攀比，各人尽各人的力吧；我活着，不是尽 100% 的力，是想着尽 200% 的力。人脑的潜力可以说是无限的，只要找对了方向去努力。

其实，人生每时每刻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校正方向。我每次远行，只要日程超过 7 天，我就要在可拎可背的旅行袋里搁一本大厚书，伦敦 Dorling Kindersley 出版公司出版的科学百科全书的译本——《青少年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第二版。这本大书从封面到内容每一页都有彩色插图和著名科学家、发明家的肖像，把科学基础知识生动地表现出来，使读者身不由己进入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的殿堂；展示物质、反应、材料、力和能、电和磁、声和光、地球、天气、太空、生物、生命的奥秘及生态学等 12 个方面，简直包罗万象。

这本大书重 2.5 公斤。我每到达某地，都有邀请方来接，每当书记或局长或主任抢拎我的旅行包时，我都会说：“还是让年轻人拎吧，挺重。”对方常是“哎哟”一声：“□！黄老师，您带着什么宝贝那么沉？”我笑答：“长城砖！”对方：“哟，您到我们这儿来背长城砖干什么啊？”我慢斯条理地：“您看了就明白了。只要有人接站，我到哪儿都背着它。”

譬如：我国有 126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过去我们却常说中国有 96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那是缺乏海洋国土意识，冷落了那 300 万平方公里海洋富藏，直到改革开放年代

才掀起开发海洋国土的序幕，我国拥有 18000 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 14000 多公里的岛屿岸线；还有 6000 多个岛屿。如今，在祖国大地上走着走着，或远或近就到了海边，只因内陆也有交通线通向海港，新的海陆空丝绸之路正在接通，以利内地的宝贵物资出口。每当我到了海边，对海水浴场旅游点兴趣不大，我又不写海滩上发生的多角恋爱，也写不好走私接头、潜逃出境。每个作家都有其局限和特长。我总是渴望知道当地普通人的生活：以前靠海生活的人们，现在过着怎样的日子？这里有近海养殖业吗？海水富氧化的影响如何解决？曾发生赤潮吗？有海水人工利用项目吗？有潮汐发电站吗？于是，我不由得在这本大书里找海，找海与人类的关系，海水化学资源镁、溴、碘、铀的开发，海洋石油的崛起与高科技的进展……

于是，可查地球目，找“海和洋”、“波浪、潮汐和海流”……你在查目录时，会发现“力和能”目，跟着是“流体中的力”，“漂浮和下沉”吸引着你，于是布莱兹·帕斯卡和阿基米德先跟你打起招呼来。布莱兹（1623—1662 年）22 岁时就制成了第一台机械计算机，1646 年制作了水银气压计，并于稍后用以测量气压。啊，原来我们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常有布莱兹陪伴。书上还写有：有一种压强单位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平方米承受一牛顿的力称为一帕斯卡（Pascal），简称一帕（Pa）。那么我在海拔 4950 米因淘气扔雪球患高原反应不良症，是 Pa 在捣乱。阿基米德原理我是在高小还是初中物理课学的，却不知道以这位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发明家命名的原理，据说是在他跨进澡盆时注意到水溢出现象，他兴奋得忘了自己还裸着身子，跑到大街上大

叫：“尤里卡！”（我找到了！——这也是国际“尤里卡”发明奖的由来吧）行啦，不要受焦耳、瓦特、史蒂芬森的诱惑，并火速跳过 1926 年戈达德发射第一枚用液体燃料推进的火箭；跳过和我们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电和磁——灯泡、电扇、电脑、磁铁，别忘了自己本是要找海的。可本杰明·富兰克林又拦住我的眼路：他为了证明闪电是电引起的，1752 年他在一场雷雨中放风筝，电从潮湿的风筝线上传下来，传到风筝线另一端的一把钥匙上，当他将一手指靠近钥匙时，手指和钥匙之间跳起火花……1753 年他发明了避雷针。我想起上海电缆厂大车间里巨大的仿雷击设备……呀，快翻页，到海边去，到海里去……看到地球仪，看到“移动的大陆”，才明白：事实上，所有的大陆好似浮在糖浆般的海洋上的圆木，一直在地球表面漂移着。好啦好啦，我别抄书啦，我又画不来图，那图可是又好看又明白易懂。大家自己“乘圆木”去找全球海流图和浪高可达 76 米的海啸吧，我可要在连岛沙州上喘口气，然后乘直升机往南海的钻井平台上去看望石油工人了。我不是做梦，他们去年登门说：徐迟说去没去成，你代他去吧。文坛的杰出“角色”是永恒的“血肉之躯”，没人能够替代。我怎能代替 20 世纪中国文艺与科学谐和结晶——写出过《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宇宙颂》、《谈夸克》的徐迟？！在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潮音涌涌，海鸟啾啾，我好想去哩！

我太喜欢这本《青少年科学百科全书》了。我不会去跟现代中青年作家吹嘘，我想他们离开学校的时间不长，科学常识 ABC 总还懂得也没忘记吧。但他们的孩子……他们可能没时间给孩子绘声绘色讲科学常识，如果他们手头有钱买

一本给孩子吧，哪怕孩子还小，一本彩图大书，小手手还是喜欢去碰的。我老了，老伴儿更老了，我们生活中常有些力所不及的事要烦劳中青年朋友，当他们为我搬来电脑装好试机，当海关通知我去取回澳门寄来的葡萄牙文学丛书，当我们需要新的大书架，当我的多功能电话一个功能也没有了，输入电脑的文字全飞了……的时刻，家无盈门五尺之童难以适应现代化生活时，中青年朋友们不惜时不吝力帮了我们很多忙，尤其是在我们大病后生活不能自理时，女护工真比我们的女儿会服侍我们，想到她们的家或在农村或是在山里，久而久之，我们老想对帮助过我们的他（她）们有所酬谢，以红包（钞票）来谢太庸俗了，对方也不肯收，我自然而然想到“长城砖”，送给他（她）们的儿女一块“长城砖”——我已经多次向上海译文出版社索购《青少年科学百科全书》，这本8开433页的书定价260元，曾获上海优秀图书一等奖书目。论价不便宜，论值太合算了。如今红白喜事随个分子也得这个价码，可这本书，得以伴孩子从童年到青年，并成为他们人生道路取向的重要砝码，太值得了。我的老年朋友，你如果有了这本书，儿孙节假日来看望你，就有得乐了，代沟将悄然消失在对科学的追寻中；而且它将是你生活中的“负离子空气清新剂”，使你从碌碌凡尘的苦恼中，回到青年时代的课堂里，找回逐渐淡漠了的强烈的求知欲、上进心。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年纪，“到陌生的地方去，到自己不懂的地方去”是我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并在赠《青少年科学百科全书》时书之以励青少年，也与我的老年朋友共勉。

我能背得了几年“长城砖”?! 几块“长城砖”?!

当进入 21 世纪——科技兴国、智能竞赛白热化的时代，中国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下一代青少年纷纷背起一块又一块“长城砖”，筑成科学技术新的长城吧，为了祖国，为了人类，为了文明，为了和平。

1999 年酷暑三伏

(选自《人民文学》1999 年 10 月号)

山鸟飞去又飞回

——写在香港回归祖国时

宗 鹰

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渴望啊，没有落空。

一个半世纪的不挠奋争啊，终有结果。

香港啊香港，米旗、皇冠，曾是帝国强权霸道地硬按给你的印记。今天啊，被刷掉啦，永远刷掉啦！

香港啊香港，鬼舰、洋督，曾是清朝丧权辱国强加给你的诟耻。今天啊，被洗雪啦，彻底洗雪啦！

我两度住在香港，又三次经过香港。我的人生，我的感情，有一部分留在了香江，留在了太平山，留在了维多利亚湾。

在这次欣的时刻，自豪的时刻，我想起欧阳修《千叶红梨花》中的诗句：“春风吹落复吹开，山鸟飞来又飞去。”三四年前从美国到加拿大温哥华的情景浮上心头。

我们1993年从芝加哥驱车到多伦多。1994年从西雅图驱车到温哥华。在这两个加拿大的大都会，我们都觉得像回到了香港。处处是鳞次栉比的港式商店，满街是熙熙攘攘的港人行客，真像“香港人都搬了家似的”。我们来到温哥华

的烈治文岛，“香港仔中心”啦，“百家店”啦，就如同置身中环、九龙。唐山杂货、港式烧腊、凉茶小食，应有尽有。这个“新华埠”，其实就是“新香港”。

来到温哥华，天天看到的是海，时时望到的是流。由海流自然联想到人流。温、港两地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两地维多利亚湾的潮流却连接在一起。近年来，在“九七大限”的影响下，香港的人流涌进温哥华。这一涌啊，真把温哥华涌成一个“华人世界”。不过，在那欢乐的外表里，隐伏着多少乡思，多少离怀？不少人心头萦绕着类似李白“西望长安不见家”的感念。我们曾到西区一座花团锦簇的住宅探望一对老人。男主人是香港一位退休企业家，女主人是香港中文大学一位退休教授。

“你们这里真美，真好！”女儿连声称赞。

“天气好，环境美，住宅也不错，比起香港住得舒适多啦！”老先生满脸笑容地说。

“舒适是舒适，还是觉得不是香港，不是自己的地方。”女教授微微叹气。

“冬天尤难适应。三点多就天黑了。外边又冷。”老先生说。

“我们成了候鸟啦！”女教授微笑，轻轻摇头。“春暖，我们飞来。深秋，我们飞回。年年如此，飞来飞去！”

“我有时要多飞几次。在上海有投资，做生意……”老先生慢条斯理说。

我心想，他们都年逾七十，还能做几回候鸟？我不由想起王恭《春燕》诗句：“春风一夜到衡阳，楚水燕山万里长。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

“山鸟飞来又飞去”，最后，还是鸟恋故林，回飞归巢。

那天到北温哥华，顺路去山腰一座三层住宅探望一位中年女士。入门见到一只可爱的宠犬。女主人得意地谈起这只狗的奇异来历。她们姐妹两家从港迁来，合住这座楼房。姐夫一直无法在此打开局面，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近年在中国内地找到生意，于是常回香港和内地。一年到头飞来飞去也非长久之计，索性全家搬回香港。偌大一座楼房，她一个人住难免心慌，想养只狗看门壮胆。一天，这只壮健的大黄狗突然来到她家，一连几天都不离去。她先用英语同它“交谈”，毫无反应。后来改用广东话，一召唤，它立即摇着尾巴挨过来。她估计这只狗以前的主人也是香港来的人，如果是迷失了路，它不会随便不回家的，很可能主人回流香港，把它遗弃了。它要自找一个新主人。

于是，话题就落在“回流”上。

“唉，香港人大批移民来此地，其中不少人家只是迁来一半，另一半留港保职守房。家分两地，长年累月，哪有不生变故的？何况这几年此地经济不景气，谋生求职都不易。反观香港，越临近‘九七’，反而越有起色，经济更显兴旺。人流就开始回转倒流啦。现在不但纷纷流回香港，而且还带着生意，带着资金流回中国内地……”

几年过去了。倒流的人潮，更为汹涌。除了经济、生活、乡念等等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成功组建，使越来越多海外港人摆脱疑惧、惶恐，而勃兴“九七大幸”、“九七大庆”的“回归热”。

香港啊香港，你这被人强占的土地，带着灿烂的珠光宝气，扑回祖国的怀抱。朝朝暮暮思念你的祖国，擦掉强加在

你身上的诟耻，让你发出更灿烂的光辉。

香港的儿女啊，飞回吧，曾经飞去的多情的故乡鸟！

（写于芝加哥西郊徜徉室）

（选自 1997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报》）

从拱北到关闸

——澳门见闻录

傅宁军

巴士从广州城里开出还晴空丽日，到了珠海市区却飘起了□□细雨。枝桠上深深浅浅的绿色在雨丝中摇曳开来，一扫岭南阳光残留的燥热，空气也变得绿茵茵清凌凌了。

拱北边关设在珠海市的最南端。那是一栋外观普通的四层楼房，最底下一层是进出人员及来往车辆的通道。地图上看，这里有一条二百米宽的土堤和澳门相连，而三面环海的澳门半岛，也惟有这条土堤通向祖国大陆去。

走进边关大楼，先经边防检查站的武警军官核审证件，然后经海关检查行装。我看到，来来往往的过境者络绎不绝。初夏时节衣着极为单薄，过境者中不少人只拎着一两只装东西的塑料袋。我问海关小姐，怎么很多人不像出远门的样子？

这位海关小姐告诉我：那边来的大都有亲属在这边，这边去的大都有亲属在那边，按规定允许有亲属的人持探亲证常来常往。假如在澳门带条外烟入境，到珠海卖给摊贩后再买点蔬菜带回去，这样一倒，几倍的菜钱都不在话下。

“那么”，我好奇地问，“你们也可以常过去看看□？”
“哪里”，她笑着摇了摇头，“出大楼就是出境了，我们海关工作人员，有的干到退休年龄，还没有走出过往澳门的那个出口呢！”

我想起报端披露拱北海关多次查获走私大案的功绩，看看海关小姐大盖帽上银亮的海关标志，那是一个铁锚和一把钥匙，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步出边关大楼，隔一片开阔地就是澳门的关闸，这中间相隔大约二百米，细雨里这段“空白地带”净无纤尘。过去曾经是禁区，葡国驻军于1975年全部撤出澳门后，这里不再有一兵一卒，但见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流。有趣的是，在中国边关大楼进出都是靠右行，而进出澳门的关闸，就要按澳门的交通规则靠左行了。

关闸当街而立，上面悬挂葡萄牙国旗，是进入目前仍属葡萄牙领地澳门的标记。我们通常所说的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及凼仔岛、路环岛，总面积16.92平方公里。关闸呈长方形，外观颇有葡国风味。在椭圆形门洞两侧墙壁上，各有白漆勾描的图案浮雕，或是铁锚或是火炮，还镌刻着“1849”的纪年数字。

就在1849年，葡萄牙人驱逐清政府官吏和海关人员，占据整个澳门半岛。随后又占据凼仔岛和路环岛。不过，葡萄牙人的后代改变了在世界上的形象。时隔一百三十年后的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并圆满解决澳门问题，1999年12月20日中国将恢复在澳门行使主权，那时澳门将作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关闸也将作为葡国留下的“文物”而存在下去……

关闸既无闸门也不设关，只是在关闸内左侧有个小屋，门口摆着个小长桌，有三五个穿蓝制服的边境人员。偶尔会喊进关的人停下，把携带的提包之类的物品放在桌上检查。我留意了一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被喊过去，只管走自己的路。关闸内的右侧连小屋也没有，出关的人们无遮无挡，好像责任都归拱北中国海关了。

我回头望去，拱北的边关大楼上的五星红旗，在细雨里仍鲜亮地飘扬。天是浅浅的蓝，雨是透明的，这边的大楼的规模要比那边的关闸大许多，它的五星红旗也比葡国旗要高出一大截，两个远隔重洋的国家的旗帜相距两百米互相凝望，默默无声却似有千言万语……

中国，我多灾多难的祖国，近百年来遭异邦欺负多了，留下的耻辱多了，把自己的关楼修得高一点，怕也是一种民族心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露吧？带着痛苦的记忆和悲怆，带着燃烧着的希望，中国毕竟在地球上站立了起来，这是举世公认的，它是民族自尊心的注释，也是民族凝聚力的依托。

也许就这一点而言，全世界都该谅解中国人。

（选自1990年第1期《钟山》）